



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

中国 资本主义萌芽

(上) 田居俭 宋元强 编

巴蜀书社



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

中国 资本主义萌芽

(下) 田居俭 宋元强 编

吉林出版社

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上册

田居俭 沈元强 编



北京出版社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13032

1113032

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下 册

田 村 仁 著 衣 谷 猛 编



巴 蜀 书 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13046

1113046

出版说明

1987.18

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史学界对中国史学上的许多重大课题展开了研究和讨论。随着历史学研究的日益活跃与深入，史学界很多同志特别是广大中青年同志，迫切要求对三十多年来对许多方面的研究与讨论情况能有个较全面的了解，以便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为了满足史学界的这种要求，也为了给今后的史学工作者保留一套较完整的中国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

这套丛书大致分为史学总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至一九一九年）三大类，每类又分为若干专题，按专题分册出版。每种专题分册又由三个部分组成：专题研究的概述、重要论文选编、论著目录。概述与编选都以专题讨论为中心，兼顾有关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全面、准确、客观地反映已有的研究水平。编者对某些学术问题的评价和看法，不代表编委会的意见。

丛书编委会由李侃、林言椒、王庆成、陈高华、袁庭栋五人组成，李侃为主编，林言椒、袁庭栋为副主编。工作机构设在《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

由于我们对编辑这类书籍缺乏经验，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和史学界同行提出建议和批评指教。

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

巴 蜀 书 社

目 录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略述	田居俭 宋元强	1
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	侯外庐	112
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	邓拓	150
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		
——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	翦伯赞	173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问题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所作的报告	吴晗	241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	尚钺	251
略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	吴大琨	329
中国封建社会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孔经纬	339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	黎澍	363
《织工对》史料能说明中国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吗?		
——兼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在运用史料与论		
证方法上存在的问题	彭泽益	405
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	傅筑夫	433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478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若干问题	伍丹戈	491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	吴承明	506

目 录

DA99/18

关于中国清初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发展水平问题 ——和吴大琨同志商榷	李之勤	527
关于中国清初资本主义生产萌芽发展水平问题 ——答李之勤同志兼评尚钺同志的几个论点	吴大琨	575
明末城市经济发展下的初期市民运动	刘 炎	589
试论万历民变	刘志琴	626
关于徐一夔的《织工对》	郑天挺	646
商人资本在棉手工业中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徐新吾	665
明代矿业的发展	白寿彝	697
明代后期景德镇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梁森泰	748
四川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	冉光荣、张学君	779
论中国地主经济制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	李文治	815
论清代前期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	刘永成	845
明清农业经济关系的变化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	柯建中	870
关于中国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尹 进	904

论中国封建经济成熟甚久瓦解特慢的原因·····	胡寄窗	932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萌芽·····	方 行	950
明清封建专制政权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	洪煊椿	974
论明清社会的发展与迟滞·····	傅衣凌	998
建国以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索引·····		1015
后记·····		1064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略述

田居俭 宋元强

建国以来，我国历史学界曾围绕一些重要课题，进行了长期地研究和讨论。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孕育、发展及影响，或曰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的提出可追溯得更早，但广泛、热烈地讨论则肇端于五十年代中期，迄今已有三十载。为了喜迎史学百花园地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我们编辑了这本论文集，并借一点篇幅，概略地回顾一下同行们往日辛勤耕耘的历程，选择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予以撮述，为有志于此道的同志（特别是青年同志）继续探讨这一课题提供方便。

一、讨论的由来与发展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前期史，可溯源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我国学术界曾开展过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大论战。在论战中，出现了所谓中国社会的发展完全是由外来原因决定的“外铄论”、中国社会发展极其缓慢的“停滞论”以及中国早已进入“商业资本主义”阶段等说法。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为了批驳这些歪曲中国历史的

荒谬观点、深入研讨中国社会的性质，便触发了对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另外，由于马克思主义当时业已传入中国，一些研究思想文化史的学者，开始以它为指导，探讨中国历代思想演变的物质基础，也逐步涉及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例如，邓拓在三十年代写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①一文，主要是反驳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西欧资本主义侵入之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已经成熟，官僚工业已向着较正常的道路发展。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侵入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已经有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但这只是某种程度的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当时手工业的经营，还没有达到工厂手工业的完成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并没有真实成熟。这是我们目前见到较早的一篇明确提出资本主义萌芽并对其发展程度作出估计的文章。又如傅衣凌回忆说，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他对中外学者提出的中国社会长期落后的理论有所反感，不同意“外铄论”。在研究苏州洞庭商人时，发现有商人雇募工人从事纺织生产。这说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出现商业资本和生产相联系、商人控制生产的初步萌芽，因此否定了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说”^②。在搜集手工业史料的过程中，看到了严如煜的《三省边防备览》，于是写了《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③一文，指出这些地区的手工业形态，已超出原始的家内工业的生产，极接近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阶段。因为它是在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调集多数的劳动者，从事种种

① 见《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三联书店1959年出版。

② 《我是怎样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文史知识》1984年第3期。

③ 原载1946年《厦门星光日报》历史双周刊，后收入《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不同的作业。手工劳动者的劳动，自原料购置到产品完成，全由一人承担；但在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条件下，每个劳动者的作业极为单纯，长年从事同一工种的作业。总之，明清时代封建社会内部的生产技术水平与分工，已出现某种变化。这篇文章，尽管没有明确使用“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但实际上是国内较早的一篇专门探讨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

迄于解放前，对这个问题论述较多的是吕振羽。1937年，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使用了“都市布尔乔亚的社会因素”这一概念，认为：“到明清之际，布尔乔亚的都市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社会经济领域中之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布尔乔亚势力的成长而开始其独立性的表现，便产生具有革命性质的黄宗羲、戴震、王夫之等人的布尔乔亚的政治哲学。”“然而中国的布尔乔亚虽然走入了阶级任务之履行的进程中，但是作为布尔乔亚革命之社会因素还未达成熟之际，便遭受外来的强力袭击——鸦片战争，把它绞杀于母胎之内”^①。1940年，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提纲》一文中，提得更为明确，认为：“到明末，并出现了资本主义性的手工业工场的雏形”，清朝社会是明朝社会的继承和发展，“培养着资本主义的因素”^②。在1948年出版的《简明中国通史》中，他已直接用“由封建经济的复兴到崩溃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为标题，指出：“由于自由商人原始资本积累的增高，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大量贱价劳动力不断由农村流入都市，以及社会一般生产力与技术的进步，又引起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萌芽。”“但是这种资本主义原始形态的东西，还只是在这里

^① 《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十编，上海黎明书局1937年出版。

^② 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耕耘出版社出版。

那里出现，并非普遍存在；在明清之际，又受到致命的摧残。”由于清廷反动政策的打击和束缚，“中国市民阶级和生产力的进步，为龟步式的前进”，“但是在鸦片战争前，从中国社会的内部，却也重新生出资本主义的嫩芽。”如农村，就出现了“带有一些资本主义内容的经营地主生产”等等^①。

全国解放以后，有一些学者在研究通史、思想史的过程中，继续探讨我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发表了一些重要见解，并注意引用史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对明代的经济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认为：“在明代，特别在东南沿海一带，在生产方式中，数百年来发生的逐渐变化，现在却引起了变革，资本主义因素逐渐地增长起来；但另一方面，这种资本主义因素，特别是在明中叶以后，受到了封建主的各种压制与打击，未能获得迅速的发展。”“明代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产棉区和棉织业中心的分工，手工业原料需要的增多，赋役和其他税收的改征银币，农业中大批雇工的出现，都说明了明代农业上资本主义因素在显著增长。”该书还认为，在清代的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的手工制造业都占一定的地位”，然而它的发展也曾受到了清朝统治阶级的狂暴摧残、压迫和阻碍^②。侯外庐对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③进行了重大的修订和补充，出版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书中引述多则史料，证明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已存在资本主义的幼芽。而且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阶级关系也起了变化，出现了市民运动。当时的启蒙思

① 《简明中国通史》第十五章，大连光华书店1948年出版。

② 《中国历史纲要》第六章，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

③ 重庆三友书店1944年出版。

想，就是这种经济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反映。这部书中的许多见解，对以后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萌芽广泛地展开讨论。肇始于1954年。这一年，学术界对《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涉及到该书的时代背景和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李希凡、蓝翎在《评〈红楼梦研究〉》^①一文中提出：贾宝玉“是当时将要转换着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曲折地透露了那个时代尚未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变革封建制度的历史要求。”次年，邓拓发表了在当时影响极大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②一文。此后，翦伯赞、吴晗、尚钺、黎澍等也相继撰文，遂使资本主义萌芽成了热烈讨论的课题。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是史学界讨论资本主义萌芽最为热烈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出版了若干种专著。有两种论文集，专门辑录了具有代表性的讨论文章^③。在讨论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有：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内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何时出现的？哪些是资本主义萌芽，哪些不是资本主义萌芽？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可谓聚讼纷纭。有唐代出现说、宋代出现说、元代出现说，更多的论者则是明清出现说。不过具体出现在明清两代的什么时间，看法也很不一致。第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如何？中国社会是否因此发生

① 《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0日。

② 《人民日报》，1955年1月9日。见作者著：《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

③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选编了1956年9月以前发表的33篇论文；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三联书店1960年出版，收录了1956年10月以后两年中发表的20篇论文。

了变化？论者对此问题所持意见分歧很大，因而相互争论、辩难也最为热烈。第三，资本主义萌芽对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有无影响？多数研究者认为我国明清时期已出现市民阶级和市民运动，个别学者则持相反意见。第四，比较集中地探讨了丝织、棉织、矿冶、陶瓷等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论者多数主张这些部门在明清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少数则认为某个部门还没有出现。不过，即使认为已经出现的论者，对于萌芽的表现及程度，看法也多有歧异。第五，关于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文章较少。论者大多认为农业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个别人持相反的看法。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有两个论断，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影响极大。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这段话当时普遍为研究者重视和引用。毛泽东同志还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②这段话正式发表较晚，但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早已被视为经典性的论断。

十年动乱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术研究万马齐喑，唯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20页。

^②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2年1月31日），人民出版社1978年单行本。

独文坛上出现了一股畸形变态的“《红楼梦》热”。虽然“评红”也多少涉及到了资本主义萌芽及市民思想等问题，但基调划一，人云亦云，很少有学术价值。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学术界又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许多史学工作者感到，经济史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应该大力加强，这有助于揭示中国历史的全貌和发展规律。因此，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风气日盛，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愈加受到重视。另外，鉴于林彪、“四人帮”推行封建法西斯专制统治的痛苦教训，史学界曾对我国封建专制主义展开批判并对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进行讨论，这也涉及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从1976年至1984年，在经济学和历史学界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这项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并取得了不少新成果。据统计，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约有一百五十余篇，出版了若干种专著，还有两种论文选集^①。

通观这一时期的著述，可以清晰地看出以下特点：第一，几乎所有的论文不再把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和小说《红楼梦》的时代背景相提并论。对五十年代和十年动乱期间“《红楼梦》热”中提出过的许多论点，有人尚赞成其中一部分，有人提出怀疑和反对，更多的人是不予顾盼，把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一个专门的、独立的学术问题来继续探讨。因此，从现象上看，参加讨论的人和发表文章的数量都不如过去多。第二，在五十年代，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概念进行争论较多，综合地、一般性地论

^① 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选辑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文章19篇，1976年至1979年的研究成果12篇。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主要选辑了1980年初至1982年4月的研究成果18篇。

述资本主义萌芽的文章较多。近年来，则有愈来愈多的论著专门探讨某一地区——如广西、陕西、广东、苏州、佛山的资本主义萌芽，或专门探讨某一行业——如景德镇制瓷、四川井盐、北京采煤、广东采矿等业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工作呈现出不断深入的趋势。第三，思想较为活跃，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新观点、新方法。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发生的时间，相继有人提出战国出现说、两汉出现说和清代出现说。有的文章对中国历史上究竟是否有过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就一定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有的研究者对倭寇、海禁、流民等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见解。有些文章围绕行会、会馆、公所的性质和作用问题，展开了讨论。有的文章开始采用中西对比和计量的方法进行研究，等等。这种自由讨论的浓厚空气，是五、六十年代无法比拟的。第四，运用史料的范围日益扩大。除了官修史籍、私人著述外，许多研究者还使用了档案、契约、碑刻及社会调查的材料。近年国内出版了多种档案和碑刻资料选辑，大有益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第五，如果说，五十年代主要是一些知名的老一代史学家发表鸿论，近年来，则主要是一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争鸣，并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第六，五十年代讨论的中心课题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早晚及其发展水平，许多文章对萌芽的程度估计较高。近年来，较多的文章则着力于探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发展不起来。

以上，我们从纵向简要地回溯了我国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和研究的来龙去脉。下面，我们再从横向来缕述讨论中较为集中的若干专题。

二、何谓资本主义萌芽？它出现于何时？

目前，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中已孕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它具体出现在什么时期，哪些是资本主义萌芽，哪些不是资本主义萌芽，则各执己见，莫衷一是。有的研究者，还不断地对自己的结论进行补充和修正。大体归纳，有如下几说。

1. 战国出现说。

这是近几年出现的新见解。

胡寄窗在《论中国封建经济成熟甚久瓦解特慢的原因》^①一文中，作了如下论析：首先，在五十年代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中，绝大多数同志把“萌芽”不适当地理解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水平，如劳动者必须完全自由，不能带有丝毫的封建人身依附的残余，厂主不应带有丝毫手工作坊老板的味道，而且这种作坊必须“鲜明”地看到，而不是“稀疏”地出现。但是，“倘使达到这样的水平，那已是资本主义初期的形态，而不再是“萌芽”状态了。甚至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初期的资本家和工人也不一定如此纯粹。”所以，要求资本主义萌芽具有其较成熟状态所应有的条件是不妥当的。其次，任何一种存在剥削的生产方式，都会同时存在若干过时的或新兴的因素，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生产方式，只是占统治地位而已，而作为零星存在的过时或新兴的生产方式，必然受占统治地位生产方式的制约

^① 《经济研究》1981年第6期。已收入本书。

而带有相应的色调。由此可知，只要有小商品生产存在，就可能有雇佣劳动零星而稀疏的存在，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之存在。

“在中国，说它出现在战国后期亦无不可，未具备成熟条件的萌芽也是萌芽。至于接近完全成熟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在中国封建时代始终就没有过。固然从古代到清末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内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有所发展的，但它仍是稀疏的出现于个别时期或个别地区，只有量的差别而不曾发生什么质的变化。”所以，争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起于何时，“远不如探讨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已持续地巨大发展，何以未能及早地瓦解封建经济的原因，为更有意义。”如照多数学者意见将萌芽时期定在明清，战国秦汉时代商人资本已甚猖獗，唐宋时代手工业分工之细密、国内外贸易之发达等，都将无法解释。他强调：“如将‘萌芽’时期推早到唐、宋或以前，在理论上亦无违反马克思主义分析之处”。

傅筑夫在其近著《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修订了他以往的看法，提出战国时已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我们说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结构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因素，乍聆之下，也许对于这个提法会感到新奇，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出现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与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两回事，资本主义因素是产生资本主义的一些历史前提条件，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是资本主义萌芽本身。”^①他认为，所谓资本主义因素，就是发展了的商品经济，只要商品生产不再是个体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只要商业联系

^① 《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300页。

着生产而不再是单纯的贩运，这种商品经济就含有了资本主义性质。马克思说：“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而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因素，就是指这种“历史前提”而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较早出现的原因是：一、中国历代的城市 and 欧洲型城市不同，没有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冰炭不相容的行会制度。中国古代工商业者虽是不自由的，但只要他们的经济行为不与礼法、王制抵触，就能获得西方工商业者所不能获得的营运自由。中国城市给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园地。二、由于交通的发展等原因，国民经济体系在春秋末到战国时逐渐形成。这种体系，是社会经济发展到含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时所形成的一种经济结构形态，它建立在广大国内市场的基础上，而且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三、春秋末到战国时期，货币经济突出发展，贵金属黄金已成为事实上的主要货币，这是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一个本质要素或前提条件。四、营利思想高涨和流行，这是资本主义因素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从战国到西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表现是：一、专业化的商人雨后春笋般出现，商业资本有了大量积累。商业的性质和经营方法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扩大了营运范围，改变了商品的构成。经营的货物已不再是本地区少量的物资，而是远程的和运销于全国各地的大宗贸易，包括全国各个地区和各生产部门的产品，不管它们原来是不是商品。二、大型工矿企业发展，主要是煮盐、采矿、冶炼和铸造铜铁器皿等，其所使用的工人，只能是雇佣劳动者，而不可能是其他。

对于战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说，迄今不同意见间的争论尚少。

2. 两汉出现说。

这也是近年提出的一种见解，目前只有个别研究者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饶会林认为，“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上限，不在明清，也不在唐宋，而在两汉”。他在《我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的上限问题》^①一文中，列举了三点理由：一、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前提和根本条件。从铁的冶炼和加工、钢的生产、有色金属的加工、各种燃料的发明和使用、造船和纺织等手工业以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看，两汉时期比西欧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十四、十五世纪，有过之而无不及，大约与西欧十七世纪相当。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前提。以商品生产而言，十七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进出口共约三十种，我国两汉时期与此极其相似。商业城市在兴起，当时成都与英国曼彻斯特十九世纪中叶的人口数量相当。城市密集程度也超过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西欧。对外贸易也已十分发达。三、雇佣劳动制出现。当时社会存在着封建剥削关系，这是主要的；但也有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它在当时私营大工商业中已占统治地位”，此外还有奴隶制剥削关系，它在各生产领域均不占统治地位。总之，“两汉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确已发生”。

张寿彭在《“两汉资本主义萌芽说”的质疑》^②一文中，对上述见解提出异议。他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封建社会内部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原始形态，也就是在封建社会

^① 《辽宁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② 《辽宁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

末期出现的以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为一方，以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为另一方的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关系的最初形态。换言之，有产者剥削无产者，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剥削关系，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基本标志。饶文不是从当时社会生产关系变化的角度去探讨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而是孤立地把生产力发展水平作为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否的标志。其次，两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虽明显地超过了西方相应阶段，但这时商人贩运的主要是统治阶级需要的珠玉金银等奢侈品；区域性市场尚未形成，商人包买主尚未出现；国际贸易也仅是一种贩运，主要为贵族官僚奢侈消费生活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次，中国的雇佣劳动虽然出现很早，但那并不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工人，只能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佣劳动者。

3. 唐代出现说。

较早提出这种主张的是孔经纬，他在《中国封建社会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①一文中认为，根据列宁所说的：“从分散的小生产生长出资本主义的简单合作。”^②我国自唐中叶以后，分散的小生产者即有了开设大一点作坊的可能，如《太平广记》所载，唐天宝年间，刘清真与其徒二十余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可能是已具有资本主义单纯协作性质的大作坊了。《乾闥子》中叙述的窦某，由于剥削雇工，从事商品生产，成为食于人的资产者。可见，“在唐朝的一些地区内，雇佣劳动关系已有相当发展”。同时，中唐以后，个别地方“也出现了商业资本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最初资本主义萌芽形式”。吴海若也

^① 《新史学通讯》1955年12月号，已收入本书。

^②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15页。

持有类似看法，他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①一文中强调：资本主义在工业发展中有三个阶段，即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工业。前两个阶段，不论在中国或外国都是在封建社会内部萌芽的，而且在社会经济中不能成为统治形式；机器工业阶段，通常是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发生的。我们所说的萌芽不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基本因素，“而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初级阶段，即指雇佣劳动的大作坊和手工工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据此，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萌芽于明代以前。如《太平广记》载，张守珪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工〔工〕者杂处园中。”这段记载，看来是经营地主的经济。经营地主的经济一方面有封建性，另一方面也有资本主义性质。又，据《糖霜谱》载，唐宋时种蔗制糖已是商品生产，需要多数人协作，糖霜户已经分化为上户、下户，“其中必然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

傅筑夫、李竞能在五十年代曾合写《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一文，后来傅筑夫对其进行修订和补充后，改名为《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②，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开始，这种生产方式，一方是占有生产资料因而也就占有货币和生活资料的有产者，一方是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便不能生存的无产者。有产者剥削无产者，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剥削关系，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建立的基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乃是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历史前提。我国唐代已有了相当发达的国内外商业，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资

① 《经济研究》1956年第4期。

② 载《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三联书店1980年出版。已收入本书。

本，商品生产也跟着发达起来，因此，商业资本必然逐步向产业渗透，开始向产业资本转化。唐代还出现了同时期欧洲不可能产生的大型作坊和手工工场，雇佣劳动制已是普遍实行的一种制度。所以，“尽管唐代还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高峰时代，但是已经在这个经济结构的胎内孕育着资本主义因素的最初萌芽。”如果说，它这时还是个别地、分散地出现，“那么，把这些现象看作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历史前提，则是毫无疑问的。”

4. 宋代出现说。

在五十年代，围绕这种见解，曾展开过讨论。

束世澂最早力主此论。他在《论北宋时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①一文中认为：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以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资本主义关系的构成，一方面要有掌握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一方面要有自由出卖劳动的劳动者，这两者还需相互对立而发生接触才能有资本主义生产。我国宋代，商品经济已空前发展，它表现为：国内市场的普及、政府在城市的收入在财政上占有重大比例、社会劳动分工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市场逐步扩大、封建政权很需要工商业资本的支持。“这样高涨的商品经济，是可能作为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前提的。”其次，北宋时已涌现出大量脱离农村封建制和城市行会限制的无产者，雇佣劳动者普遍、大量地存在着。第三，北宋社会存在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如苏轼《徐州上皇帝疏》云：“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镒巨万，……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

^①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已收入本书。

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也。”此外，造船、制瓷、丝织等业，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这一萌芽还不只是稀疏地出现”。文章还认为，北宋资本家声势已很煊赫，能与封建主抗衡，因此出现了重商主义派。如苏轼反对征收工商业者的助役钱和均输法，王岩叟“请诏有司讲究商贾利病”等，“不能不说是商人资本家的代言人”。柯昌基也持同样观点。他从宋代雇佣劳动的性质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①，认为：宋代已到了中世纪晚期，由于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封建制度逐渐解体。当时有非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也有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采矿冶金业中除利国监外，信州铅山铜场“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景德镇制瓷业有二三百民窑，雇工与从业者达“数十万”。煮盐业更为典型和突出，资本主义盐业经营在四川很普遍，工资劳动者已没有任何人身依附关系和财产的束缚，只有经济上的隶属性。宋代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大都反映在工场手工业中，其具体概况为：零星的，具有地方性；规模较大，工人达五百多，有的工场包括两、三个作坊；内部有一定的分工，生产有一定的秩序性与连续性；采取轮班作息，凭技付酬；工人的劳动具有若干奴役性。此外，宋代个别农业部门，“资本主义也像晨曦一样地从云端缝隙间透射出了一点儿微光”，在制糖、园圃、种茶等部门，有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

韩大成也认为，在宋代井盐业和冶铁业中，出现了基本是自由的雇佣劳动^②。孔经纬在前面提到的文章中也强调，中国资本

^① 《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

^② 《对黎澍同志“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一文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主义萌芽在宋朝继续发展，南宋更为突出。傅筑夫在《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的见解是：宋代（尤其是南宋）商品生产远比唐代发达，而且大大超过了十四、十五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时的发展水平。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型作坊和手工工场，在宋代已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大量地、普遍地存在了。不但在私营的各种商品生产及服务性行业里，雇佣劳动已成为劳动的主要形式，而且在官营手工业中雇佣劳动亦在取代徭役劳动。“总之，根据宋代的商品经济和雇佣劳动的发展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宋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产生时期。”

有的研究者还作了如下估计和论断：在宋代，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范文澜说：“北宋政治统一给予手工业、商业以巨大的影响，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都比唐朝发达，货币流通也比唐朝有很大的增加。宋朝生产力的顺利进展，很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①华山在《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②一文中，认为可以从茶叶经济看资本主义萌芽在宋代出现的可能性及其发展的长期性和艰苦性。其主要论点是：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虽然商品经济不一定引导到资本主义，但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就不可能出现。而从茶叶经济推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一点来考察，“我们可以说宋代的商品经济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已经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除了一定程度的商品经

① 《中国通史简编·绪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② 《文史哲》1957年2—3期。

济发展外，还需要有货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以及自由劳动者，即自身劳动力的出卖者。“由于史料的不足，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宋代已经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根据我们现有的一些材料，我们也可以判定有这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如宋代不论在农村或都市已有雇佣劳动者存在，单在茶焙里的雇工就要有四十万人左右，这在当时是个相当大的数目。而且，工资也货币化了。不过，雇佣工人的身份及是否受行会制度的束缚等，在制茶业中还看不出来。总之，“由于文字史料的缺乏，我们还不能断言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在宋代发生，但从宋代社会各方面的条件看，这种萌芽的出现有其极大的可能性。但它的发展是比较艰苦的，而且是长期的，这不仅由于连续几次的落后民族的入侵，在某种程度上打断了它历史的进程，而更重要的是封建国家对若干主要工商业的垄断政策，使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大为缩小，并受到严密的控制。所以它的发展就显得非常迟缓，要超过西欧国家几倍的时间。”

不过，在五十年代，有的研究者也专门撰文对宋代出现资本主义雇佣关系说提出异议。王方中在《宋代民营手工业的社会经济性质》^①一文中，申明了如下看法：在宋代，家庭手工业相当广泛，手工业者同土地牢固联系着，他们并不从事商品生产。手工业中有小商品生产者（如丝织业的机户），但没有采用雇佣劳动形式，仍是使用家内劳动力的小作坊。在造纸业中，即令使用了雇佣劳动力，“考虑到当时整个的社会经济条件，也很难肯定这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我们不应当忘记工役制劳动力也是采取雇佣

^① 《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

形式的。”在瓷器、矿冶、制盐业中，有些作坊的劳动力采取了雇佣的形式，“然而，就其劳动力性质，就其与封建政权的关系等方面来说，这些作坊的性质还是封建主义的，而非资本主义的。”只能说，这些作坊的出现有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近年来，有的学者对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继续进行探讨。柯昌基的《再论宋代的雇佣劳动》^①一文，对宋代陶瓷、印刷、造纸、矿冶等行业中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论证。郭正忠也指出，十一世纪中叶，在我国四川地区，曾出现过一种新式盐井——卓筒井，其生产关系已突破封建主义樊篱，“属于中国历史上——大约是第一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前身，曾有过比西欧市民阶层更早的‘创世纪’；只是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打击，他们又夭亡了”^②。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强调：中世纪有过形形色色的“包买商”。其主要业务，是为了转卖商品而包购产品。这类商人资本支配生产的途径，后来被马克思称为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两条道路之一。从《永乐大典》保存的一桩“梦夫令诉冤”命案及其它史料来看，西欧中世纪末那种纺织业包买商人，早在十二世纪前后我国便已出现。“宋代纺织业中，已经出现或正在出现产业资本的萌芽；至少，资本主义萌芽形成的主要历史条件，已经存在”^③。

5. 元代出现说。

① 《南充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

② 《宋代四川盐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6期。

③ 《宋代纺织业中的‘包买商’》，《光明日报》1984年7月18日。

认为元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者，主要是依据徐一夔《始丰稿·织工对》中的一段记载：“余僦居钱塘之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过其处，见老屋将压，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进而问之曰：以余观所为，其劳也亦甚矣，而乐何也？工对曰：……吾业虽贱，日傭为钱二百缗，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养吾父母妻子。”这段史料，吴晗在三十年代就曾予以介绍^①，但史学界对这一资料叙述的时间是元末还是明初，织工所从事的行业是丝织业还是棉织业，解释不一。郑天挺在《关于徐一夔“织工对”》^②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详密的考订，结论是：“徐一夔《织工对》叙述的是元末杭州丝织业织工。”钱宏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若干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③一文中也认为，《织工对》的记载表明生产资料为作坊主私人所有，直接生产者是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出卖者，他们与雇主间没有其他身份隶属关系，所以“江南的丝织业中在元末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也有论者持相反的看法。彭泽益在《“织工对”史料能说明中国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吗？》^④一文中提出：第一，只有揭示元代手工业者身份地位的真实情况，才能对《织工对》所记述的生产性质作出符合实际的估计。事实上，元代的封建依附关系是很强烈的：工农业直接生产者丧失了身份的自由，沦为被奴役的地位；封建劳役以繁重并带有奴役强制性著称，还存在着

① 《十四世纪时之纺织工厂》，1936年《清华周刊》45卷、第6期。

② 《历史研究》1958年第1期，后收入作者著：《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已收入本书。

③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2集。

④ 《经济研究》1958年第4期。已收入本书。

行会强制。元代史料中的所谓雇佣，没有丝毫“自由”气息，表现为极端落后的奴化形态。第二，《织工对》记述的“是属于一个封建行会手工业”。作为这个“织家”的业主，一方面是行会老板，另一面又当是属于投下匠户。所以，即使对这个丝织手工业的外部关系存而不论，仅从它的生产本身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而言，就已充分证明它完全是封建性质的，“根本不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和特点”。

近年来，有的文章还在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刘文娟的《从“织工对”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彭泽益同志商榷》^①引录了《织工对》的全文^②，认为徐一夔记述的杭州丝织作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她强调：第一，不能只依据“系官匠户”或“投下”户的史料，把元代民间手工业者的存在估计得过低。当时自由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市场，确是存在的。第二，元代的“行”只是一种被封建政府用来办税、对工商业户进行超经济强制的工具，并不过问本行业的具体生产和销售，特别是生产组织的内部事务。但她又认为，《织工对》本身，“尚不足以作为中国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标志”，因为单靠少数事例，不能肯定它属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范畴。某些分散偶发的形式，在比这更早的时期也是见得到的。“这样看待它，并不等于就能抹煞它本身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

6. 明清出现说。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清时期出现的，征引的史料十分广泛，下文将有提及。不过，对

^① 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以编：《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于萌芽出现的具体时间，看法仍不一致，大约有以下七、八种见解：

吴晗依据徐一夔的《织工对》，认为明朝初年“产生了大作坊资本家对手工业工人的剥削关系”^①。具体表现为：在同一里巷，有若干同一行业的大作坊，大作坊主人同时也是商人，手工业工人从个体的生产转向大作坊的集体生产，有了单纯协作，产品精致畅销，经营大作坊有利可图，资本家颇为赚钱，作坊随之增多。

洪焕椿根据对江南一带的历史考察，认为“在十五——十六世纪，即明代正统到万历年间，江南地区的某些手工业部门，特别是纺织事业，已有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这种现象是散见的，而不是偶发的”^②。他进而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实质上就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的最初发生。研究这种萌芽，首先应观察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因为只有商品生产发展，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准备条件；同时还要进一步考察封建制度的某些变化，看是否存在资产者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十五——十六世纪时，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人身依附关系逐步削弱。从《松窗梦语》、《醒世恒言》等书的记载看，一方面出现了小生产者分化的现象，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工场主；一方面是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直接控制了生产。这是由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方式的两种途径。特别是在丝织业中，已存在一定规模的自

① 《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② 《论十五——十六世纪江南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4月号。

由劳动力市场，工场主与机工的关系，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

傅衣凌指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始自明代中叶，以嘉靖朝（1522—1566）为一转折点，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也就是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大约有三百多年的时间，这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①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应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变化来进行考察。在手工业生产方面，明代中叶以后，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状态。苏州地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不失为一个有力的证据。广东出现高炉冶铁，初步具备手工工场的雏型，出卖劳动力的人，具有原始雇佣劳动的形态。在农业生产方面，在短工中，具有自由雇佣劳动者的萌芽。

许大龄认为：“约当十六世纪的前后，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江南确已成为散见的现象了。在这里，已经出现了手工工场，出现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一方面是握有生产资料并且能够较大量购买劳动力的工场主，另一方面是没有生产资料只凭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工人”^②。他指出，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包括明代中叶以后从正德到崇祯的一百多年，中国已发展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社会内部的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提高，社会地域性的分工较为明显，工商业的城镇日益兴起，白银成为各地通行的货币，商品市场在国内外也有较广泛的开拓。在这种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下，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这种萌

^①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4年第1期，后收入作者著：《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已收入本书。

^② 《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初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

芽，主要是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丝织业、棉织业、造纸业、制瓷业、榨油业、矿业等手工业部门中。

侯外庐认为：“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已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这是在十六世纪中叶开始的。”“从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初叶，也就是从明嘉靖到万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①嘉靖年间，长江三角洲一带，如苏、杭、湖、松诸府，大抵成了国内市场的一个中心区域。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总览市利，大抵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纴，而三吴为最。……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另外，中国的东南沿海、长江和赣水的大三角地带，次于长江三角洲，也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萌芽，翦伯赞、秦佩珩、田继周等也持此说^②。

邓拓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约当公元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其中，从万历到明末和从清初到乾隆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的阶段；后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阶段。”万历以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虽然基本未变，但在某些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因素找到了萌芽生长的适宜土壤。在这里，封建社会内部严重妨碍资本主义萌芽发生的某些历史条件，开始有了变化。到清朝乾隆年间，这种变化更为明显。一方面生产资料逐渐和直接生产者

^① 《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1章，已收入本书。

^② 翦伯赞：《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秦佩珩：《论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郑州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田继周：《明代后期一条鞭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

分离，特别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被少数人控制在手里变成了资本，另一方面失掉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半无产者队伍逐渐形成，他们变成了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这个时期除了官府手工工场外，在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有了相当数量的民间手工工场，从这里产生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产生了代表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状态的新兴社会力量（市民阶级），产生了最初的雇佣劳动者队伍。

吴承明对明代后期出现说，作了如下说明：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本来不易辨识，也不容苛求。不过，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不仅要从微观上研究，还要从宏观上考察。第一，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因而不能用举例方法来论证。不能用封建社会中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来确认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第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没有不可抗拒的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徐州利国监的冶铁，徐一夔《织工对》中的丝织工场，都后不见来者，不能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起点。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史，只能从明代后期，或者说从十六世纪写起”^①。

李之勤也主张，明末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②。

黎澍认为，明朝虽然出现了个别的手工工场，但清朝的发展更显著。他说：“在明朝的记载中，我们还只能在江南地区的丝织业中偶然看到有个别手工工场的出现，而在清朝的记载中，我们就不仅在江南地区的丝织业中，并且在其他地区的其他行业

^①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1年第5期。

^② 《关于中国清初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发展水平问题》，《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2期。

中，都可以看到有个别的类似手工工场生产组织的出现。”^①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②一文中，他进一步发展和补充了自己的看法：中国历史上由于长期推行抑制工商的政策，社会没有真正的发展，盐铁官营和大规模工场手工业的官营成为不可改变的传统，这是封建国家的重要财源和供养封建统治者的重要方式，是限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大障碍，“只有在封建统治极端腐朽，陷于解体的朝代如明末，才会出现某种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这样的朝代照例是非常短暂的，一旦新兴的封建王朝取代了腐朽的封建王朝，资本主义萌芽就会被切断。从明末到清初的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对上面介绍的观点，近年也有论者提出不同意见。刘云村在《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商榷》^③一文中认为，黎澍论述资本主义萌芽前后有几篇文章，但观点不尽一致，提出了清代不存在民营手工业等论据，“其中心思想是否定资本主义萌芽”。事实上，清代手工工场不仅存在，而且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新发展。因此，清代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定不了的。

三、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水平及影响

既然中国封建社会内已孕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那么到鸦片战争前夕，这种萌芽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已演变到了何种阶段？史学界曾有过热烈的争论。大体说

①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58年第4期。已收入本书。

② 《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

③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论文集》。

来，有两种看法：（一）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相当发展，到了手工工场阶段或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瓦解、崩溃，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代表的市民阶级正在形成。（二）承认当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而且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并未达到手工工场阶段或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没有也不可能瓦解封建经济基础。

第一种意见，以尚钺为代表。他在《清代前期中国社会的停滞、变化和发展》^①一文中认为，清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不仅存在在沿海的城市工商业中，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城市工商业中，而且存在在中国从南到北的广大地区的土地上，不仅商品作物在排挤食粮生产，同时，商业资本也广泛地在组织着城市和农村的家庭手工业。特别是广大而赤贫化的农民，被排挤出农村流向城市。因之，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在乾嘉时代较之明末是发展的更高了。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了中国社会，从经济观点看，已是资本主义的‘所谓原始积累’时期。”不能因康、雍、乾时期相对的安定与和平，便认为“当时中国社会还是很完整的封建社会，或者即使承认有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但这个萌芽还非常微弱，仅仅是萌芽时期的一点幼芽。这些认识显然都是不正确的，因为从上述的雇佣上万人、上千人或数十百人的手工业工厂相当普遍存在说，从商业资本组织家庭手工业的普遍现象说，这些已经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事业，除了技术比较不发展的情况以外，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物质条件都具备着。不仅如此，而且就它们的规模和结构来说，如果没有强大政治上的

^① 载《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版。

压力和阻碍，转化为巨大的机器工业的物质基础是存在的。”李希凡、蓝翎在评论《红楼梦》的文章中，也作了类似的论断：“明末清初商品经济遭到破坏后，到了乾隆时代又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尤其是商业资本的发展更是惊人，这在《红楼梦》中是可以看出的。同时这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也是空前的（贾府中许多用具都是外国商品），可见这个时期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原始蓄积期的一些特点。”^①“《红楼梦》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即将崩溃时期的本质，把高度发展了的封建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基本矛盾完整而深刻地揭露出来。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红楼梦》是中国三千年来的封建社会走向崩溃时期的历史性的记录与总结。”^②李之勤在同吴大琨进行商榷的文章中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官营手工业在所有规模较大的手工制造业中，不论在工场数目和生产比重上都不占绝大多数或统治地位。而且恰恰相反，占绝大多数和统治地位的正是私营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当时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不仅在生产规模、内部分工、商品和原料市场联系各方面都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在许多行业中，许多地区中，也都已有了数量众多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出现。”^③陈湛若也认为，吴大琨实际上是否认了乾嘉时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否认了乾嘉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濒临崩溃的前夕。结论应该是：“（一）在经济较发展地区例如东南沿海各省，在乾嘉时代（或者更早些），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都足以说明中国封建社会已面临‘山雨欲来风满

① 《评〈红楼梦研究〉》，《光明日报》1964年10月10日。

② 《论红楼梦的人民性》，《新建设》1954年11月号。

③ 《关于中国清初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发展水平问题——和吴大琨同志商榷》，《教学与研究》1966年第2期。

楼’的崩溃前夕。如果这些地区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必将在深度与广度上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趋于崩溃。（二）我们的史料仅限于东南沿海等地区，这正表明其他广大地区由于经济发展之不平衡，仍处于较迟滞状态。因之当时封建经济仍居支配地位，所以只是封建社会崩溃的前夕。”^① 还有些学者，也持类似观点。

第二种意见，以吴大琨为代表。在《略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②一文中，他认为：肯定《红楼梦》里所反映的社会乃是濒临崩溃瓦解前夕的封建社会，甚至说《红楼梦》是中国三千年来封建社会走向崩溃时期的历史性的记录与总结，“都说得太笼统或是太夸张，并没有抓住〈红楼梦〉里所真正反映了的时代特点。”

“如果把乾隆朝就看成了是‘崩溃前夕’的社会的话，那么到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的时候，我们又将把当时的社会看成是什么社会？”他认为，清王朝“到了十八世纪中叶，确已发展到了它的统治力量强大的最高峰，从此就向衰落的途径发展了，但也毕竟还没有就到了‘崩溃瓦解的前夕’。”而由盛转衰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当时的社会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或者发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蓄积过程”，真正动摇清朝统治的，“依旧还是由封建社会内部的固有矛盾所造成的农民起义。”“马克思所指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实际上乃是指的在农奴解放以后的有雇佣工人的生产。当时社会所能有的有雇佣工人的生产，当然也只可能是一种手工业的生产。它可以是简单的‘协作’，也可以是有了分工的手工业制造业，但有一个必要条件，那

^① 《略论〈红楼梦〉社会背景——评吴大琨先生的几个论点》，《文史哲》1956年第4期。

^② 《文史哲》1955年第1期。

就是必须是私有的。”“中国不但在乾隆时有规模较大的手工制造业，即在这以前很久就已经有了大规模的手工制造业了，但所有这些规模较大的手工制造业，绝大多数都是‘官营的’。……私人所有的‘手工制造业’，虽然也有一些，但因为是受压抑在‘官营手工业’之下，所以至多只能在某些特殊的地区得到一些发展，在这意义上可以作为‘萌芽’存在，但却决未曾成为‘大树’。所以若说在乾隆朝，中国就已经有了可以动摇整体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黄逸峰与吴大琨的观点相近^①，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范畴，“前者是一个缓慢的分解过程，它不能从摇撼封建经济结构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后者是一个急剧的分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积聚起大量资本，和大量供自由雇佣的劳动力，从而使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是一个质变的过程。”雍正、乾隆时期，由于经济政治条件的限制，还未走上原始积累阶段。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

还有些研究者虽大体属于这种意见，但具体论析各异，今举其要者如下：

翦伯赞概括：“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烂熟的程度，并且在它的内部孕育着从明朝中叶以来就已经萌芽的资本主义的因素。这种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以极其复杂的多样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出现于当时某些地区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组成部门中，它出现在农业生产中、手工业生产

^① 《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形式及其特点》，《江海学刊》1982年第3期。

中，也出现在商业资本的活动中。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和一定的范围内对当时的封建经济起了一定的分解作用。但是由于这种因素还是处于萌芽状态，因此它所起的作用，不论在深度上或广度上都没有达到足以摇撼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程度，如象上面所说的在农业生产中还是封建地主经济的统治，在手工业生产中，家庭手工业还是象汪洋大海一样弥漫全国，在商业资本的活动中，还是商业资本的独立活动和高利贷资本占主要地位。”^①

许大龄估计：一、资本主义萌芽在手工业中的表现非常微弱，许多手工业部门虽出现资本主义经营，但本身还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二、由于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不大，对农业的经营也就影响有限。“因此，把十六、十七世纪初期理解为某些地方已达到资本主义的手工业工场阶段，或某些地方的农业已基本采取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则不免估计过高。”不过，资本主义萌芽仍在缓慢的前进之中^②。

从翰香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内存在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实际状况，比某些论者所泛泛了解的要低得多，少得多。无论就上述几个重要手工业部门的整体看，还是就其中最发达的部门看，都远远谈不上已经或正在达到工场手工业阶段。与个体手工业相比，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还只是河汉间疏星数点而已。部分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虽带有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迹象，但其中的关系极为复杂，不能笼统地下结论。商业资本控制个体小生产确已达到相当紧密的程度，但已表现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真正意义

^① 《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已收入本书。

^② 《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初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

上的包买商的数量是很少的，大多数商业资本只是处在向真正的包买商过渡的进程中，还有待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何况封建行会制度的普遍，使得手工业各部门的生产关系更加复杂，前进的步伐更加缓慢。”她还特别强调：“判断资本主义萌芽程度的根本关键不是多几个或少几个手工工场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触动自然经济结构中的根本支柱的问题。”事实上，“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结构中的决定性的基本环节尚未破裂，远远谈不上中国封建社会‘瓦解’了。基于这些认识，我们始终认为只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这就是：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整个社会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①

附带需要提及的是，除了上述两大类意见之外，还有个别研究者的看法，介乎二者之间。王钰欣认为，清代前期“中国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已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即由小商品生产阶段开始向资本主义简单协作阶段发展。……多数地区已处于小商品生产阶段，某些地区正在进入资本主义简单协作时期，而在一些交通闭塞、商品经济很不发展的地区，还依然停留在家庭手工业和工艺业阶段。”“正在进入资本主义简单协作时期的某些地区的一些手工业部门中，已有不少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经营形式出现。可是这种经济结构还相当稀疏、微弱，其发展也不十分稳定、成熟，并显示出若干中间的、过渡性的特点。”总而言之，“清代前期，在中国手工业经济结构中，简单协作和手工工场都出现了，……但是，手工业经济中出现了这两种生产形态并不等

^① <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诸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于整个手工业经济已达到这两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阶段。”^①

由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程度的讨论，还进一步引申出：明清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的性质有没有变化？中国近代史应起于何时？对于这个问题，两种意见曾进行了激烈地交锋。

尚钺在《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的《序言》^②中提出：“关于明清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将影响到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某些传统看法，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或中国社会停滞论，乃至中国社会一直到一八四〇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后，中国社会基础还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等等，而且也将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究竟以什么时期作为起点的问题。因为，不拘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或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发展线索上，以及从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继续和发展上，以一八四〇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时间划一个分界线，都是不很妥当的，而且有着折断历史发展线索的毛病。”在另一篇文章^③中，他作过这样的结论：“不拘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社会矛盾和斗争的内容与形式上，我们都可以看见明代，特别是明末三五十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已在开始起着本质的变化。”

此论问世以后，在史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随之相继有人撰文商榷。

刘大年指出：有些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人，把古代历史加以

^① 《清代前期手工业经济的性质和特点——对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水平的基本估计》，载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

^②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

^③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见《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

现代化了，把现代资本主义的诸范畴和特征搬到封建主义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而《序言》还不止于此，“他的研究对象本来是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而他所做的结论则改变了封建社会的性质”，“大大提前和‘创造’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①。

黎澍认为：《序言》把中国近代社会的开始提前三百年，目的是要改变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看法，以及根据这个看法产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具有长期性的理解。事实上，从中国手工业的发展过程到处可以看到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深刻反映：一、即使最发达的手工业也不完全脱离农业；二、一切手工业者必须依靠行会的保障；三、自由竞争的禁止。当然，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会慢慢地发展起来，但是这个过程由于外国资本的大举侵入而被打断了，“中国的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这个时代始于鸦片战争”。^②

针对商榷者们的质疑和问难，尚钺后来又撰写《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二三事》^③等文，进行答辩。这一时期，曾有许多文章对尚钺的学术观点进行“批判”，有些内容已超出了学术民主和自由讨论的范围，故这里不予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在继续探讨明清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时，提出了一些与五、六十年代流行看法颇不相同的见解。

① 《关于尚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历史研究》1958年第1期。

② 《中国的近代始于何时？》，《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

③ 《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

胡如雷指出：“是否明清时期生产关系已经完全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变成其桎梏呢？还不能这样说。……尽管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空前地激化了，但生产力发展的余地还不算太狭窄。单纯根据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断言生产关系已经完全不适合当时的生产力，是不妥当的。因为明清之际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天然终点还有一个相当的距离”^①。

孔经纬认为：“秦至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专制主义封建统治构成中国封建制的发展期，内中只有前期与后期或前期、中期、后期之别，从未经历过类似西方的封建末期。所谓封建末期，通常指封建经济处于解体、资本主义经济正孕育成熟的特定历史时期。西方的封建末期和专制主义时期是一致的，中国封建社会既没有过那样的末期也没有过那样的封建专制。”“作为封建经济对立物而存在的中国资本主义关系萌芽虽在封建专制后期出了土，但直到鸦片战争前，封建经济仍未临于崩溃期”^②。

黄逸平提出，有些同志认为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经济已处于较为“成熟”的封建社会末期的历史阶段，有的甚至认为它已处在封建社会末期“崩溃”的阶段，“这些估计似显偏高”。他认为，“封建社会末期的基本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封建经济关系的解体”，而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经济虽有若干变化，但基本结构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仍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未导致自然经济的解体，这也就限制了市场的进一步扩大。资本主义萌芽甚为微弱，工场手工业数量尚少，大多还处在过渡状态中。资本的原婚

^① 《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7月出版，第414页。

^② 《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积累可以说无有影迹。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这样一个社会经济水平，距离工场手工业时期和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尚有相当一段行程，显然不属于封建社会末期的后一阶段，当然更不是行将崩溃的前夜。它只能说是正处在封建社会末期的前一阶段”^①。

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水平的讨论中，还涉及到对阶级结构的影响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阶级关系也起了变化，明清时期出现了市民阶级和市民运动；少数研究者认为，我国明清两代并未出现新兴的市民阶级及市民运动。

侯外庐对此论述较早，影响也大。他认为，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将当时德国的市民等级大体上分做三大集团或营垒，即城市的豪贵集团、城市中等阶级的改良集团和城市平民的集团。依此，从阶级的代表性上讲，第一集团也包括于地主阶级反对派之中，第二和第三集团又形成了反对第一集团的人物，即中等阶级的反对派与平民反对派。从思想意识的代表性上讲来，反对派分做城市中等阶级的反对派异端与城市平民反对派异端。此外，还有农民反对派异端。中国十七世纪的反抗运动，不可能和德国十六世纪的情况完全一样，但东林党运动就具有中等阶级的城市反对派的性质，长江流域等地的市民暴动，含有平民反对派的性质。明代市民运动最初表现出来的是“盗矿”、反矿官的斗争，大规模的市民运动是嘉靖以后特别是万历时代的城市工商业者和手工业工人的反抗运动，如万历二十九年（1601

① 《学术月刊》1982年第2期。

年)有名的苏州织工反孙隆的大暴动。到了天启年间,则发生了城市中等阶级反对派的运动,有名的东林党六君子狱就发生在这时。东林党人的争自由或讲学运动,不仅表现出朝野的对立,而且反映了自由主义者的前辈中等阶级的政治要求。另外,明末市民运动和农民暴动是桴鼓相应的,李自成所提的“均田免税”、“不纳粮”、“平买平卖”等口号,表现着农民初期的民主要求^①。尚钺很赞同上述分析,他认为:中国在明代甚至更早的时代已出现了市民,它包括的分子很复杂,“与恩格斯分析十六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时的市民几乎是一致的”。清代的秘密结社组织,贯彻着一定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是与在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增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民运动有直接关系。”^②

傅衣凌对此亦有专门论述,他在《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③一书中写道:“市民阶级的产生过程在中国开始萌芽于什么时候呢?对于这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国城市居民是很早就出现的,并且跟着城市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人数。但是把城市居民初步的赋予以近代性质的萌芽,那是在明代中叶前后,也就是十六世纪初年才开始存在的。”“江南城镇商品经济的发达,工商人口的增长,这样,就大大的扩大城镇市民阶层的队伍,改变城镇的社会阶级关系,出现了一些与工商业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的最初萌芽”,因此,“明代后期江南地区下层士民的反封建斗争,在当时城市市民要求的影响下,已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内部分裂,从其反对勒索和封建徭役以及争田价的斗争中,尤明显的反映明代后期商品经

^①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1章。

^②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清代前期中国社会的停滞、变化和发展》。

^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

济的发达所给予当时社会经济的冲击作用。”当然，“明代仍是一个封建社会，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的束缚之下，资本主义的萌芽因素的发展不是很顺利的，把它估计过高，是不恰当的；可是如果有人因此对于这些城镇斗争的社会性质，认为这尚是封建社会内部所固有的斗争，看不出有若何严重的新的东西，这也不是很恰当的。”刘炎的《明末城市经济发展下的初期市民运动》^①一文也较早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明末商品货币经济已经达到相当高度的发展，开始严重地瓦解封建的自然经济，城市中有新的阶级和阶层出现，“这些新因素就成为瓦解封建社会不可战胜的力量”。明末城市的阶级结构是：从事手工业、商业活动并和地方封建势力有勾结的城市“市豪”，虽不能径直看成是西欧的“市民阶级”，他们实际是居于城市贵族的地位；城市工场主阶级，是近代市民阶级的雏型；小商品生产者、手工工人、小商贩等人民群众，是反专制主义和官僚乡绅斗争中最坚决、最勇敢的先锋。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新兴市民阶级的成长，反映在阶级斗争上就出现了明末连续发生的城市“民变”，反映在思想意识上就表现为明末反理学思潮和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想的泛滥。他特别强调：“整个‘民变’是包含了新的、区别于农民反封建地主斗争的东西的。”

也有少数研究者不同意上述意见。吴大琨认为：把明代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手工业者、中小商人与官僚统治阶级的矛盾，看成是与整个封建势力相对抗的“市民运动”，是对这个术语“原有意义很大的误解”。第一，在欧洲封建制度下，城乡关

^① 《历史研究》1955年第6期。

系的特点是：农村从政治上统治着城市，而城市却从经济上剥削着农村。城市里的“市民”绝大多数是原来庄园内的手工业者与商人，当他们发展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手工工场的老板与大商人的时候，便开始运用经济武器与封建领主展开斗争，结果产生了一些“独立的”或“自由的”城市。欧洲的所谓“市民运动”，“是可以与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作为同义语来看的。”第二，中国显然不是这样，根本没有产生过“独立的”或“自由的”城市，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及与之勾结的大商人、大高利贷者本身都住在城里，掌握着城市统治权，压榨手工业者与中小商人，所以中国的“市民”不能与欧洲的“市民”同日而语。明末城市手工业者与商人反对“税监”、“矿监”、“织造太监”的运动，“只能作为封建社会内部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同样性质的斗争来看待”^①。胡如雷认为：在西方，城市居民几乎全是工商业者，所以市民运动也就是城市工商业者所发动的阶级斗争。而中国，工商业者只是城市居民中的一部分，所以市民运动并不是全部城市居民的政治运动，而仅是城市工商业者所发动的斗争。由于中国的市民运动与资本主义萌芽是同时发生的，就容易形成这样的错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是产生市民运动的物质前提。其实，即使在欧洲，十四世纪以前还毫无资本主义萌芽的任何迹象，而“城市公社革命”恰恰发生在十一至十三世纪。“可见市民运动是城市工商业发展的结果，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结果。我国明清之际的市民运动也不是因资本主义萌芽而引起的。”“我们并不否认明清之际的手工业工场主可能

^① 《关于〈中国历史纲要〉明清史部分几个经济问题的意见》，《文史哲》1955年第3期。

参加市民运动，但这种资本主义势力的参与并不一定是爆发市民运动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当工商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即使没有工场手工业，同样可以爆发市民运动”^①。刘志琴也认为：万历民变发生在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历史背景中，如果袭用西方市民运动的眼光来看待它，认为这是新兴市民阶级的运动，或地主阶级反对派的斗争，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万历民变，发生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城市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居民比较复杂，工商业者和手工工人不占优势，传统的抑商政策又使得工商业者的地位卑下，经济力量单薄，不得不依附官僚地主的势力，所以聚居在城市中的官僚、缙绅士大夫，在市民中占有主导地位，民变基本上是由这些官员士大夫领导的群众运动，无论是手工工人、小商贩还是工商业主，只能追随官员士大夫，打击不法中使，没有自己的口号和纲领，指导思想没有越出封建纲常的藩篱，斗争不具有政治上的要求和反封建法制的性质。这些有别于西方市民运动的特点说明，明末的市民在政治上还不足以构成新的社会力量，离形成新的阶级还相当遥远。”民变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虽有一定联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萌芽与民变有直接的关系，从民变发生的地区看更加清楚，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只是稀疏地出现在江浙和沿海一带，在辽东、山西和陕西还说不上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也同样的兴起了大规模的民变。民变的结果，打击了不法中使的掠夺，保护了商品经济和人民的切身利益，有可能减少资本主义萌芽所受到的摧残，却不能助长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① 《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章第7节。

事实也证明，矿监税使撤销后，资本主义的萌芽仍然是非常困难，因为封建法制本身就严重地压抑着它的滋生，民变由于并不反对封建法制这个历史的局限，所以它也就不能担当这个历史的重担”^①。

四、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和主要出现于手工业经济中。从已发表的论文看，以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为最多。其中，涉及到纺织业、矿冶业、制瓷业、井盐业、木材采伐加工业、造纸业、采煤业、制糖业、榨油业、粮食加工业、金属制造业及航运业等许多部门。不过在五、六十年代，综论全国或同时讨论几个手工业行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文章较多；七十年代以来，专门探究某一地区或某个行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文章较多。这里，拟重点叙述对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总特点的认识以及丝织业、棉织业、矿冶业、陶瓷业、井盐业研究中提供的一些问题。

第一，对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总特点的认识。

有几位研究者，在这方面作了论析，他们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

翦伯赞认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手工业生产可以作这样的概括：在某些大作坊或工场中，已吸收了几十、几百乃至几万、几十万工匠，这些工匠和作坊或工场主人的关系是建筑在契约之上

^① 《试论万历民变》，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出版。已收入本书。

的雇佣关系；技术分工相当发达，工人被束缚在一定的专门技术劳动之中；出现了手工业的中心城市和市镇，吸收了很多被从农村排挤出来的农民无产者，扩大了手工业工匠的队伍；商业资本已渗入手工业生产，通过大工场主和包买商的加工、定货或收购成品等活动，大作坊或工场在一定程度上把一部分小作坊乃至家庭手工业者组织在自己的生产体系之中。但另一方面，小作坊和家庭手工业者还象汪洋大海一样遍布于全国各地，包括手工业发展的地区；技术的地方分工，即某一地区对某一生产产品生产的专门化普遍存在，带有颇大程度的封建闭关性；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在有些手工业生产部门，简直看不出和过去有什么区别^①。

彭泽益的见解是：清代前期手工业的所有制形式，可以分为官营和民营。官营手工业基本是以自给而不是投放市场和获取利润为目的进行生产。民营手工业，则以个体经营的手工业占优势，这种独立的个体手工业者构成清代城市手工业的主体，分别组成维护本行业利益的行会，具有行会手工业的基本特点。在严格的行规限制下，行会对再生产过程起着严重的制约作用，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手工业铺坊随意变为较大的企业。为了从根本上改造生产过程的性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量，“当时在行会势力范围以外的地方，就有一些商人由小生产者的组织者不断变为直接支配生产的组织者。”商人转变为大作坊主和工场主，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商人资本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转化，开始时带有临时的、不稳定的特点。因为商人资本所进行的加工制造各业，都有一定的季节性，而且生产終了即行结束，它

^① 《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

基本上还是属于以商业资本的活动为主。“这里所形成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工剥削关系，只能象是昙花一现而已。”另一种是商人资本同生产进一步结合，直接投资产业，建厂雇工制造，它从一开始就以劳动力出卖给大作坊主和工场主的自由雇佣劳动为前提。商业资本转变为工业资本，“大大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资本主义关系的最初一批企业的形成过程。它也是中国手工业资本主义关系发生经历的主要途径。这些大作坊和手工工场在十八世纪，特别是二、三十年代间大批出现，显然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中的一个巨大进步。”^①

吴承明持如下看法：一、在十六、十七世纪，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可以确切证明的只有苏州、杭州的一些丝织作坊和广东佛山的一些冶铁炉坊，它们具有工场手工业的性质。在其他手工业中，有些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迹象，但缺乏直接的史料证明，或其范围过小（如松江的暑袜业），可予不计。二、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了发展。能得到直接证明的，有如下一些手工业行业：几个地方的制茶、制烟、制糖、制纸；江苏、浙江某些城市的丝织业；江苏某些城市的棉布踞染业；陕西南部的木材采伐业；广东佛山、陕西南部的冶铁、锻铁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北京西部的煤矿业；云南的铜矿业；四川的井盐业；上海的沙船航运业。这时期，商人支配生产已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形式。但除丝织业的账房外，很少有包买主的形式。那种予买、放债、以原料换成品的商人所控制的生产活动，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为

^① 《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在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商人支配生产的主要形式不是包买主制，而是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产。这在农产品加工的行业中最普遍。它不同于工场手工业的地方是，在商人雇主制中，商人的投资还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三、在整个资本主义萌芽中，起重要作用的仍是工场手工业，如采矿、冶铁、制瓷、制糖、造纸等，其中四川井盐业发展比较完整。这些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要也是来自商人，部分来自地主。从小生产者分化出来的工场手工业主，在明代后期还是主要的，进入清代就让位给商人了。至于那种业主参加劳动、雇用少量工人或学徒的小业主经济，是不能作为资本主义性质看待的^①。

第二，丝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我国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在丝织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这是学术界普遍的看法。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又有不同的意见，如：《织工对》反映的是什么时期、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丝织生产的性质如何具体分析？当时是否有了丝织手工工场？山西潞绸的生产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还是封建性的？等等。关于《织工对》的讨论，前文已提及，此不再赘。这里主要介绍围绕江南丝织业及潞绸展开的讨论。

王仲华的《明代苏松嘉湖四府的租额和江南纺织业》^②一文，较早地对苏州丝织业生产的性质进行了论述。文章援引《苏州府志》一段记载：明万历年间，“苏民无积聚，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织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直。有他故，则唤无主

^①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

^② 《文史哲》1951年1卷2期。

之匠代之，曰唤找。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缂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粥(鬻)后散归。若机房工作减，则此辈衣食无所矣。每桥有行头分遣，令织造府禁革，以其左右为利也。”他认为，《志》中所说的机户有下列特点：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但雇佣工匠；参加生产活动的是男性而不是女性；缂、纱、纺车由专门工人分工生产；雇工一种是长期的，一种是临时的，后者什百为群，前者人数可能更多，工资以日计算，有着剥削行为的行帮行头，是机户和临时雇佣工人的中间人。“可见江南的丝织业，已由家庭生产进而为商品生产，由家庭两性分工发展为社会劳动分工，雏型的手工业工场，在明代是出现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则史料，在康熙《苏州府志》、《长洲县志》及乾隆《元和县志》、《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织工部》中均有记载，只是文字互有出入。但它为研究者竞相引用，几乎成了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为权威的一条史料。另据陈作霖《凤麓小志》云：“金陵机业聚于城之西南隅。开机之家，总会计处谓之账房，机户领机谓之代料，织成送缂，主人校其良楛，谓之饩货。小机户无甚资本，往往恃账房为生。各机户复将丝发交染坊染色，然后收回，织成段匹，再售与缂业。四者层层相因，休戚相关。清乾隆迄今，通城段机以三万计，纱缂绒段不在此数。织机之工俗呼机包子。”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卷六中说，其祖先经营丝织业，大约在明成化末到弘治初，最初“购机一张，织各色绉帛，善极精工。每下一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

金。”另外，明人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有篇《施润泽滩阙遇友》，描述了苏州吴江县盛泽镇丝织业的繁盛情景。该篇说，明世宗嘉靖年间，镇上施复夫妇如何从一张织机发家，最后“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缁（绸）机”的工场。再有，据《上元江宁两县志》记载，江宁“在乾嘉间机以三万余计，其后稍稍零落，然犹万七八千。”据续纂《江宁府志》补遗载：“江宁机房昔有限制，机户不得逾百张，张纳税五十金。织造批准，注册治文凭然后敢织。”康熙年间，机户向曹寅“公吁”请奏免限制，得旨永免，“自此有力者畅所欲为，至道光间，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这些史料，也是在学者间被反复引用，视为江南地区丝织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明证。

翦伯赞和王仲荦的见解相似，他把十八世纪上半期江南丝织业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官营丝织厂，在江宁、杭州、苏州都有。官营纺织厂有织机六百多张，还控制着若干民间机房，工匠各有专门分工，而且都从民间机户雇觅，工资很低，用银计算。从这些官营丝织厂的织机和工人的数目，特别是雇佣劳动和货币工资等看，都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必须指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是为了出售而生产，而当时的官营丝织厂，则是为了供应皇家的消费而生产。“因此，它们还是带有封建的性质。”另一种是民间丝织厂，“当时江宁、杭州、湖州这三个丝织业中心都有为数甚多的丝织业机房，其中有些并已发展到工场手工业的规模。”明中叶以来织工和机户主人的关系就是建筑在契约关系之上的雇佣关系，清初更是如此^①。

^① 《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

有的学者对上述看法持相反意见。吴大琨认为，清代的“机户”实际上是代皇家织绸缎的一些乡绅、富室，基本上属于地主官僚阶级，并非什么“资本家”。至于“机匠”，则不但有“行头”控制，而且都是受“行会”与“官府”管理的自有生产工具的行会手工业者，并非什么“无产者”。正因为这些“机户”是为皇家织绸，所以“机匠”闹事，地方政府才帮助他们立碑“永禁机匠叫歇”^①。彭泽益在《从明代官营织造的经营方式看江南丝织业生产的性质》及《鸦片战争前清代苏州丝织业生产关系的形式与性质》^②两文中指出，明代官局织造衰落以后，各地盛行的机户“领织”形式，成为官府控制和掠夺民间丝织业的主要方式，它具有浓厚的封建奴役剥削性质，与此同时，行会也在起着支配作用。“明代苏州的机户和织工在当时是处在双重的人身隶属关系之下，他们既从属于行会组织，同时又是‘机户皆隶籍于局者’”。所谓“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正是行会手工业中老板和帮工之间的一种相互依存关系，“这是使他们结成封建的宗法关系的基础”。如果把这些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乃是对史实的误解”。迨至清代，丝织业以机匠向机户“揽织”为主，完全在行会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这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机户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竞争。“行会组织妨碍着城市手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已为大量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

徐新吾则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民营丝织业并未存在手工工场。理由是：一方面，从史料依据上看，《松窗梦语》中说的二

① 《评“明清之际中国市民运动的特征及其发展”》。

② 《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经济研究》1963年第10期。

十余台织机、《醒世恒言》中说的三、四十张绸机，即或不是虚构，原文亦未说明这些织机是否已集中生产并建立了大规模的手工工场，抑或只是掌握了分散小作坊的织机总数。《江宁县志》所载道光年间“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也不能误解为大规模的手工工场。南京地区从未出现过规模如此宏大的民间丝织手工工场。“这里所说的大量织机台数，乃是指商人包买主(账房)控制下众多分散小机户的织机总数。”另一方面，从经济条件看，当时的丝织机户规模都是狭小的，全部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大量的“单机户”与“双机户”，少数“多机户”只限于四五台为止，因为它们在经济条件上没有再向前发展的可能性。丝织业生产工艺过程比较复杂，开织前有许多准备工序，机户要尽可能利用家内妇女儿童的辅助劳动力以降低成本，雇工一般只限于“织匠”。这是机户的规模长期停留在一定“极限”的根本原因。总之，“机户一般还只是属于个体经济的小业主，还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作坊”^①。

关于山西潞安地区丝织业的性质，也发生过争论。

明万历年间郭子章所著《蚕论》云：“今天下蚕事疏阔矣，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伙，取给于湖茧，西北之机，潞最工，取给于闽茧。”黎澍据此指出，非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被混淆在一起，在关于丝织业的论述中表现最为明显。潞安机户取给于闽茧，即使在近代交通条件下，也是违反资本主义利润原则的。

“当时何以必须不顾这样严重的困难来继续维持丝织业呢？原因就在于这种丝织业不是生产商品的，而是为皇家生产贡品的。”潞安本无丝织业，自明初成为朱元璋第二十一子的封地后，才由外

^① 《关于鸦片战争前中国民营丝织手工工场并未存在的考证》，《学术月刊》1983年第9期。

地征集几千机户并植桑八万株，开始织造“潞绸”，作为进贡之用。山西及其他各省衙门，也前来定货。明初潞安丝织业除生产贡品和官方定货以外，还生产商品。到了明末，当地桑树凋零殆尽，养蚕业随之没落，可是当地生产贡品和官方定货的义务仍旧存在。那些没有逃亡的机户因不能脱离匠籍，必须从河北、江苏甚至四川运蚕丝来织绸交差，以致陷入“支价赔累，荡产被家”的悲惨境地。所以，“如果从潞安机户取给于闾茧便得出商业资本活跃或区域分工的结论，如果不区别非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那是完全错误的”^①。

韩大成则持相反意见。他说，潞安地区的丝织业，究竟是专门生产贡品呢？还是生产商品呢？从史料看，从万历三年至十八年中每年大约要上贡或出卖给官家二千五百匹，而潞安绸机在明代盛时约有九千至一万三千张，完全有可能从事商品生产。机户除生产贡品外，同时进行商品生产，他们就是靠商品生产所得的盈余来弥补在生产贡品或官方定货中所受的损失和维持自己的生活。如问潞绸生产为什么求之于川湖地区的丝？答案是：商业资本家可以用行贿等手段，逃避沿途税收，使丝价不至于过高。同时因为用丝好，织作好，可能高价出卖，从中获利。而能够担负这一任务的，当然不是小商品生产者，而是商业资本家。把这些视为商业资本的活跃和一定程度的区域分工，有什么不可以呢？^②王守义也有类似看法，他在《明代山西的潞绸生产》^③一

^①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

^② 《对黎澍同志〈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一文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58年第7期。

^③ 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学《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文中提出：一、潞安一带古代原是栽桑养蚕的，明初政治稳定，蚕桑事业获得发展的较好条件。只是到了嘉靖至万历年间，潞绸生产逐渐繁荣，本地蚕丝不敷应用，同时为了提高质量，才从外地购进优质原料。后来在万历中期，连年大旱，也不得不从外省购进原料。二、明代潞安机户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由农民家庭织绸而来，逐渐发展为民间机户；另一类名隶匠籍，是为皇家和政府进行织造的机匠。潞绸机户主要是后者。机户不是赴府当班，而是在当地分造交纳，除却完成上贡织造外，有条件从事家庭纺织，因而潞绸生产就由上贡生产扩大到一般商品生产。后来由于产品质量较好，受到市场欢迎，跃为首位。所以，“明代中期以后的潞绸机户，实际上是一种特殊身份的纺织户。一方面，他们名注官籍，须承应官差织造，即使赔累，也因‘名随机转，欲徙业而不能’，其结果只有逃亡。从这方面来说，是被迫的，强制的，带有封建徭役性质。从另一方面说，他们从个人和家庭的织造中发展了商品生产，富有的机户还雇工生产，……他们是业主。”

第三、棉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研究者公认的事实是：我国明清时期棉织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远不如丝织业突出和广泛。直至鸦片战争前，我国织布业长期停留在农村副业和个体的家庭手工业阶段，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组成部分。男耕女织，即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封建经济的一大特征。不过，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棉织业中还是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这种萌芽体现在什么地方？则是仁智互见，各说不一。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不但棉布的染踹加工过程中出现了萌芽，而

且商业资本已渗入到棉布生产领域，出现了包买主，其活动亦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钱宏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若干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一文中作了如下论析：没有资料能说明江南棉纺织业中存在资本主义作坊或手工工场，当时棉布生产主要依靠农村副业和一部分小手工业者。但棉布又是重要商品之一，在国内销路很大，且有一部分运往国外，这就使商业资本有了广大的活动地盘。商人从农民或小手工业者那里收买棉布，转贩各地。“随着棉布业中商业资本的发展，在棉布商人中逐渐出现了一些不再用货币而以棉花来收买布匹的包买主”。如明万历时朱国祯在《涌幢小品》中说：“商贾从旁郡贩绵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绵花以归，仍治而纺织之，明旦复持以易。”这些商贾就是包买主。包买主进一步发展，就会成为以原料直接分配给家庭手工业者进行生产，而给以一定报酬的包买主。“因此，明至清鸦片战争以前的江南棉纺织业中的以棉易布的包买主，其中有一部分也应该承认它是在发展较低阶段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傅衣凌在《论明清时代的棉布字号》^①一文中也说：明清时代江南各地，曾出现不少布商和牙行，他们是否永远中止于收购任务，而不含任何组织生产的作用呢？恐怕不完全是这样。从朱国祯《涌幢小品》的记载看，明代江南的布号，在经营牙行式的收购业务之外，也开始从事包买主的活动，以原料付与小生产者，而使直接生产者隶属于自己。发展到清代苏州的布号，形式更加完备。乾隆《长洲县志·风俗》云：“苏布名称四方，习

^① 载《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

是业者，在阊门外上下塘，谓之字号，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这种字号的活动，已包括了从收购棉布、组织加工到发卖运销等。后来有的字号更从包买主发展到直接从事布匹的生产与贩卖。

不过附带要提及的是，多数研究者认为棉织业中不存在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包买主。有的论文专门就此进行了论述。

黎澍认为，不能把农村副业和家庭手工业当作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松江府各县，作为商品生产的棉布相当多，但纺织仍旧是一种农村副业。正因为大量布匹是在乡村生产的，所以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说：“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坊、踹房、商贾悉随之。”枫泾和洙泾都是乡村市镇的名称，布号设在这些村镇，显然是为了便于向农民收买布匹。又据清乾隆年间上海人褚华《木棉谱》云：“明季从六世祖赠长史公，精于陶猗之术。秦晋布商，皆主于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俟其将成行李时，始估银与布，捆载而去，其利甚厚，以故富甲一邑，至国〔清〕初犹然。”外地商人除设有坐庄以外，都不直接与生产者发生关系，甚至不直接与本地布商发生关系，而是经过牙行向本地布号收买布匹。褚华的六世祖，就是兼代布商收买布匹的客店老板，“至于真正意义上的棉纺织业包买主，我相信严中平同志的判断是谨慎和可信的，这就是，在文献里，‘还没有发现’。”^①萧国亮专门考察了明清上海地区农村家庭棉纺织生产情况，也认为在纺纱织布生产过程中还未出现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的包买主。他说，商人要支配生产，

^①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

就需要商业资本与生产发生密切联系。但在明清时期，一般说来，商业的买卖过程，必须经过封建牙行的媒介。而这些封建牙行并不是商业资本的代表，它的作用仅仅是撮合买卖双方成交，替政府收税和监督商业活动。由于牙行在商业资本与棉纺织生产者之间筑起了一道堤坝，商业资本要向棉纺织生产渗透是不可能的。不过，明末清初，情况有些变化，当时上海地区新兴的市镇，是封建牙行势力的薄弱环节，布商开始在这些新兴市镇直接向生产者收购棉布。牙行制度的衰落与商人直接收购布匹，为商人控制生产及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包买主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但是，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在上海地区的棉纺织业中，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包买主还未产生。如《金泽小志》载：“肆中收布之所，曰花布纱庄。布成持以易花，或即以棉纱易，辗转相乘，储其余为一家御寒具，兼佐米盐。”这里，“花布纱庄”以棉花生产者所需要的原料来偿付棉布的价格，实质上是一种商品买卖形式，还不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包买主^①。

第二种看法认为，只有染踹加工业中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许大龄认为：明末在枫泾、朱泾镇出现了数百家布号，这些布号有一些已控制了一部分染坊和踹坊，把生布交给他们踏染，而每一个染坊和踹坊，又各拥有一定数量的雇佣工人。由此，“可以看出庞大的商业资本已经把染坊踹坊组织在一起了，这种布号的出现，正是体现了资本主义在棉织业中的萌芽。”^②徐新

^① 《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农村家庭棉纺织生产》，《财经研究》（上海）1984年第8期。

^② 《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初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的萌芽》。

吾在近著《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①一书中，专门讨论了染踹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特点。他认为，踹染业中所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布号自行设立作坊，由商人资本直接设立较大的作坊，雇佣外地破产农民为染踹匠，在统一指挥下劳动，它属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一种是商人支配生产的踹染作坊，资料较多是苏州踹坊。苏州踹坊的生产关系较复杂，存在着字号（布商）——包头——踹匠的三边关系。包头“置备菱角样式巨石木滚家伙房屋，招集踹匠居住，垫发柴米银钱，向客商领布发碾。每匹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皆系各匠所得，按名逐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房租家伙之费。”主要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剥削者是布商，布商给踹匠发工钱，包头再从中盘剥，包头受商家约束。包头对踹匠的封建压迫和剥削十分严重，但不能就此否定踹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因为，历次踹匠斗争的主要锋芒是针对布商，斗争的主要内容是增加工资；踹匠在作坊里工作，人身自由虽受限制，但来去自由，包头制度不同于手工业的行会制度；表面上看，踹匠的工钱由包头发给，但实质上，仍是布商和踹匠之间的雇佣关系。“总之，我们如果透过复杂的现象，商人支配生产的实质是可以剥露出来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在这种商人支配生产的形式中，还包含着极浓厚的封建性质。”彭雨新也认为，清代前期苏州踹布业，是“既具有微弱的资本主义因素又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的手工业”^②。

第三种看法认为，只有加工缝制暑袜业才具有较明显的资本

^①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② 《从清代前期苏州的踹布业看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战线》1959年第12期。

主义因素。

从翰香在《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诸问题》^①一文中提出，商业资本采取种种方式控制踹布业，并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布商与直接生产者——踹匠之间无直接支配关系，而包头逐月向踹匠榨取租金，这种超经济榨取的剥削关系，“与其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不如说是封建剥削的又一种形式更符合实际。”她认为，松江地区用棉布缝制暑袜的生产，是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现象。范濂《云间据目抄》云：松江“郡城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这类家庭手工业之所以比一般棉纺织品小生产者更加需要依赖于商人资本，是和它所处的较特殊条件分不开的。制成适于缝制暑袜的棉布，需要一些特殊的技术，不是一般家庭手工业所能织成。因此松江城郊许多不能自织的劳动者为暑袜店商人缝纫，缝成后交回暑袜店，从店中取得报酬。“事实表明这些家庭手工业者实际上已成为失去独立性的工资劳动者，暑袜商店商人大体上也具备了资本主义包买主性质。”

除了上述几种看法外，还有一个特殊但又重要的情况应当提及。彭泽益在《鸦片战争前广州新兴的轻纺工业》^②一文中指出，佛山棉纺织业的兴起和发展是建立在国外进口棉花供应的基础之上，是为市场进行的商品生产，是适应广州外贸发展的需要而逐步兴盛起来的。当时从事各种布匹织造的工人约有五万人，分别在大约二千五百家织布工场作工，平时每个工场平均有二十个工人。这些织布工场雇工人数不受限制，没有行会或其他势

① 《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

② 《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力施加约束。由于企业主自由雇佣的劳动者人数多，不但能够生产大量的商品，同时还能提供大量的剩余价值。“因此对这些轻纺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估计它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不是没有根据的。”

另外，近些年来，有些学者还致力于探讨中国的棉织业为什么长期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何以长期延续的一个关键问题。

吴承明作有《我国手工棉织业为什么长期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①。他依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则，从手工棉纺织业的生产结构和生产效率方面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纺和织的分离是一种社会分工，能提高生产力，但这方面的记载不多。从生产者来说，专业化必须有较高的经济效益，能比既纺又织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否则没人愿意干。事实上，农户的收益主要来自织布，若单从事纺纱，只能补偿工食。农民不能放弃织布，纺和织就无法分离。农家大都利用老弱劳动力纺纱，附庸于织布。纺和织的劳动生产率又十分悬殊，从棉到布，一匹布需5—7个工作日，无论是一人单干或多人协作，织布都是一个工作日，大量劳动是用于纺纱。而纺纱效率太低，供不上织，以致有“数月理棉纱，未得上机织”之叹。纺供不上织，是因为工具落后，至明代仍是单锭手摇纺车。三锭脚踏纺车在乾隆时始见记载，但劳动强度大，如用壮劳力纺纱，由谁来织布？家庭手工业的劳动力结构，阻碍着先进工具的推广。总之，“我国手工棉纺织业之长期

^① 《文史哲》1983年第1期。

停留在农民家庭手工业阶段；是由于纺纱的生产效率、从而它的经济效益过低，而这又是由于纺的工具落后。”

从翰香认为 家庭从事棉织副业，在中国有许多自己的特点。从明代看，大体有三：其一，从事棉纺织副业的家庭极为普遍，地域不分南北，社会经济状况不论发达与否，只要条件许可（包括原料的供给和棉纺织技术的传播），几乎家家户户都能从事。其二，棉纺织副业是支持小农忍受封建剥削、维持生存的重要手段，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业的生产水平向来很低，地租和赋税不仅占去农民全部剩余生产物，而且经常侵吞大部分必要劳动生产物。为了生存，农民不得不在从事农田耕作的同时兼营手工副业。而棉纺织业无论从产品的实用角度，还是从技术易于掌握的角度，都是农家赖以生存的理想副业。其三，棉纺织生产通常是由农家妇女儿童利用农业劳动的间隙，甚至靠无限制延长劳动时间来进行的。既不用支付工资，除原料和简单工具外，又没有任何成本限制。在同等技术条件下，其他形式的手工工场，是无法与之竞争的。鸦片战争以后手工棉纺织业对抗外国棉货的历史，也清楚地说明了明代农村棉纺织副业为什么能够长久地持续发展，而未被其他手工工场所代替的原因①。

第四，矿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有：云南铜、银矿业，广东、陕西、河北的冶铁、锻铁业，北京西部的煤矿业等。讨论的问题除了是否已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外，主要是争论资本主义萌芽的程度和特征。由于封建政府一向严密控制矿业的生产经

① 《试述明代植棉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营活动，这一领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亦常为论者道及。现将有关问题，简述如次。

第一个问题，明清时期云南铜矿及其他各地矿冶业，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它具有哪些特征？

多数研究者的结论认为，此时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王明伦在题为《鸦片战争前云南铜矿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①的专文中说：云南的铜矿，元明两代即已开采。康熙二十一年，清政府明令广开云南矿藏。办法是，广招商人富户雇工开采，由政府委官驻厂监收十分之二作为矿税，其余十分之八听民自由发卖。此后，云南矿业就在官府管理、商民开采的形式下发展起来。在云南矿场中，有清政府为了征税和实行“预发工本，收买余铜”政策而设立的一种专门管理机构。这是为压榨场民和防止他们武装反抗的行政机构，而不是管理生产的组织形式。矿场中的生产单位是“硐”或“尖”，分属于投资者。尽管资本有大有小，但都是雇工生产。资本家对工人有雇佣剥削和“米分”剥削。雇佣剥削有“月活”和临时工。他们保持着人身自由，“去留任其自便”，这是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受“米分”剥削的，平时由资本家供给饭食，没有按月计算的工资，“至得矿时，与硐主四六分财”。米分制虽然是落后的给酬办法，但实质上也是一种资本主义剥削形式。云南铜矿业中的生产单位并不完全是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还存在着贫民伙开的小规模的形式。“因此，把矿场看成是一个企业单位，根据矿场管理机构的封建性质，完全否定铜矿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或者，根据矿场的

^① 《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

聚集人数，把云南矿场看成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手工工场，把劳动者完全看成是‘自由’雇佣工人，从而把铜矿业的生产完全归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白寿彝在《明代矿业的发展》^①一文中提出：明代矿业有官矿，有民矿。官矿由明廷派官直接经营管理，总的趋势是走向衰落。民矿是按照规定，取得官方许可，向官方交纳一定课额，总的趋势是走向发展。明中叶以后，矿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已出现工场手工业的组织。嘉靖四十五年成书的《徽州府志》云：“凡取矿，先认地脉，租赁他人之山，穿山入穴。深数丈，远或至一里。矿尽，又穿他穴。凡入穴，必祷于神。或不幸而覆压者，有之。既得矿，必先烹炼，然后入炉。煅者、看者、上矿者、取钩（矿）沙者、炼生者，而各有其任。昼夜番换，约四五十人。若取矿之夫、造炭之夫，又不止是。故一炉之起，厥费亦重。或既矿起，而风路不通，不可熔冶。或风路虽通，而熔冶不成，未免重起。其难如此，所得不足以偿所费也。”可见，这时的徽州府，在矿业中的工场手工业中至少拥有四五十人以上的雇佣劳动力。资本主义生产在明中叶后矿业中出现，是当时矿业中的新兴力量。但这种萌芽又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封建政权的压迫和摧残特别显著。其次，矿业的直接生产者虽以无产者的身份出现，但具有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者身份的人仍然存在。第三，民矿矿主中，势家、官僚、地主、中官等与封建势力相结合。“这些特点，使中国矿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沿着保守的道路进行，而有别于西欧之沿着典型的道路进行。但尽管如此，明代矿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毕竟打开

^①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了封建统治的缺口，为以后的矿业发展在开辟着道路。”李龙潜基本同意以上分析，并补充了三个特点：第一，明代矿业中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内部的精细分工，逐渐引起地域的分工，形成工场手工业中心。第二，矿冶业的发展不平衡，这是明代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反映。商品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比较明显地表现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性质。商品经济较薄弱的地区，民营矿冶业还在工役制度下进行生产。第三，在明代矿业经营中，已经渗入高利贷、商业资本，它们牢固地和工业资本联系着，共同剥削工人^①。

关于清代矿业，韦庆远、鲁素根据大量档案史料，写成《清代前期的商办矿业和资本主义萌芽》^②一文。他们也认为：商办矿业总的来说，仍是封建性的工商业，它从属于封建生产关系并为其服务。但不能否认，其中也明显地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主要表现在商品货币关系、雇佣劳动关系在商办矿业中的重大发展。“商办矿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全国范围是处于领先的地位。”

黄启臣在《明代民营冶铁业的经营方式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吗？》^③一文中对上述有的估计提出异议。他认为：一、所谓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是指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发展的第二阶段，即介于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大机器工业之间的阶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形成的条件是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社会地位的改变和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其中，资本的

^① 《理论与实践》1959年第6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③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

三

积累和各阶级社会地位的改变两个条件，明代尚未具备。另外，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雇佣劳动的基础上，考察和判断明代民营冶铁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否进入了工场手工业阶段，主要就是看这个生产部门是否具备了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雇佣劳动。二、明代民营的铁采矿业，无论是采取定税执照方式还是政府招商承办方式，以及未经官府批准的私人经营方式，都受封建政府的严格控制和干预，如矿禁的严厉、铁课的苛重、铁产品的招买和临时摊派、铁器严禁出口等，使民营采矿业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不能顺利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在民营采矿业中，铁矿工还不能说是自由雇佣劳动者，矿主、炉首、炉户也很难说就是近代意义的资本家，铁矿工进行斗争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封建统治者，而不是反对资本剥削。三、长期以来，许多论著都引用嘉靖《徽州府志》中关于“凡取矿，先认地脉，租赁他人之山，穿山入穴，……”的记载，证明明代采矿业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其实，这则史料前半段已经说明，它是记载元代徽州府婺源州的铁产地及冶炼情况，并不是记述嘉靖年间婺源州的铁矿开采冶炼。四、我国直到清朝乾嘉年代，民营冶铁业才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比较明显地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雇佣劳动。

羊口

黎澍与以上各家认为矿冶业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认为：采矿业中的“雇”“佣”并不是自由雇佣劳动者，他们是一种因为无以为生而自愿在一定时间内按照农奴条件出卖劳动力的失业者。他们在卖出劳动力以前是自由的，但一经受雇便在野蛮的封建管理制度之下丧失全部自由，变成了农奴式的劳动者。他们卖掉的不仅是劳动力，而且也包括整个人身和人格。

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所谓“雇”“佣”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性质是何等的不同。“在中国，主人支付给劳动者的一定工作时间的工资即是支付给他的一定时间的身价；在此时间里面，劳动者不仅劳动力属于主人，而且人身和人格整个属于主人，在穷乡僻壤尤其如此，因为那里是最适于保存农奴式劳动组织的地方。”^①吴大琨也认为：在清代的矿业中，最发达的应是云南的铜矿。可是据对此问题作过深入研究的严中平著《清代云南铜政考》说：“清代云南铜矿业的组织，实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类型。政府放本收铜，并不干涉生产本身，严格说……只是预支铜价，不能算作投资，因此我们不能说这种产业是一份国营事业。在生产者方面，他们一面缴纳一定的铜课，一面没有出售产品的自由，且也不能拒绝政府发给的铜价，因此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份自由企业。”由此可见，把清代这一类矿业组织，看作资本主义的经营是不合适的^②。

第二个问题，广东以佛山为中心的铁矿开采与冶铸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到何等程度？

王宏钧、刘如仲在《广东佛山资本主义萌芽的几点探讨》^③一文中，引用方志及碑刻资料指出，十五世纪中叶，佛山已经成为广东铁器制造业中心。到明天启二年（1622年），文献中已有“炒铸七行”的说法。这七行是：铸锅、铸造铁灶、炒炼熟铁、打造军器、打拔铁线、打造铁锁、打造农具杂器和打造铁钉。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佛山铁器制造业的行业分工细密，产品种类繁多

①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

② 《关于“略论〈红楼梦〉社会背景”及其它》。

③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第2期。

多，制造工艺复杂。七行之中，铁锅、铁灶是“铸”，其它五行全是锻造，也就是“炒”。各行炒铁的“炉户”就是“炒铁之肆”。据屈大均《广东新语》云，当时的佛山“计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一肆数十砧，一砧有十余人。”从这样的生产组织看来，已是具有相当规模的手工工场了。李龙潜在《清代前期广东采矿、冶铸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①一文中也有类似估计，他认为：一、铁矿采冶业是清代前期广东较发达的手工业部门之一，以罗定等地为最良。开采和冶炼，都由商人经营。据记载，商人经营一个铁场需万金左右，目的是为了盈利而进行商品生产。炉场上的劳动者，已有司炉者、掘铁矿者、汲者、烧炭者等分工，他们和炉场主人是一种自由的雇佣劳动关系。“因此，清代前期，罗定等地的铁矿采冶业中已经出现工场手工业了。”二、佛山镇是广东的冶铸业中心，主要有炒铁业、铸锅业和铸钉业。乾隆年间佛山镇共有炒铁工匠二万人，他们有专门技术，和主人无主仆名分关系，没有人格依存关系。除了出卖劳动力外，他们一无所有。鸦片战争前后，佛山镇铁钉业最为繁盛，许多商人投资经营铁钉作坊，有工人多至数千。这些商人还剥削坊外所谓“替钉者”，即替这些作坊主生产铁钉的个体小手工业者，实际上，控制了这些个体小手工业者，使他们成为雇佣工人，作坊主变成了包买主。总之，“在鸦片战争以前，从工场的规模，雇佣工人的数量和雇佣关系等情况看，可以肯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或手工工场了。”

黄启臣的论断有所不同，他认为，明代广东佛山冶铸业还没

^① 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以编：《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1辑，1981年7月出版。

发展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从屈大均《广东新语》的记载看，佛山镇的冶铸业只类似行会手工业作坊。冶铸生产受行会行规的限制十分严格，如铸铁镬，“凡铸有耳者，不得铸无耳者；铸无耳者，不得铸有耳者，兼铸之必讼。”另外，业冶者同工匠的关系也有行会手工业色彩，所谓“业冶者必候其工而求之，极其尊奉，有弗得不敢自专，专亦弗当。”业冶者还不是资本家，而是类似行会手工业的老板或师傅；工匠也不能算是自由雇佣劳动者，而是类似行会手工业的帮工或徒弟。业冶者对工匠是用“尊奉”和“优待”的办法，而不是用“雇佣”的办法，更没看到任何形式的工资报酬^①。罗红星亦持类似见解，他有如下分析：明清时期的佛山冶铁业，属于民营，有三种经营方式。其一，家庭小作坊。这种经营方式最普遍。家庭小作坊的劳动所得为兄弟子侄共享，资金的积累和经营规模十分有限。其二，家族大作坊。这种经营方式常出自大姓望族，由族长指定代理人具体经营，驱使的直接生产者则是家童、雇工和穷苦的族人。这类作坊往往成为承造各种官府器物 and 军火的主要生产单位。其三，商人经营的大作坊。这类作坊出现在明中叶以后，多由外地商人挟资开办。

“明中叶至清前期佛山冶铁业商人投建的大作坊中，正发生某些社会性质的变化，呈现出资本主义的萌芽因素。”^②

第三个问题，矿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是什么？

韦庆远、鲁素在《论清初商办矿业中资本主义萌芽未能茁壮成长的原因》^③一文中，论列三点：一、违反价值规律的限价收

① 《明代民营冶铁业的经营方式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吗？》

② 《明至清前期佛山冶铁业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③ 《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

购政策。对铜矿和部分铅、锡矿，由官府向“厂民”发给一定“工本”，所产铜的百分之二十作为课铜，其余一律由官府以“官价”收购，完全无视产品的实在价值和市场价格，极大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二、雍肿腐败的封建官僚政治体制。商办矿业不能自由经营，须经官府审核批准，接受监督管理，官府派员驻厂横加干涉，弊病日增，效率日减。三、各级贵族、官僚、缙绅人等对商办矿业讹诈掠夺。清代前期，商办矿业一度蓬勃发展，贵族人等认为插手商矿，有大利可图。于是依仗权势，或夺取富矿，或“搭伙入股”，无亏损之忧，有坐享其利之乐。或开关节，贪污纳贿；或讹索财宝，上下分肥。商矿无法进行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难以避免亏赔衰退。

李龙潜分析清代广东采矿、冶铸业发展遭到阻碍的原因是：一、清代前朝，封建统治者虽然放宽了矿禁的限制，但清规戒律仍然很多，诸如有碍地方风水龙脉，不准稍移壑口（矿口）；为了防止接济海外的抗清斗争，禁止或限制铁器出口等。同时，矿税苛重，除定额矿课外，还要纳各种税银，名目繁多。因而许多矿商被迫中途停业。二、冶铸业中，有封建的行会行规。如铸铁鑪者，必须参加行会，入行要交银三至五千两，一般商人无力交纳，从而妨碍了商人投资冶铸业和竞争。三、经营采矿、冶铸业的商人大都和封建关系有不解之缘，稍有积累，就购置土地。这势必影响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扩大再生产亦无法进行。第四、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在中国大量倾销商品，破坏了原来的手工业，严重地阻碍了矿冶业的发展^①。

^① 《清代前期广东采矿、冶铸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第五，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陶瓷业是封建社会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明清时期，景德镇是全国制瓷业中心，规模大、经济关系复杂，向为研究者所注重。从已发表的文章看，对于其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多数持明代出现说，少数持清代出现说，还有个别认为不存在的。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水平，大多数认为已达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少数认为尚未发展到这个程度。还有许多研究者的文章，着力探讨了景德镇中官窑与民窑的关系、封建行会势力的表现与作用、民窑中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及官窑中匠役制度的变化等。

徐文、江思清的《从明代景德镇磁业看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①一文，论及两个问题：一、雇佣劳动的普遍和工役制度的瓦解。景德镇磁业在宋元之间已相当发展，明中叶以后，各方面又发生了重大变化。磁器生产分民窑和官窑两种，“民窑是民营手工业作坊，这个作坊里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是窑主；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便不能生存，被雇在作坊内做工的是陶工。那时由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就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主与雇佣工人，这种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在嘉靖（1522—1566）以后就已很显著。”在官窑，即御器厂，其劳动力来源是由匠籍和编役来供给的，中叶以后开始有雇佣工资劳动者来补官匠之不足，雇佣陶工逐渐增加，由工役制变成了雇佣关系。二、官窑和民窑的矛盾及磁器生产数量激增。御器厂本来专为烧造御用磁器，因隆庆、万历年间御器需要量大，御窑厂供不应求，政府就摊派给民窑，产生了“官搭民烧”制度。这是对民窑的残酷

^① 《光明日报》1956年3月29日。

剥削。不过，尽管封建专制主义对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加以种种摧残和阻挠，民窑的生产还是发展，生产数量大大超过以往的记录。梁森泰著《明代后期景德镇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①一文，对此论列颇详：一、明代后期，景德镇出现了民营的制瓷手工工场。在民营制瓷手工工场和作坊中从事瓷业生产的，是具有自由雇佣劳动性质的陶工。这些陶工基本上与土地分离，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佣工身份具有新的因素，劳动力成为商品，工匠比较自由，有“凡人”的身份。不过，这些新因素是极不稳定的。佣工与农村联系密切，难以完全摆脱封建制的束缚；政府可用“召募”等方式把工匠“占籍在官”，民匠的“凡人”身份不稳定；佣工还受行会束缚，学徒制封建色彩更浓。“按照明代后期景德镇瓷业佣工的状况，景德镇民窑从手工业转变为手工工场的过程尚未完成，手工工场还处于初期阶段，陶工还处于从封建农奴转变为自由雇佣劳动者的过渡状态。”二、景德镇经营民营制瓷手工工场和作坊的是窑主。窑主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少数人与封建官僚交游，更多的是由手工业者分化上升的小业主，他们经营的正常途径只能是把资本投入瓷业生产，但民窑资本十分软弱，窑主仍依附于封建地主，还不能完全从封建生产关系中分离出来。那些中小窑主，由于政府对民窑的压抑和商业资本对中小窑户的支配和盘剥，积累资本和扩大再生产相当困难。三、总的看来，景德镇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已成长、发展到一定程度，如瓷业佣工占职业人口很大比重，而且人数不断增加；自嘉靖到万历，景德镇陶工多次发动反封建斗争，万历三十

^① 载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

年（1602年）达到最高潮；制瓷手工工场精细的分工也反映了新因素的发展。但是，民营手工工场、作坊仍被制瓷业中的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着，如资本和雇佣劳动都未摆脱封建关系；民窑被官手工业组织——御器厂控制；资本主义因素没有囊括整个瓷业生产领域，只是在主要环节中出现，等等。因此，“明代后期景德镇制瓷业中的新因素只处于萌芽状态，它的出现只不过是量变过程中部分的质变。”

胡铁文在《试论清前期景德镇制瓷业中官窑行会同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①一文中，阐述三个问题：一、景德镇制瓷业在清前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从史料看，时间是在康熙、乾隆年间。二、作为封建方式的官窑处于衰退阶段，无力阻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所谓官窑，一是指官办的生产御用瓷器的官窑厂；一是指为御用瓷器而生产的形式，主要是“官搭民烧”。在明代，官窑因民窑的兴起而建立；在清代，官窑因民窑的发展而衰亡。明中叶以后，“官搭民烧”逐渐成为官窑的主要形式。尽管封建劳役经济还存在，但对景德镇制瓷业资本主义萌芽并没起到严重阻滞作用。三、清前期，景德镇制瓷业中的行会有三类：第一类是商人行会，第二类是手工业行会，这两类行会活动不多，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未起重要阻滞作用。最主要、最活跃的行会是第三类手工业工人行会，它存在于砌窑、满窑、烧窑、挑运、成坯等行业中，可以把它叫做“行帮”。行帮不仅没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相反却是这种萌芽形成过程的产物。当然，也要看到行帮这个封建组织的封建性，如强制的“帮”籍制度，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限制了技术力量自由发展壮大；垄断技术，不传授外人，墨守陈规，不求改进，妨碍技术的传播与提高；产品买卖和劳务雇佣关系实行固定的宾主关系，形成垄断；排斥资本，非有关系者很难投入；这种封建组织极易形成具有特权的阶层，等等。“虽然它产生之后又给资本主义萌芽成长带来一些不利因素，但这显然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和以上的见解相反，黎澍认为景德镇瓷业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理由是：明代景德镇，不可能“人口近百万，窑约三千”，该镇所在的浮梁县，人口也不过十万左右。明政府在景德镇只设一个巡检司，其编制与镇相当。宣德年间，景德镇有官窑五十八座，嘉靖年间，民窑中的青窑有二十余座，瓷器产量并不大。朝廷经常大量的派遣迫使民窑服从官窑需要，在这样的奴役和剥削下产生资本主义经营很困难。此外，它还没有脱离农业，窑户必须自己种田，行会制度早已存在，它是与资本主义经营相反的制度，砌窑等行业，凡是需要技术的，无不有它自己的业务秘密。由此可以断言，“景德镇瓷业的资本主义经营在明朝和清朝是不存在的。”^①

潘群则认为，清代前期景德镇瓷业并不存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他在《关于清代前期景德镇瓷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②一文中，提出如下看法：一、整个景德镇瓷业中不是民窑占主导地位，而是官窑占主导地位。从官营瓷业的御厂生产规模看，无论就生产设备的完整，或就产品数量以及工匠人数等而言，都比民

①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

② 《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

营瓷业中任何一个生产机构巨大得多，而且控制着景德镇整个瓷业。从“官搭民烧”方面看，清代前期经历了两个阶段，由部分官窑产品搭附民营烧造发展到全部官窑产品搭附民窑烧造，从部分生产工序由民营瓷业完成发展到全部生产工序由民营瓷业包制，民营手工业中贡品比重日益增大而商品比重日益减弱。“官搭民烧”并非“民窑”战胜了“官窑”，而是“民窑”已为“官窑”所支配。“只要官营瓷业和官窑产品仍占主导地位，整个景德镇瓷业就不能摆脱劳役经济的束缚和支配，其封建劳役性质就不能起根本变化。在此前提下，又怎能说清代前期景德镇瓷业，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之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呢？”二、“民窑”中的行会不是残余现象，而是普遍现象。清代前期景德镇民窑业中的行会，非但不是残余现象，而且支配着整个民窑业的供、产、销。其作用是：排挤更多的劳动力参与手工业者队伍，迫使部分破产农民重返土地；促使每一行业愈加细小而相互隔离，不能形成有机联系和协作，使扩大再生产极为困难；工艺墨守成规，阻碍技术进步，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造成桎梏；与封建政府、地方士绅相勾结，成为垄断行业、镇压工匠斗争的工具。总之，情况正如恩格斯所说：“生产仍然被纯粹行会手工业的形式束缚着，因而还保持着封建的性质。”①三、整个景德镇瓷业中阶级斗争的主要目标不是反资本剥削，而是反封建奴役。在民窑要为官窑服役的前提下，在行会组织束缚整个行业的情况下，景德镇工匠斗争目的，仍是争取供给饭食和减轻酷刑，“是为了反对封建盘剥和反对封建奴役，而不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剩余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49页。

值的剥削。”

第六，井盐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盐业收入是封建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历来封建统治者对盐业的生产与销售控制极严，自由雇佣劳动与商品生产很难在这个行业产生。学术界一般认为，在我国明清时期的海盐生产中，只是一些灶户有所分化，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但是，四川地区井盐的发展道路不同，由于地理和历史的特殊情况，那里较早、较多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迄于目前，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宋代四川井盐业中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二是清代井盐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哪些特点？有无手工工场？

前文提及，柯昌基、郭正忠都确认宋代井盐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里拟将他们的具体论析稍加陈述。柯昌基认为，宋代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发展得较为典型和突出的是煮盐。据北宋文同《丹渊集》载：并研县“自庆历以来，始因土人凿地植竹为之卓筒井，以取咸泉鬻炼盐色，后来其民尽能此法，为者甚众，遂与官中略出少月课，乃倚之为奸，恣用镌琢，广专山泽之利，以供侈靡之费。访闻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减七八。曩时朝廷尝亦知其如此创置无已，深虑寝久事有不便，遂下本路转运司止绝，不许容开造。今本县界内已仅及百家。其所谓卓筒井者，以其临时易为藏掩，官司悉不能知其的实多少数目。每一家须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著之徒，抵罪遁逃，变易名姓，尽来就此佣身赁力，平居无事，则俯伏低折与主人营作；一不如意，则递相扇诱，群觉哗噪，算索工直，偃蹇求去，聚墟落，入镇市，饮博奸盗，靡所不至，已复又投一

处，习以为业。”可见文中所述井户皆实行资本主义经营。从全省看，始自北宋的资本主义盐业经营在四川是很普遍的。工资劳动者已没有任何人身依附关系和财产束缚，只有经济上的隶属。如此典型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何以会在边鄙的乡邑中滋长呢？主要因为这里没有城市行会的限制和政府控制较弱、骚扰不剧^①。郭正忠也着重引述上面这条史料，认为盐井的经营者既能交纳一定数额的课税，又能支付几十个工匠的工资，是货币资本的拥有者，“豪者”经营盐井，固然是修靡生活的需要，但直接目的还是把井盐投入市场，攫取利润；工匠一无所有，必须将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但并不出卖人身。宋代四川卓筒井作坊中这种新式生产关系，属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②。

吴天颖与上述论者见解相反，他在《论宋代四川制盐业中的生产关系》^③一文中认为：一、就宋代四川全省而言，民营制盐业不少尚停留在古老的家庭手工业或“手艺人”阶段，劳动者为既耕地又煮盐的农民；制盐还未独立为一种职业，是农民经济的补充。二、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小商品生产者，他们既是盐业生产者，又是盐井所有者；这部分人虽易两极分化，但当时还未出现资本主义生产的苗头。三、文同《丹渊集》中说到的井研县，其盐井所有者并非“大商人”或“早期资本家”，因为该地当时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这个山中小邑决不会出现挟资巨万的大商人，制盐的井主不可能是商人转化的产业资本家，实际多为地主阶级

① 《宋代雇佃关系的初步探索》。

② 《宋代四川盐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③ 《文史哲》1984年第1期。

分子。唯其如此，才能了解他们何以不将剥削所得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广专山泽之利，以供侈靡之需”。井研县盐井的劳动者，一部分是农民，另一部分是“工匠移人”，后者并不是由小生产者中分化出的自由劳动者，而是因政治因素而丧失原有社会身分的封建雇佣劳动者。总之，井研县并不存在“典型”而“突出”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

冉光荣、张学君在《四川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①一文中认为，在清代乾嘉时期，四川井盐业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其标志乃是雇佣劳动的手工工场的出现。文章论列了以下见解：一、四川井盐业在清代前期的突出变化，首先体现在生产规模的扩大上。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载：“四川货殖最巨者为盐。川北之南部、西充、射洪、乐至、蓬溪，川南之犍为、富顺、荣县、资州、井研，川东之忠州、云阳、开县、大宁、彭水，川西之简州，上川南之盐源，州县著名产盐者二十余处。而地出咸水，可以熬盐闾阎私井不卖者，不在此数。大盐厂如犍、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四川井盐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内部分工十分细密，已由简单的协作过渡到以明确的技术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二、在规模巨大的盐场中，有数以万计的劳动者——盐工，他们原则上都是具有自由身份的雇佣工人，来源大致有三：一为农村失去土地或仅有极少土地的农民；一为城市破产的小手工业者；一为他省流徙之民。虽然他们的“自由”程度不同，但对盐业资本而言，都是劳动力的出售者，“论工受值”，完全依靠工资过活。三、井盐业的资本来

^① 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

源，约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小商品生产者的投资，二是土地资本，三是商业资本转化为盐业资本。商业资本通过多种方式大量渗入盐业资本，逐步控制大部分盐场井灶，产业资本亦进入流通领域，形成了产、运、销合为一体的大场商，已发展为手工工场是无可置疑的。

王方中在《清代前期的盐法、盐商与盐业生产》^①一文中着重阐述了以下见解：一、淮盐中资本主义萌芽的有力证据至今还没见到，而四川井盐的发展道路却显著不同，原因是明末农民起义使四川封建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清初大量外省人民流入四川，这里封建政权对井盐的控制较松，如：允许人民自由开凿、自己占有盐井；川盐的赋税负担较轻，井盐的生产和贩运比较自由。除了社会条件外，自然条件也有一定关系，如：川盐的运输条件好，绝大部分靠水运；燃料条件也好，天然气和煤炭耐烧，成本低，因而有较大的竞争潜力。二、川盐迅速发展的表现是：与海盐生产技术的长期停滞不同，川盐的生产技术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如凿井技术；盐井不断增加，盐厂规模扩大，盐的产量增加，销路扩大。三、一部分商业资本较为迅速地转入产业的原因，首先是榷盐制度松弛，盐税较轻，封建政权的其他勒索也少，商人有利可图，商业资本乐于转入盐业生产。其次，与海盐比较，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井盐的束缚较小。因为在海盐中，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而井盐是一种类似矿业的手工业，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较小；海盐的生产过程比较简单，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不多，井盐凿井和生产过程较复杂，固定资本大，资本家的地位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显著上升，地主的地位相对下降；在海盐中，地主的身份和场商的身份在许多场合是合而为一的；在井盐中，地主和资本家、商人的身份往往是分开的。这样，商人和资本家就能在较大程度上摆脱地主对他们投资活动的束缚与阻碍。不过，在本文、特别是另一篇署名为欧阳云钦的文章中^①特别强调，有些同志明显地夸大了四川井盐的生产规模。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所说的“盐厂”，决非近代意义的工场或工厂，而是指一个产盐区，即“著名产盐者二十余处”的“处”。每一个盐产区包括的许许多多生产单位，就是从盐井中提取盐卤的井户和用盐卤煮盐的灶户（也有些地区是井、灶合一的）。直到民国年间，富荣东场每一井户职工数为六十一至六十三人，键为是井灶合一的，每户为十八人。清代可能还没这么多，估计相去不会太远。

五、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三十年来，学术界对于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在五、六十年代，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和著述为数极寥，许多文章是在全面研讨资本主义萌芽时兼及，引述的史料多属官修史籍和私人文集笔记。所探讨的问题，有明清农村经济中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出现的时间与发展水平、经营地主的性质及雇佣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等，但并没有展开多少讨论。有许多学者在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还持慎重和保留的态度。而七十年代中叶以后，讨论这个课题的专文显著增

^① 《清代前期四川井盐业的生产规模问题》，《光明日报》1984年4月27日。

加，并出版了几种专著。对五、六十年代所涉及的问题，有了更深入、更具体的讨论。尤其是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条件、发展的道路与规律及迟缓的原因等问题，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在研究工作中，开始大量利用档案文献、田契租约等史料。主张农业中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者，愈来愈多。研究工作呈现不断深入的趋势。

三十年来关于这个课题的讨论，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经济中，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如果有，出现于何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又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和方式发展？水平与程度如何？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农村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这种萌芽是微弱的，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的剥削关系。不过对萌芽出现的时间，看法颇有歧异。吴海若说：“唐代出现了雇佣一百多个季节工人的茶园。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茶从唐代起就成为广泛的商品生产，商业性的茶园中的工作没有很多的劳动力是不能进行的，当劳动者是自由人的时候，多数劳动力只能雇佣来。这种现象不仅会出现在种茶业中，同样也会出现在一切商品化较高的农业部门和地区。”“唐宋时种蔗制糖都是商品生产，需要多数人协作，糖霜户已经分化，其中必然有资本主义生产萌芽。”同时，“唐宋两代，虽然现在找到的材料不多，但是已经看到了富农经济和经营地主经济的苗头。”^①束世澂认为，北宋时从大土地所有者来看，一般是田连阡陌，雄于一乡，“但已部分出现完全使用雇佣

^①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

工人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者”，因为当时已有富者“专以财役使贫民”^①。不过，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我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明清时期。其中，有的确认产生于明代中、后期，如尚钺、韩大成、陈诗启、李文治等；有的则确认在清代，如翦伯赞、傅衣凌、黄冕堂、李之勤、刘永成等。他们的具体说法下文多有介绍，这里不一一引述。

还在1954年，傅衣凌就撰专文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了探讨^②。他认为：明代的江南地主经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初步显现出新的经济成分，逐渐摆脱了封建劳役制的束缚，走向资本制的过渡阶段。在中国封建史上雇佣劳动者的出现，是很早的，在农村和城市，都拥有相当的数量，形成封建农奴制的一个重要的支柱。“惟是把这雇佣劳动者赋予以新的性质，并提高其在社会劳动里的比重，无论如何，那不能不说只有在明代以后才开始出现的。”“根据文献的记载，明代雇工的身分尚不是很自由的。所以明代的雇佣劳动者有很多地方尚保留着半家长制半奴役制的雇佣工作形式。然无论如何他们又是在商品货币经济已有一定程度的发达，并出现着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之后才存在的，因此，其中也就出现有一部分的短工，身分是较为自由的，并且这般雇工皆向雇主领取货币工资。”后来，他在另一篇文章中^③，又进一步修订和补充了自己的观点：“明清时代中国开始出现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随着生产

① 《论北宋时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

② 《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第5期。

③ 《略论我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规律》，载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

力的不断发展，也在农业生产上面露出萌芽的端倪，据明、清地方志和文献资料记载，各地有大量的农业佣工或雇工，但这些雇工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佣工。其始具备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佣工，那是出现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江西新城（今黎川）的栽烟业。”他强调指出：我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国家，而走自己独特的发
展道路。它的发展规律：大致先从山区发展到平原，从经济作物发展到稻田生产。前者是中国独特的发展规律，后者是一般的共同规律。”

尚钺的论文《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①辟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渗入农村》一节，他认为：农业生产上的资本主义萌芽，是由城市手工制造业的发展渗入到农村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经营方式既渗入农村，所影响的不仅只是作为城市手工业原料的桑、棉、茶、蔗、花果、香花香草等商品作物的经营方式，也影响一般的农业经营方式和改变着农村的生产关系。”他还认为：“明中叶以后有些地区农业经营基本上已采取了资本主义制”，如江南苏杭地区。李之勤也较早发表专文《论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商业性农业的发展》^②，阐述了近似的见解。他认为：社会生产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手工业中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是促使农产品商品化和商业性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随着织物业、制糖业及其他手工业的发展，棉花、桑树、苧麻、蓝靛、香、茶、甘蔗、烟草等的种植，在某些手工业发展的地区迅速增加。菜园、果园、花园等生产，鱼类与家畜家禽的饲

① 载《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

② 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

养业以及商品粮食的生产，也都获得很大发展。“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使农业经营出现了新的方式。不仅从封建的自给性的农业中出现了许多以出卖农产品为目的的小商品经营，而且从小商品的农民经营中分化出了资本主义经营的富农，从封建地主中也出现了经营地主，有的商业资本家也渗入了农业经营而变成为农业资本家。”他强调：“如果在估计清初资本主义生产萌芽发展水平时忽略了这一点，客观上就必然看不见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的真正原因，从而就陷于外因论的泥沼，荒谬地妄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用洋枪大炮打进来的。”

翦伯赞在《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一文中，对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农业生产作出如下概括：第一，在当时农业生产关系中出现了土地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大土地占有者，另一方面是农民无产者。第二，已有一部分土地所有者把土地变成商品，从封建的租佃制转向商业性的农业经营。一部分农民无产者也从封建佃租制的奴主关系中解放出来，转化为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农业雇佣劳动者；另一部分农业无产者，在某些地区内突破了封建的地方闭关性走向城市或边疆，参加工匠队伍或寻找新的自由土地。第三，由于农业经营的商业化、专门化，扩大了商品交换关系，替国内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第四，实物地租正向货币地租过渡，有些地方出现了货币地租。“这一切说明了当时的农业生产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封建租佃制依然普遍存在，实物地租还是支配的地租形态，地主农民之间封建的义务乃至人格依赖和奴役、地方的闭关性与生产的极端分散性，在很多地区还没有被摧毁，这一切又说明，“在当

时农业生产中，资本主义因素只是萌芽，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封建地主经济。”

黄冕堂的《论清代前期的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四府的农业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①一文，探讨了该地区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其结论是：“总起来看，江浙四府的农业基本结构仍然是封建的。自然经济仍然占据着多数的农村。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佃耕制度尚有着较牢固的基础。封建地租的盘剥极重，超经济的强制仍然比较普遍的存在。生产技术水平极端低下而且墨守陈规，生产工具极为简陋。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土地三者结合的封建结构还有着强大的势力。”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阶级斗争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四府内许多城近郊和经济作物生产的农村转入了商品生产的轨道。“个体农民经济发生了明显的阶级分化，萌发了新的阶级，产生了剥削雇佣劳动的‘富农’和主要靠工资过活的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在各类小商品生产即家内手工业和商业性农业、农副业之中准备了产生资本主义的良好土壤，部分生产已经处在由小商品生产转向资本主义生产的门槛上，个别部门已经跨入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新阶段。”地主经济中“也产生了剥削雇佣劳动的改良主义倾向和相应的商品生产。”他特别强调：农民经济中“小商品生产和个体农民的解体与阶级分化是农业经济乃至整个封建经济发展变化与资本主义萌芽的根本关键和出发点，因此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刘永成著《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一书

^① 载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

问世。他在书中结合清朝乾隆刑科题本及有关文献，较全面地探讨了我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认为：一、资本主义萌芽，是指封建社会后期，即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时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原始形态。史学界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产生尖锐的意见分歧，“关键在于我们对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前提是：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资本一定程度的发展及其向产业资本转化；地租形态的演进与货币地租的发展，三者缺一不可。清代前期的农业中，已经具备这些前提。二、清代农业雇工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农业劳动力具有商品属性，区域性农村劳动力市场形成，这意味着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劳动生产者，他们是农业生产中的新型劳动力，是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虽然尚保留一些封建色彩。三、农业经营中出现了佃富农经济与经营地主经济，这是“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两种主要的经营形式。”“佃富农经济和经营地主经济拥有较多的肥沃土地、足够的劳动人手、充足的肥料、较为齐全的生产工具、较多的牲畜，以及各种水利设施，并兼营手工业、商业等等，这无论在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和社会生产力方面，还是在推动农业技术的进步和促使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李文治的长篇文章《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①阐述的见解是：一、资本主义萌芽是指封建社会后期生产关系的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开始出现，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过程的最初形态。马克思曾指出这种最初形态的特征，一是

^① 载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著：《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即封建奴役关系向资本主义自由雇佣过渡；一是“稀疏地”出现，即这种萌芽只在条件较好的个别地区发生，而不是普遍发展。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条件，并且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资本主义萌芽就很难产生。农业雇佣关系性质的变化，自由劳动的出现，则是鉴别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的根本标志。”劳动力社会形态的变革，封建雇佣向自由雇佣过渡，包括经济关系即实际生活与法权关系两个方面。先是经济关系的变化，然后才有法权关系的变革。研究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既要看到实际雇佣关系与法权关系的矛盾，又要看到它们的一致性。三、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首先是从富裕农民的经营开始的。“早在明代中叶——十五世纪，首先由富裕农民的经营产生了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此后又经历了约两百年，到清代前期，“伴随着中小庶民地主的发展，又由这类经营地主形成了比较自由的雇佣关系，在地主经济中又开始产生了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由富裕农民经营和地主经营的发展，“表明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四、中国地主经济制虽然缺乏严格的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但却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地主，他们可归纳成两大类，一是贵族缙绅地主，一是庶民地主。“这时出现的经营地主主要是庶民地主”。五、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首先发生，如江、浙某些地区较早地出现了富裕农民的经营。后来在封建宗法势力薄弱的地带继续发展，如江、浙、皖、赣诸省交界地带，明末农民起义对地主阶级打击严重的四川，新开垦的东北三省地区等。“在过去的讨论中，偏重于商品经济发

展的作用，而忽视封建宗法关系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欠。”六、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中国地主经济制也在发展变化。“无论从地权转移及地权分配的变化，或是从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及封建依附关系的松懈，都反映了地主经济制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给农业资本主义萌芽较早地发生提供了某种可能。”魏金玉在《关于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①一文中，提出如下看法：其一、明清时代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封建的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一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内部矛盾激化，主要表现在土地所有权与土地耕作权分离的扩大以及封建地租由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的发展，二是商品货币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三是农业中的雇佣关系越来越普遍；四是出现了一个受剥削、受压迫的直接生产者取得凡人等级地位的过程。在这些条件统统具备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可能发生，而且确实发生了。其二、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业雇佣关系性质的变化，即农业雇佣劳动由等级性向非等级性过渡。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雇工经营性质的变化，即雇工经营由家长制经营方式向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转化，亦即自给性的生产向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商品性生产转化。“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是在经济作物的雇工经营中发生的。其三、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道路的特殊性是：从农民经济中演化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沾染旧的影响少一些，发展得迅速一些，因而显得革命一些，是所谓革命的道路。从地主经济中演化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旧影响的联系更多一些，发展缓慢一

^① 载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

些，因而显得落后一些，是所谓改良的道路。“但是在中国明清时代，这两条道路却是同时并存，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

罗仑在《关于清代山东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生的道路问题》^①一文中，概括地表述了如下见解：就农民经济而言，由佃农雇工向富农雇工经营转化，是一种无甚发展前途的保守道路。因为佃农雇工大致有两种：或因家庭劳动力不足而临时雇工，或为获取超额地租的余额而雇工。因前一个原因而雇工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可言，由后一个原因而雇工的佃户虽带有新的性质，但他们要发展成租地资本家，其前途是十分艰难坎坷的。由自耕农雇工向富农雇工经营的转化，是一条有发展前途的革新道路。自耕农雇工可以说是导致清代山东农业经营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原始起点，特别是富农雇工经营，较易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有许多经营地主，在自耕农的分化中开始起家之后，大都经历了一个上升为富农的发展阶段。就地主经济而言，由传统的租佃地主向经营地主的局部转化，是一条保守的道路；由富农向经营地主转化，是一条革新的道路。山东地主经济中的雇工经营，大致分三种类型：其一是租佃地主拨出一小块地，为获得某些消费性产品供自家享用而雇工；其二是租佃地主兼经营地主，拨出一大块地，为获得为数较多的商品作物而雇工；其三是典型的经营地主为获得大量商品作物而雇工。第一种属封建性质的雇佣关系，第二种由传统租佃地主向经营地主局部转化，第三种是经营地主经济体，最易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需要在这里提出的是，有些研究者不同意上述论析，他们认

^① 载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

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村经济中并不存在或者基本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许大龄较早就这种看法进行了论述。他不同意尚铨关于经营地主及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水平的估计，认为“明代中叶以后的地主，主要的还是封建的地主”。作为封建地主，第一是用封建的剥削方式剥削佃农；第二是所入所得，不是投向扩大再生产，而是主要用于消费；第三是积累了财富之后继续扩充土地和经营高利贷。当然，不能否认当时某些地方个别地主的较进步的经营方式，但也不能以偏概全。即或个别地方出现了大量农业经济作物的经营，并普遍出现了农业雇佣的关系，也不能理解为“农业经营基本上已采取资本主义制”。他还认为，在某些地区，雇农比十六世纪以前的确是普遍了，但雇佣工人的身份是极不自由的。明代中叶以后还有短工的存在，“这些短工的出现，我们应该估计为中国农村中新生的现象”^①。

朱崇宙撰写的《明末清初太湖地区的农童雇佣劳动》^②一文认为，在太湖地区一些地主使用几名长工在少量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这和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经营地主”毫不相干。“既然明末清初太湖地区的短工不具有自由雇佣劳动者的身份；同时，部分使用雇工的地主和富裕农民也不具有农业资本家的身份，那么，短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仍然是一种带有封建性质的雇佣关系。”

近年，吴承明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③一文中，概

① 《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初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的萌芽》。

② 《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③ 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

述了如下意见：一、农业方面，在明代后期，曾有一些地主雇工经营的迹象，到清代前期，反而罕见。我国历代都有大量流亡人口，自由雇工很早就出现。清代农业雇工增加，其人身束缚亦逐渐解除。但是，不能从自由雇工直接引伸出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要求劳动者受雇于资本，而不受雇于土地或其他权力。土地不是资本，也不能转化为资本。有些经营地主，虽然出卖部分产品，但还如马克思所说，其实质仍是“伪装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因为他们出卖产品，是为了满足更高级的生活享受。富农经济在清代颇有发展，力农致富之家屡见，但他们大多在发家之后，即向出租土地过渡。他们除出租土地和雇工外，绝少农业投资，他们的财富，基本上还没有转化为资本。二、农业中不是完全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大体有这几项：福建产茶地区商人租山或买园植茶，福建上杭山区的豪主雇管民垦山，安徽南部山区的富裕棚民租山垦植，川陕富裕棚民经营药厂和木耳、香蕈、香菌厂，东北垦区富裕佃农招工垦植等。可以说，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极其微弱的。

尹进先后写了《关于中国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①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业中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吗？》^②两篇文章，主要围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条件和雇佣劳动的性质，同已经发表的文章中的许多论点，逐项进行辨析，结论是明清时期农业中并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他的具体说法，下文再予引述。

第二，关于经营地主。

^① 《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② 《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这是在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多数主张在明清时期农业中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者，都认为这一时期有了经营地主经济。不过，只有少数论著对此进行了较深入地论述。

景甦、罗仑通过文献材料和实地调查，撰写了《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①一书，认为“当时，在地主经济领域中，可以说采用雇工经营方式的经营地主已经形成一个新的阶层，这个阶层，在几个重要的方面以其自身的经营特点，与租佃地主相区别。”“我们所指的经营地主这个概念，是一种拥有大量土地，雇佣长、短工（年工、月工、日工）经营农业生产，并以剥削长、短工剩余劳动产品为生活主要来源的（与租佃地主不同的）农业经济体。”同时，从几个方面剖析了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经营地主在生产过程中显示出相对进步性。他们拥有较新式的生产工具、运输工具、各种畜力和足够的肥料；使用了较充裕的雇佣劳动力，在农忙季节，常以较高价格吸引男女老弱各类劳力，保证耕作收割宜时，也增强了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协作；经营面积较大并集中，便于组织生产，土地单位面积产量较高。二、经营地主经济体中包含有资本主义性质，表现为：经营地主在农业生产中不是采用租佃制而是采用雇工制，多数还经营手工业、商业和高利贷，生产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自给自足，而是为了生产数额较多的商品谷物；经营地主雇佣的直接生产者，即长工已经基本上含有自由无产者的身分；经营地主与长、短工之间所建立的基本关系是货币雇佣关系。三、经营地主经济体还残留有

^① 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

封建性。从生产资料所有者——经营地主方面看，生产目的尚残留有自给自足性，管理上残留着家长式统治，经营地主兼有租佃地主的身分，普遍兼营高利贷，政治上享有绅权。从直接生产者——长、短工方面看，雇工带有奴仆性，长工要求向佃农和自耕农方面转化，短工通常带着自己的工具在地主土地上劳动，长短工的工资严重地保留着实物工资的残余，甚至都是实物工资。不过总的来说，“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已经是开始向资本主义制过渡的经济体了。”景甦近年还发表文章^①，继续强调：一、清朝前期出现的经营地主“是我国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主要形式”。二、清朝前期在农业中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有所发展，“在新的形势下出现的经营地主，其生产关系带有资本主义性质是可能的，也是毫不奇怪的。”三、经营地主哪些方面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第一是它在生产中同时雇佣较多的农业工人，实行简单协作；雇工在政治上虽受地主阶级的压迫，但已摆脱了封建隶属关系，获得了人身自由，可以靠出卖劳动力获取工资，使自己的劳动力在雇佣市场上转化为商品。第二，经营地主的土地虽不是资本，但可以垄断土地，利用土地剥削农业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价值；同时在自己的土地上实行集约生产，不断提高土地效益；将土地上的大量产品变作商品，逐渐积累起庞大财富，扩大再生产，使它所占有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发挥资本的效能。四、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标志，是较多的“自由劳动者”同时被雇佣，在生产中形成协作，以及生产资料所有者以生产大宗商品为生产目的。由于经营地主的剥削对象，基本上是一

^① 《论清前期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4年第1期。

些不受社会束缚和没有自己财产的农业雇佣劳动者，并且主要是为生产商品粮食或供市场销售的经济作物而剥削长短工。因此，经营地主的生产品也就初步具有资本的特性；为此，我们把清前期出现的经营地主看作是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秦佩珩认为，明代中叶以后，个别地区就出现了少数经营地主，包含有资本主义的新颖性质，同时还残余着严重的封建性^①。柯建中先后发表过两篇文章^②，阐述专制主义统治的高压加强和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是影响明清地主阶级变化的主要因素，变化的主要表现是缙绅地主的衰落和经营地主的兴起。他认为，明清时期地主阶级内部两个不同类型——缙绅地主和经营地主，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日益明朗的。缙绅地主由拥有政治特权的官僚、聚族而居的大姓和武断一方的乡官组成。这个社会集团的基本特征是富贵合一，贵比富更重要。他们多是由于政治上的飞黄腾达促成经济上的急剧扩张，而政治上的失意又往往导致经济上的迅速败落。缙绅地主的政治特权愈大，和生产实际的距离就愈远。他们把占有土地当作压榨高额地租的手段，兼并土地，猎财自厚，不仅不能刺激生产的发展，反而招致生产的破坏，缙绅地主也一并走上了衰落的道路，而经营地主则不然，“不是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而是以农为主，兼及工商和其它副业的多种经营，并在经营过程中注意经济实效，关心扩大生产，发挥管理职能，对于这类型的地主，我们就称之为经营地主。”

① 《论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郑州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② 《明清农业经济关系的变化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6期；《略论明清时期封建地主阶级的变化》，《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3期。

经营地主的活动改变了农业生产的面貌，缙绅地主以单纯集中土地为能事，经营地主却在土地上投入了较多的生产资金和劳力；缙绅地主以坐而待收为能事，经营地主却注意采取诸如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提高土壤肥力、进行合理安排等措施，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多种经营的特点还使经营地主突破了自然经济的狭小天地，有些人在商品经济已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投资于矿冶和纺织部门，朝着早期资本家转化的可能性，不能说是不存在的。

刘永成根据清朝刑部档案，研究了经营地主问题^①。他认为，经营地主经济是和佃富农经济在同一历史条件下同时出现的另一种农业经营的新方式。指的是“在某些个别地区的庶民地主或商人直接投资与组织农业生产，并雇佣了一定数量的雇工，为适应市场的需要，为牟取利润而进行的农业经营方式”。中国的经营地主经济，在清代前期特别是到了乾隆时期，在某些个别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并获得了初步的发展。这些地区，既包括南方，也包括北方；这种经济既有种植经济作物的，也有生产粮食作物的。不过，它在我国南方某些较为集中种植经济作物的区域，特别容易得到发展。经营地主经济有如下特点：第一，经营地主与佃富农一样，占有大量土地，雇佣较多雇工生产，因而有进行规模较大的社会性生产的条件。但佃富农是以租佃方式集中土地，而经营地主则是通过购买和“收田自耕”等途径集中并使用土地。第二，经营地主生产的产品，不是单纯为了满足自己家庭的消费，而是为着市场的需要，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三，在分配关系方面，经营地主与封建缙绅地主完全

^① 《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

不同。前者是通过雇佣关系，采用经济手段剥削农业雇工的剩余价值；后者则通过对奴仆、“雇工人”的人身占有，采用超经济的强制力量，榨取劳动者的全部生产物。第四，经营地主与农业雇工之间只是货币金钱关系，不存在人身隶属问题；缙绅地主则不然，他把劳动者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劳动者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

此外，还有些研究者的论文，如吴量恺的《清代乾隆时期农业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①、黎民的《乾隆刑科题本中有关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②，也都利用刑部档案对乾隆时期的经营地主进行了具体地叙述和分析。

不过，需要提出的是，也有研究者专门著文，论证并不存在“经营地主”。朱建在《关于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③一文中，与景甦、罗仑进行商榷，他认为：一、中世纪的封建农业，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农村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在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从《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一书作者提供的调查资料看，还不具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必需的条件。当然地主在土地上经营生产，较个体农民的生产有更优越的条件，“但它只是地主对土地经营方法的改变，而不是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那几家比较典型的经营地主，还只是中国传统的地主庄园。”二、从市场关系看，书中提到的三个经营地主与城市市场还是非常疏远的，他们所在的地区还只是一个自然村，他们市场活动的范围非常狭小，带有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② 《文物》1975年第9期。

③ 《学术月刊》1961年第4期。

浓厚的地方性和闭塞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无法生长出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机构。三、这三家经营地主雇佣的主要对象是短工而不是长工，这些短工都是附近的贫苦农民，都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以做短工来补贴家用，家庭主要收入还是依靠自己土地上的农产品，他们不能算作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他们还是十足的小生产者。从长工来看，工资收入低得可怕，谈不上资本主义的最低工资水平。有的长工还有自己的土地，并不是十足的无产者。这种长短工，只能算作是地主经济“用一种变态的农民剩余劳动的直接掠夺来代替农民用实物向地主缴纳地租的形式，这种雇佣关系下的长短工的生活比一般的租佃农民更要凄惨得多，这种生产形式不仅没有比租佃关系进步，而且还要落后一些。”四、这三家经营地主的消费生活，也找不到丝毫的资本主义气息，而是十足的封建气息。地主阶级的消费形式一般也是带有自给自足性的，只能限制在一个小圈子内，孤立地去享受。所以从消费形式看，这些经营地主还是十足的封建地主。

第三，关于雇佣劳动。

农业中雇佣劳动的社会性质，也是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必然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较大，各人的研究途径也有不同，有必要再专门加以介绍。

大致说来，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明清时期农村雇佣劳动基本上还是封建性的，但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由劳动的特点或性质，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发生关系。

上文已提及，傅衣凌在《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提出，明代出现了带有新的性质的雇工。在另一篇题

为《我对于明代中叶以后雇佣劳动的再认识》^①的论文中，他进一步订正和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一、明代中国的农业比起手工业来说，是较为落后的，因而此时雇工的封建性仍是很浓厚的，有的长工还和奴隶劳动结合在一起。“然而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影响下，仍使得雇佣劳动比起以前的时期有所区别，而含有自由雇佣的若干特点。”二、这些特点尚未完全具有自由劳动者的标志，但已不同于前代。它们是：议定有工资，并以白银付给雇工；双方立契，规定工作年限；人身依附关系开始变化。作为自由雇佣劳动的若干特点，在长工方面，尚非十分稳定，而且还带有地方性。短工、忙工较之长工表露得远为明显。三、关于自由雇佣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我的意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特别在资本主义的前史，自由雇佣劳动者不一定要完全脱离生产资料。”

许大龄对这个问题也较早地作过论述^②。他认为，十六、十七世纪从事农耕的雇工有长工和短工。长工在明代称为“雇工人”、“傭工”，他们“在法律上、在实际的人身隶属关系上都是不自由的。”在明律中，奴婢与雇工人往往并提，雇工人的身分介于凡人与奴婢之间，在法律上受到很大限制。雇工人除从事农业生产外，还要为主人服各种杂役。不过，主人对长工的束缚，万历以后已逐渐松弛。短工、忙工和伴工，都是短期受雇的人，他们在此时已接受货币工资。万历十六年政府颁布新律例：“官民之家凡傭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只是短雇受值不多者以凡人论。”这表明短工实际上已是自

① 《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② 《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初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的萌芽》。

由劳动者。不过，“这种农村里的自由的短傭，在不可能存在大量富农的条件下，要更扩大的发展，还是有困难的。”

李文治在《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一文中提出：一、雇佣劳动有各种不同的历史形态，自由劳动是由封建雇佣过渡而来的，它的出现“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指标”。自由劳动和封建雇佣的区别要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在经济关系即实际生活方面必须摆脱对雇主的前资本主义的封建依附关系，一是在法权方面必须解除法律上的身分义务关系。中国农业雇佣关系的变化是从明清时代开始的。二、中国农业雇佣的封建性表现为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封建等级关系，对雇工而言，雇主是以特权者的身分出现的。而由明代中叶到清代前期伴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及农民阶级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宗法伦理已非神圣不可侵犯，森严的封建等级关系发生动摇，自由劳动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关于实际生活中雇佣关系的变化，短工很早就以自由的身分出现了，长工的变化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概乾隆五十一年以后，只有对雇主有“主仆名分”的雇工才具有人身隶属关系。三、雇佣关系实际生活的变化，使原有的封建法权规定已不相适应，迫使统治者不能不加以适当变革。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明确了短工的法律地位的平等关系，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解除了部分长工法律上的身分义务。

经君健先后发表过两篇文章^①，专门探讨了明清雇工人的法律地位及其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他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

^① 《明清两代“雇工人”的法律地位问题》，原载《新建设》1961年第4期，署名欧阳凡修；《明清两代农业雇工法律上人身隶属关系的解放》，原载《经济研究》1961年第6期，署名欧阳凡修。此二文已收入《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一、法典反映的生产关系是和实际生活有距离的，但它毕竟是统治阶级经常有效的、现实的统治工具。因此，对于明清雇佣劳动者身分地位的探讨，可以从明清法典的有关规定做起。二、明清法典并不承认雇工人和雇主之间有什么平等的身分地位，所有的只是从属的人身隶属关系。雇工人在雇主家族中居于类似子孙、卑幼的地位，其法律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低于凡人。不能把雇工人这个被编制在雇主宗法家长制体系内的社会等级，视为资本主义的自由雇佣劳动者阶级。三、当时并非所有的雇佣劳动者都受雇工人法律的约束，不属于雇工人范畴，以及解除了雇工人身分而成为“凡人”的雇佣劳动者和雇主是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的。因此，“如果说明清时代某种形式的雇佣关系带有资本主义性质，构成资本的历史前提的话，那么，那种形式下的雇佣劳动者必须不属于雇工人的范畴，必须是已经从雇工人的身分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雇佣劳动者。”四、农业雇佣劳动者人身隶属关系的解放是一个缓慢、曲折的历史过程，从短工的解放到部分长工的解放，前后历时长达两个世纪。万历十六年“新题例”明文规定，短工不再属于雇工人范畴。清乾隆五十三年之《大清律例》又补入一则极为重要的“新例”，全文如下：“凡官民之家，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仍照定例治罪外，如系车夫、厨役、水火夫、轿夫及一切打杂受雇服役人等，平日起居不敢与共，饮食不敢与同，并不敢尔我相称，素有主仆名分者，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均以雇工〔人〕论。若农民佃户雇倩耕种工作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依凡人科断。”这就是说，“农民佃户”所雇佣的那部分长工也从人身隶属关系下得

到了解放。因此，在研究明清社会农业资本主义因素的发生、发展时，万历前期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间在雇主雇佣短工经营范围内，以及乾隆五十三年以后“农民佃户”使用雇佣劳动（包括长工、短工）的经营形式，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线索。

第二种意见认为，明清时期的农业雇佣劳动者，特别是在经营地主和佃富农经济中，基本上是自由的，具有商品的属性，即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性质。

田培栋在《关于明代后期“长工”的身分地位问题》^①一文中认为，如果“抛开封建社会后期人身依附关系松弛的总趋势等等，孤立地仅从法律条文得出的结论，起码是不全面的不能令人信服的。”他强调：明代后期，在江南地区不但出现了大量的“长工”，其中一部分人还早已取得了身分上的自由。“新题例”中对于“长工”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能收到多大效果，有待讨论，但决不可夸大它的作用。那些违反时代潮流的法令，与实际生活的距离往往很大。有人根据法律条文，认为“长工”在受雇期间，身分是不自由的，即使被雇主殴打致死，雇主仍可逍遥法外。但在现实的生活中，雇工在受雇期间死亡，雇主要受牵连，严重的要倾家荡产、长期坐牢。明代后期，地主阶级中各个阶层对待雇工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缙绅地主的代表人物就主张加强法制，以传统的强制手段控制雇工，“新题例”的颁布就是具体体现。而经营地主则主张从经济上满足雇工的要求，消除雇工的“不满之心”，不少人提出宽待佃户、奴婢、长工的主张。总之，不管统治者的法律规定如何，“伴随着封建人身依附关系

^① 《北京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

松弛的历史趋势，不少的长工仍取得了身分的自由。”

刘永成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个发展变化过程，由于乾隆刑释题本得到初步整理，他在《论清代前期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①及专著《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中，提出如下论析：清代在一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中，特别是在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雇佣关系。“这种关系的出现，乃是封建社会开始解体的象征，它孕育着农业资本主义的萌芽。”这种新型的雇佣关系具有的特点是：首先，雇工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一部分农业雇工在现实生活中取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他们与雇主基本上处于“平等”，短工比长工的“自由性”更大些。在法律上，从乾隆五十三年“新条例”可以看出，有“主仆名分”的雇工，仍与奴仆一样，对雇主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没有“主仆名分”的雇工，人身依附关系就松弛，可同雇主“同坐共食，尔我相称”。其次，区域性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形成。据档案资料记载，清乾隆时期，东北至盛京，西达四川，南到广东，都出现了地区性的农村劳动力市场。既有雇工出卖劳力，也有雇主购买劳力，主雇双方任意买卖。再次，农业劳动力具有了商品的属性。在劳动力市场上，不仅雇主可以挑选雇工，雇工也有选择雇主的自由；劳动力的价格，受着供求关系的支配；劳动力价格的高低，还是由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大小来决定的；在工资形式上，一般采用计时工资制，也有实行按日计件工资制的。由以上三个特点看，“标志着农业生产中已经开始出现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劳动生产者了。”虽然这些雇佣劳动者遭到封建制度的

^① 载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

种种束缚和摧残，尚保留着一些封建色彩，但是，这些雇佣工人确已开始具有“自由劳动者”的身分。

吴量恺在题为《清代乾隆时期农业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①的文章中也认为，清代乾隆时期，某些地区农业经济领域中的雇佣关系，具有如下特点：较为“自由”的主雇关系；农民小生产者经济严重破坏，农民分化，逐渐变成雇工；劳动力成为商品。具有这些特点的雇佣关系，虽然遭到封建制度的种种束缚，但“这是一种新兴的力量，它意味着雇佣劳动关系的新发展，它意味着在农业生产中已经有了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萌芽性质的生产者了。”

第三种意见则认为，由于农业雇佣劳动者还没摆脱人身依附和生产资料的束缚，不能说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罗耀九在《明代中叶的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吗？》^②一文中，与傅衣凌进行商榷。他认为：一、说嘉靖时代江南农村雇佣劳动者人数很多，显然是夸大了。当时劳动农民除极少数是有土地的自耕农外，绝大多数是佃农，雇佣工人人数占总劳力的百分之四以下。二、不能把支付货币工资作为资本主义性质雇佣劳动的标志，因为这种办法早已有之。明代雇主有殴打雇工人的权利，只是不能打伤打死而已。明代雇工受雇主超经济强力控制，是不自由的，“可以肯定明代的长工不是自由劳动者”。三、短工没有人身隶属关系，但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古已有之”，不是明万历时期的新变化。关键在于明中叶的短工还没有和生产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② 《历史研究》1961年第1期。

资料分离而且永远分离。在一定条件下，他们又会回到土地上来。因此，不能说明代中叶农业上的短工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者。

尹进在《关于中国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文中，谈了以下的看法：一、万历十六年“新题例”是对“雇工人”涵义的第一次明文确定，当年的长工，肯定在“雇工人”范围之内。乾隆五十三年刊入《大清律例》的“新例”显然有些不同，它对雇佣劳动者是根据被雇于“官民之家”还是“农民佃户”，确定其“以雇工人论”或“依凡人科断”，不象“新题例”那样以受雇时间长短而不同看待。这样，固然有一小部分长工，于“农民佃户”雇佣之下，开始在法律上属于“凡人”了，但同时又有一大部分短工，于“官民之家”雇佣之下，在法律上纳入了“雇工人”的行列。但总的说来，农业中的雇佣劳动确实有了新变化，只是还不能说这时的长工和短工就是受资本主义剥削的雇佣劳动者。二、从短工来看，明清时代农业劳动中的短工，当农忙季节到雇主家劳动时，一般都自带生产工具，如锄、镰等。如果没有，便不能获得召雇。这就表明这时的短工不同于工厂乃至手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同时，从法律上说短工实际上并没完全获得“凡人”地位。依乾隆五十三年“新例”，短工在“官民之家”属“雇工人”之例，只有“农民佃户”雇佣之时，才“依凡人科断”。在大部分土地已集中到“官民之家”的情况下，短工受雇于“官民之家”必是大多数，其所处地位和所受剥削，自然主要是非资本主义的。三、从长工来看，万历“新题例”规定，长工统属“雇工人”，对雇主有隶属关系，是不消说了。乾隆年间“新例”规定，只要被雇于“官民之家”，也“以雇工人论”。

至于被雇佣于“农民佃户”，看来没什么隶属关系。但这时的雇主是一般富裕农民，其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持全家生活，不是什么经营贩卖或扩大再生产。“所以，把这中间的雇佣劳动硬说成是受资本主义性质剥削的，那在条件上看来也是不具备的。”

第四、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这是近年来引起学者们重视的一个问题。吴量恺曾专门撰文^①进行探讨，他认为：一方面，是封建土地所有制阻滞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由于土地买卖和地权转移非常频繁，延续了封建制度的寿命，限制、阻挠新生产关系萌芽的滋长。由封建制度的束缚而造成的低下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成为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在这个制度下，农业中劳动力购买者集团，即原始富农和经营地主都不是很稳定的，产生不易，发展更难；劳动力的出卖者，即雇工集团，在发展中也障碍重重。另一方面，是封建性的商品经济不能迅速分解自然经济。因为我国封建社会中的商品经济，其目的主要是生产和交换享乐品、奢侈品，城市和市场也都是消费性和寄生性的。这种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分解作用是微弱的。而封建的自然经济仍处于统治地位，它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为基本特征，形成了强大的抵制力量，使商品经济中的产品，很难突破自然经济的坚固防线。

李文治认为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表现是：从十五世纪（明成化、弘治年间）开始，十六世纪（嘉靖至万历前期）稍有发展，到明代后期又呈现倒退趋势。十七世纪中叶，经过农民大起义对封建宗法传统及封建经济关系的冲击，农业资本主

^① 《试论鸦片战争前清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主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义萌芽又走上缓慢发展的道路。一直到十八世纪（乾隆年间），上距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已约有三百年，才又向前进了一步。他认为，形成萌芽发展迟滞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是以地主经济为核心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严重束缚和在地主经济制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的残酷统治。“离开地主经济制，就失去了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凭借，也无法认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具体些说：一、中国地主经济制特点之一是佃农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无“占有权”，地主有增租夺佃的权力，地租可增到难以想象的高度，严重挫伤农民改良土地及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自耕农的田赋负担最重，赋税转嫁形成严重压迫，某些地区虽分化出部分富裕自耕农民，在地主经济制的制约下，其发展前途也受到严重限制。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地主发展道路尤其狭窄，因为雇工经营盈利过低，如遇水旱灾荒还会亏损，加上封建地主腐朽寄生性的影响，一些经营地主仍不免向着土地出租的方向倒退，使封建土地所有制不断地再产生。二、封建国家机器维护和支持高额地租的实现，各级地方政权成了催租机器。在雇佣关系方面，国家机器的作用则在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即从宗法关系方面反对雇工的解放。总之是积极地维护封建租佃制和封建雇佣制，防止和压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①。

刘永成专门就农业经营新方式发展缓慢的原因作了分析②，也是从两方面谈的：一、封建土地所有制方面的原因。就佃富农经济而言，地主阶级对其增租、加押与夺佃以及高利贷盘剥是套

① 《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

② 《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

在佃富农脖子上的三条绳索,严重威胁着它的存在。就经营地主而言,它本身带的封建色彩比佃富农经济浓厚:一些经营地主因羡慕出租地主的坐享安逸之利,不再从事农业经营,或者想方设法变成缙绅地主;在传统的遗产诸子均分制的制约下,当经营地主老了或死了,几个儿子分家析产,原有经济也就宣告瓦解;农业雇工的工资不仅很低,而且常受剋扣及种种虐待,加深了劳资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二、封建专制政权方面的原因。封建政权的支持,是地主阶级获取高额地租的牢靠保证。专制主义政府为维护自然经济和压制商品经济,往往限制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还采取加重经济作物产品赋税的办法,限制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对于失业流民被迫逃到偏僻山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棚民、寮户,或加以阻止,或逐回原籍,或采用保甲制度把他们固定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断绝了佃富经济和经营地主经济所需劳动力的来源。

六、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在五、六十年代,只有个别文章涉及这个问题,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此相当关注。前文已叙及研究者对某些具体行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原因的探讨,这里再介绍一些从宏观方面探索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原因的见解。

方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萌芽》^①一文中,从中国封建经济的内部结构及其坚固性入手进行探讨,他认

^① 《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为：一、地主制经济下小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中国的农民比欧洲的农奴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和较独立的自有经济，容易和手工业结合，较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沉重的人口压力与繁重的封建剥削，又迫使农民扩大商品作物的种植和从事手工业生产。但农民主要还是从事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而不是走向资本主义大生产所需要的那种小商品生产，结果只能维护封建经济，限制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生产的扩大。因此，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水平是与该行业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达程度成反比例的，棉纺织业就是例证。“欧洲手工业的发展是离心的，它促进着封建经济结构的分解；而中国手工业的这种发展却是向心的，它保持着封建经济结构的稳定。”二、地方小市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市场结构。农民连同小手工业者的商品生产还是交换价值生产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这决定了地方小市场仍是农村市场的主体；城市手工业基本上还是为本城市生产，没有摆脱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地方小市场在城市和农村的广泛存在，就难于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市场条件。”三、土地占有、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封建经济关系，在封建社会后期，一直是财富分配的基本结构和社会积累的主要方向。因为土地可以买卖，地产又是最稳妥的生息形式，商人、高利贷者自然会成为土地的买主。商业和高利贷虽较有风险但剥削率高，地主也会从事经营。但“三位一体”只能加强地主经济，资本主义萌芽不能把货币资本大量吸引过来，自然发展缓慢。至于明清时期生产力虽然有所提高，但主要是量的扩大，特别是人口的飞速增长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阻力。生产力发展水平既无力促进封建经济结构分解，资本主义萌芽就难于进一步发

展，封建社会也就只能长期延续。

洪焕椿的《明清封建专制政权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①一文则认为：“国家权力通过各种法权形式，推行一整套方针政策，对经济基础产生了巨大的、在一定时期内甚至带有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使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很难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是资本主义萌芽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具体说：一方面，明清时期封建国家对民间手工业和商业，总的方针是抑制而不是奖励，是重税而不是轻税，是掠夺而不是扶植。国家采取抑商政策、闭关政策、重税政策、派买政策等等，使城市民间工商业长期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由于封建国家机器及官僚、豪强、地主是依赖全国农村个体小农养活，农业经济是维持国家统治的命脉。因此，国家的各项政策，就积极维护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如垦荒、赈恤、招抚、蠲免、治水等，使广大小农的简单再生产能继续下去。但由于压迫和剥削不断加重，农村经济常遭破坏，而每一次从衰败到恢复，又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从而使资本主义萌芽长期处于螺旋式缓慢发展的状态。

李洵则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因。他在《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②一文中指出：一、是由中国封建社会本身的特征所造成。中国的地主经济历史悠久，不易破坏，起了维护封建生产关系的作用；专制主义制度，有着强有力的地位，同样起着维护封建生产关系的作用。二、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始终没能形成对旧生产关

^① 《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

^② 《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6期。

系突破的条件。其发展过程不是一直的、持续的，而是曲折的、反复的。在两个时期或两个朝代之间，常常是一场带破坏性的战争，消耗巨额的社會财富积累，破坏社会生产力。三、全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落后地区拖住了经济先进地区的后腿。四、人口的压力，实际上吃掉了社会生产力增长的部分。五、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对经济活动强有力的干预和影响。六、是西方殖民势力干涉、限制和压迫的结果。

傅衣凌认为：封建土地所有制是阻碍明清社会前进的主要绊脚石。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土地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它不同于过去的屯田、占田、均田制所受到的封建专制国家的控制和支配，而更多的是向私有经济发展，这一转变过程，始自宋元，完成于明清，从形势户转变为乡绅地主、乡族地主、商人地主等等。私有经济的成长，既有自然性的主要面，又有商品性的另一面，使得中国的封建社会更具有弹性，阶级对立十分尖锐，却又富有通融性，在不急于要求冲破生产关系束缚的前提下，让原有的社会得以继续生存下去，其间生产力且有所发展，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封建文化。所以，我们似可以称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一种弹性的封建社会。封建土地所有制牢固存在的原因，一是地主阶级不断更新强化这种土地所有制，二是地主阶级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对直接生产者实行残酷的中世纪式的野蛮统治，三是中央集权制所建立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保护地主所有制，从上层建筑调整了地主阶级的内部结构^①。

胡寄窗认为，中国封建经济成熟较早而瓦解过程转慢的原

^① 《论明清社会的发展与迟滞》，载《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

因，自有其特殊的决定因素。“在这些因素中，地理条件实为最根本的因素。”他认为，中国封建生产关系本身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一、封建生产关系的量的演变——生产关系的地区延展。中国封建生产关系在南北朝和北宋末有两次极为突出的地域大延展，此外封建政权平时运用其权力促使某些边远经济落后地区逐渐封建化的活动，从未停止。“在一个幅员广袤的国度里，当一个支配的生产关系在整个政治地域内尚有充分扩展条件时，在它的上升阶段会增添其活力，在它的下坡阶段会延长其衰落过程。这是中国封建关系所以能延续较久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特质。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由于它不象封建领地那样根据政治特权代代世袭，而是频繁地转移所有权，结果既有土地兼并的趋势，又存在土地细分的事实。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就是以分散的小农经营为其基础，为数甚多的小地主，各自支配着少数农民，从事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以剥削地租。这种剥削形式不可能像英国、德国那样，易于改采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任何一种封建经济，不论其工商业如何发达，倘使它的农业未能资本主义化，则整个社会就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三、农商结合的经济结构。西欧商人资本是刺入封建经济的一把尖刀，最后对它起着瓦解作用。而中国地主经济一开始就同城市商品经济象孪生兄弟一样并行发展，二者间并无尖锐矛盾。“在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后期，尽管商人资本的力量已相当壮大，它不仅不曾起过分解封建地主经济的作用，甚而在一定程度上与地主阶级结成联盟起着维护封建制的作用。”四、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先秦以来重农思想的支配以及多次农民流亡危及封建经济基础的经验，使封建统治者基于维持其长期统治的动机，给农民

一些暂时休养生息的机会，这就会不断助长小生产农民安于现实的本性，不积极要求变革。传统的讳言财利观点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不能不对封建经济的发达起着某些阻滞作用。汉初以来占支配地位的抑商轻商思想，有时具体体现为封建政府的政策。这些都是“延缓工商业发展的因素，从而也是使这一封建经济延缓瓦解的因素”^①。

还有些文章，较突出地阐述了某一个方面。晁中辰在《清前期人口激增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②一文中强调，清朝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人口迅速突破四亿大关，给我国社会带来重大影响。人均耕地面积大大减少，顺治、康熙年间每人平均五亩半左右，嘉庆年间还不到二亩四分。大量相对过剩的人口，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化，影响扩大再生产的进行。“劳动者相对过剩，以致于严重地阻碍了技术的进步，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使借贷利息特别高，从而阻碍了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总之，任何物质生产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进行的，它必然会受到社会主体的生产——人的生产的影响和制约，“不能只从物的生产上解释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还必须考虑到人的生产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史实证明，在清代前期它就曾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张海鹏、唐力行在《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③一文中强调：“生产力水平低下，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一个首要原因”。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

① 《论中国封建经济成熟甚迟瓦解特慢的原因》，《经济研究》1981年第5期。

② 《山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

③ 《安徽师大学报》1982年第3期。

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生产力水平高于我国清末。当新的生产力与封建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到不可调和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革命之所以成功，从根本上说，是新的生产力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旧制度的母腹中成熟了。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是新的生产力发展缓慢，资产阶级由于经济力量弱小，无法承担历史赋予的使命。任继愈在《明清理学评议》^①一文中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停滞长久，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思想方面，宋以后的理学思想限制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宋、元、明、清的理学，即官方的学术思想，通过各种渠道，阻止封建社会尽量少改变甚至不改变面貌。特别到明清时期，理学在推迟社会变化、加强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互相配合，维持了封建社会的稳定，推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刘昶在《为什么资本主义不曾在中国发展起来》^②一文中提出，中西方历史有两个重大差异：首先，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差异。西欧中世纪分裂为许多庄园领地，领主的统治权力以庄园或领地为限，同外界的交往，只能服从经济规律；同时在割据条件下也没有超越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商品经济有顺利发展的条件；工商业和城市为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创造了历史前提。而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上始终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个体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政治上则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统治全国。统治者可通过直接地剥削、无偿地征发和调拨来满足大部分需求，产品转化

① 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② 《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为商品的途径大都被堵塞。当然一些经济交往还得借助商业进行，但任其发展会瓦解小农经济，因此要对工商业实行严格限制。私营工商业受到种种超经济干预，得不到城市的庇护，没有广阔的自由市场，加上社会周期性动荡，不能象西欧那样健全发展。其次，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古代就是游牧部落对农业定居社会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游牧部族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和西方，为了回答这种挑战，历代都尽最大努力，加强中央集权。但是，抵御游牧部族侵扰所需要的大量人力、物力，又成为沉重的负担，使得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威胁中央集权的统治和社会的统一。农民战争横扫了不利于社会统一和国家强盛的垃圾，为重建新王朝创造了条件。中国古代社会在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结构和功能，有相应的自我保持机制。它适于应付游牧生存圈的挑战，却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难以自主地进入资本主义。而欧洲的社会生态环境，则与中国相反。

最后，有必要谈谈海外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论析。美籍学者王业键在《明清经济发展并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①一文中认为，对于这个问题，至少有三种主要见解：一种是从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着眼，这便是国内学者的“资本主义萌芽论”，认为阻碍资本主义成长的是三个互相关联的封建性的制度——封建土地所有制、国家政权和宗法制度，在这样的环境中，资本主义幼芽是没法成长的。第二种是从资本积累的观点分析，以何炳棣的“资本耗散”说为代表。在研究十八世纪扬州盐商的论文中，他的结论是，盐商们的巨额财富由于下列三大因素终归耗散——炫耀性

^①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3期。

的消费、社会地位的追求和宗族制度的影响，结果，大量可供发展生产的资金便消耗于非生产的用途上。进一步使资本耗散的是中国的家族制度，由于中国没有长子继承制，一宗很可观的财产经数代细分之后便成为微不足道的了。第三种是从技术方面探究，艾文的“高水准均衡陷阱说”在这方面申论最为有力。他认为中国技术的停滞应归咎于人口的增加和市场的密集。由于人口增加，劳动力充分，而生产工业原料的农田面积却要相对减少，这样，工业成品中劳动力成本也相应减少，因此很少有人去寻求节省劳力的技术或发明。而市场网日渐密集的结果，又使农民家庭手工业逐年兴起，棉布商可用相当低廉的价格买到所需产品，所以他们关心的是市场，而不是生产的经营与改进。在此种情况下，由于农业耕作区的扩张和技术的推广，生产力也会随之提高。但到后来，由于人口继续上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可能又几乎消失，传统技术水平已达最高峰，如果没有一次现代的科技革命，生产再增加是不可能的。王业键认为，这几种见解各有其可取之处，但也都有不足之处，如没有把人口增加的可能影响考虑进去，似为“资本主义萌芽说”的一个主要弱点。

除上述诸方面外，在研究中涉及到的问题还有：资本原始积累开始的时间与程度；商品经济、商业资本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行会、会馆、公所的性质与作用；明代倭患的性质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清代闭关政策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清代流民对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的作用，等等。因为篇幅所限，不暇详举。

关于研究方法，近年来有两点日益为学者所重视。其一，中

西比较研究。同是一个经济现象，既要研究中国的，也要研究外国的，只有放开眼界、具体比较，才能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历史的特点。上面介绍的许多文章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如徐新吾的《**中国和日本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比较研究**》^①可算一个典型。其二，注意数量概念。吴承明曾对此发表了如下意见^②：不注意数量，是中国文献的一个缺点，是一种封建传统，封建生产注重使用价值，资本主义要等价交换，才有明确的数量关系。有些经济史著述，强调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不大注意数量概念，不作定量分析。这样容易把小事看成大事，把局部看作全局。提倡数量概念，第一步要搞定量分析。凡能定量者，必须定量，这可以破除许多假说，使立论更有根据。其次要有动态数据，如农业增长率。第三，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可用统计和数学方法验证过去的一些理论或传统观点。他的《**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③一文，可说是这种方法的大胆尝试。当然，如何运用好中西对比、数量分析及其他科学方法，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共同努力。

以上，将建国以来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问题的研究状况，择要述说。回顾以往的三十年，许多学者为此尽了筚路蓝缕之劳，今后，会有更多的新成果相继问世，会有更多的资料得到搜集、整理、出版。只要我们大力倡导学术研究中的民主空气，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方面的研究就一定会不断引向深入。

① 《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

② 《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晋阳学刊》1982年第1期。

③ 《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 启蒙思潮的特点*

侯外庐

一、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

中国启蒙思想开始于十六、七世纪之间，这正是“天崩地解”的时代，思想家们在这个时代富有“别开生面”的批判思想。

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已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这是在十六世纪中叶开始的。马克思说：“世界商业与世界市场是在十六世纪开始资本的近代生活史的。”^①中国也是这样，中国的历史从这时起已经处于封建解体的缓慢过程之中。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②当资本主义幼芽在中国封建社会孕育的过程

* 本文为侯外庐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第1章。为了统一本论文集体例，编者将章、节序号作了变动。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14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620页。

中，城市对农村的矛盾、货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矛盾，以及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的矛盾，总括言之，个体经济的自由经营对由法律固定下来的封建特权所依存的土地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了。

从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初叶，也就是从明嘉靖到万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引《歙县风土论》说：

国家厚泽深仁，重熙累洽，至于宏治，盖兼隆矣。于时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蠶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咸获服劳，比邻敦睦。……

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觚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镗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诤争起矣，纷华染矣，靡汰臻矣。……

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群易。资爰有厉，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牟。……

迄今三十余年（隆庆后三十余年，正当万历三十年左右，十七世纪的初年。——引者）则竟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者，少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顾炎武的这一段描述，典型地说明了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历史变革性的转折步骤，值得我们重视。从这里，我们看到资本的生活史从“末富（工商）居多，本富（土地）益少”到“富者百人而

一，贫者十人而九”，从这里可以看到金钱货币和商业关系的情况，可以看到财产集中和阶级分化的情况。

城市手工业的规模在逐渐扩展着，例如以苏州的纺织业来说，《吴江县志》卷三八就记载着它的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的迹象：“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按当在正德嘉靖之际），……居民悉逐绌绸之利。有力者（始）雇人织挽，贫者（仍）皆自织。”从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开始分离，经过手工业的独立“成俗”，以至产生了城市的“有力者”（资本家前身）和雇佣劳动者以及手工业作坊，是有其过程的，但就在最后，手工业还是和农村不完全分离。

江南市镇人口的集中，也是从嘉靖间逐渐增长着，张瀚《松窗梦语》有记载，而《震泽县志》描写得最典型：

凡民人所屯聚者谓之村，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防遏者谓之镇，亦有不设官而称镇。……旧吴江县市镇，其见于莫志（明成化时修）者，镇（四）……市（三）……，徐志（嘉靖时修）亦载四镇，而市增其七……。屈志（清顺治时修）复增……市镇。

震泽镇，……元时村市萧条，居民数十家。明成化中至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

平望镇，……明初居民千百家，百货贸易如小邑。然自弘治迄今，……居民日增，货物益备。

双杨市，……明初居民止数十家，以村名。嘉靖间始称为市，（居）民至三百家。

严墓市，……明初以村名，时已有邸肆，而居民止百余

家。嘉靖间倍之，货物颇多，始称为市。

檀邱市，……明成化中居民四五十家，多以铁冶为业。至嘉靖间数倍于昔，凡铜、铁、木、圻、乐艺诸工皆备。

梅堰市，……明初以村名。嘉靖间居民五百余家，自成市井，乃称为市。

《吴江县志》（吴江县在明代原和震泽县为一县）也记载着：

盛泽镇，……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缁为业，始称为市。迄今（清乾隆）居民百倍于昔，绫缁之聚，亦且百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

黎里镇，……明成化间为邑区镇，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自隆庆迄今，货物贸易如明初，居民更二三倍焉。

同里镇，……明初居民千百家，市物腾沸，可方州郡。嘉隆而后稍不逮昔，然居民日增，贸易至今犹盛焉。

县市，……元以前无千家之聚，明成弘间居民乃至二千余家，……百货具集，……嘉隆以来居民益增，贸易与昔不异。

八斥市，……明初居民仅数十家。嘉靖间乃至二百余家，……居民辐辏，百货并集。

庞村市，……明初以村名。嘉靖间始为市，时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

镇市“居民”的集中大体是从嘉靖以后逐渐发展的，至于农村人口，吴江和震泽两县志都说到相对的减少。“市镇递有增易，而村则小者日多，名亦益俗，固不可得而复增益。”

社会阶级的变化迫使社会生活也有改变，《吴江县志》卷三八记载着：“邑在明初风尚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侈。……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

头。循分者叹其不能顿革。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贫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由此看来，嘉靖时代是社会生活显著变化的时期。

《苏州府志》引《吴门补乘》，说到明代中叶以后，“吴人好游托权要起家”，说到人们“创造利端，为鼓铸囤房，……大村名镇必开张百货之肆，以榷管其利，而村镇之负担者俱困，由是累金百万，至今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说到“徐郡守（嘉靖时知府）亲信吏胥门隶往往为富人，至今为吏胥门隶酷以剥剝。”明末小说《三言》，常有“一等官，二等商”的叙述，商和官的观念是在变化之中。这些也说明了变革性的历史转变阶段的情况。

下面我们分别从几方面来论证这一时期社会内部的新旧矛盾。

第一，为了究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变化，我们需要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土地所有关系的形式以及其在解体过程中的若干变化。

一、中国中央专制主义依存于土地的皇族所有制。马克思指出东方国家的“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①列宁指出“亚洲式专制政府中的官吏底意志分配于农民的旧有份地”，是“古老式的土地所有权形式，^②这正符合于中国历史的特点。

由汉代至开元、天宝之际，土地国有制形式采取了对劳动力的军事的政治的编制形态，例如屯田、营田、垦田、草田、公田、官田，中经占田以至均田、露田，都是这一制度的不同名称。其

^① 《资本论》第3卷，第1032页。

^② 《社会民主党在1905至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2章。

筒壁田、屯田的形式是在中古历史上都存在过的。对于劳动力采用军事的或准的编制形态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在中世纪，农民的经营（特别是在空地垦殖上），在欧洲（中国也一样。——引者）到处都占支配的地位”^①，也即由于封建领主“依存于他的臣属的人数”^②。这种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一方面由于承袭了古代土地固有（氏族贵族所有）的传习，他方面由于封建制度的组织大都采取野蛮的军事组织形式（恩格斯论罗马帝国的灭亡和封建因素的形成就着重指出了这一点）。中国在这一时期，土地固有制形式正是在对内外战争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如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形式更是在落后民族入侵以后发展起来的。这种欧洲中古史中野蛮民族的军事组织影响于封建的所有制形式相比较，其形态不同，而其性质相似。

但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固有制不是单一的封建所有关系，和它相并存在的还有豪族的土地占有制形式，史称“豪强兼并，武斯多曲”，就是指的这一占有关系。这关系的形成，一方面是以古代社会的世族做了它的前身，在奴隶制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情况之下，世族阶级便转化为豪族阶级；他方面又由于中国农村公社的残余以及北方落后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加强了列宁所指出的“这种身分性的地主”阶级的制度。列宁说：“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底混杂性，是在阻碍着经济的发展，身分的体制（旁点系我所加。——引者）是在妨碍着商业的流转，旧的土地占有制与新的经营底不相适应，是在产生着尖锐的矛盾。”^③因此，身分的

① 《反杜林论》，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220页。

② 《资本论》第1卷，第906页。

③ 《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底土地问题》，见《列宁文集》第3册，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80页。

体制之下的豪族地主，成了中国历史上被斥责的对象。他们和皇族地主是矛盾的，但也是妥协的，其间斗争和联合的形式，各代也有些不同。这所谓联合的形式，是和马克思所指的近代“自耕农民的自由小土地所有制形态”^①对立的。历代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也是从这里出发。

二、开元、天宝至明代，土地国有制采取了对劳动力的经济的经营方式（庄园），以适应土地大量开发以后的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人口已经具有熟练劳动技术的发展。所谓皇田、官田、皇庄、官庄，历经唐、宋、元、明一直在集中，至明代则变本加厉，“州郡之内，官田十居其三”，苏崧官田更为集中。这是一方面。此外，因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增进，中唐以后，在皇族地主与豪族地主之外，产生了土地私有制的庶族地主，史称寒族或素族，即非身分的地主。这样的地主，在宋、明以来有迅速发展的趋势。因此，唐代如牛李党争，和杨炎、元载和刘晏、卢杞的党争，宋代如王安石新党和旧党的党争，都应从庶族地主和豪族地主的矛盾的背景去说明，他们和皇族地主相配合成为三角斗争的形势。如果说杨炎不以身分为别而以“贫富为差”的两税制开始结束了前一阶段的国家地租形态的租调制的剥削形式，则明代的“一条鞭”法开始结束了后一阶段的国家地租形态的二税制的剥削形式，并适应历史的发展，转向具有在最大限度上减轻封建依存的财产税形式的新的剥削制度。到了清代，“更名田”的办法，“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办法，“摊丁入地”的办法，更贯彻了“一条鞭”法的精神。一方面，给予土地

^① 《资本论》第3卷，第1053页。

私有制以一定的刺激作用（《大清会典》说：“前明分给各藩之地，国朝编入所在州县，与民田一体给民为业，曰更名田”），另一方面，更明确了财产税的性质。

三、明中叶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是适应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的，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以及赣水流域的广大的三角地区（《明会要》引《明政统宗》说：“嘉靖元年八月令广东江西货物纳税，自北而南者于南安，自南而北者于南雄”）。这和列宁论俄国的情况是相似的：“土地占有的非身分性是在增长着。……因之，农民日益分化出了一种社会分子，他们转变为土地私有者了。这是一般的事实。以后在分析农民经济时，我们一定要揭开产生这种分化的社会经济机构。现在我们必须确切地确定，俄国土地私有制底发展，即在于由身分性之转变为非身分性。”（旁点系我所加。——引者）^①列宁所说的这种变化的本身就表示资本主义经营的倾向。在俄国十九世纪，据列宁的分析，“贵族封建的或贵族底农奴的地产，还继续包含着全部私有土地底一大部分，但是发展的倾向，却是明显地走向资产阶级的土地占有制的创立。……用钱买得的私有土地，则在增加着。土地底权力日渐衰微，而货币底权力则日在增长着。土地日益卷入于商业流通中了”^②。在中国的十六、十七世纪，虽然没有俄国十九世纪末期的这样变化程度，但性质上是相类似的。一方面，土地皇族所有的集中情况，如上文所指出，是空前的，但这集中是依靠了“监督”来实行的。另一方面，私有土地也在迅速地发展着，过去豪族

^① 《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底土地问题》，载《列宁文集》第3册，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3—4页。

^② 《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底土地问题》，载《列宁文集》第3册，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4页。

地主已经在土地商业化的过程中受了一定的打击。皇族大地主与土地私有主的斗争也日益尖锐，这就反映了皇族的土地独占和土地商业化的矛盾。

关于土地私有的发展以及经营地主的势力，在明代特别是在明末，史料的记载是很多的。例如叶梦珠辑《阅世编》卷一《田产》说到非身分性的“有心计之家”的私有情况：“有心计之家，乘机广收，遂有一户而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万至一、二万者，亦田产之一变也。”朱国桢《涌幢小品》说到非身分性的白手起家的私有情况：“余目所经见，（吴江）二十里内有起白手致万金者两家，此水利筑堤所以当讲也。”汪道昆《太函集》说到非身分性的居士的财产私有情况：“吴处士……三年而聚，三年而穰，居二十年，居士自致巨万，……庶几垆都若云。”顾炎武《日知录》卷十，曾拿汉、唐时代的情况和明代的情况相比较，以汉代的豪族地主相当于明代经营“分租”的地主，唐代的兼并之家相当于明代“包租”的经营地主，来说明私有土地的发展。史料上常见地主经营的方式，甚至“穷天极地而尽人”，以达到“货日益”的目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三引天启诏，“各省开垦水田，往往既垦成熟，被势豪或经营地主混占告夺”。

土地商业化或私有化就是“一条鞭”法施行的物质条件。这个法典式的总结，正显示出嘉靖至万历时代财产关系的变化。在这时候，官田实际上已经变相地成为经营地主的民田了。同书卷二十三引《武进县志》说：“嘉靖二十三年，无锡……并官民田地均为三则，吾邑亦仿而效之。……且税为粮，……一概均于民田，……将朝廷入官之田无价而白与顽民，将原额所纳之租无事

而重害平民。……（万历后期）……以田随户，以户领田，户既可以那移（即业主之姓名，因田买卖而变），而田即因之变乱。母依乎子，变动不拘，官民肥瘠高圩山荡存于籍者，……名是而实非。”由这里可以看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客观趋势。实际上，万历十年的鱼鳞册，已经看出了反映土地私有制的情况，那就是“业主之姓名随之，年月买卖，则年有开注人，虽变迁不一，田则一定不移，是之谓以田为母，以人为子”。所谓“以田为母，以人为子”，“母依乎子，变动不拘”，即是指土地财产的变注，完全以所有者的人户登记为原则了。

不但官田如此，豪强地主的土地也在变化，同书说：

（嘉靖中常州）富家之败，若子急于售产，不暇推取，久之而推者无所归，……久之而纳者不知其下自困。……延至万历初，势穷当变。①

财产的等级分类不以身分为差别，而以所有的多寡为差别，陶书说：

正德中，……（常州）富民巧为规避，人户消长参错，多有产去差存者，讼牒纷纷，官民病焉。嘉靖元年……以家费富夫及丁田居上者为上户，丁田数少家道颇可者为中户，丁田消乏者为下户。②

又引唐顺之与王仪书，表示出赋役的变革是适应财产转移，其中说到嘉靖时“吾田已卖之某人，而某人宜顶吾差，……卖主以虚名偏差可以无乱乎定差之籍，新买主以实力顶差可以无累乎鬻田之人。”③

①②③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三。

由此，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

嘉靖中……官田与民田犹自角立。嘉靖末则以官田民田并言之，无复差别，……盖又法之变而加密者也。①

引《上元县志》：

嘉靖中，（官民田）均为一斗五升。……其更佃实同鬻田，第契券则书承佃而已。……

正嘉以来，事日增，役日繁。……买者卖者或以官作民，或以民作官，以各就其所利。于是民田减价出鬻者日益多，而差役之并于佃户者日益甚。……维时一条编法已行于数省矣。隆庆中，……计以官田承佃于民者日久，各自认为己业，实与民田无异。而粮则多寡悬殊，差则有无互异。于是，……官民悉用扒平，粮差悉取一则，革现年之法为条编。②

史称“一条鞭”法的优点，是因了租赋则例纷繁，不得不改为《官民一则》。其实问题在于“私相典卖”。上书说到：

初官田粮重，民间白佃以输公赋（租）而已。久之贫人食绩，改则以利鬻，富者得业，准劝以就轻。加以豪富隐漏，胥吏奸诡，驯致兼并者安享膏腴，逋逃者哀鸣中泽，税粮亏额，里甲包赔。……嘉靖壬子，……所部六邑，通行丈量，俾富而强者田必有赋，贫而弱者粮无虚赔。……第惜当时……仍滋欺隐，兼以官民均为一则（即指条编的先声），恩怨卒成二途。③

不但官田已经由官而民，屯田也由军而民，变化甚大。上书说到：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三。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四。

③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

嘉靖中，屯田御史张鉴，以原额屯田多为豪强兼并（按上文言，屯田可“私相典卖”），……佃买之田，概充募军承领之数，……军民互讦，追夺纷纭。①

滁州的情况是“屯军……好出游服贾，不恤农。……甚者……阴受民贖，遂私买卖。”《泗州志》《屯田》条：“卫所之占种，旗军之复侵、盗卖。”又说：

泗人毋论大小人户，专以买种屯田为利，取其价之廉也。而一买之后，视之不啻若事业。然开垦修筑，殚力经营，若将谓生且息于其中，子孙可永保而无失也。豪军旁伺，一见膏腴，不借口于同伍之绝业，则驾言于顶差之额也，公然争夺。……不敢显言曰买，而必托为佃种以自解。②

有一种城市居民中的新发户，叫做“寄庄户”上书说道：

寄庄户，则人非版籍（在里、甲、排之编外），徒以田产置在各里而得名者也。其人或为流寓，或系都村，此等（人）通天下皆有，而惟南都为最多。盖南有三十六卫及各衙门钦天监太医院等役，又四方流寓之所萃聚，皆得置买田土。……然此寄庄皆富室。……一条编未行之时，有力差一事，往往破人之家，人皆以田为大累，故富室不肯买田。……行一条编法，……“城中”富室始肯买田，……至今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由富室买田之故也。……富室不能自种，必业与贫民，……收一石，则人分五斗。③

因为阶级关系的变化，粮长的选派也变做以城市富人为对象。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四。

③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四。

《天下郡国利病书》引《嘉定县志》说：

（明初）以殷实户充粮长，督其乡租税，多者万石（充之），少者乃数千石。……当时父母兄之训其子弟，以能充粮长为之贤，而不慕科第之荣。……佃户得以父子相保，男乐耕耘，女勤纺织，老死不见县门，故民淳事简。……永乐以后，渐用岁更；宣德初，户部言粮长岁更，顽民玩之，故多贖租，请如旧便。至嘉靖中，为抑强扶弱之法，粮长不独任“大家”，以中户轮充。……轮充又（改）以朋充，朋充有三、四人、或五、六、或八、九。……盖粮长既不论于粮，而论家货。家货高下非有凭也，故每年夏秋之间千金之家无宁居者。

国初里编老人一人，得参议良陶利害及政事得失。……当时系以殷实户充之。（其后）往往为吏胥求索有破产者。方历十三年，……县有兴革之役，则用居民以大姓有行义者充之，事毕而罢。凡清给使，代以义民，义民者多市人也，习见官府之事。盖国家令有只应巡拦，不得用殷实户，但用市人，乃知虑深远矣！①

因此，史称一条鞭法“不利乎士绅，而并良则称便矣。”

木棉桑麻的农业生产，也向私有经营方面发展，例如“湖（州）潞以桑为业，而（孝）苑土治生产，喜种桑，则种桑万余唐家村上”②；“南阳李义卿……家有广地千亩，岁植棉花，收后载往湖湘间货之”③。因此，农业生产物参与了国内市场的流通，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

② 唐顺之：《荆川集》卷十六。

③ 张履祥：《近古录》卷一。

“言贝则泛舟而弭诸南，布则泛舟而弭诸北”^①。

第二、我们再从手工业和商业，来考察十六、十七世纪中国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的萌芽。

一、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东方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广泛的基础。他说：“在印度和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小农业和家内工业的统一形成的。在印度，还有以土地共有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的形态；并且在中國这也是原始的形态。……由农业与制造业直接结合引起的巨大经济和时间节省，在这里，对于大工业的生产物，提出了极顽强的反抗。”^②

这一精确的理论，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食货”二字的涵称，即可以典型地证明。食指农业，货指手工业，所谓“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③。所谓“力耕桑为农”，“钱帛之属谓之货”^④。这就是历代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农夫红女”的自然劳动分工。他们的劳动在极大的程度上表现出经济和时间的节省。普遍地束缚着自然经济的经营方式。租（农产物）调（手工产品）的和两税（农产物和手工产品分季交纳）的剥削制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二、村落共同体或家庭公社，不但和皇族地主以及豪族地主有血缘关系，而且成为专制主义的基础。马克思说：“那些家庭公社是奠基在家庭手工业上，在手织业、手纺织业和用手进行的事

① 徐光启：《农政全书》。

② 《资本论》第三卷，第412—413页。

③ 《汉书·食货志》。

④ 《唐六典》。

业底特殊的结合上，这种结合使它们都能自给自足。……这些淳朴的村社不管外表上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一直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坚固基础。”^①恩格斯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分析。

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和自然经济相联系着的家族、乡曲、乡里的组织，从汉末的“部曲宗族”起，劳动组织都和农村公社的组织紧密地依靠在一起，唐代白居易的《朱陈村》一诗形容这种情形最为典型。宋代人还对于“谱系不具，义分不联，贫富异居，耕商异业，流居离处，久渐睽疏”，以为是坏的现象。皇族土地所有制和豪族土地占有制的形式，实以这种公社的小农制为基础。通过列宁所说的“警察式的官僚的方法”，这种封建经济更加巩固起来。中国历代的闾伍、三长以及乡社或保甲的制度就和土地租税的剥削关系相互连锁着，没有三长制就难统治均田制之下的“匹夫匹妇”，没有保甲法就难统治二税制之下的“各色人户”，没有乡里公社的所谓“田里”和“桑梓”的组织，就难巩固豪强地主的统治。列宁说：“农村公社的外表上的均平性只是隐蔽了公社内部分配的巨大的不平衡。”^②豪族地主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不平衡上面的。被宗法公社所维系的地方独立性及其血缘的关联性，从全国来讲，正成为专制主义的基础。依据这样的基础，我们可以考察历代的农民战争。据恩格斯分析，农村公社曾经起过这样作用，使农民战争的起义规模扩大，这是一方面；同时另一方面，镇压农民战争的地主武装，从统治阶级绞杀赤眉、黄巾以至太平天国一系列的运动看来，也是利用了宗法公社的组织编制，以分化农民的队伍，刘秀、曹操以至曾国藩的地主武装

^①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论印度》，人民出版社版，第13页。

^② 《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底土地问题》，载《列宁文集》第三册，第34页。

的组织都不是偶然的。

三、从十六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解体过程，没有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关键在于，既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又在发展过程中未能走进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这即是如马克思说的，既为旧的所苦，又为新的发展不足所苦，死的抓住活的。①资本主义要排斥身分性的人格依附，然而封建主义的顽强传统又要维持这样的人格依附。这就是问题，这就是矛盾。对于从明代以来的这种新旧矛盾，我们既不能割断历史，否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顽强传统的历史，如上面所述的，又不能忽视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否定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

资本的原始形态是商人的和高利贷的财富，然而资本的形成却以自由劳动者从农业的分离为前提。依据列宁的分析，这样的分离过程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在农村市镇中的分离；第二阶段是城市手工工场业的独立形成；第三阶段是城市的大工业的出现。与这样的阶段相适应，逐渐形成以至建立国内市场，逐渐由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发展而为近代资本家，逐渐由农村分离的手工业无产者发展而为近代的自由劳动者。我认为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有些情况是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发展的。更正确地讲来，因了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某些地区居于第一阶段，某些地区正走进第二阶段，某些地区依然没有走进第一阶段。

四、城市手工业的形成，开始总是和农村手工业的分化相伴

① 参看《资本论》序言。

随的。例如在松江的纺织业，“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起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抱纱以出。……织者率日成一匹”^①。在农业和手工业缓慢的分离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城市手工业。如“前明数百家布局皆在松江枫泾”^②。因此，商业资本也发展起来。如“松江旧无暑袜店，……万历以来，……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女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③。

《古今图书集成》记载明代苏州城市的发达，当是概括说明后期的情况，如说“城市（苏州）……居民大半工技”，“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这是手工业作坊和雇佣劳动者的说明。然而，当时这种雇佣性质却具有工役制的束缚。工役制即农奴制在农业和手工业上的残余方式。列宁说：“以工役制度为方式的农奴制度，乃是经济发展底阻碍，乃是……东方专制主义形态的源泉。”^④这在苏州不但表现为官有手工业方面的服役制度，而且也表现为私人手工业方面的剥削形式。如说“苏州织工延颈而待庸用”，如说“什百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散归。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着矣。每桥有行头分遣”^⑤。苏州情况如此，其他地区的手工业也有衣食于主人的人格依赖的情况，如钱塘之工，“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二鼓，一唱众和，……盖织工也。……苍然无神色。……工

① 《古今图书集成》卷六九〇。

② 顾命徽：《清夏闲记摘抄》。

③ 范濂云：《闲居日抄》。

④ 《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底土地问题》，载《列宁文集》第3册，第26页，并参看《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分析工役制的部分。

⑤ 《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卷十、卷六七六。

对曰：吾业虽贱，日庸为钱二百缗，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养吾父母妻子。”^①

苏州手工业到了万历时代的规模是这样的：“染房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②这样看来，苏州在十六世纪末，已经至少有一万左右的工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③，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是在形成之中。这些劳动人口，并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从农村逃亡而来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四引《上元县志》：

“正嘉之际，外繇媪集，民病而不知恤，职生厉阶。……嘉靖末年，户口尚及正德之半，而今才及五分之一。……大都赋役日增，则逃窜日众。又国初里甲什九，坊厢什一，本田什九，寄庄什一。其后……细户不支，悉鬻于城中，而寄庄滋多，寄庄田纵千亩，不过户名一丁，……其细户田既去，则人逃。”

此外，昆山县也是这样，“居民逃窜，岁逾日积”^④。

据张瀚《松窗梦语》所载，张家的资本的发展是和江南都市的发展相适应的。张家起家稍早，但发展成为兄弟“各富数千金”，却在十六世纪的嘉靖年代。明代说部《醒世恒言》记载的江南盛泽镇的丝织业情况，也是指的嘉靖时代，说有一个施姓户主，积累了数千金的资本，举办了有四十张织机的手工工场。

嘉靖年间，长江三角洲一带，如苏、杭、湖、松诸府，大抵

① 徐一夔：《始丰稿》卷一。

②③ 《明实录》神宗卷三六一。

④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六。

成了国内市场的一个中心区域，张瀚所谓“总览市利，大抵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纴，而三吴为最。……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明实录》也说到嘉靖以后江南富室积银至数十万两者颇多，其他史料记载有因机织而致富至百万两的。

在中国的东南沿海、长江和赣水的大三角地带，次于长江三角洲，也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如《天工开物》所记载的景德镇的磁业分工情形和《陶冶图说》所记载的该镇的发展情况，如《古今图书集成》所记载的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情况，如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记载的冶铁手工业的技术和分工，所谓“佛山之冶通天下”，都是实例。但一般说来，当时中国的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是不平衡的。

五、随着城市手工业的形成以及农村手工业的分化，在主要是征收实物的二税制之下，货币地租逐渐发展起来，经过嘉靖到万历年间有了成文式的规定。私人地主方面也逐渐采用货币地租，经营地主则进一步使用雇佣劳动。城乡的银货币逐渐从死藏进入流通的蒸溜器之中。虽然布帛在交易和赏赐中仍占居一定的地位，但钱庄业特别在嘉靖以后发展起来，金银虽仍垄断于官僚、太监手中，另一方面却也表现了所谓“上下求银”的现象。

第三、商业资本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与南洋、俄国以及日本的贸易的开展，而活跃起来。特别在嘉靖以后至隆庆时代，不但沿海苏、浙、闽、粤的商人资本有了规模较大的国际和国内的经营组织，而且内地如川、陕、晋、赣、徽的商人资本也参与着贸易活动。国内贸易方面，如《农政全书》引隆庆时代的史料说：“东南之机，三吴、闽、越最伙，取给于湖茧，西北之机，潞最工，取给于闽茧”。万历时代张瀚说：“贾人之趋利者，

不西入川则南走粤，以其利或当五、或当十，或至倍蓰无算也。”^① 国外贸易方面，如《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述闽人的海外贸易，其他史料所详载的“下番致富”的商业活动，都有发展。《海澄县志》说：“饶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盖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初期，商人是探险事业的投机家，中国史书上叫做“海贼”。这所谓“海贼”，也是和当时历史发展相适应，是嘉靖年间在泉州等地区开始发展起来的。^②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六载，明代，“吴中风俗，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猾之民为之。”然而当时却把巧工商贾等人都目为“贼”。

商人资本的活动对于旧的生产方式是具有分解作用的，但因生产方式内部的坚固性，也对于商业的分解起着一种障碍作用。因此，马克思指出，前人把亚洲的商业范围和意义估计得过低，后来的人又把这些范围和意义，估计得过高^③。明代的商业资本正要从它的分解作用和阻碍它的分解因素来考察的。

上面我们说到明代商业的发展对于旧的生产方式是起了分解作用的，然而商人又脱离不了旧的生产方式的约束。其矛盾表现在：（一）它和农业的经营依然结合着，特别是季节性的商业活

① 张瀚：《松窗梦语》。

② 参看《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一——九六。

③ 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411页。

动。(二)它和农村公社的家族组织相结合，特别在沿海商业最繁荣的地区，这种形式更表现的突出，因此，商人不少是以某些巨姓为首而举族外出，复把一定的利润再回投入他的乡里的地产，广东、福建、浙江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上举《醒世恒言》讲到某商人的活动，最后还是把他所获得的资本投到土地上。山西商业的情况也是这样。华侨资本的活动也是这样。(三)会馆制度的排他性的组织，在明末商业发展的时代也逐渐形成，以致各“帮”的严密的樊篱妨碍了国内市场的集中。(四)官僚资本和商业高利贷的结合，妨碍了私人经营的发展，一直到清代的山西票庄还是这样。(五)官有商业打击私人商业的禁例，更具有严重的障碍的因素。凡此等等的表现，不是孤立的，而是封建旧生产方式通过各方面而产生的束缚力量。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章论证中国的经济，同时指出了商业“有多大的分解作用，首先是依存于旧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①这又是死的抓住活着的例证，历史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撕破了家庭关系上面所笼罩着的温情脉脉的纱幕，并把这种关系化成了单纯金钱的关系”^②，这一关系也产生在明代，但还没有以新的代替旧的，而是在新旧关系的矛盾中，换句话说，是在温情脉脉的纱幕和单纯的金钱关系二者交织之中。《苏州府志》载吴人“以商货为生，……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然)兄弟析烟亦不迁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故一村之中同姓至数十家或数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焉。”

① 《资本论》第3卷，第410页。

②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5页。

根据上面的三点历史分析看来，一方面，十六、十七世纪的土地虽然向国有方面集中，但另一方面，私人对土地的经营也在发展着；一方面，官有手工业虽然大量被皇族所“监督”着，形成官僚机关的层层中饱，产生了财政困难的严重局面，但另一方面，城市私有手工业的发展却对国民经济起了日益重大的作用。同时，城市商业与对外商业的发展，更推动了私有制的发展。这样，历史面临着变革的关头。货币用银的逐渐普遍，说明了商品经济关系的增进。手工业开始和农业分离，即逐渐打破了那亚洲式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底特殊形态。“一条鞭”法的出现，逐渐打破所谓“农桑”、“耕织”的男女分工的生产束缚，逐渐代替着所谓“两税”、“二税”分类分期式的对手工业产品与农产物兼征的剥削制。历史进入了新旧因素的矛盾大大发展的局面，活的东西要冲破死的，而死的东西还在束缚着活的。嘉靖到万历的年代，正处在这种历史变化的转折过程中。

二、社会变革中的阶级关系

在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经济状况起了变化，因而阶级关系也起了变化。这里，我们就要着重地分析一下当时的阶级关系。

我们不要机械地找寻资产阶级的萌芽，也不要望文生义地附会市民，因为资产阶级的萌芽是从冲击社会萌芽的，其历史也是很长远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育了最初的资产

阶级分子”^①。这样看来，自由居民到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形成有一个长久的过程。

同书又说：“中世纪的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前辈”。^②这样看来，城市中的各种市民等级和农村中的各种小农等级，都具有资产阶级前辈的资格。在他们的转变过程中又有着极复杂的情况，其转变的具体路径，各国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恩格斯说：“十六世纪初叶，帝国各种不同的集团——即诸侯、贵族、僧侣、阔阔之家、中等阶级、平民和农民，构成最复杂的群众，他们有极端庞杂而且相互交错的要求。”^③恩格斯对当时德国的市民等级的阶级区划，大体上分作三大集团或营垒，即城市的豪贵集团、城市中等阶级的改良集团和城市平民的集团。依此，从阶级的代表性上讲来，第一集团也包括于地主阶级反对派之中，第二和第三集团又形成了反对第一集团的人物，即中等阶级的反对派（以城市为主，即近代自由主义者的先辈人物）与平民反对派（即近代资产阶级的先行人物）。从思想意识的代表性上讲来，反对派分做城市中等阶级的反对派异端与城市平民反对派异端。此外，还有农民反对派异端（如孟彩尔）。中国的十七世纪的反抗运动，不可能和德国十六世纪的情况完全一样，但我们认为象长江流域以无锡为中心的东林党的运动，就具有中等阶级的城市反对派的性质（包括上书所指的其中构成分子如“富裕的中等阶级、温和的中等阶级，以及按照地方情形多少

① 《共产党宣言》，第24页。

② 《共产党宣言》，第46页。

③ 《德国农民战争》，解放社1949年版，第21页。

有点差异的较贫分子”），象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的市民暴动，是含有平民反对派的性质（包括上书所指的其中构成分子如“中等阶级破产的分子和无公民权利的城市居民群众，如手工业工人、日工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各种萌芽”）。在明末，后者和农民的联合，即类似于平民和农民的联合反对派。

明代的市民运动最初表现出来的是“盗矿”、反矿官的斗争。早期如英宗时代叶宗留等领导的有名的“盗矿”斗争^①，其后如弘治间广东归善县唐大翼反对铁冶管制的暴动^②，更后如嘉靖间“浙江、江西盗矿者且劫徽、宁”的斗争^③。这些反抗运动大抵是和农民运动相联系的。

大规模的市民运动是嘉靖以后特别是万历时代的城市工商业者和手工业工人的反抗运动。这种市民运动和嘉靖以至万历期间城市经济的发展是相适应的。其中如万历二十七年（公元一五九九年）临清的“罢市”暴动^④，荆州市民的反陈率暴动，万历二十九年（公元一六〇一年）有名的苏州织工反孙隆的大暴动^⑤，万历三十年（公元一六〇二年）景德镇市民反抗矿监的暴动^⑥，万历二十八年（公元一六〇〇年）武昌等地市民继续反陈率的暴动^⑦，这些史书所指的“市民”，就是城市平民反对派集团内的分子。

到了天启年间（公元一六二一——一六二七年）发生了城市中等阶级反对派的运动。封建统治者镇压自由讲学、自由结社，“一切书院尽行拆毁，变价入官”；有名的东林党六君子狱

① 《明史》卷十。

②③ 同上书卷八一。

④⑦ 《定陵注略》卷五。

⑤⑥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四一九。

就在这时发生。然而严重的问题更在于引起了“士民”的反抗运动，如统治者骂为“引类呼朋”的杨涟被逮，“都城士民数万，拥道攀号，争欲碎官旗而夺公”^①，如周顺昌就逮，“士民夹道”抗议，“郡中士民，送者数万”，“百姓执香伏地，呼号之声如奔雷泻川”^②。此外魏大中、李应升就逮，都有所谓“士民”的暴动。黄尊素被逮后，锦衣“凌轹市民，一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纵。一招而击者云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辄重，悉投之河”^③。起义的地点正是在手工业发达的苏州、常州等地。这些史书所谓的“士民”，就是中等阶级的反对派集团，而东林党人（以后为“联络吴越俊秀”的复社）的争自由或讲学运动，就不仅表现出朝野的对立，而且反映了自由主义者的前辈中等阶级的政治要求。

明末市民运动和农民暴动是桴鼓相应的。李自成所提的口号“均田免税”、“不纳粮”和“平买平卖”，正表现着反对封建特权及其所依存的大地产的占有制。这种斗争，是农民初期的民主要求。

在当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之下，规模广阔的农民战争形成了推翻明代封建王朝的主力，城市的阔阔之家、士民以至城市平民的各个集团对于农民战争，因了各集团的不同利益，便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态度，情况是复杂的。

上面所举的第一个集团，其中不少是利用特权而兼营高利贷和商业的分子，和欧洲十六世纪的德国相似，他们也和封建统治者血肉相连的。这一集团首先站在农民战争的反对方面，策划

①②③ 《明季北略》卷二。

着反动措施。

第二个集团，其中不少所谓犹带温情脉脉的私人商业资本家，他们既有地方性的封建上层关系，又有一定的传统特权的家族关系。他们畏惧农民战争，因而一般也站在农民的反方面，不同情或打击农民运动。明末清初代表中等阶级反对派的思想家一般都从理论上主张平均土地而又反对农民暴动。

第三个集团，其中占有多数的下层分子如手工工人、交通运输工人、矿工和流氓无产者，是同农民一道参加了斗争的，而其中少数上层分子如手工业主人却表现了动摇，背离了农民运动。一般地讲来，这一集团和农民可以形成“平民和农民的联合反对派”。泰州学派多出身于这样阶级的人，李贽便反映出平民反对派的思想，他评点过《水浒传》，死于非命，不过他们没有如德国农民战争时代的孟彩尔那样。

特别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清代的民族压迫和汉族反民族压迫的斗争，使得民族的矛盾掩盖了阶级的矛盾，因而上述的阶级关系便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中世史上的民族斗争基本上是农民解放的斗争。因此，农民首先是反清运动的主力（如李自成余部）。中等阶级的集团和平民的集团，一般说来，不少也参加这一斗争。而第一集团就有极大的分化，少部分参加反清斗争，大部分则和大地主大官僚结合起来形成向清朝统治者投降的集团，策划“太平策”。在反清的民族战争期间，平民反对派形成了秘密组织的会社或会党。在统治者所谓“江南人心浮薄”的歧视之下，民间手工业受了严重的打击，清王朝除了军事镇压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文化的以及政治的镇压政策。腐朽的封建势力更变本加厉地为清代封建王朝服务。《泾县小志》卷十说：“康熙

初，里中多布局，局中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尤膏闾里，‘民’受其累，积愤不可遏，纠众敛巨资，闭里门水栅，设计愤杀，死者数百人。”这就是利用封建的宗法关系以绞杀平民反对派的典型的例子。

自然，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论《暴力论》中所指出的，落后民族的统治，经过一定时期，也不得不按照被征服的民族先进经济状况，寻求适应的步骤，甚至改变了自己民族的语言以求适应客观的历史条件，康熙以后的中国经济情况，就呈现出复苏以至某些发展的迹象。但是，明清之际的民族战争以及落后民族的民族监狱政策，的确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同时，西方殖民主义的东侵，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增加了困难。但是人民反封建的斗争一直是在延续着。

三、启蒙思潮的特点

我们研究了十六至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其阶级关系，就可以进一步分析这一不平凡的时代的思想潮流了。列宁说：“它（马克思主义——引者）精妙地结合着两种特点：一方面是完全用科学冷静态度来分清客观情式与客观进化行程，另一方面是极坚决地承认群众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和革命首创精神底意义，同时当然也承认那些善于探索并实现其与某些阶级联系的个别人物、集团、组织和政党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和革命首创精神底意义。马克思非常重视人类发展中革命时期的态度是从他的全部历史观点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因为他认为由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无数矛盾只有在这样的时

期才能得到解决。”^①

十六世纪末以至十七世纪的中国思想家的观点，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中国社会条件的反映，它不完全等同于西欧以至俄国的“资产者—启蒙者”的观点，然而，在相类似的历史发展情况之下，启蒙运动的思潮具有一般相似的规律。

列宁曾分析俄国启蒙运动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对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满怀着强烈的仇恨”；第二，“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一般俄国全面欧化”；第三，“坚持人民群众底利益，主要是坚持农民底利益，……他们衷心相信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一经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而且衷心愿意促进这一事业。”^②自然，中国十七世纪的情况是不同于俄国的十九世纪的情况，但是启蒙思想的性质是共通的。

第一，“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只是在萌芽状态中”^③。中国的启蒙者如何心隐、李贽以至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和颜元等人，都以各种表现方式，强烈地仇视农奴制度及依存于它的一切产物。他们在所谓“封建”和“郡县”的各种历史问题争辩之中，反对封建国有土地制和大地产的占有制，反对一切政治法律上的束缚，反对特权和等级制度，反对科举制度（时文）。他们之中有的提出了“自由私产”的主张，有的传播土地平均的思想。以李贽为例，他说：“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

^① 《反对抵制》，载《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版，第189页。

^{②③} 《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人民出版社版，第18、19—20页。

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①。以颜元为例，他说：“岂不思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②。类此主张的思想，是他们的共通特点。

第二，中国的启蒙者拥护教育、自治和自由。如东林党的自由结社讲学的主张，顾炎武等人的地方自治的主张，黄宗羲等人的教育主张，都是代表。以顾炎武为例，他敢说“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③，婉转地反对孔子“庶人不议”的教条，进而主张“天下之人……皆得举而荐之”^④，表现了他的初期民主思想。

关于拥护西方的生活方式，当时虽然不同于十九世纪的向西方找寻真理的迫切，但他们已经普遍地有着这种要求。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先头部队是西洋的教徒，他们在输入中国的宗教中，带来了一种副产物，即儒家与基督教的新格义（或相互通释），利玛窦和汤若望实为代表。李贽就和一六〇〇年到北京的利玛窦相友善。传教士们在宣传宗教的同时，也输入了天文历算以至名理的西洋文明。到了明末，所谓泰西文明便普遍地成了士大夫中间时髦的学问。明末复社四公子之一方以智的《物理小志》、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梅定九的算学翻译以及李之藻的《名理探》的翻译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初期的欧化思想。例如《名理探》序说：“日聆泰西诸贤昭事之学，其旨以尽性至命为归，其功则求于穷理格致”。《几何原本》徐光启序说：“万象之形围，百家之学海，……不意二千年古学度绝后，顿获补缀唐虞三代之阙典遗义”。

① 《藏书》卷二。

② 《存治编》《井田》。

③ 《日知录》卷十九，《直言条》。

④ 《顾亭林文集》，《生员论》下。

明清之际的学者们，在民族压迫之下，表现了爱国主义的崇高思想。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又是和世界的进步思想相关联着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的萌芽时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成果已成为共同的享受物。民族的片面性和偏狭性日益失去立足的地位”^①。因此，王夫之已经说到“中国之天下”，可见他的闻见已是世界的，才有此限定语，不能不对西洋科学称其“巧密”；颜元不能不呼唤科学的世界，他的弟子李塨更不能不言及仿效“西洋诸法”；顾炎武不能不说“外夷”有高于“中夏”的学问与制度；黄宗羲不能不说出朝代更替的界限而理想和西洋制度相似的政治。李贽也说到“泰西水法”是“经济所关”的学问。这一系列的思维运动，都是在中国和西洋文明交接之后才产生的。因此，十七世纪的学者们已经选出中古的思维樊篱，而作“经世致用”的横议，在某些论点上表现出一种打破民族片面性和偏狭性的新思潮。

第三，他们同情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尽管他们多数并不同情农民暴动。以黄宗羲为例，他敢于说工商“盖皆本也”^②，敢于说“向使无君，人各得自利”，“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巳矣”^③，国家是“为万民非为一姓”^④，特别是他的“平均授田”的主张，更坚持着农民的利益。以唐甄为例，他敢说“凡为帝王者皆贼也”^⑤，“君臣险交也”^⑥，主张“平（等）”

① 《共产党宣言》，第27页。

② 《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③ 《明夷待访录》〈原君〉。

④ 《明夷待访录》〈原臣〉。

⑤ 《潜书》〈室语〉。

⑥ 《明夷待访录》〈利才〉。

则万物皆得其所”^①。他们程度不等地表现出初期民主思想。他们对于农民所受的中世纪压迫的痛苦，无例外地表现出控诉和抗议，王夫之的《黄书》、《噩梦》便是代表作。但是，他们都把他们的理想和万年乐土或所谓“天地之道”与“百王之法”等同起来。王夫之，颜元所强调的平等制度，黄宗羲、唐甄因反君主专制所憧憬的绝对的形式平等的社会制度；顾炎武因大力宣传“经世”的理想所自夸的“三代不易”的制度，都是例子。他们对于未来的远景怀着无限的信念和幻想。他们的思想之所以带有浓厚的幻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必然要跳出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不仅超越现在，而且超越未来的境界，必定成为狂暴的空想”。^②特别在古旧制度束缚甚严而无自由的社会，幻想更易于发生。列宁说：“某一个国家内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表现得愈薄弱，……则政治的乌托邦，通常也容易发生。”在封建势力特别强固的条件之下，“幻想是弱者的命运”^③。嘉靖以来出现的小说《西游记》以及后来的《聊斋志异》等幻想作品，正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而产生的。

然而，他们是历史的觉醒者，他们在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学诸方面的“别开生面”，就不仅是反理学运动的量变，而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他们这种要求都是装璜在理论形式的还原（如人性论、泛神论、进化观点、劳动与财产观点等等）上面。而这不是如有些人说的“无中生有”。

① 《明夷待访录》《大命》。

② 《德国农民战争》，第31页。

③ 见《列正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812、813页。

如列宁所指出的，他们不知道行将到来的社会矛盾，“他们看不见它（社会发展。——引者）所特有的矛盾”^①，只看到未来的美好世界。“资产阶级思想代表者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性，相反地，……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世界乐园”^②。虽然他们各有自己的反对派的特性，但一般说来，他们都是封建社会的叛徒。十七世纪的中国启蒙学者，还写出了将来社会全面图景的理想著作，如《天下郡国利病书》、《明夷待访录》、《潜书》等。然而，另一方面，在他们的真挚的理想背后，也包含着叛变的不彻底性。新生的东西既然在旧社会的母胎内是微弱的，所以在他们的理论中常保留着旧的内容，而且常显出矛盾的体系。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现实主张之间虽然隔着许多环节，使人难以捉摸，但二者的联系是存在的。这即是：“正如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一样，从那时起重新醒觉的哲学，在本质上，也是城市发展的产物，因而，也是市民发展的产物。”^③

上面我们研究了十七世纪中国启蒙学者的基本特点，下面再就他们从各种思想角度所表现的特征来分析一下。

历史的转变反映于思维活动，并不是一开始就采取直接的政治形态，因为社会矛盾是或明或暗地错综交织着，人类思想也就不可能深入到社会的历史分析，通常是由自然史和自然人出发，采取抽象理论还原到古代的形式。例如复古改制的意识，人性倾向的认识，知行先后的思想等。并且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意识，也常是通过自然哲学与人性论的绝对概念体现出来。西洋的宗教政

①② 《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第48、20页。

③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版，第63页。

革便是这样的。明末清初的学者们，都以各种偏颇的观点，为历史的人类与人类的历史绘出他们理想的美妙的图谱。我们应从他们的代数学似的绝对概念中来分析他们的抽象语句背后的实质，而不能直截了当地看出他们的语言与实质之间的统一。王夫之的“易传”哲学（如自然哲学），颜元的“三物三事”的哲学（如劳动生产的世界观），就是例子。他们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过程和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先进阶级的要求，但他们所强调的人性概念和世界观的要求，是用中古神学的方式来表现的。恩格斯说：“在资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的第一个阶段上，即从十三世纪起到十七世纪末止，才带有这一色彩。……这只有拿从前的整个中世纪历史来解释，因为中世纪除了宗教与神话而外，就不知道有其他任何思想体系形式。”只有到了资产阶级已经长成，这才能产生出和本阶级相适应的思想体系。^①因此，十七世纪中国学者们的思想，在中世纪长期的冬眠中，既有适应历史发展的进步的因素，又有受传统的思想所束缚的因素。

上面已经讲过，启蒙的历史必然使启蒙者的思想对过去作诅咒，并对将来作幻想，这样的思想是不调和的。不但如此，启蒙学者所使用的语言大都是古色古香的，他们爱好古代语言的形式，而想说的是近代的内容，表里又是极不一致的。正如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所指出的，十九世纪以前是语句形式重于内容的。一方面，他们过于重视古代形式，另一方面，他们的唯物论思想在观点上却否定历史，如恩格斯说的：“在历史领域内，也缺乏对事物的历史观点。……人们把中世纪看做是千年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36页。

六

内普遍野蛮状态所招致的历史行程之简单的中断。对于中世纪所作的大成就，如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相邻地域上形成起来的生气勃勃的诸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巨大的技术进步等，没有任何人加以注意。因此，就不可能有对伟大历史联系的正确见解，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供哲学家们来使用的例证和插图の汇集罢了。”①

十七世纪的中国学者也类似这样。他们一方面几乎都善于运用经学和子学的古代语言，而推崇古代世界，但另一方面，又把过去历史和将来的历史割裂开来。例如颜元，一方面复古气味无以复加，另一方面，却把过去和将来用“文墨”世界和“实物”世界间隔起来，主观上要求“文衰而返于实”的世界。又如顾炎武，一方面高举着人所不能怀疑的“六经之旨”，他方面又提倡那断绝千古的“当事之务”。再如王夫之，虽然有进化观点，但一方面说：“六经责我开生面”，他方面说“七尺从天乞活埋”，旧的和新的既和平共处，而又不共戴天。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的历史观点的幼稚正反映着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矛盾。

基础之反映于思想，是通过政治、法律等形式来间接进行的。因此，思想意识的面貌通过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漫长时期表现上好象是和经济发展不相关联的，然而“如果你在这曲线里描画出它的中心轴线，……那末，这条轴线就益会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地平行着。”②启蒙时代思想的轴线也是和资本主义萌芽状况的发展的轴线相平行着的。

①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27—28页。

② 恩格斯：《给斯他尔根堡》，载《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论的信》，人民出版社版，第31页。

从另一角度来看，启蒙学者在自然哲学方面大多具有唯物论的思想。当时的自然科学是幼稚的，他们也就不能正确地了解自然界，然而他们的眼界相当开扩，一般地具有天才的洞察，而且常会推察到有关唯物论的真理的粒子。例如王夫之的变革的人性论（“性日生”）和自然进化论（“鱗蠃生化”），又例如黄宗羲的“神灭”思想（推崇范缜的哲学），再如颜元的改造现实的世界观和以实践为基础的知识论，都是有价值的遗产。同时，他们是形而上学的旧唯物论者，因此，其进化观点是贫乏的，常陷入于循环论；其“实践”观点是个人的，缺乏历史的内容。他们想抓住自然界和自然人，而他们抓住的依然只是空洞的抽象的东西。恩格斯说：“旧唯物论对于历史的见解……在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它是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事物，把历史人物分为正直君子和诡诈小人。”^①这里所说的旧唯物论的实用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美国“实用主义”唯心论完全是两回事。胡适派专门干混淆历史的把戏，常把中国的旧唯物论和美帝国主义的“实用主义”唯心论涂抹在一起，进行他的“媒婆”任务。我们须严格地把二者区别开来。十七世纪的中国学者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或实际实物实效之学，是中古绝欲思想的对立物，是进步的资产阶级先辈的先进思想，他们所提倡的个人实践实质上是进步的“市民”的世界观，而“实用主义”的唯心论所标榜的个人主义却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世界观。

中国的启蒙学者之所以把个人的实践规定于绝对的善恶标准之上，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不要说顾炎武和颜元的经世思

^①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56页。

想，即象王夫之的知行论，虽然它是超越古人的杰出思想，但其中实践概念的结论也归结到所谓“人性存在”的君子或圣人的观点方面。因此，在他们看来，参加社会实践的人不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伦理标准之下的形式的总和。这就走入唯心论。

为什么象欧洲的启蒙哲学要回到希腊，象中国的启蒙哲学要回到先秦呢？这自然是由于他们企图摆脱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不得不托古改制，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在古代哲人的思想体系里，曾出现过历世的思想方法的胚胎形态，因而“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世界观的胚胎和发生过程。因此，如果理论的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命题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这种见解愈来愈为自己开拓了道路。”^①中国的先秦哲学也类似这样。中国的启蒙学者为了追寻自己当时的一般命题，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也就不自觉地回溯到古代中国的经学和子学，因为古代哲学“总的说来……比（中古）形而上学要正确些”^②。从反对中古的烦琐哲学方面来讲，回到古代一事，也包含着为了进行批判活动而选择武器的功用。然而钻在考据学的牛角尖里的所谓“汉学”自然不符合这种情况。顾炎武的“理学，经学也”的命题，傅山的“五经皆主制”的命题，顾宪成的“性命之作用为诗书六艺”的命题，黄宗羲的“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命题等等，都回到所谓“三代”的黄金世界，追求自己的当时的一般命题。这是进步的思想，我们应当把它和乾嘉的“汉学”区别开来。同时，这种情形也证明了一个特点，即思想史的变化，不是

①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6页。

依存于基础而创造意识形态，而是依存于基础而改变过去的传统意识。

启蒙学者在追求一般命题的胚胎的时候，即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先辈而寻求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但同时也一般地寻到原始素朴的大同理想，或者说，他们在大同理想的外衣之下而表现自己阶级的要求。启蒙时代还没有暴露资本主义的历史矛盾，启蒙学者也就只“相信当代的社会发展”，“仅仅限于向改革前制度底残余作斗争”，他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的乐观主义”，他们的“愿望的内容上是与资本主义所创造和发展的那些阶级底利益相适应的”，他们的纯真的理想和后来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那样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说谎的谬论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此，“启蒙者没有挑出任何一个居民阶级作为自己特别注意的对象，不仅一般地讲到人民，而且甚至一般地讲到民族”。①

在十七世纪的中国思想家的用语上也没有特别注意到那一种居民，以王夫之为例，他既说到“大贾富民，国之司命”，但也说到“能士者士，其次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但对于“故家大族”和“疆豪猾吏”却攻击不遗余力。再以黄宗羲为例，他的工商“盖皆本也”的市民术语，也是并指着资本家与劳动者，但对于“罔民而收其利”的超经济剥削也攻击不遗余力。

因此，他们的思想不一定是政治的表白，而多数是通过文艺、哲学以至宗教的形式，间接地具有政治运动的意义。如恩格斯所说，这就是“那明白地或不明白地、直接地或以思想形式、也许甚至以幻想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和其领袖（即所谓伟大

① 《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第48—49页。

人物)头脑中而成为自觉的动机的动因”。①

上面所讲的是从启蒙学者主观理想所表现出的共同的纯真态度来分析的，然而这不等于说他们中间客观上就没有代表某些集团的阶级倾向。相反地，他们是有着派别的。《德国农民战争》就多从这一角度来进行分析。具体地区别十七世纪中国学者的派别，将在本书各章展开讨论。这里只举一二例子来比较说明：王夫之虽然在哲学体系上是更进步的，傅山虽然敢在京师做平民运动，但他们的思想倾向却接近于代表城市中等阶级的反对派（不要误会为中小地主）；顾元虽然在方法论上是复古的，但他的思想倾向却接近于代表城市平民反对派，由此可见，他们的阶级出身虽然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我们分析某一派的思想却主要不能依据阶级出身，而应依据其思想的实质。

以上研究明清之际的社会关系和思想轮廓，是不够充分的，但写作的企图是依据这样的教训：“要批判它（全部思想内容。——引者），要从错误的但在当时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唯心论形态中、从这个暂时形态中剥取有价值的成果”②。我们就是要这样来继承前哲的遗产。

（原载《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

①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57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66页。

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 和历史意义

邓拓

中国十八世纪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红楼梦》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只有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者，才故意抽掉它的社会背景，歪曲它的历史意义，而把它说成是为“忏悔情孽”而作的。胡适一流人戕贼中国古典文学、扼杀古典作家的现实主义传统、毒害青年读者的不可告人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与任何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文艺观点根本不同。高尔基在《年青的文学和它的任务》一文中说过：“马克思承认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面学习了很多东西。依据左拉的小说，我们可以研究整个的时代。”

我们从《红楼梦》里面，同样看出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它的发展脉络；从这里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它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

本文打算从《红楼梦》这部作品所描述的事实中关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若干主要线索，联系到一些重要的历史材料，就它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作正面的说明。

《红楼梦》这部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清代的康熙、乾隆三朝，主要的是十八世纪的上半期。

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概括地说，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虽然，作为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决定着社会性质的还是封建经济，因而当时的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但是，这个时期的封建社会毕竟不同于以前的任何时期。它已经产生了新的因素，其标志是：在封建经济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这就表明了当时的社会，除了农民和地主的主要矛盾以外，还存在着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市民社会力量和封建统治的矛盾；而在这个矛盾中，还夹杂着民族矛盾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复杂内容。

由于《红楼梦》是反映当时那样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的一部伟大作品，它就不但揭露了当时的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的腐败、虚伪、残酷、暴虐和深刻的社会矛盾——包括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和阶级内部的矛盾；而且反映了当时新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萌芽和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的生活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痛苦。

本来，清代以前的封建土地关系，已日益向两极发展，虽然在农民大起义中部分解决了土地关系上的尖锐矛盾，但是在清代

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矛盾又继续迅速发展。顾炎武《日知录》记载的“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的现象正在逐渐严重化。明代统治者早已实行了“计亩征粮”的一条鞭的赋税制度，货币地租逐渐发展，农产商品化趋势已经日益显著；国内市场扩大，全国有三十几个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都相当发达，出现了许多自由商人和独立手工业者；除官办的手工工场以外，还出现了带着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同外国的贸易往来也开始增多；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为代表的新生的市民思想正在传播。特别是在东南地区，这种市民经济和市民思想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

清朝封建统治者对于明代已有相当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市民社会势力的发展，曾极力加以抑制和摧残。但是，客观的历史发展并不符合于清朝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愿望，新兴的社会力量是消灭不了的。相反，由于清朝统治者依靠和纵容八旗贵族和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给以种种特权去兼并土地、垄断商业和手工业、进行高利贷剥削的结果，却引起了清代农村土地更加集中，农村中失去土地的人口大量游离出来，社会的阶级分化更加剧烈；高利贷和商业资本更加活跃，农产商品化的过程进一步加快，手工业更多地为市场而生产；国内市场日益扩大，国外贸易也比以前活跃；城市工商业进一步发达起来。在这种条件之下，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就进一步发展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育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正是这种情形。

当时的市民社会中有城市的手工业者、工场手工业主人、中小商人，以及住在城市的一部分经营地主和破产的贵族地主，还有代表市民思想的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这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当时虽然还没有摆脱封建的束缚，但是它从经济上到思想上都表现了与封建主义相对抗的许多特点。

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清朝统治者不断地对汉族人民及其他民族进行屠杀和战争，一方面消耗了大量的兵力、财力，加深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外的市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封建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基础日渐动摇起来。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分析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期间的历史材料，也可以进一步认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论断。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当时带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兴的市民经济，还没有充分成熟的发展条件；而当它刚刚萌芽的时候，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已经逐步侵入了中国，阻碍中国新的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后来外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以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并且用战争的手段打开了封建的中国，就使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被奴役地位。但是，这并不能引出一个错误的判断说：当初的资本主义因素既然还没有充分成熟的发展条件，就不可能产生反映它的文学艺术作品。事实并不是这样。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论中教导我们：“关于艺术，谁都知道，它的某些繁荣时代，并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

适应的，因而也不是与那可以说构成社会组织骨干的社会物质基础相适应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希腊人的艺术“在我们面前所显示的魔力，是与它生长于其上的未发展的社会阶段不相矛盾的，相反，它正是这个未成熟的社会关系的反映。”

《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其理由就在这里。

二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就描写一个中小地主甄士隐的家庭遭遇一场火灾，他“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盗贼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只得将田地都折变了，携了妻子与两个丫环投他岳丈家去。”后来，“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这是当时封建社会的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和在这个基础上所产生的新的社会矛盾的一个具体写照。

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丧失土地，大地主激烈兼并土地的血腥记录和农民的反抗事迹，充满了十八世纪的清代历史，这是人所共知的。

清代初年的圈地运动，曾经占去了大量肥沃的土地。当时有二十五万顷的圈地，八旗壮丁每人占地达三十六亩。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写道：“圈地每人六赏，一赏六亩，共地三十六亩。如家有壮丁三人，该地七十亩，人多者照数加增。”但是到了乾隆年间，新的土地兼并的风浪很快袭来，不仅汉族农民纷纷失地，而且据《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就连八旗壮丁圈占的土地也“大半典卖”了。《清朝经世文编》中载有乾隆十三年杨锡

魏的奏疏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这就证明当时土地兼并是多么剧烈的了。兼并的结果是土地大量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里。清代全国耕地面积在康熙二十四年为六，〇七八，四三〇顷，雍正二年为六，八三七，九一四顷，乾隆十八年为七、〇八一、一四二顷；而大地主阶级兼并的土地数目却很惊人。据昭桂所作《嘯亭续录》记载，直隶怀柔的一家姓蔣的大地主就占有了“膏腴万顷”；皇帝出巡，借宿在他的寒厓，“进奉上方水陆珍错百余品”，一日耗费十几万两银子，还有“高平董氏，盛氏富亦相仿”。一家大地主就占了一百万亩土地，那末，照上述全国耕地六百万顷或七百万顷来计算，如果有六百个或七百个这样的大地主就把全国的耕地都占完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继续尖锐化是必然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被镇压了多年以后，零星的农民骚动又继续发生，最著名的如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的“王伦之乱”，攻破阳谷、堂邑等县城，就是证明。《红楼梦》的作者所谓“盗贼蜂起”完全是事实。不过，这个时期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还没有马上爆发成为全面的起义。

历史已经证明，清代的所谓“康乾盛世，嘉道守文”的整个时期，即是封建经济发展到烂熟的时期，也是它的内在矛盾和外部矛盾开始充分暴露的时期。这种情形就如周（红楼梦）第二回中作者借一个古董商人冷子兴的嘴里说出的荣宁二府外强中干的情形一样，“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接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但是，这些大地主阶级却好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红楼梦》第十六回中，贾府的乳母赵嬷嬷说：“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

花的象淌海水似的。”凤姐忙接道：“我们王府里也预备过一次。”赵嬷嬷又说：“如今还有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好世派，独他们家接驾四次。要不是我亲眼看见，告诉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粪土，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他们的这么多银钱财产是从何而来的呢？

虽然，当时地主阶级的大量银钱财产的来源，除了进行高利贷剥削和经营工商业赚来的以外，主要的还是从农民身上进行残酷榨取得来的。《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出宁国府交给乌进孝掌管的就有八九个庄子，荣国府交给乌进孝掌管的就有八九个庄子，荣国府交给乌进孝的弟弟掌管的也有八处庄地，还有东省的地地不算。老管家周瑞曾对贾珍说：“奴才在这里经管地租庄子，银钱收入，每年也有三五十万往来。”这还只是他们对农民剥削的一个方面而已。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地租已有不少是采用货币地租的形式的。乌进孝交给贾珍的租子，主要的是二千五百两银子，其次是一千担常用米，其余是山珍野味。当时江南地区货币地租已经相当流行。如《松江府志》载，乾隆元年尚书杨名时奏称：“娄县知县王士瑾请将毕姓田产，每岁租银一千三百余两供廩食之需。”这类记载散见在许多文献中，可以证明有许多私人的田产，每年是收租银而不是收租谷的。货币地租的流行，同田赋征收中的银粮比例的变化也是一致的。按《清朝文献通考》所载，顺治十八年的田赋中，银赋为二、五六七、〇〇六两，糯米为六、四七九、四六五石；而乾隆十一年田赋中，银赋增至二九、六一一、二〇一两，糯米则为八、四〇六、四二二石。银赋是把农产品出卖换得货币来完纳的。银赋的增加不但说明了货

币地租的逐渐流行，而且说明了农产商品化的程度提高了。

随着农产商品化的趋势而来的是棉花、烟叶等商品作物种植的加多。例如，棉花在明代就已在长江流域普遍种植，清代更为发达。康熙有御制木棉赋，赞扬种棉的利益；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编绘木棉图说十六条，说明棉花的播种和染织的全部过程，刻石树立在保定，于是以滹沱河流域为中心，在北方也普遍推广植棉了。又如烟叶的种植，这时候也比以前更多。王士禛在《香祖笔记》里说：“今世公卿士大夫无不嗜烟草者。……初闻人自海外携来，膏田亦种之，反多于吕宋。今处处有之，不独闻矣。”我们不必去讨论烟叶传入中国的途径，但要说明这种商品化作物日渐普遍的趋势，甚至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不安。雍正五年有一道上谕说：“烟叶一种，于人生日用毫无裨益。……小民转置错铄，但顾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故当国利之时，若令其舍多取寡，弃重就轻，必非情之所愿也。地方官遽然绳之以法，则势有所难行。”农产商品化的趋势已经不是法令所能够阻挡的，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种植棉花和烟叶的，当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出卖。这就可见那时候的商品作物已经相当发达了。那时候的经营地主，首先也是种植商品作物的。明季顾越元的《客座赘语》所记载的金陵“城西一带最宜于蔬圃，近市而易于获利”的情形，在清代更加普遍。雍正五年的上谕中就普遍责那些致富之家“舍本逐末，弃膏腴之沃壤，而变为果木之场；废妻媵之恒产，以幸图赢余之利”。种植大批果木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市场的需要。市场上需要什么，他们就生产什么，这是毫不奇怪的。这时候农村中的雇工，也随着商品化的农业经济的发达而同时增

多。康熙年间编修的《古今图书集成》记载着许多农村雇工的情况。如《扬州府志》《汇考》中写道：“无田之农受租于人佃户，无力受田者为雇工，多自食其力。”“力佃播藏，年可获中人钱，为地佃。”《苏州府志》《汇考》中又写道：“佣农治田力穡。……雇工以度其寒，以岁计曰长工，以月计曰忙工。”虽然农业中的雇佣劳动也是很早就有的，可是这个时候却更加发展了。这只有在经营地租和富农经济产生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红楼梦》第五十六回中描写探春兴利除弊，决定把大观园出产的笋、菜、鱼、虾、香草、花儿和稻子都包给能知园圃的老妈妈，一年可得四百银子的利息。这简直就是大经营地主的算盘了。第七十九回里写的“桂花夏家”单有几十顷地种着桂花”也是一例。

这些大地主和高利贷、商业资本还结了解不解之缘。请看《红楼梦》的第四回，那位葫芦庙的小沙弥出身的门子就说出了金陵的贾、史、王、薛四大家的关系，是“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贾赦、贾政等是世袭的封建贵族大官僚大地主不必说了。薛宝钗的哥哥，那个仗势欺人、抢走香菱、打死冯渊的薛蟠，不正是“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的“皇商”吗？薛姨妈不是还有好几处当铺吗？贾府被抄的时候不是查出两箱房地契文、一箱放债的借票吗？这些已够说明：他们不但是封建大官僚，而且又是兼并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又是大高利贷者和大商人。

当时的官僚、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相结合的例证，在史籍中是不胜枚举的。例如，《东华录》载，康熙二十八年御史许三礼参劾尚书徐乾学“发本银十万交盐商于扬州贸易；在大蒋家胡

同开当铺放债，在无锡一处即买田一万顷。”《东华续录》引乾隆九年大学士鄂尔泰的奏疏，其中说道：“查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前面所举《喇嘛续录》中还引述高士奇的“亲家陈元帅，伙计李开芳，开张绸号，膏腴各处请粮，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千顷，大兴土木，修整花园，杭州西溪广置园宅。苏、松、淮扬王鸿绪等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以高士奇之流的新官僚而拥有田地千顷，商铺资金数百万，这在当时并不稀奇。

因为清朝的统治者是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它并不愿意妨碍大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倒反愿意让商业高利贷资本同封建土地制度相结合。据《东华录》引乾隆年间的一道上谕说：“山西等处富户，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贫民已经失业，虽遇丰稔之年亦无凭藉。”乾隆朝中的一位刑部左侍郎钱维城上疏也说：“豪商大贾挟其金钱，买贱卖贵，子母相权，岁或入数万金。富者以数百万计，以一家而有数千百万家之产，则以一家而致数千百万家失业也。”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这就是：一方面地主阶级利用商业高利贷资本趁机加紧剥削农民，积累财富，并且把一部分财富投到城市工商业中去；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更加集中到少数地主手里，大批农民失地流亡，大批地流向城市，成为城市中的雇佣劳动者。

三

城市和工商业的发达，是封建农村中吐出大批劳动力和商品

生产扩大的必然结果。现在我们就来考察这一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城市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情况，以便判断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在这一方面，曹雪芹的家庭就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材料的一个来源。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家庭，从他的曾祖曹玺、祖父曹寅到他的伯父曹颀、父亲曹頌，世袭了江宁织造，历时六十年，有时还兼任苏州织造和两淮盐政。通过这个历史的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怎样经营官办的工商业，它和民间的独立手工业者、手工作坊、工场手工业以及自由商人之间有哪些联系和矛盾。

故宫的《文献丛编》中有曹寅在康熙四十七年六月的一封信，其中说到江宁织造府的“神帛、官浩两机房，自顺治二年间，案经内院臣洪承畴经定，除丝颜等料照时采买外，其一应匠作工价，因开织之初惟期撙节，所定工价甚寡，较之缎匹、倭缎仅十之二三。此各匠虽有工价名目，实皆民间各户雇觅应工。迄今六十余年，历任织臣无可动钱粮，惟一循旧例。若竟行革除，则穷匠星散谋食，不能束腹以待软工。……臣等原议浩帛二项匠约计三百七十名，岁需银二千七百两，即可贍活群工。”

这就说明：第一、官办的织造业自设机房，经常有几百个工人为它做工；第二、官办的机房往往向民间派定手工业工人按时应工；第三、官定的工价很低，不足以维持手工业工人的生活；第四、民间的许多手工业户随时都能够雇到自己所需要的许多工匠；第五、民间穷苦的手工业工匠平时是星散谋食的。

这些工匠是完全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手工工人。《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织工部》《纪事》中记载苏州织工的情形

说：“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具各散归。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每桥有行头分遣，今织造府禁革，以其左右为利也。”

这又说明：第一、当时的手工业已有相当细密的分工，手工业工人各有专能；第二、计日受值的雇佣制度已经流行；第三、雇主和雇工之间虽有经常的相对固定的关系，但已经是属于自由的契约关系了；第四、出卖劳动力的劳动市场已经以较大的规模出现，并且行头从中剥削很厉害，可以“左右为利”；第五、清朝的织造府所以要禁止这种行头的剥削，只是因为官办工业和民间工业有矛盾，如果取消了行头，就更便于织造府的机房直接招工。

从官办的织造工业来说，它直接控制着一部分手工业作坊主人、小手工业者和商人。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巡抚郎廷极请以曹寅之子继任江宁织造的奏折中说：“今有江宁省会士民周文贞等，机户经纪王聘等，经纬行车户项子宁等，缎纱等项匠役蒋子宁等，丝行王楷如等，机户张恭生等，浙江杭嘉湖丝商邵鸣皋等，纷纷在奴才公馆环绕，具呈称颂曹寅善政多端。”这许多机户、匠役、丝行、丝商等等当然都是受织造府直接和间接控制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是经常和织造府发生矛盾的。织造府“限制机户不得逾百张，张纳税五十金，织造批准纳税给文凭，然后敢织”；而机户则要求“减免额税”。这一类矛盾是日益明显地存在的。

但更重要的是，当时除了官办织造工业以外，民间的织造业也相当发达。这种民营的手工业是市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据陈作霖《凤麓小志》载，“金陵机业聚于城之西南隅。开机之家，总会计处谓之帐房，机户领机谓之代料，织成送缎，主人校其良楮，谓之讎货。小机户无甚资本，往往恃帐房为生。各机户复将丝发交染坊染色，然后收回，织成缎匹，再售与绸缎业。四者层层相因，休戚相关。清乾隆迄今，通城缎机以三万计。纱绸绒缎不在此数。织机之工俗呼机包子。”

所谓“机户”一般地是指雇佣手工业工人的工场手工业的主人，“小机户”就是作坊主人，“机包子”就是独立手工业者，他们都直接和间接受着帐房和绸缎业商人的层层剥削。当时的所谓“帐房”就是商业资本家控制手工业生产和运输过程的组织形式。他们供给手工业生产者以原料或者同时供给生产工具，收买成品。这种制度是比较完备的商人雇主制。当时民间织造业的数量很大。陈作霖说这一座南京城里从乾隆以来就有三万架缎机，其他还不计算。这个数字也许是过高的估计，但它毕竟说明了在乾隆的时候，南京的民间机织业的发展，已经很有可观的了。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的那些机包子等独立手工业者和机户等又跟帐房、绸缎业商人经常有矛盾。他们的关系不是“层层相因、休戚相关”而是层层剥削、互相对立的。

由于城市中官办的和民营的两种手工业的影响，当时许多城市附近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也比以前更加发达。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九月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中写道：“采办青兰布三十万匹……此项布匹出在上海一县，民间于秋成之后，家家纺织，赖此营生。……三月奉部文发买，临期急迫，必需牙行经纪四散

收买，所以价贵。”《古今图书集成》《松江府部》《汇考》中记载：“乡村纺织，尤尚精緻，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纁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从这些记载里，我们不难想见那时候的农村家庭手工业是多么发达的了。并且，上述松江府的记载中还写道：“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衣食全赖于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家庭手工业并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广大的市场而生产的。

当然，人们都还知道，中国城市工商业有很久的历史，手工业工场也早已出现了。从汉代说起，据《汉书》《食货志》所载，当时不但“举天下盐铁，作官府”，而且有东织室，西织室，设置“令丞”。后汉还有“甄官令丞”营造琉璃。后来两晋、南北朝和隋朝都有各种官办的手工业工场。唐、宋、元的官办手工业的发达，几乎使全国的手工业者都变成了官府的“工奴”。在那些年代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同样已经产生，宋代城市还有相当数量的“土木杂作”等出现。但是，在那些年代里，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作为新工业发展的阶梯的、为广大市场而生产的民营的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雇佣劳动的市场都很狭小。只是到了明代，城市的商业和民营的工场手工业及农村的手工业才逐渐发达起来，特别是在东南地区比较发达。清兵入关之初，这些工商业曾受了相当的打击，一度低落。但是，因为社会经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发展条件，这些工商业不久就恢复和进一步发展起来。

我们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许多城市的面貌上，首先就可以看到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盛。就以当时的金陵来

说，这座城市显然已经成了当时江南工商业的中心城市。它不但保存了明代的铜铁坊、皮市、履鞋坊、帘箔市、伞市、木器街、木匠营、弓箭坊、织锦坊、颜料坊、毡匠坊等等，还增加了珠宝廊、书坊等新的市肆。《续板桥杂记》中说：“乾隆之世，利涉武定二桥之间，茶寮酒肆东西林立。”当时商贾水陆交通直达金陵的有十几路。这是金陵的情形。再举武昌的情形来看，据《古今图书集成》《武昌府部》《汇考》所载，当时“商贾之牙侩，丝帛之麇肆，鱼米之市魁，肥其妻子，雄视里闾，下至百家技艺、土木食工，以及俳优侏儒，趋利于闾阎者，未尝不趾相错而踵相接也。”如果说，这些都是南方的情形，那末，再举同书关于宣化府城的记载来看：“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潯州毡铺、泽州粮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染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街五里许，贾皆争居之。”可见当时许多城市的工商业都很发达。

而且，清代康熙以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引起社会风习的变化，也更加显著地表明了它比唐、宋、元、明各朝代还要深刻得多。康熙年间编修《古今图书集成》的封建老爷们，叙述了武昌等城市百工商发达的情形之后，就不胜慨叹地写道：“土俗民风经百余年而未变。迨故明万历之季，风气寢薄。……今则贵贱无分，少长失序。”此等腐儒的叹息，在当时许多文字中本来也很平常，但它却证明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这就是：明代万历以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反映到社会风习方面，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万历以后变了，因为城市工商业发达了；而清代康熙年间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因为新兴的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市民社会力量进一步发展了，这当然会使封建老爷们看不下去的。

这种工商业发达的情形，在当时究竟是不是相当普遍的呢？当时其他地区的城市和其他工商业的全面情形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应该在这里得到简要的回答。许多历史的材料说明，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无论建筑业、采矿业、制盐业、陶瓷业、纺织业、制茶业、印刷业等在许多地区都十分发达，分工也很细密。如乾隆年间的建筑业在各处都有，其中分工的种类各样很多，有大木作、楠木作、石作、瓦作，搭彩作、搭材作、土作、油作、裱作等等。

在采矿业方面，清朝统治者曾一度严令禁止，但后来也逐渐开放了。据《清史稿》所载，康熙年间山西应县、陕西临潼、山东莱阳各处银矿已经开采。雍正年间广东总督鄂尔达奏称：“粤东山多田少，而矿产最繁，土民习于攻采，矿响所在，千百为群，往往聚众私掘。”广东的采铁和冶铁工业发达的情形在鄂尔达的奏疏中记述得还很多。比如他描写“铁炉不下五六十座，煤山、木山开挖亦多，佣工者不下数万人”。可见是很发达的。乾隆年间陆续准许山东博山等地煤矿以及贵州思安、陕西哈拉山、甘肃扎马图等地金矿和银矿，两广和云南各地的铜、铁、铅矿，尽行开采。云南的铜矿历史很久，规模也很大。它在康熙、雍正的时候是“由官给工本”开采的，起初每年产铜只八九十万斤，乾隆的时候虽然仍由官府“放本收铜”，却并不干涉生产过程，各矿厂可以独立经营，因此每年产铜增至一千二三百万斤，矿区也扩大许多倍。《清史稿》载乾隆时“大厂矿丁六七方，次办万余，近则土民，远及黔粤，仰食矿利者奔走相属。”再看阮元《云南通志稿》《食货志》的材料，云南铜矿在康熙年间常有十七八处在开采；雍正二年至乾隆八年常有二十余处在开采；乾隆九

年以后常有三十余处在开采，乾隆三十七年有四十六处在开采。王嵩《厂矿采炼篇》记述各处的“商贾负贩，百工众技，不远数千里，蜂屯蚁聚，以备厂民之用。而优伶戏剧，奇邪淫巧，莫不闻风景附。”可见连某些边远的矿区也逐渐变成新兴的工商业小城市了。

清代的制盐业在两淮、两浙、两广、福建、山东、长芦、四川等著名的产盐区同样是扩大生产的，盐利也是最大的。许多盐场又经过了裁并，就日益集中，每个大的盐场往往都有几千上万的盐民或“窰户”，许多盐场或盐井互相毗连，使产盐区的集镇也更加繁盛了。这些盐区不但是制盐的工业区，而且又是盐商集中的商业区。当时两淮等地的盐商获利最大，康熙、乾隆屡次到南方巡游，强迫盐商捐输的款项，动辄几百万两。即便是在边远的云南，当时盐井的数目也比以前增多，雍正年间由八大井、四十多小井增加到三十六大井、九十多小井，乾隆年间又新开了两大井。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说：“云南琅井在昆州，白盐井在姚州，黑盐井在楚雄，皆在万山中最下处溪河之中，环溪数千家，皆窰户也。每担咸水税若干。”各地盐业的发达可以概见。至于历史悠久的江西景德镇的瓷业，在明代就已经扩大了规模，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的时候更进一步发展了，制作的技术也更加提高，分工协作的组织比以往也更加细密。在那里不但有规模十分可观的能够承担官局烧造任务的大窰，而且有许多为市场而生产的小窰。从那里出产的瓷器行销各地，因此景德镇更加成为“商贾云集”的地方了。据唐英的《陶冶图说》所载，当时“景德镇……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靡不借瓷以生”。这些大部分都是私窰，而在御窰，则只有“工匠役夫三百余人”，即便还有其他工人，也多不到哪里去了。

各个地区的这许多官办工商业和民营工商业之间的矛盾同样是很尖锐的，斗争不断地爆发。因为清朝统治者对民间工商业的压迫日益加紧，激起了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的反抗。他们进行斗争的方式更加复杂。他们有的利用统治阶级的矛盾，发动罢市。这是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进行斗争的独特形式。如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十八、十九两日，江宁、镇江、扬州的商民举行罢市，拒绝新任督抚到任，要求减轻税额。有的组织武装走私。如康熙年间山东、河南的“流棍”，往往“率党”二三百人，兴贩私盐，横行白昼，在泰州沈家营等地杀死缉私官兵。有的率众反对抬高米价。如乾隆十三年春夏之交，米价骤涨，苏州有“市井咸失厥类，年者倡言平抑米价，和者纷如蚁聚，势愈汹涌。”这一类事实只有在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市民社会力量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才可以理解。

康熙年间有一个反满的秘密组织“三合会”出现，乾隆年间又有另一个反满的秘密组织“哥老会”出现。这些秘密组织跟城市的行帮组织有密切关系，跟海外的华侨商人和苦力也有密切关系。就城市的行帮来说，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有许多城市的行帮的内部关系，比起从前的行会大有不同。如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汉口米粮业帮规中写道：“吾人若无团结集议之所，则无以整顿行规，且意见各殊，斗斛参差……何以昭公溥而永保信用？”并规定“缴入帮费银十五两”、“公所之常费收取悉照帐簿”，“有破坏帮规者，即开会议罚”。这种行会章程显然带着新的色彩。

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相随而来的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输入，对于清朝闭关的封建经济的侵蚀和瓦解的作用，也在日益加深。

自从康熙二十三年开设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二十八年间帝俄签订尼布楚条约，雍正五年又订立恰克图条约以后，东南沿海四个关口，北方陆路一个关口，输入的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不断增加。康熙五十九年专门为了经营对外国商人的贸易而设立了广州十三行，它们和明代的三十六行的性质很不相同，应该说这时候买办资本也开始萌芽了。

看《红楼梦》的人都记得，《红楼梦》中有许多外国的货物，如洋漆、洋布、洋泥，金表、挂钟、西洋金自行车、玻璃灯、西洋珐琅、洋烟、西洋葡萄酒、波斯玩器，暹罗茶叶、止头痛的药膏“依弗哪”以及冯紫英夸称为“鲛绡帐”等四种洋货都是。王熙凤夸耀“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薛宝琴自称“八岁跟父亲到西海买洋货”。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而俱来的，是外国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比明朝的时候更为增多。康熙皇帝曾任用了许多传教士为钦天监，当教授，到内地勘测，那些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增设教堂，吸收教徒，买土地，做生意。这些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思想倾向同样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四

由于当时从城市工商业的基础上兴起的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市民社会力量进一步的发展，清朝封建统治者就遇到了过去所没有遇到的新兴社会力量跟它相对立。这种对立关系已经超出了封建社会中农民和地主对立的范畴，而带有新的社会意义。因此，有些人仅仅看到清代的农民斗争对于封建统治的冲击，

而忽视或抹杀了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对于封建统治的冲击作用，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农民斗争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的，而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却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作为封建制度的对立面。这完全是新生的事物，怎么能够抹杀的呢？

在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正是由于这种新兴的市民社会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封建农村的阶级分化和农民的高村，由于西洋资本主义势力开始逐渐侵入，这才给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以多方面的威胁。而在当时一部分经营官办的工商业的贵族官僚和地主阶级中，也逐渐地产生了思想上和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分子，这也是很自然的。

曹雪芹就是属于贵族官僚家庭出身而受了新兴的市民思想影响的一个典型的人物。人们都看到了《红楼梦》具有强烈的反对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但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曹雪芹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反封建的呢？应该说他基本上是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的。必须从这一点来分析，才能更清楚地认识《红楼梦》的历史意义。

人们大概都不否认，《红楼梦》里的许多正面人物，是代表着那些没落的封建贵族官僚地主的家庭中向往自由生活的一群青年人。他们一方面对于日趋腐败的封建制度发出了动人的控诉和强烈的反抗呼声，揭穿了以贾政、贾母，王夫人，薛姨妈等为代表的行为伪善、实则残酷不仁的封建家庭统治者的面目；另一方面也无情地揭露以贾珍、贾琏、凤姐、薛蟠等为代表的唯利是图、肆意暴虐的当权派的丑恶。作者的思想就是要反对这两方面戕贼个性自由的封建恶势力，而追求着符合于个性解放的目的的

新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

除了在许多文章中已经反复被引用的例子以外，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几个例子。从婚姻自由的问题上说，尤二姐对着贾珍、贾琏那一班人最尖锐地表示：“必得我拣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才嫁他。要凭你们拣择，虽是有钱有势的，我心里进不去，自过了这一世了！”在反对人对人压迫的问题上，春燕传述宝玉的话说：“这屋里的人，无论家里外头的，一应我们这些人，都要回明太太，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对于一切向封建统治阶级的庙堂里爬去的人们，作者借宝玉的口中狠狠地骂道：“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处处痛骂封建的道德、功名、利禄和等级制度，痛骂那些虚伪的封建社会的忠臣孝子，痛骂那些凌辱别人的个性自由的残暴行为。

作者的这种思想倾向，显然是受了当时反映着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兴市民思想的影响。人们晓得，清初顺治、康熙年间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铸万、刘继庄等人都曾提倡个性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对于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表现的基本思想，和这几位思想家的言论有许多相近之处。例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论了“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曹雪芹也借宝玉的口里说“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唐铸万在《潜书》《天命篇》中说：“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被薄，此乐则被忧。……人之生也无不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曹雪芹同样借宝玉的口里发出“不平则鸣”、“世法平等”的一类呼声。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说：“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

情，而看之借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威肃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曹雪芹也借宝玉的口里说道：“除了‘明明德’以外就没书了，都是前人自己编纂出来的。”刘鹗还提倡看小说和看戏，认为这是“性天中之诗与乐也，书与春秋也，易与礼也。”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也提倡看《西厢记》、《牡丹亭》等小说，看《醉打山门》等戏曲。这些思想的产生和在一定程度上的彼此共鸣，难道可以说是完全出于偶然的吗？

还应该提到的是，曹雪芹毕竟是汉人，他的祖上虽然入了族籍，在清朝统治者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之下，这位充满着个性自由思想和人道主义的作家，是不能无所感触的。《红楼梦》写成之后，清朝宗室弘晔评歌：“《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矣，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弘晔所说的碍语，有人加以种种不同的解释，其实最主要的应该是以下两方面的意思，一则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汉人大兴文字之狱，前前后后十七起之多，并且到处搜集成千成万的“违碍书籍”，这当然会使弘晔对于曹雪芹的作品存着顾虑；二则是雍正以来清朝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复杂化，阿其那、塞思黑的案子牵涉很广，曹家被抄与此不无关系，这同样使弘晔有所顾虑。但是，《红楼梦》并不因为当时的清朝宗室怕它有碍语而不得传世，相反的，它是不脛而走和深入人心的伟大作品。

显然，《红楼梦》是描写了一整个时代的。这个意义并不因为它带有自传的性质而减弱。有不少伟大的作品也是自传性的，谁能否认它的价值呢？但是，《红楼梦》又毕竟不是家谱式的自传，而是刻划了一个时期社会的典型面貌的。

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序言中说：“把每个人看作时代、民族、阶级的产物，我们当然应该从同样角度去看作家；可是要承认作家是一个比别人更饱和着经验——人生的知识，而且由于经验的堆积，具有着把自己的印象装饰在形象里面的本领的人。”这样的作家所写出的作品，由于作家的“经验愈广大——它里面的主观的，个人的地位就愈狭小，一般的意义就愈灿烂地呈现出来，艺术家的社会形象就愈鲜明地显示出来，作家愈坚决地排斥他的个性——他就愈容易抛弃他的渺小的、无足轻重的东西，他从周围世界所接受的重要的客观的东西就愈深刻地广泛地展示出来。”我们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

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红楼梦》和曹雪芹，我们自然也不能不看到这部作品和它的作者的思想是有弱点的。由于作者出身于一个封建贵族的大家庭，他所处的社会环境限制了他的世界观，给它蒙上了虚无主义和宿命论的色彩。他对于封建制度的罪恶虽有强烈的憎恨，却找不到出路。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一文中有一段话也适用于曹雪芹。高尔基说：“批判的现实主义是作为‘多余的人’的个人创作而产生的。这些人不能为生活而斗争，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而且或多或少明确地意识到个人存在的无目的，于是把这种无目的只是了解为社会生活的一切现象以及一切历史的过程的无意义。”

《红楼梦》描写的历史悲剧所留给读者的消极方面的影响，其根源就在这里。然而，这决不是作者的过错，这同样是反映了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市民社会力量的脆弱性和它的历史命运啊！

（原载《人民日报》1955年1月9日）

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 社会经济的性质

——兼论《红楼梦》中所
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

葛伯赞

我写这篇论文的动机是企图说明《红楼梦》的时代背景。

大家都知道《红楼梦》是出现在中国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一部最杰出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大家也知道这部杰出的作品，一直到最近以前，从来没有得到正确的科学的分析，而是长期地遭受地主、资产阶级的所谓新旧“红学家”的歪曲，特别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歪曲。胡适在他的《红楼梦考证》一文中对《红楼梦》作出荒谬绝伦的结论。他说《红楼梦》一书是与作者当时的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空中楼阁”，又说是“随手拈来，初无成意”的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而且它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显然，胡适的这种谬论和他的反革命的企图是分不开的，他的目的是企图抽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抽出它的时代精神，从而取消它的思想内容，并以此否定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否定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否定社会现实生活的

发展规律对思想的决定作用。一言以蔽之，就是通过《红楼梦》的所谓“考证”，宣传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相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任何人，包括作家在内，决不能离开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而孤立地生存，因而任何作品，包括《红楼梦》在内，必然有意或无意地要反映作家生活于其中的周围世界。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①因而一个作家又必然要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通过自己的世界观去概括那些足以表现他所处的时代的现实中的若干生活，必然要在他的作品中宣布他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倾向。《红楼梦》这部作品正是集中地反映了作者所处的时代，而且表承了他对于自己的时代所持的态度。

在《红楼梦》这部作品中，天才的作家曹雪芹通过了一些看来很平常而实在是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深刻地揭露了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的主要内容，鲜明地反映出当时社会内部存在着各种矛盾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和不可调和性。作者描写了新旧两种人物、两种思想，而他自己则是站在新人物、新思想方面的。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性的限制，作者始终没有找到出路，但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是一贯地在和陈腐的传统、过时的道德、当权的人物的斗争中，开辟自己前进的道路。

因此，我们研究《红楼梦》，决不是象胡适一样，只是考证作者的事迹、生卒年代和这部书的版本，更重要的是考查这部作品的时代背景。我的这篇论文就是试图研究这个更重要的问题。

^① 《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72页。

非常明白，要说明《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就要求我们对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历史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即要求我们广泛地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各方面的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和制约。这个问题太大，显然不是一篇论文所能完成的。在这篇论文中，我把我的研究限制在经济方面，亦即限制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方面。

虽然有这一限制，问题仍然很宽泛，因为说到十八世纪上半期的社会经济，就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史学家之间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毛主席所指出的，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①。问题只是在于这种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最初出现在什么时期。关于这一点，说法很多。有人说最初出现在明嘉靖、万历（1522—1620年）之间，有人说出现在明成化、正德（1465—1521年）之间，甚至有人说可以上溯到宋朝。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究竟出现在什么时期，这有待于深入的研究，但我以为决不能早到宋朝，我以为最初出现在明嘉靖、万历之间的说法是比较符合事实的。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早在十八世纪上半期以前，因而当我们考查十八世纪上半期社会经济问题时，就要追溯到十八世纪上半期以前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明朝中叶以后的历史，而这显然不是一篇论文所能完成的任务。在这篇论文中，我把我的研究限制在十八世纪上半期。

这篇论文中引用的资料主要是清代的官书、地方志，也有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20页。

笔记杂录，此外还引用了《红楼梦》中的有关经济的资料。应该说明一下，《红楼梦》中的资料，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中的资料一样，对事实的描写是有些夸大的，但决不如胡适所说是毫无根据的“空中楼阁”，而是作者对于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具体反映。

下面我从四个方面来说明十八世纪上半期的社会经济的性质：一、土地集中与阶级分化；二、农业生产；三、手工业生产；四、商业与商业资本的活动。由于我搜集的资料不够完备，因而根据这些资料作出来的论断，也只能是一种初步的意见。

一、土地集中与阶级分化

十八世纪上半期，在中国史上，是康熙末年到乾隆中叶这一时期。这时满族统治者已经在中国土地上巩固了它的统治，重建了中国的封建秩序，恢复了中国的封建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

很多资料证明，满族统治者在掌握了国家机器以后，就把恢复中国的农业生产当作自己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他们利用上层建筑积极地促使封建经济基础及作为封建主义根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巩固。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如整顿水利、奖励开垦等等办法，特别是带有强烈阶级性的政策，如减免钱粮，动员和培养封建力量，把汉族地主阶级扶植起来，并把统治农村的权力交给他们，让他们重新骑在农民的头上，使用各种经济外的强制手段，迫使农民在封建地主经济的奴役之下从事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经过十七世纪下半期半个世纪的努力，到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农业生产又走上了发展的道路。

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可以从耕地面积的逐渐扩大得到证明。据《清朝文献通考》《田赋考》所载，顺治十六年（1659年）中国耕地面积的总数是五百四十九万余顷，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增至六百零七万余顷，雍正二年（1724年）增至六百八十三万余顷，乾隆十八年（1753年）增至七百零八万余顷，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亦即《红楼梦》的作者死后的第三年，便增至七百四十一万余顷，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明末耕地面积的数字，因而也就说明了那些在清初因为遭受战争的蹂躏而生长了野草的土地，到十八世纪上半期几乎全部栽种了谷物或其他农作物①。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达，在某些地区土地价格也因之逐渐上涨。据钱泳《履园丛话》所载，顺治初，良田每亩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涨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回到顺治初价格；乾隆中，田价每亩涨至七八两乃至十余两；到嘉庆中，每亩竟涨至五十余两②。

这些都表示了农业生产的发达。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业生产发达的过程亦即土地集中的过程。关于这一点，《红楼梦》的作者提供了很好的资料。《红楼梦》第一百十三回刘姥姥说：“我们那里虽说是屯乡里，也有大财主人家，几千顷地，几百牲口，银子钱亦不少。”第一百十九回又说到刘姥姥庄上的一些地主，作者说：“那庄上也有几家富户……内中有一个极富的人家姓周，家财巨万，良田千顷。”象这样一千顷、几千顷地的大

① 这些数字不一定准确，但这是当时政府征收田赋的依据，至少可以说明这一时期内耕地面积扩大的倾向。

② 钱泳：《履园丛话》卷一。

地主出现在屯乡里，这就反映出当时八旗庄田区域内的土地集中已经达到严重的程度。

在另外的地方，作者又说到大观园的主人拥有的田庄。《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中说到宁国府如今“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又说荣国府有“八处庄地”，比宁国府的田地多几倍。第八十八回说到荣国府的“地租庄子银钱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万来往”。这些资料说明了大观园的主人们也是大地主，他们所有的土地当然不只是原来分配的份地，而是包括着后来从八旗农民或汉族农民手中收夺的土地。同时也说明了大观园的主人们之所以能够奴役成百的丫环和奴仆，主要的是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威力之表现。

《红楼梦》中所反映的土地集中的情况可能有些夸大，但基本上是符合于当时事实的。乾隆十四年监察御使赫泰《筹八旗恒产疏》中曾说到八旗农民失掉土地的情形云：“恐八旗老圈地亩，典在民间者未必止于九千余顷。何则？近京五百里之内大概多系旗地，而民典旗地，自康熙二三十年间以至今日，陆续典出者多，赎回者少，数十年来断不止于此数。”^①这一资料说明了八旗农户典出的土地总数将近一万顷，按照八旗壮丁每人占地三十六亩计算，则已经有三万多人把他们的份地当作债务的抵押品交给别人了。

土地集中不仅是八旗庄田区域的现象，很多资料证明在十八世纪上半期土地集中已经是普遍全国的现象。康熙四十三年上谕中说到当时土地兼并的情形云：“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小民所有几何？从前屡颁蠲诏，无田穷民未必均沾惠泽，约计小民有

^① 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卷四五。

恒业者十之三四耳，余皆赁地出租，所余之粮仅能度日。”^①盛枫《江北均丁说》记载康熙末年江北、淮南一带的情形云：“区方百里以为县，户不下万余，丁不下三万，其间农夫十之五，庶人在官与士夫之无田及逐末者十之四，其十之一则坐拥一县之田、役农夫、尽地利而安然食税衣租者也。”^②这些资料说明了在康熙年间大部分耕地已经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只有十分之三四的农民尚保有小块土地，其余都是“赁地出租”的佃农。在某些县分，甚至占人口总数十分之一的地主霸占了全县的耕地，占人口十分之九的农民都失掉了土地，其中有十分之五变成了佃农。

到乾隆年间，土地兼并继续进行。杨锡绂在其《筹民食疏》中说到乾隆十三年时湖北的情形云：“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庄，每岁所入难敷一家口食，必须买米接济。”^③又吴英在其策书中说到乾隆四十五年时广西的情形亦云：“阡陌开而田大半归富户，而民大半皆耕丁。”^④这些资料说明了乾隆年间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耕地面积已经被地主瓜分，很多以前有田的农民变成了地主的佃户或耕丁。

资料又证明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一些拥有庞大耕地面积的大地主。早在康熙二十八年副都御史许三礼就在其奏劾徐乾学的奏疏中检举徐乾学在无锡县买田一万顷，又在苏州、太仓、昆山、吴县、长洲、常熟、吴江等州县买房屋田产。^⑤同年

①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卷七三，康熙四十三年正月辛酉谕。

②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〇，《户政》。

③ 《皇清名臣奏议》卷四四。

④ 《清代文字狱档》第五辑，《吴英拦与献策案》。

⑤ 《东华录》，康熙朝卷四四，康熙二十八年十月：“买慕天颜无锡县田一万顷……苏州、太仓、昆山、吴县、长洲、常熟、吴江等州县俱系徐府房屋田地。”

左都御史郭琇又在其奏劾高士奇的奏疏中检举高士奇于本乡平湖县置田产千顷^①。康熙二十九年佛伦在其奏疏中说山东“富豪之家，田连阡陌”^②。《华亭县志》说到康熙时松江府境内的地主“有一户而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万至一二万者”^③。雍正时，四川总督黄廷桂、巡抚宪德在其密查岳钟琪财产的奏折中说岳钟琪在四川成都、温江、金堂、彭县、彭山、邛州等六处有地^④。昭槎在其所著《啸亭续录》中记乾隆时“海内殷富素丰之家，比户相望”，其中如京师米贾祝氏，“富逾王侯”，“宛平查氏、盛氏，富亦相仿”，“怀柔郝氏，膏腴万顷”^⑤。薛福成在其所著《庸盦笔记》中记和珅所占的土地有八千余顷，他的奴仆之中也有人占有土地六百余顷^⑥。又马国翰在其所著《竹如意》中记当时“山右亢某，家巨富，食庖多至千数，人以百万呼之，……晋省大旱……人心惶恐……亢独诡诡然对众扬言曰：‘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⑦这些资料指明了当时大地主占有耕地面积多至十万亩乃至一百万亩。

土地集中的过程，也就是中间阶级没落的过程。正象邓拓同时在他所著《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中所指出的，《红楼梦》就是以一个小地主甄士隐开始

① 《东华录》，康熙朝卷四四，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修整花园。”

② 《东华录》，康熙朝卷四五，康熙二十九年六月。

③ 光绪《华亭县志》卷二三，《杂志》。

④ 《文献丛编》第八辑，《雍正朱批谕旨不录奏折》，四川总督黄廷桂、巡抚宪德奏查明岳钟琪房产人口折。

⑤ 昭槎：《啸亭续录》卷一。

⑥ 薛福成：《庸盦笔记》卷三。

⑦ 马国翰：《竹如意》卷下。

的。《红楼梦》第一回说到甄士隐的没落是因为家里遭了火灾，“水旱不收，盗贼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于是“只得将田地都折变了”^①。这里暴露了由于土地兼并而引起的阶级矛盾已经达到了相当尖锐化的程度。

资料证明小地主的没落在当时是一般的现象。《锡金识小录》曾说到当时无镬的情形云：“城居者多贫室，有窟眷者十不得一，而乡民颇多温饱，盖雍正间汇追旧欠，奉行不善，凡系旧家大抵皆破。”^②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当时除了那些当权的大地主可以勾结官府逃避缴纳旧欠以外，象甄士隐一类居住在城市依靠地租为生的小地主到这时都在耽心明天的早饭。

当然，作为一个阶层从土地上被剥夺和驱逐的在当时还是中农，这些中农就是上面所引证的资料中所说的“从前有田之人”。这些人大抵被挤入了贫农的队伍，他们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资料证明这些被剥夺和驱逐的农民无产者有一部分是留在农村充当佃农或者变成农业雇佣工人。农民无产者之变成长工或日工等农业雇佣劳动者，在明代就有这类记载。乾隆《湖州府志》转引明人王道隆《蕺城文献》中所载云：“农人最勤，四体焦劳，终岁不休。无产者靡情受直，抑心弹力，谓之长工。夏秋农忙，短假应事，谓之忙工。收获之际，公私偿责甬场遽空者十恒七八。”^③这样的情形在清朝还是继续存在和发展。乾隆十四年礼科给事中刘方薰在《请修补城垣勿用民力疏》中说：“伏见任力役者惟农民，而农民为最苦，无田可耕则力佃人田，无资充

① 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

② 黄珂：《锡金识小录》卷一，〈备考〉上，〈民俗变迁〉。

③ 乾隆《湖州府志》卷三九，〈风俗〉，引王道隆：《蕺城文献》。

佃则力傭自活。”^①所谓“力傭自活”，就是出卖劳动力以为生。

另外有些资料，特别是当时统治阶级发布的文告中，又反映出当时的农民离村外出的情形也很普遍，他们或者跑进工商业城市，加入城市工匠或流氓无产者的队伍，或者远离故乡跑到遥远的边疆地区去寻找自由的土地从事开荒或经营小本买卖。康熙四十六年上谕中说：“今巡行边外，见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②康熙四十八年上谕说：“今河南、山东、直隶之民往边外开垦者多。”^③康熙五十一年上谕中说：“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余万。”^④康熙五十二年上谕中说：“湖广、陕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开垦。”^⑤雍正六年上谕中说：“上年闻湖广、广东、江西等省之民……迁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⑥乾隆十年御使胡蛟龄《推广辟荒疏》中说：“陕西省之榆林、延安二府各属，近边无业贫民，均赖出口种地以资生计。”^⑦严如煜在其所著《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中说：“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

还有一些资料指明离乡出外的农民找不到下落。据《熙朝纪政》所载，乾隆二十三年“岢岚州逃亡六百余丁，五寨县逃亡二百余丁”^⑧。

① 《皇清名臣奏议》卷四五。

② 《东华录》，康熙朝卷八〇，康熙四十六年七月戊寅谕。

③ 《东华录》，康熙朝卷八四，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庚寅谕。

④ 《东华录》，康熙朝卷八九，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壬寅谕。

⑤ 《东华录》，康熙朝卷九二，康熙五十二年十月丙子谕。

⑥ 《东华录》，雍正朝卷一二，雍正六年二月甲辰谕。

⑦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四，《户政》。

⑧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三。

象这样成千成万的“象鸟一样无拘无束的无产者”^①从土地上被驱逐走向他们以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遥远的边疆乃至自己还不知道的地方，这就具体地说明了当时阶级分化所产生的变化是相当剧烈的。

一方面是大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从土地上被剥夺和驱逐出来的出卖劳动力的农民，这就是隐藏在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农业繁荣背后的社会的真实内容。

土地集中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农民被剥夺和驱逐，不是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所特有的现象，而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中经常发生的现象。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中，这种现象的出现往往是农民战争爆发的信号。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农民之被剥夺和驱逐则是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前奏曲。因为：“农民一部分被剥夺和驱逐，不仅在游离劳动者时，为工业资本‘游离’出来了他们的生活资料 and 劳动材料，它还创造了国内市场”^②。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正是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而且在这个末期的封建社会内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虽然这种萌芽由于满族统治者的侵入遭受了蹂躏，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又恢复了它的发展。问题只是在于这种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

二、农业生产

现在我们从农业生产方面来考查这个问题，首先考查当时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2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44页。

土地所有者怎样处理他们的土地，是按照传统的办法把土地用于封建剥削，还是象列宁所说的已经把他们的“土地变成商品，变成‘获取金钱的机器’”^①，即当时的土地所有者是否利用他们的土地进行商业性的农业经营，进行商品生产。关于这一点，《红楼梦》上有很好的反映。

《红楼梦》第七十九回说到“桂花夏家”，“非常的富贵。其余田地不用说，单有几十顷地种着桂花。凡这长安，那城里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亦是他家贡奉”。这里反映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当时已有大地主把自己的土地的一部分用于商业性的园艺业的经营。

《红楼梦》第五十六回说到赖大的园子，“除他们（家的女孩儿）带的花儿，吃的笋菜鱼虾，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又说探春也想把大观园包给能种园圃的老妈妈，照她的估计，大观园出产的特笋鱼虾各种花草蔬菜之类，“一年就有四百银子的利息”。这里又反映出一件更重要的事实，即当时的包买商人的活动已经侵入园艺业。这些包买商人利用那些走向没落的封建官僚地主的贫困和对银子的想望，把那些原来仅供地主老爷们玩赏的花草果木连同他们的花园都变成了商品。

《红楼梦》上所说的“桂花夏家”、赖大的园子和大观园的包租，是符合于当时事实的。很多资料证明，在当时，应该说更早一些，在靠近大城市附近的郊区已经出现了商业性的园艺业，其中有菜园、花园，在某些适宜于种植果木的地区，也有果园。

据《畿辅通志》所载，早在明天启年间，北京市郊已有专门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4页。

“以种花为业”的农户，这些农户有温室的设备，他们将牡丹在商业性的温室催开，送进封建的皇宫^①。到清代，在北京城内槐树斜街的慈仁寺，药王庙的庙会中已有花市^②，而丰台一带的村子已经变成种植花草的区域，这里每年贩到市场上出卖的芍药有一万多茎^③。不仅在北京，在扬州也有商业性的花园。据《扬州画舫录》所载，当时扬州近郊梅花岭、傍花村、堡城、小茅山、雷塘等地都有为了供给市场的鲜花而经营的花园，城内牌楼口、开明桥皆有花市^④。这些出现在花市的花草，芍药也好，玫瑰也好，它们的颜色都和从前一样，只是失去了原来的诗的意味了。

和商业性的花园同时出现的还有商业性的菜园业。根据《畿辅通志》所载，在清初北京城内城外都有以种菜为业的农户。在天坛附近有种龙须菜出卖的菜园^⑤。在郊区还有许多地窖火炕设备的菜园，他们能在冬天供给市场以韭黄、胡瓜之类的蔬菜^⑥。又据《锡金识小录》所载，当时无锡郊区的农户，“不植五谷而植园蔬”，“冬菜一熟，可抵禾稼秋成之利”^⑦。又据《粤中见

① 光绪《畿辅通志》卷七三，〈物产〉一，引《帝京景物略》：“天启间建碧霞元君庙，其北土近泉居人以种花为业，冬则薰火暖之，十月中旬牡丹已进御矣。”

② 光绪《畿辅通志》卷七三，〈物产〉一，引《六街花市》：“草本花……京师槐树斜街慈仁寺，药王庙花市恒有之。”

③ 光绪《畿辅通志》卷七三，〈物产〉一，引《析津日记》：“京师丰台芍药连畦接畛，担市者万余茎。”

④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四。

⑤ 光绪《畿辅通志》卷七三，〈物产〉一，引《析津日记》：“天坛生龙须菜，清明后鬻于市。”

⑥ 光绪《畿辅通志》卷七三，〈物产〉一，引《五京杂俎》：“京师有韭黄，盖地窖火炕中所成。”同卷引《学圃余疏》：“胡瓜出燕京者最佳，种之火室中，遍生花叶，二月初即结小实。”

⑦ 《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场圃之利〉。

闻》所载，当时的广州西郊，“土沃宜蔬，居人又善治圃，水泽蔬果之利不一而足”。他们在水田中种植茭白、荸荠，在池塘中畜鱼，并种植藕菜、莲花、茨菰和芹菜；特别是种莲的农户最多，“十家而九”。这些农户“夏卖莲花及藕，秋以莲叶为薪或卖与人”^①。从这里就可以理解《红楼梦》中所说的“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当时南京市郊也有商业性的种菜业。《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所说的王太，“他的祖代，在三牌楼卖菜的，到他父亲手里，穷了，把菜园都卖掉了”。又说到居住在清凉山背后的于老者，“率领五个儿子灌园。那园却有三百亩大……”。《儒林外史》中的三百亩大的菜园和《红楼梦》中几十顷地的桂花园，显然是文学家的夸大，但至少可以反映出当时有着进行商品生产的大规模的园艺业的存在。

商业性的果园在当时也是存在的，特别在广东，那里适宜于果木的种植。据《粤中见闻》所载，广州附近果园很多，“塘基、堤岸、园林多种荔枝龙眼。南海、平浪、三山而东一带多龙眼树。又东为番禺之李村、大石一带，多荔枝树。龙眼绿叶，荔叶稍黑，障蔽百里。顺德有以稻田种者，田每亩，荔枝可种二十本，龙眼倍之”。同书又说：“番禺鹿步都自小坑、火村至罗冈三四十里，多以花果为业……每田一亩，种柑桔四五十株……自黄村至朱村一带，则多梅、梨、橄榄、香蕉之属，连冈接阜，弥望不穷。岁之正月，广利墟卖柑桔，栽者数十百人。”又说：“海南州县皆以槟榔为业。”^②象这样以农田大规模种植果木，就说明了果园的经营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

应该承认，在很早的时代，可以说有的城市就有供应城市居

① 范端昂：《粤中见闻》卷二五，〈物部〉五。

② 范端昂：《粤中见闻》卷二九，〈物部〉九。

民的园艺业者。但在封建时期，这种供应品主要的是封建地主庄园的副产物，或者是小农的小商品生产。象上面所说的把大量的农田用于商业性的园艺业经营，那是明代中叶以后特别是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事情。这种商业性的园艺业显然带有新的性质，它指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居住在城市近郊的农户——中农、富农和一部分地主——已经逐渐屈服于金钱权力之下，卷进城市经济的体系之中去了。甚至某些破落的封建贵族，象大观园的主人们，也不得不对自己的园子加以考虑，是把园子里的花儿当作“玩意儿”呢，还是把它们换回“四百银子”？

比园艺业更为重要的商业性的农业经营，在《红楼梦》中没有反映，但这种事实在当时是存在的。商业性农业的存在，具体地表明在若干作为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或其他技术作物的种植已经不是为了自给自足，而是为了出卖。如象棉花、烟草、甘蔗、桑、茶以及芝麻等油料、靛青等染料的种植，在当时的某些地区已经排除了谷物的种植，占有一定数量的耕地面积。

棉花的种植在明朝已经相当普遍，到十八世纪上半期，在很多地区便发展成为主要的农作物，河南所产的棉花是当时棉织业原料的主要来源之一^①。在松江、太仓、通州所属各厅州县，植棉业也很发达，高晋在其《奏请海疆河棉兼种疏》中说到乾隆十四年时上述各地植棉的情形说：“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花者则有十分之七八。”^②江苏靖江县的农户也

^① 徐锡龄：《熙朝新语》卷九，引尹会一《敬陈未议疏》：“今棉花产自豫省，而商贾贩于江南。”

^② 《皇清名臣奏议》卷六一：“松江、太仓、通州地方……种（棉）花费力少而获利多……各厅州县农田计之，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花者则有十分之七八。”

是“多种棉花”。①直隶“宁津种棉者几半县”，②直隶南部的农户把种麦子的好地改种了棉花③。又据钱泳《履园丛话》所记，当时已有商人开设棉花庄④，从分散的农户手中收购棉花，运往无锡等棉织业城市出卖。显然，当时的农户植棉不是为了替自己准备衣服，而是为了出卖。

烟草的种植，最初在福建，到康熙年间逐渐普遍⑤。在某些地区，已经变成农民追求金钱的手段之一。郭起元在其《论闽省务本节用书》中说：“闽地二千余里……今则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⑥吴英在其策书中叙述乾隆四十五年广西种植烟草的情形说：“今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种植一二万株，小家亦不减二三千。”⑦岳震川在《府志食货论》中论及雍正时陕西南部某些州县的种烟情形说：“城固 清水 以北沃土腴田，尽种烟苗。”又说：“紫阳务滋烟苗，较汉中尤精，尤易售。”⑧另外的资料，又记载着在湖北的均州一州、湖南的衡州一府⑨，在河南的卢氏⑩，这些地方的农民主要的是种植烟草。此外，在直隶

① 康熙《靖江县志》卷六，《食货》。

② 光绪《畿辅通志》卷七四，《物产》二，引《河间府志》。

③ 黄可润：《畿辅见闻录》：“直隶保定以南，从前凡有好地者多种麦，今则种棉花。”

④ 《履园丛话》卷二三，“余族人有名属者，住居无锡城北门外，以数百金开棉花庄。”

⑤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三：“吕宋国有草名淡巴菝……初，漳州人自海外携来，莆田亦种之，反多于吕宋，今处处有之，不独闽矣。”

⑥⑦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户政》。

⑧ 《清代文字狱档》第五辑，《吴英摺与献策案》。

⑨ 吴熊光：《伊江笔录》，卷二：“烟草无益于人，楚省均州一州，湘省衡州一府皆种之。”

⑩ 吴熊光：《伊江笔录》卷二：“予驻卢氏，该邑在万山中，民贫利，平日多种烟叶。”

昌平、热河及辽东的某些地方也有种植烟草的^①。种植烟草也是为出卖。据岳震川的记载，当时陕西的烟草买卖每年达数十万金，汉中的烟铺在商店中占十分之三四^②。吴英也说到广西的烟铺，“大市三二十间，中市小市亦十余间”^③。

茶的种植在中国很早，而且在很早以前就被当作商品出现于市场，到这时更为发达。据《粤中见闻》所载，在广东珠江之南有三十三村，土沃人勤，多业艺茶，涉江而鬻于城市^④。这说明了当时广东的种茶叶已经是商品生产。又据乾隆《六安州志》所载，居住在安徽霍山县城附近一百里以内山区的农户都以种茶为生，从春天到夏天，这里挤满了收购茶叶的商人^⑤。此外，王庆云在其所著《熙朝纪政》中说到川茶征税，初论园、论树，到雍正八年改为计斤征税^⑥。这又说明了四川的种茶叶也很发达。

桑的种植，在中国比茶更早，但最初只是栽种在靠近居宅周围的隙地，是农民的副业。五世纪时北魏王朝虽曾给农民桑田二十亩，要农民种桑树，但这也只是为了农民的自给，特别是为了保证封建实物地租的征收。到了明朝，在湖州才出现商业性的经

① 光绪《畿辅通志》卷七二，〈物产〉一，引《昌平州志》：“先白浮山村产者（烟叶）良，后城中更甚。”同卷引《热河志》：“本名淡巴菰，土人亦称为烟，酒院旁隙地多种之。”又，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一，〈吃烟事迹〉：“今州县无不种烟……关东烟叶味厚……元胜建烟也。”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户政〉：“南郑、城固大商重载此物（烟草），历金州以抵襄、樊、鄂渚者，舳舻相接，岁糜数十万金，可谓好之僻矣”；又：“汉中……烟铺十居其三四。”

③ 《清代文字狱档》第五辑，〈吴英拦与献策案〉。

④ 《粤中见闻》卷二五，〈物部〉五。

⑤ 乾隆《六安州志》卷二三，〈艺文〉，〈霍山竹枝词序〉：“霍为六分邑……地瘠民贫，近县百里皆种茶……民惟赖茶以生，自春徂夏，商贾辐辏。”

⑥ 《熙朝纪政》卷五，〈纪茶引〉：“雍正八年定川茶征税，初论园、论树，至是乃计斤而略增其税。”

营，有些农户种桑不是为了自己养蚕，而是为出卖桑叶^①。到了清朝，商业性的种桑业继续发展，据《湖州府志》所载，湖州买卖桑叶论个（二十斤）或论担（一百斤），“市价早晚迥别，至贵每十个钱至四五缗，至贱或不值一饱”。有賒买，也有预先付钱订购的。而且桑叶买卖“有经纪主之，名青桑叶行”^②。从这里可以看出桑叶在湖州已经以商品的资格出现于市场。又陈宏谋《劝种桑树檄》，说到在乾隆十六年时陕西省也有桑叶买卖^③。

甘蔗的种植，在广东也发展成商业性的经营。据李调元《南越笔记》所载，在番禺、东莞、增城、阳春等县“蔗田几与禾田等矣”^④而且种蔗业中也有包买商人的活动，这些包买商人都是糖商，他们“春以糖本分以种蔗之农，冬而收其糖利”^⑤。

此外当时的农户还种植芝麻等油料^⑥，靛青等染料，红花、地黄等药物^⑦。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是否已经发展到商业性的经

① 朱国桢：《涌幢小品》。

② 同治《湖州府志》卷三〇，《輿地略》，《蚕桑》上，引胡志及《西吴蚕略》。

③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七，《户政》：“凡有桑树，或估价摘叶，或听民人摘叶赴局，官即酌量给以价值，俾民人知家有桑树，年年可以卖钱，路上野桑亦可摘叶卖钱。”

④ 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一四，《蔗》：“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矣。”

⑤ 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一六，《糖》：“春以糖本分与种蔗之农，冬而收其糖利……开糖房者多以是致富云。”

⑥ 《东华录》，康熙朝卷九二，康熙五十二年十月丙子谕：“今岁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获。”这里把芝麻与棉花并提，说明了芝麻的种植相当普遍。又，乾隆《广州府志》，卷四七，《物产》条，引《广州记》，谓广东农户“苧菜为油种”。

⑦ 康熙，《靖江县志》卷六，《食货》：“民间种花之外，多利蓝为染，取利甚倍，蓝有大蓝、小蓝、槐蓝之别，取靛花为青黛亦甚佳。”又，乾隆《广州府志》卷四七，《物产》条，引《广州记》，亦谓广东农种“三蓝以染缁”，又，吴熙光《伊江笔录》上编也说到广东农户种植靛草以及地黄、红花等药物。

营，还要搜集更多的资料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和商业性的农业经营平行，还有农业品的加工，如用谷物酿酒、用甘蔗制糖，用含有油质的植物榨油等等。

很多资料证明当时的酿酒业异常发达。史贻直在其奏疏中说到雍正时陕西各州县的农户多以酿酒为业，其中有些州县如“三原、泾阳、渭南、富平等县，烧锅各以千计，其余州县亦皆有之”^①。方观承在其奏疏中说到乾隆时直隶宣属十一州县有缸户五百二十一座，其他七州县有烧缸五百六十一座^②。关于酿酒的规模，据方观承说：“缸户一座，中小者数缸，多者三五十缸，每日尽烧，自一二缸至五六缸不等，需七八日轮转一次，大率一岁中二、三、八、九、十月蒸烧。”又说：“西北五省烧酒之坊，本大者分锅迭烧，每岁耗谷二三千石，本小者二三百石。烧房多者每县至百余，其余三斗五斗之谷，则比户能烧。即专计城镇之坊，大小相折，以县四十为率，每岁耗谷已千数百万石。”显然，这些拥有烧锅的缸户也就是拥有剩余谷物的地主或富农，他们之从事酿酒不是为了自给，而是为了通过对粮食的加工谋取利益^③。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他们酿酒的规模看得出来。

用甘蔗制糖，在广东是极普遍的农业品加工。据李调元《南越笔记》所载，当时广东的富裕农户每家有一个压榨甘蔗的作坊，中等的农户王家共有一个压榨甘蔗的作坊，因为转动一个榨

① 《皇清名臣奏议》卷三一，雍正十一年史贻直《筹禁烧锅疏》。

② 光绪《畿辅通志》卷一〇七，《略》六二，《经政》一四，《榷税》条，引乾隆十六年总督方观承奏疏：“宣属十一州县，现在额设缸户，共五百二十一座……延庆、蔚州、保安、宣化、怀安、赤城、怀来七州县内，烧缸五百六十一座。”

③ 光绪《畿辅通志》卷一〇七，《略》六二，《经政》一四，《榷税》条，引方观承奏疏：“一则谓骤禁烧锅，恐失业之民多，不知开烧锅者非大有资本不能具磨仓什器，屯积粟谷。此种豪民，即不开烧锅，亦可用其资本经商行贾，何患失业？”

蔗的糖铲要使用三头牛，而三头牛对于中等以下的农户来说是不能独立购买的^①。

此外，还有用茶子、菜子、芝麻、落花生、豆类、橄榄、桐子等含有油质的植物榨油^②，以及制茶焙烟等等农产物加工，关于这些，我没有收到足够的资料，不能断定它们是否已经发展到商业性的农业经营。

无疑地，园艺业和农业的商业性经营以及农产品的加工会给国内市场的形成创造条件，首先就扩大了劳动市场。因为种植经济作物，例如种植烟草、桑，都需要更多的劳动人手。据吴英策书中所叙，种植烟叶，“每万株费工人十或七八”，而当时广西种植烟草的农户，多者至两万株，则一家农户所雇佣的工人多至二十人，少亦三、二人^③。又据《粤中见闻》所记：“稻田茶丘十余亩，旁居七八村，皆衣食于茶”，又说茶叶的“采摘多妇女”^④。同采摘茶叶一样，采摘桑叶和棉花也大半是妇女。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这些商业性的农业生产中，不仅增加了雇佣工人的使用，而且把妇女也从厨灶旁边拖出来卷入劳动生产之中。其次也要增加对生产工具的需要，例如种花种菜需要温室火炕、水井等设备，酿酒需要蒸馏器具、厂房、仓库等设备，制糖、榨油都需要压榨设备，因而又扩大了生产资料的市场。此外，生产费

① 《南越笔记》卷一四，〈蔗〉：“榨（蔗）时，上衣一人一寮，中农五之，下农八之，十之，……糖铲相比若磨然……驾以三牛之牯，糖铲旋转，则蔗汁洋溢，糖在盘中，汁流槽中，然后煮炼成怡。”

② 《粤中见闻》卷二五，〈物部〉五。

③ 《清代文字狱档》第五辑，〈吴英拦与献策案〉：“今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种植一二万株，小家亦不减二三千，每万株费工人十或七八，灰粪二三百担，粪料粪水在外。”

④ 《粤中见闻》卷二五，〈物部〉五。

也要增加，如种烟草一万株需要灰粪二三百石，粪料粪水在外。由于生产费用的增加，有时超过了一个农户所能担负的程度，因而就给包买商人伸手的会，这样就推动了商业资本与农业生产的结合。至于农产品的加工，如榨油、酿酒等，虽然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也是为了出卖，但主要的是被当作地主经济的副业，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大规模生产显然是带有新的性质的商品生产。总而言之，农业经营的专门化、商业化所引起的重大结果是扩大了农产品与工艺品的交换，特别是扩大了各个农业部门和区域之间的交换，如种植经济作物区域与种植粮食区域的交换。所有这一切都表示了资本主义因素在农业经济中的萌芽正在发展。

但必须指出，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农业生产中，从事商业性农业经营的农户在当时农户总数中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最大多数的地主仍然是用祖传的租佃制方式进行封建剥削。这些地主大半住在城市，即使住在自己的庄园也不经营农业，只是靠地租的收入为生。

《红楼梦》第一回所说的甄士隐就是一个靠收地租为生的地主，他有田庄，但他不经营农业，把田地租给农民，自己却住在姑苏城内，“每日只以观花种竹、酌酒吟诗为乐”。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说：“花自芳的女人将亲戚作媒，说的是城南蒋家的，现在有房有地，又有铺面”。这个“有房有地，又有铺面”的姓蒋的，也是住在城内收租的一个地主。

至于各拥有八九个庄子的宁、荣二府的主人，他们的土地都是租给农民，交给庄头乌进孝兄弟管理，而他们自己则正象作者所指斥的，住在大观园内，“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

叔子的养小叔子”。

象《红楼梦》中所说到的这些居住在城市以收地租为生的地主，在当时是很多的。赵锡孝在其所著《徭役议》中曾说到这种现象，他说，“江南烟户业田多，而聚居城郭者什之四五。”^①另外的一些资料也说明当时大多数地主还是把土地用于封建剥削。康熙四十九年上谕中曾经说到“山东、江南田亩，多令佃户耕种”^②。山东是沿海省份，江南是商业资本比较发达的地方，尚且如此，其他比较偏僻的地方更是如此。特别是在八旗圈地区域，封建佃租制几乎是普遍的现象。孙嘉淦在其论八旗公产奏疏中说：“我朝定鼎之初，虽将民地圈给旗人，但仍系民人输租自种，民人自种其地，旗人坐收其租，随手花去，则又探取次年之租矣，至于次年无租可索，则以佃户抗租为词矣。”^③这些资料表明了封建的租佃制在农业生产中还是占支配的地位。

固然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并不排除土地租佃，有许多资本家自己没有土地，为了进行商业性的农业经营，他们必须向土地所有者租进土地。但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商品生产，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地租形态是货币地租，在货币地租制之下，土地所有者与租佃者之间的关系只有货币与货币的关系，没有人与人的隶属关系。

资料证明，和资本主义的土地租佃不同，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力佃人田”的都不是资本家而是“无田可耕”的农民，他们佃租土地的目的不是为了进行商品生产，而是为了活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三，〈户政〉。

② 《东华录》，康熙朝卷八六，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辛卯谕。

③ 《孙文定公奏疏》卷四，〈八旗公产〉。

命。虽然当时在某些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已经有了货币地租，但作为支配形态的地租还是实物地租。《儒林外史》第九回曾经说到长江下游有一条河里，“各家运租米的船拥挤不开”，正反映了实物地租在当时工商业发达区域的江南还是普遍流行。另外的资料又表明当时的实物地租还流行着对分制。康熙四十六年的上谕中说：“小民有田者少，佃户居多，半年则纳粮之外，与佃户量其所入分之。一遇岁歉，则佃户竟无策可施矣。”^①对于耕种官田的农民，也有四六分的。乾隆十年御史胡蛟龄在其《推广辟荒疏》中建议将陕西榆林、延安二府的官田“招民承种，照安西哈密佃种官田官四民六分收之例，变通酌筹”^②。显然，对分制或四六分制虽然也是实物地租，但实质上是农民为了获得土地使用权必须用一半或十分之四的时间，吃自己的饭无偿地为地主耕种土地。

实物地租，尤其是采取对分制形式的实物地租，是封建地租，是一种使农民倾底破产并把他们变为雇农的一种地租，而且也只有那些已经不能抵抗自身变为农业雇佣工人的贫农才能接受这种佃租制。

章谦在其所著《备荒通论》中曾说到在对分制下生活的佃农的情况云：“一亩之田，耒耜有费，籽种有费，耨斛有费，雇募有费，祈赛有费，牛力有费，约而计之，率需钱千。一亩而需千钱，上农耕田二十亩，则口食之外，耗于田者二十千。以中年约之，一亩得米二石，还田主租息一石，是所存者仅二十石。当其春耕急需之时，米价必贵，势不得不贷之有力之家。而富人好

① 《东华录》，康熙朝卷八〇，康熙四十六年七月戊寅谕。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四，《户政》。

利，挟其至急之情，以邀其加四加五之息，以八阅月计之，率以二石偿一石。所存之二十石，在秋时必贱卖，富人乘贱而索之，其得以暖不号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岁者，十室之中无二三焉。”^①象这样在强烈的封建剥削和高利盘剥之下的佃农，他们自然说不上任何规模的商品生产。

实物地租一般是以谷物支付，而且是建筑在契约关系之上的，但封建社会的租佃契约，对于地主来说，是取得地租和保证劳动入手的法律根据，而对于佃农来说，则是贫困影响下的协定，所以它并不完全排除封建义务。《红楼梦》第五十三回载贾珍的庄头乌进孝给贾珍的一张地租单子，在这单子上除了粮食及卖粮食牲品的银子以外，尚有无数贡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单子上面写着：

“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鲟鳇鱼二百个。各色杂鱼二百斤。活鸡、鸭、鹅、各二百只。风鸡、鸭、鹅二百只。野鸡、野猫各二百对。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蛎干二十斤。榛、松、桃、杏瓢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对。干虾二百斤。银霜炭上等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万斤。御田胭脂米二担。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杂色梁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担。各色干菜一车。外卖梁谷牲口各项，折银二千五百两。外门下孝敬哥儿玩意儿：活鹿两对，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户政》。

鸡两对，西洋鸭两对。”

从这个单子上所开列的项目看来，贾珍从他的庄头所收到的地租，除了二千五百两银子以外都是实物。因此问题就在这二千五百两银子。邓拓同志在其所著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中曾说到这二千五百两银子的问题，他认为这是货币地租的表现。我不同意邓拓同志的解释，因为在单子上明明写着这二千五百两是卖梁谷牲口得来的，这就说明了佃户交给庄头的不是银子而是梁谷牲口，至于庄头把梁谷牲口卖出换成银子，那是执行主人的命令，等于主人自己卖出，不能说是货币地租。如果是货币地租，就不能在交纳的定额货币之外再送上比货币更多的实物。因此，我以为这个单子所表现的是实物地租，而且是带有浓厚封建义务的实物地租，因为从这个单子上我们可以看出贾珍的佃户除了缴纳一定量的谷物以外，还有义务供给地主老爷们所需要的柴炭，大量的猪、羊、鸡、鸭、鹅、鱼、干菜、干果以及山珍、海味，乃至孝敬地主哥儿的玩意儿，这在货币地租中是没有的。

象《红楼梦》上所说的这种带有封建义务的实物地租，《儒林外史》上也反映这样的情况。《儒林外史》第十一回说到邹吉甫和他的儿子去看他的主人娄三公子时也是拿着两个布口袋“装了许多炒米，豆腐干”作为献礼。虽然炒米和豆腐干的价值不大，但同样是佃租关系中的封建义务的残余的表现形式。

雇佣劳动制度在当时的某些地区和某些农业生产部分中已经相当流行，但就全国范围来说，人格依赖以及因此而生产的奴役，基本上还没有被摧毁，特别在八旗庄田区域内，人格依赖和奴役还是相当严重。在这里许多农民“或地已被圈，无处栖身，

乃投充以种地，或地尚未圈，恐被霸占，因投充以保家”^①，投身之后，“一家老幼尽为人奴”^②。八旗地主及其代理人可以任意奴役他们，如派他们砍柴、喂马而不给以任何代价，甚至对这些农民的妻女也可以任意奸淫霸占^③。显然，这些投充八旗地主的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奴主的关系。

不仅八旗庄田区域如此，其他各地也存在着人格依赖和奴役的关系。赵锡孝《徭役议》中说到康熙时苏州有些农民，为了逃避不能负荷的差役，把自己的田地献给地主而为其佃户，以此取得地主的“保护”^④。在这种情形之下，农民对于地主自然有人格依赖的关系。象这样带着自己的田产去向当权的地主卖身投靠的农民，《儒林外史》上也有这种反映。《儒林外史》第三回说到范进中了举人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

除了地主的奴役以外，还有来自地主阶级政府的奴役。王鸣雷《民夫记》描写康熙时福建农民被奴役的情形，简直类似奴隶的待遇，这些农民被抓到船上服役，他们在服役的期间，不但没有任何报酬，连饭也不供给，自己随身背着粮米、干柴和简单的炊具，并且“锁颈赭衣”象犯罪一样押解到工作场所，在工作中

① 《孙文定公奏疏》卷六，《复王岐编入内府疏》。

② 《孙文定公奏疏》卷六，《请撤会审疏》。

③ 《于成龙抚直杂稿》，《奏疏》，《旗纛层官》：“张应秋者，卖身旗下，恣肆无忌，奸淫冯氏而并及有夫之幼女……勒诈银两，或硬派柴草，或隐占地亩，纷纷诈害，以致穷民典身鬻女，填偿褊腹。”

④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三，《户政》：“长老传言：康熙十三年前，均田之法未奉旨通行，差徭偏重，乡民以役敬家者接踵，小户附于大户，求为代役。”

又经常遭受鞭打①。

还应该提到，一直到十八世纪上半期，在中国各地尚残存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贱民”，如山西的乐户，浙江的情民，徽州的伴僮，宁国的世仆，常熟、昭文的丐户，这些无权力的“贱民”和当地地主家族的关系是世袭的奴主关系。当地地主不但可以随便役使他们，并且可以随便加以捶楚。这些“贱民”，一直到雍正年间才以诏令宣布解除了他们的“贱民”的身分。当然，这些残余的贱民之被解除世袭奴仆的身分，也说明了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已经没有容纳他们的余地了②。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人格依赖和奴役在一定程度内还是存在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现在我们对于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农业生产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第一，在当时农业生产关系中出现了土地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大土地占有者，另一方面是农民无产者。第二，已经有一部分土地所有者把土地变成商品，从封建的佃租制转向商业性的农业经营。与此相关联，一部分的农民无产者也从封建佃租制的奴主关系中解放出来，转化为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农业雇佣劳动者，而另一部分农业无产者，在某些地区内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三，《户政》，王鸣雷《民夫记》：“吏叱官差，官差唤班头，班头唤花户，夫两阶立，鱼贯而入，入右出左，班头押至。顿颈赭衣若囚系，其或隆冬，促缘不掩其长形，肘竹筒小篋，所载饭食之具，薪柴一小束，瓦甌熏汗，凡背系薄苇席，俱截草绳缚之，腰夹横数尺粗布，裹八升之黑豆，神官佛寺，坐无空地，宿败絮展石，伸脚侧足出，拳卷则背露，至操泔粪纒弄潮，日行尽夜，辄五百里不得休息，如以少缓，则丁壮数以百鞭……其逃去死亡，于回也不得半。”

② 《东华录》，雍正朝卷一〇，雍正五年四月癸丑谕：“山西之乐户、浙江之情民，皆除其贱籍……江南徽州府则有伴僮，宁国府则有世仆……应予开豁为良。”又，同书卷一六，雍正八年五月丙戌“户部议准江苏，巡抚尹继善奏：苏州府属之常熟、昭文二县旧有丐户……请照乐籍、情民之例，除其丐籍……从之。”

突破了封建的地方闭关性走向城市或边疆，参加工匠队伍或寻找新的自由土地。第三，由于农业经营的商业化、专门化，扩大了商品交换的关系，替国内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第四，适应于商业性的农业经营，实物地租正在向货币地租过渡，有些地方出现了货币地租。这一切说明了当时的农业生产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在另一方面，封建佃租制依然普遍存在，实物地租还是支配的地租形态，在地主农民之间封建的义务乃至人格依赖和奴役，以及地方的闭关性与生产的极端分散性，在很多地区还没有被摧毁，这一切又说明了古旧的传统的东西还是继续压在农民的身上。因此，我以为在当时农业生产中，资本主义因素只是萌芽，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封建地主经济。

三、手工业生产

和商业性的农业经营的出现平行，在手工业方面，也出现了手工业工场。在手工业中最突出发展的是纺织业，特别是丝织业。

大家都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家庭和当时的丝织业是有密切关系的，从他的曾祖一直到他的父亲世代代都被任为管理江宁官营丝织厂的官员。

但是《红楼梦》的作者没有提到丝织业，如果说《红楼梦》中也说到与纺织有关的事，那就是在第十五回中曾经说到在往铁槛寺的路途中的一家农民的茅屋里“炕上有个纺车儿”。当然，这个“纺车儿”也反映出—个事实，即当时北京附近的农民已经把纺棉花作为他们的副业。资料证明这种反映是符合当时事实

的。《畿辅通志》说到当时宁河县农民，家家都有纺棉花的纺车，他们“聚家之老幼，姑率其妇，母督其女，篝灯相对，星月横斜，犹轧轧纺车声达户外也”^①。

应该指出，当时棉织业发达的地方不是北方，而是长江下游的无锡、苏州、松江等地。徐锡龄《熙朝新语》引尹会一《敬陈宋议疏》中云：“查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庶，而贫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资者不在丝而在布。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这段资料说明了苏、松两郡贫民的主要生活来源是依靠纺织棉花，特别是妇女，包括未成年的儿童在内，人人都从事棉花的纺织。而崑山、新阳两县则“布缕织机之事，男子亦素习焉。”^②

关于无锡的棉织业，《锡金识小录》有如下的记述：“常郡五邑，惟五邑不种草棉，而棉布之利独盛于吾邑，为他邑所莫及。乡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及秋稍有雨泽，则机杼声又遍村落，抱布贸米以食矣。故吾邑虽遇凶年，苟他处棉花成熟，则乡民不致大困。布有三等……曰长头……曰短头，皆以换花……曰放长，则以易米及钱。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尝有徽人言汉口为船马头，镇江为银马头，无锡为布马头，言虽鄙俗，当不妄也。坐贾之开花布行者，不数年即可致富。”^③这段资料说明了常郡五邑机杼遍于村落，但纺织棉花的都是“家无余粒”的农户于农隙进行，从事纺织者都是家庭

① 《畿辅通志》卷七一，〈风俗〉，引《宁河县志》。

② 道光《崑新两县志》卷一，〈风俗占候〉。

③ 《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力作之利〉。

成员，而其目的则是“以布易米”，补充生活。

关于苏州的棉织业，乾隆《元和县志》有如次的记述：“苏布名称四方，习是业者阊门外上、下塘居多，谓之字号。自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字号长数十家赖以举火，惟富人乃能办此。”^①这段资料说明早在当时棉织业的中心区域之一的苏州已经有包买商人开设字号，从数十家织户收购棉布，并对棉布进行漂染等加工工作。

根据我所收集的这些资料，对于当时的棉织业只能作这样的概括：一，棉织业还是停止在家庭手工业的阶段，没有发展到工场手工业。二，参加生产的主要是家庭成员，很少使用雇佣工人。三，已有包买商人开设字号组织大规模收购和贩卖，每年贸易额达数千百万。四，字号不仅组织收购和贩卖，并兼营棉布的加工，如漂布、染布等。

关于棉织业的规模问题，最近吴晗同志在其所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文中曾经提到^②。在这篇论文中，吴晗同志引据明初人徐一夔所著《始丰稿》中《织工对》一文所载钱塘相安里的织户的资料^③，证明早在明初，“在同一里巷，有若干同一性质的大作坊，大作坊主人同时也是棉布商人”。我不同意吴晗同志对《织工对》中的资料的解释，因为资料说到作坊主人时，只说他“居工以织”，没有说他织的是棉布，更没有说他“同时

① 乾隆《元和县志》卷十，《风俗》。

② 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③ 徐一夔：《始丰稿》卷一，《织工对》：“余僦居钱塘之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二鼓，一唱众和，其声欢然，盖织工也。余叹曰：‘乐哉！’且过其处，见老屋将压，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数人，手挽足蹴，皆仓然无神色。”

也是棉布商人”。因此，明代的棉织业是否已经发展到大作坊或工场手工业的规模，至少不能从《织工对》中的资料得到证明。关于这段资料的解释，如果允许推测的话，我同意尚钺同志的看法，即相安里的织户不是棉织业作坊而是丝织业作坊^①。因为当时的杭州不是棉织业的中心而是丝织业的中心。

大家都知道，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纺织业中占重要地位的并不是棉织业而是丝织业，根据资料的记载，当时江宁、杭州、苏州都有官营丝织厂。

关于江宁丝织局，苏州织造李煦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康熙四十七年六月《令陈织造事宜折》中曾说到这个丝织局，当时有神帛、官造两个机房，共有工匠约计三百七十人，这些工匠都是从“民间各户雇觅应工”，“工价甚寡”，“岁需银二千七百两，即可贍活群工”，至于这个丝织厂当时有多少织机，在奏折中仅有如次的叙述：“原议照局设制帛、线罗机三十三张”，“设造命机三十五张。”^②

关于杭州丝织局，工部左侍郎佟国胤等在顺治四年的揭帖中曾经说到。据说这个丝织局，当时有“织内造者食官机三百张，民机一百六十余张，挑花匠一十四名”。又说：“旧例杭、嘉、湖、金、衢、严、温、台、宁、绍十府俱在省城会织，各住私家织染，并无一局，俱系民户。”^③

关于苏州丝织局，苏州织造督陈有明在顺治五年的揭帖中曾经说到。揭帖中只说这个织局除了机房以外，有染作、绣匠。不

^① 尚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② 《文献丛编》第三十二辑，第4—6页。

^③ 《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第286页。

及其他^①。但《苏州府志》所录陈有明建织造总局记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今得总织局前后二所，大门三间，验缎所三间，机房一百九十六间，铺机四百五十张，绣缎房五间，局神祠七间，染作坊五间。”^②

到乾隆初年，这三个织局都有很大的发展。据《大清会典事例》所载：“乾隆十年奏准，江宁现设机六百张，机匠一千七百八十名。苏州现设机六百六十三张，机匠一千九百三十二名。杭州现设机六百张，机匠一千八百名。外江宁现留摇纺、染匠所管高手等匠七百七十七名，苏州挑花、捺绣所管高手等匠二百四十三名，杭州摇纺、染匠、挑花及所管高手等匠五百三十名。”^③

从以上的资料可以看出：第一，当时的官营纺织厂有织机六百张乃至六百多张，其中包括各种类型的织机；而且还控制了若干民间机房。第二，每一织局有将近两千名的工匠，其中又有各高手匠二百多人以至七百多人。第三，工匠有各种专门化的分工，如摇纺、染匠、挑花、捺绣等等。第四，工匠都是从民间机户雇来的，工资很低，是用银子计算的。从这些官营丝织厂的织机和工人的数目，特别是雇佣劳动和货币工资等等看来，都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必须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商品生产，即为了卖出而生产；而当时的官营丝织厂，则是为了供应皇家的消费而生产。因此，它们还是带有封建的性质。

比官营丝织厂更重要的是民间丝织厂，当时江宁、杭州、湖州这三个丝织业中心都有为数甚多的丝织业机房，其中有些并已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第295页。

② 乾隆《苏州府志》卷二一，《公署》。

③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九〇，《内务府库藏织造》。

发展到工场手工业的规模。根据《上江两县志》上的记载，江宁“在乾、嘉间机以三万余计，其后稍稍零落，然犹万七八千”^①。又据续纂《江宁府志》补遗所载：“江宁机房昔有限制，机厂不得逾百张，张纳税五十金。织造批准，注册给文凭然后敢织。”康熙年间，机户向曹寅“公呀”请奏免限制，“得旨永免”，“自此有力者畅所欲为，至道光间，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当时“缎机以三万计，纱绸绒绫不在此数”^②。

据《白下琐言》所记当时江宁的机户是分散在几个区域：在军事巷附近，机杼之声比户相闻^③；在骠骑营一带的“小街曲巷”之中，“机户最多，三五成邻”^④；在聚宝门内东西偏，“业此者不下数千家”，而另一种织翦绒的机户则聚居在孝陵卫一带^⑤。这就说明当时江宁的机户是很多的。又据《凤麓小志》所载，“织缎之机，名目百余”，其中最精巧的织机，“其经有万七千头者”^⑥。这些资料说明了当时江宁的机户不仅拥有很多织机，也说明了当时织机的种类甚为复杂精巧。

乾隆《元和县志》记苏州丝织业云：“在东城比户皆织，不啻万家。”^⑦

厉鹗《东城杂记》记杭州的丝织业云：“杭东城机杼之声，

① 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七，〈食货〉“乾、嘉间机以三万余计，其后稍稍零落，然犹万七八千。北趋京师，东并高句骊、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湖淮、泗、道汝、洛。”

② 续纂《江宁府志》卷十五，〈拾补〉。

③ 甘熙《白下琐言》卷二。

④ 甘熙《白下琐言》卷四。

⑤ 甘熙《白下琐言》卷八。

⑥ 陈作霖：《凤麓小志》卷三，〈记机业〉。

⑦ 乾隆《元和县志》卷十六，〈物产工作之属〉。

比户相闻。”^①

乾隆《湖州府志》所记湖州的丝织业云：“隆、万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变百出，……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②又同治《湖州府志》引《双林志》云：“湖州元时有绢庄十座……取绢者曰绢主，售绢者曰机户。”又说：“染有灶、有场、有架，名皂坊……又有一种胶坊。”^③此外在山西潞安有绀机三百张^④，在四川成都有“业杼机者数百家，谓之机房”^⑤。

这些资料说明了当时民间的丝织业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江宁的织机在三万以上，苏州的机户将近万家，杭州的机户比户相闻，湖州的机户“相沿比业”，潞安的织机也还有三百张，成都的机户有几百家。由于丝织业的发展，还刺激了与丝织业有关的其他手工业如皂坊、胶坊的发展，出现了组织大量收购和贩卖丝织品的绢庄。更重要的是有些机户已经拥有五六百张织机，如果每机一人，一个机户雇佣的工人也有几百。这种情形，就正象马克思所说的：“较多数劳动者在同时，在同地（或在同一工作场所），在同一资本家的命令下，生产同种商品，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⑥

自然，并不是每一民间机户都有几百张织机，大多数的民间机户还是小作坊或独立手工业者，他们也许只有一两张织机靠少

① 厉鹗：《东城杂记》卷下，〈织成十景图〉。

② 乾隆《湖州府志》卷四一，〈物产〉。（疑“相沿比业”的“比”字有误）

③ 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与地略〉，〈物产〉下。

④ 乾隆《潞安府志》卷八，〈物产〉，〈货属〉。

⑤ 民国《华阳县志》卷三四，〈物产〉：“旧志云：‘明季兵燹后，锦房尽毁……按县治东南城内业杼织者数百家，谓之机房’。”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84页。

数工匠或家庭成员进行生产。虽然有些小机户已被大机户或包买商组织起来，进行同一种商品生产，但究竟没有被集中在同一工作场所，在同一资本家命令之下进行生产。

资料又证明早在明中叶以来织工和机户主人的关系就是建筑在契约关系之上的雇佣关系，清初更是如此。乾隆《元和县志》有如下的记载：“东城之民多习机业，机户名隶官籍，佣工之人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又有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粥后使散。”^①在同书还有一条类似的记载：织作“工匠各有专能，计日受值，匠或无主，黎明林立以候，相呼日唤我”^②。又据《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织工部》的记事中所载，当时“每桥有行头分遣，今制造府禁革，以其左右为利也”。据此，又知过去封建行头对织工的剥削到清初已由官府予以禁革。

另外的资料又证明，在当时除了“计日受值”的专业织工以外，还有许多贫穷的家庭妇女以计件受值的待遇为机户进行络丝工作。《凤麓小志》云：“经既染，分散络工。络工，贫女也，日络三四窠，得钱易米，可供一日食，于佣力之中寓恤贫之意焉。”^③

以上的资料不仅说明了计日受值的雇佣劳动制度在当时的织工中已经普遍流行，说明了织工已经有专门化的分工，又说明了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的市场。

但是必须指出，除了技术的专门化分工以外，还存在着技术的地方性分工。据《江宁府志》所载，“摇经者皆北乡人”，“染元色

① 乾隆《元和县志》卷十，《风俗》。

② 乾隆《元和县志》卷十六，《物产工作之属》。

③ 《凤麓小志》卷三，《记机业》。

以溧水人为佳，禄口人次之”，“天青染坊高淳人居多，溧水次之”。又同一织工也有地方的劳工，同上书云：“元缎织工头号必须江宁镇人……次则秣陵、陶吴，再次禄口殷巷南乡，以外皆不如也”，“天青则城内人为佳，”锡缎“以北乡迈皋桥人织最善”^①。以上资料又说明了手工业技术的封建闭关性还没有完全被打破。

资料又指出，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丝织业是采取控制乃至摧毁的政策。虽然在乾隆时已经取消了对江宁机户添置织机的限制，但据《潞安府志》所载，当时政府对潞安机户的摧残竟至迫使潞安机户焚毁自己的织机来表示他们对于政府的抗议^②。

在十八世纪上半期，采矿业也在明代的基础上发达起来，当时的采矿业几乎在全国各地展开，金银铜铁锡铅等主要金属以及煤、硫磺、水银等矿都在开采^③。

① 续纂《江宁府志》卷十五，《拾补》。

② 山西潞安府也是一个丝织业中心，据《潞安府志》所载，在明代有机户千家，织机九千余张，到明末还有轴机三千左右，但至清初，“止存三百有奇”，当地并不产丝，原料多从别处运来，其所以有这样多的织机，完全是为了挂牌当差，贡奉宫廷。由于工料上涨，产品又不能增价，加以差官差役的敲诈，以致机户不断破产，然而清朝政府依然要求“以三百张之机，抵九千之役。”因此到了顺治十七年，便发生了“潞安织轴机户焚机罢市”的事件。

③ 中国的采矿业在明代已很发达，到了清初，仍然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发展着。依据《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征榷考》、《清朝通典》、《食货典》及其他文献所载，顺治年间，山东临朐、招远的银矿已在开采。到康、雍时，开采的矿产已有湖南靖州、广西临桂、云南永北厅和开化府的金砂，云南楚雄、南安、广西贺县的银矿，云南昆阳的铜矿，浙江富阳等县的铜铅，四川邛州，蒲江等县的铁矿，以及贵州开州的水银等。乾隆年间是清代采矿业的繁荣时代，当时开采的矿产有湖南会同、宣章、靖州、广西临桂、贵州天柱、云南中甸等州县的金矿，广西贺县、贵州威宁州以及云南许多州县的银铅，湖南沅陵、辰溪、永顺、桑植、绥宁等县的铜矿，湖南长宁、郴、桂、陕西华阴、云南通海等县的黑铅，广西融县、云南弥勒州等地的白铅，以及贵州青平的铅矿，湖南邵阳、武冈、慈利、安化、永定等州县、浙江云和、松阳、遂昌、青田、永嘉、平阳等县的铁矿，蒙自的锡矿，还有奉天北西湖一带的煤矿以及甘肃骊狐泉的硫磺矿。

当时采矿业的中心区域在西南各省，特别是云南。根据若干资料的记载，当时云南报开的金矿有三厂，银矿有五厂，铁矿十四厂^①，而铜矿最为发达。从康熙四十四年到嘉庆十一年（1705—1806年）全省共报开铜厂有一百四十四厂。除封闭者外，康熙朝经常有十七八个厂在开采。雍正二年至乾隆八年（1724—1743年）经常有二十余厂在开采。乾隆九年以后，经常有三十以至四十余厂在开采^②。这些数字说明了当时的云南有着繁盛的采矿业，特别是采铜业。

和丝织厂一样，当时的矿厂有民营也有官营。康熙五十二年大学士、九卿等遵旨议复：“开矿一事，除云南督抚雇本地人开矿及商人王纲明等于湖广、山西地方各雇本地人开矿不议外，他省所有之矿向未经开采者仍严行禁止。”^③又乾隆九年副都御史陈弘谋《请开山林之利疏》中亦云：“云、贵各省矿厂甚多，近者广东亦复开矿，而各省矿厂大半皆江西之人。”^④这些资料说明了当时的政府对于开矿基本上是禁止的，但已开的矿厂则允许继续开采，而其条件则是矿工须雇用本地人。同时也说明了当时除政府的投资以外，已经有一部分商业资本与采矿业结合转化为工业资本。矿工是雇佣劳动者。

有些矿厂的规模已经很大。据《续云南通志》所载：“从前（云南）大厂动辄数十万人，小厂亦不下数万，非独本省穷民，

① 新纂《云南通志》卷一四五，《矿业考》，《铁矿》：“在清代见于旧志号称有额课之铁厂有十四厂。”

② 《云南通志》卷七四、七五，《食货志》八之二、三，《铜厂》。

③ 《东华录》，康熙朝卷九一，康熙五十二年五月。

④ 《皇清名臣奏议》卷三九。

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求活”^①，不仅云南如此，其他省分也有上万的人在同一矿区开矿。康熙五十二年上谕中说到“蜀省一碗水地方聚集万余人开矿，随逐随聚”^②。雍正十二年鄂弥达在其《请粤东开铸疏》中也说到广东“煤山木石开窖亦多，佣工者不下数万人”^③。这些资料不但说明了当时已经出现了拥有矿工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的大矿厂（可能是矿区），并且也说明了当时川、湖、两粤的农民无产者已经突破了封建政府的封锁命令，从遥远的地区向矿区移徙。在相反的方面，又说明了那些偏僻的落后的几乎被历史遗忘了的深山穷谷这时已经卷入了社会经济的体系之中去了。

除大矿厂以外，还有很多小矿厂。据乾隆《蒙自县志》所载，这种小矿厂大抵是本地地主商人或富裕农户共同凑出米粮作为资本，而作为资本的米粮不过十石或二十石^④。

在这种小矿中，采矿工人和厂主的关系也是雇佣关系，但支付工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按月发给工资；另一种则是按规定的比例分得矿砂。关于分配矿砂的比例，乾隆《蒙自县志》有如次的记载：“品矿数目，每十桶，镶头一分，弟兄四分，锅头五分。锅头又于五分之一内按米均分。”^⑤后一种形式即产品对分制，显然是带有劳役性质的工资。

此外，还有一种把采矿当作农业的副业的。《清朝文献通

① 王文韶：《续云南通志》卷四五，〈厂员〉，引光绪八年云贵总督岑毓英、云南巡抚杜瑞联奏稿。

② 《东华录》，康熙朝卷九一，康熙五十二年五月庚辰谕。

③ 《皇清名臣奏议》卷三二。

④ 乾隆《蒙自县志》卷三，〈厂务〉：“开一硐口，有十石米分做者，有二十石米分做者。”

⑤ 乾隆《蒙自县志》卷三，〈厂务〉。

考》《征榷考》说：“湖南之邵阳、武冈、慈利、安化、永定等州县铁矿，俱系各该居民农隙自创，以供农器，间有产铁旺盛之芷江县，挑往邻邑售卖。”

最后还应该提到在当时不论大小矿厂，采矿技术都很原始。采矿的工具只有一槌一凿^①，照明、通风、排水都是用极其古旧的方法。这些就使得当时采矿业不可能在基本上引起质的变革。

和采矿业有密切关系的是冶金业。当时金银铜铁锡各种金属都有冶炼厂。据乾隆《蒙自县志》所载，云南的“个旧原有银炉七座，锡炉十三座，龙树脚也有银炉三十二座”^②。此外还有很多的炼铜炉。又据《清朝通典》《食货典》所载，四川黄铁山有铁炉五十四座，福建延平府属州县也有炉户。《清朝续文献通考》亦载，四川洪雅县有铁炉二座，江西长宁县添设铁炉四座。雍正十二年鄂弥达《请粤东开铸疏》中也说到粤省铁炉不下五六十座^③。此外，《宜兴县志》谓宜兴县业冶铁者在张渚、簏里诸市^④。《潞安府志》谓潞安有炼铁炉^⑤。《坚瓠广集》谓遵化有铁冶厂^⑥。这些资料说明了当时冶金业的发展。

据李调元《南越笔记》所载，当时的冶铁炉每炉每天可出铁十二版，每版重十钧，每钧三十斤，十二钧重三百六十斤。多者出铁二十四版^⑦。

① 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57页。

② 乾隆《蒙自县志》卷三，《厂务》。

③ 《皇清名臣奏议》卷三二。

④ 嘉庆重刊《宜兴县旧志》卷一，《风俗》。

⑤ 乾隆《潞安府志》卷八，《物产》，《货属》。

⑥ 褚人获：《坚瓠广集》卷一。

⑦ 《南越笔记》卷五，《铁》：“凝铁一版……凡十二时，一时须出一版，重可十钧；一时而出二版，是曰双钧。”

同书又云：“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八有版则缩。”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一个炉场的资本“不止万金”，使用的工人将近一千人，运输柴炭的工人尚不计算在内。每天的冶铁量多至七百多斤。象这样大的冶铁厂，当然可以称为工场手工业。

和采矿业一样，当时的冶铁技术也是十分幼稚，李调元《南越笔记》曾说到当时的冶铁炉，虽然下铁矿时是“以机车从山上飞掷”，但鼓风仍用人力，燃料仍用木炭，有时还相信迷信如“人祭”之类可以增加产量。

和冶铁业有密切关系的是制铁业。当时制铁业的中心是佛山镇。据道光《佛山忠义乡志》所载，佛山在明熹宗天启年间，冶铁工匠已分为七行，而且早在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及六年（一六二六年）已先后发生过两次冶铁工匠的暴动^①。到十八世纪上半期，这里的冶铁业更加发展，当时已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②。

佛山的炉户主要的生产品是铁锅。《南越笔记》说：“佛山俗善鼓铸，其为镬……以五为一连，曰五口；三为一连，曰三口。”^③

佛山所铸的铁锅在当时已经成为广州出口货物中的主要商品之一。据雍正九年广东布政使杨永斌《禁铁锅出洋疏》中所载：

^①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六，《乡事》：“天启二年……炒铸七行工匠纠众狂噪……”，又：“六年……耳锅匠并锯柴工与诸炉户哄争，毁陈达逢房屋。”

^②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乡俗气候》。

^③ 《南越笔记》卷五，《铁》。

“雍正七八年造报彝船出口册内，每船所卖铁锅少者自一百连至二三百连不等，多者卖至五百连，并有至一千连。查铁锅一连，大者一个；小者五六个不等，每连约重二十斤不等，百连约重二千余斤。如一船带至五百连，约重一万斤，带至千连，约重二万斤。”^①由此可知铁锅的生产量很大。

除铸铁锅以外，佛山镇的铁匠还能把铁拉成很细的铁丝。《佛山忠义乡志》引洗沂《佛山赋》注文云：“铁线铁锅，乡多仰食于此。”又云：“铁线亦乡土产，有大缆、二缆、上绣、中绣、花丝。”^②但资料又指出，就是佛山镇这样制铁业的中心，炒铁的技术还是很古旧。《南越笔记》对于当时佛山镇的炒铁之法有如次的记述：“其炒铁则以生铁团之入炉，火烧透红，乃出置砧上，一人钳之，二三人锤之，旁十余童子扇之。童子必歌唱不辍，然后可炼熟而为爨也。”^③象这样的炒铁方法，简直使我们找不出与明代或者更早的时候有什么分别。

制盐业在四川盐井区域，也发展成为手工业工场。在十八世纪上半期，四川有多少盐井，不得而知。据王守基《盐法议略》所载，在同治年间，四川已有盐井八千八百三十二眼，煮盐的锅五千三百六十九口。不论是供给盐卤的井户或置锅煎盐的锅户，都需要很大的资本。因为井之深者数百余丈，浅亦数十丈，“辟一井之工以数年计，费以数万计，非强有力者弗能为”，而煎锅一口亦“须本数百金”^④。由此可知当时四川制盐中蓄积了巨额的资本。

四川制盐厂不仅数量很多，需要的设备费很大，规模也很

① 乾隆《广州府志》卷首。

②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一一，《艺文》下，洗沂《佛山赋》注。

③ 《南越笔记》卷五，《铁》。

④ 王守基：《盐法议略》卷二，《四川》。

大。据严如煜《论川盐》一文中说：“（四川）州县著名产盐者二十余处……大盐厂如犍、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即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以万计。灶户煮盐，煤户柴行供并用，商行引张，小行贩肩挑贸易，或出资本取利，或自食其力，各营生计，无所谓事端也。”^①这些资料说明了当时四川某些大的制盐厂已经拥有雇佣工人数万以至数十万，而且还出现了以供给制盐厂的燃料为专业的煤户和柴行。

另外的资料又说明四川的制盐厂内部已有各种各样的分工。关于这一点，温瑞柏《盐井记》中有如次的记述：四川盐井“其人有司井、司牛、司车、司篾、司榔、司漕、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②。

象这样拥有巨额资金、数万以至数十万工人，而且还有相当专门化的分工的制盐厂，当然已经具备了工场手工业的规模。

但是必须指出，不是当时所有的制盐业都是如此，云南的制盐业的规模就很小。《广阳杂记》曾说到云南的盐井，和四川的盐井不同，“井皆在万山中最下处溪河之中，咸水冲突而起”^③。因而不需要投下巨额的资金开凿盐井，也不需要从盐井中吸取盐卤的设备费，所以这里的灶户数千家都是小规模经营。

至于沿海各省的制盐业，虽然在盐的生产中占主要的地位，参加制盐的人数也很多，例如浙江在四百多万户人口中，制盐的灶丁就将近二十万^④，但制盐业的规模都很小，据朱轼《请定盐

①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五〇，《户政》。

③ 刘继庄：《广阳杂记》卷一。

④ 《皇朝经世文编》卷五〇，《户政》，吕星垣《盐法议》：“两浙盐志，人口四百六十七万四千二百七十二，灶丁十九万七千六百十四。”

法疏》中说：“凡灶户资本多称贷于商人，至卖盐给价则权衡子母，加倍扣除。又勒令短价，灶户获利无多。”^①从这里可以看出沿海的灶户并没有发展到工场手工业的规模，他们大半都是商人的债务者，但是也可以看出商业资本的活动已经渗入了沿海一带的制盐业中。

在沿海一带的灶户中，还有一类更小的灶户，他们不是专门从事于制盐，而是把制盐当作农业的副业。例如乾隆《广州府志》说到广东制盐的情形云：“大禾田既获，则以海水淋稗烧盐。”^②又如《盐法议略》所载琼州的制盐情形云：“琼属各场四面环海，遍地产盐，俱系灶丁自煎自卖。”^③

瓷器业在中国是一种很古的手工业，早在明代，景德镇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瓷器的中心市镇，到十八世纪上半期，这里的瓷器业继续发展。据《浮梁县志》引沈嘉征旧序云：“景德镇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于是豪商大贾咸聚于斯，事陶之人动以万计。”^④同书又说，当时的景德镇“列肆受廛，延袤十数里，烟火近十万家，窑户与铺户当十之七，土著十之二三”^⑤。又据唐英《陶事图说》所载，清初时景德镇有“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⑥。此外还有御窑。

这些资料说明当时的景德镇已有居民十万家，其中窑户与铺户占十分之七，而从事陶业的“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也说明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五〇，〈户政〉。

② 乾隆《广州府志》卷四七，〈物产〉。

③ 《盐法议略》卷二，〈广东〉。

④ 道光《浮梁县志》卷首，沈嘉征旧序。

⑤ 道光《浮梁县志》卷二，〈风俗〉。

⑥ 《江西通志》卷九三，〈陶政〉，引唐英：《陶事图说》。

了当时景德镇的陶器不仅行销国内，并且继续输出外洋。

《浮梁县志》又说：“景德镇烧窑之户，本省则都昌县人居多，本府与抚州府及安徽婺源县、祁门县习其业者十仅一二，而本县之人盖鲜。”^①这又说明了当时景德镇的瓷器业已经把资本和工匠从外府、外县乃至外省吸收过来。

关于窑的规模，《浮梁县志》云：“每窑需工数十人。”而御窑的工人则更多。唐英《陶成纪事碑》中有云：“在厂工匠办事人役支领工值食用者岁有三百余名。”^②

工匠的分工已很精细，有砂土工、模工、胚工、画工、上釉工等等。工匠的工资很低，低到不能维持生活。工匠住在窄狭曲巷中类似“蚁垤蜂巢”的胚房中，穿着百结的破烂衣服，日夜工作，而得到的报酬是“藜食充枯肠，不敢问齋韭”^③。因此罢工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所谓“一有所拂，辄哄然停工”^④。

这一切都说明了景德镇的瓷器业已经发展到工场手工业的规模。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瓷器业都和景德镇一样。就当时全国各地的陶瓷业来说，有很多还是规模很小的。例如雍正元年上谕中所说的山西平定等处的农民因“山多田少……向赖陶冶器具输运直省易米，以供朝夕”^⑤。这些窑户都是小规模，甚至是家庭手工业。

造船业在当时也发展到工场手工业的规模。资料证明，当时苏州、扬州已经有着发达的造船业。据《扬州府志》所载，早在

①② 道光《浮梁县志》卷八，〈食货〉，〈陶政〉。

③ 道光《浮梁县志》卷二一，〈艺文〉，〈诗录〉，〈窑民行〉。

④ 道光《浮梁县志》卷二，〈风俗〉：“每窑一座需工数十人，一有所拂，辄哄然停工。”

⑤ 《东华录》，雍正朝卷二，雍正元年五月戊戌谕。

顺治年间，扬州就是制造战舰的地方^①。又据康熙五十五年上谕中说，当时苏州的造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只^②，照当时的生产费，每船十只需数万金，而大船每只即需数万金，千余只则需数百万金，多则几千万金。又据《厦门志》，厦门也是造船业的中心，这里集中了大批的造船工人^③。

《红楼梦》第十六回提到造船业，赵嬷嬷道：“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这反映出当时苏州、扬州都设有官营造船厂。

此外还有很多手工业，如象严如煜在《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中所说的三省山内的铁厂、木厂、纸厂、耳厂等，“一厂多者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④。这些厂的规模都相当大，而且也有相当精细的分工。例如以当时的造纸业而论，就有八种专门化的工匠，如抄纸匠、刷帖晒纸匠、铡切桑皮稻草匠、上碾出料匠、槌剪麻匠、陶洗穰匠、槌稻草桑皮匠、拌焙灰甑匠等八种工匠^⑤。这说明了造纸业也达到了工厂手工业的规模。

根据以上的叙述，我们对于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手工业生产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

第一，在某些大作坊或工场中，已经吸收了几十、几百乃至成千的工匠，而在采矿与制盐业中使用的雇工达到几万、几十万。这些工匠和作坊或工场主人的关系是建筑在契约之上的雇佣

① 嘉庆《扬州府志》卷七二，《杂志》。

② 《东华录》，康熙朝卷九八，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谕：“朕南巡过苏州时，见船厂，问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于余……’。”

③ 道光《厦门志》卷一五，《俗尚》：“有倾产造船者……舵水人等借此为活者以万计……船工大盛，安其业者多移居焉。”

④ 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丛书集成》本，第22页。

⑤ 《钦定工部续增则例》卷五七。

关系。

第二，分工相当发达，技术已经把工人束缚在一定的专门化的工作之中，如在丝织业中实行了织工与摇丝的车匠之间的分工，在织匠中又有锻工、纱工和翦绒工的分工。

第三，出现了手工业的中心城市和市镇，前者如江宁、杭州，后者如佛山镇、景德镇，在这些城市和市镇中吸收了很多从农村中排挤出来的农民无产者，特别是城市或市镇周围的半农业半工艺的居民，使他们转化为工匠，扩大了手工业工匠的队伍。

第四，商业资本已经开始渗入手工业生产，通过大的手工业工场的主人和包买商人的各种活动，如加工、定货或收购成品等等的活动，大作坊或工场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把一部分小作坊乃至家庭手工业者组织在自己的生产体系之中，改造他们或者消灭他们。

这一切都说明了在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但是在另一方面，小作坊和家庭手工业者还是象汪洋大海一样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包括手工业发展的地区在内。虽然有些小作坊的主人已经变成“大商人手中的自愿的与可怜的工具或玩具”^①。但最大多数的小作坊还没有变成“手工业工场底场外部分”^②。至于家庭手工业更是处于极端分散的状况之中，手工业工场还没有在一定程度内把这些广大无边的家庭手工业者变成自己的附属物，使他们的“‘独立性’完全成为虚构的”^③。

其次，技术的专门化分工虽然相当发达，但技术的地方分

①②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第396、397页。

③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第387页。

工，即某一地区对于某一产品的生产之专门化，还是普遍存在，这种情形在丝织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丝织业中，对于同一丝织物的织造或者染色都有地域的分工。这就表现了工匠与土地的联系尚未割断，亦即表现若干手工业区域还保有颇大程度的封建闭关性。

最后是技术的进步非常缓慢，有些手工业生产部门，如象冶铁和炒铁，简直看不出和过去有什么区别。

固然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并不完全排除上述的现象，但这种现象的存在就说明了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手工业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只是处于萌芽状态。

四、商业与商业资本的活动

现在我们说到商业与商业资本的活动。

《红楼梦》中说到商人的地方很多，第二回就说到一个在“都中古董行中贸易”的商人冷子兴，而且作者是通过这个商人的谈话提出这部作品的主题的。以后在第四回又说到一个“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的“皇商”薛蟠——薛宝钗的胞兄，这个皇商在各省有买卖，在京中也有几处生意，其中有“木店”，也有“当铺”。第二十四回说到一个开“香料铺”的商人卜世仁，又说到一个“钱铺”。第五十回说到一个大商人——薛宝琴的父亲，这个商人各处都有买卖，“带了家眷，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到那一省逛半年”，并且曾经到交趾和南海各地做过买卖。第五十六回又说到“茶叶铺”和“药铺”。

《红楼梦》中提到的这些商人，有开“古董行”的，有开“香

料铺”的，有开“木店”、“当铺”的，有开“钱铺”的，有开“茶叶铺”、“药铺”的，也有到外国做买卖的；就是没有开手工业工场的。如果说《红楼梦》中提到的人物也有投资生产的，那就只有“桂花夏家”。从这里反映出当时商业资本的活动主要的是从事商品买卖和高利益剥。

《红楼梦》的这种反映是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东华录》载康熙二十八年左都御史郭琇奏劾高士其的奏疏中检举高士奇除了购置田产房屋以外，又与其“亲家陈元师、伙计陈季芳开张缎号，寄顿各处贿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又说“苏、松、淮、扬，王鸿绪等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①。

同年副都御史许三礼奏参徐乾学的奏疏中检举“乾学发本银十万两交盐商项景元于扬州贸易，每月三分起利。……又布商陈天石新领乾学本银十万两，见在大蒋家胡同开张当铺，其余银号钱桌发本放债违禁取利，怨声满道”^②。

又薛福成《庸盦笔记》载《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其中开列有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本银四千万两；古玩铺十三座，本银二十万两^③。从这几个被举发的贪官对于自己的脏款的处置，就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把脏款用于开设缎铺、古玩铺，特别是当铺、银号，也就是用于作买卖和放高利贷。

另外有些资料也证明高利贷资本在当时的活跃。鄂尔泰等在奏议中说到乾隆九年时北京共有当铺六七百座之多^④。

① 《东华录》，康熙朝卷四四，康熙二十八年九月。

② 《东华录》，康熙朝卷四四，康熙二十八年十月。

③ 《庸盦笔记》卷三。

④ 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卷二〇，乾隆九年十月。

除了当铺以外，私人放高利贷的也很多。这种高利贷者，《红楼梦》中就有两个；一个是王熙凤，另一个是泼皮倪二。《红楼梦》第二十四回说到：“倪二是个泼皮，专放重利债，在赌博场吃饭，专爱喝酒打架。”在好几个地方，说到王熙凤放高利贷的事，第三十九回说：“他这几年，只拿着这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第一百五回说到在抄家的时候发现了“借券”。

至于做大买卖的，大抵都是垄断生活资料。当时最大的商人是盐商和米商，而盐和米却是任何人不可缺少的。其次就是屯积居奇。《红楼梦》第四十八回说到薛蟠当铺内揽总的张德辉就曾经囤积纸札和香扇。

此外，还有一部分资本从流通过程中溢出，流入“货币贮藏的蓄水池”^①，“当作贮藏物的原素来保存”^②。雍正五年上谕中曾说到当时有人“将白银或以万计或以数十万计，埋藏地中”^③，乾隆九年十月鄂尔泰等奏疏中也说到当时“近京直隶所属各村庄集镇，每多富户将粮草货物卖钱去串，堆集一室，以防盗贼，此等乡愚止图一己蓄积，遂致钱文不能流通”^④。

马克思说过：“商人资本底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⑤列宁也说过：“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发展得愈强烈，工业资本（即资本主义生产）就发展得愈微弱；反之亦然。”^⑥然而当时中国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却是十分嚣张。

①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31、130页。

③ 《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六四，《刑部》，《户律钱债》，引雍正五年谕。

④ 《东华续录》，乾隆朝卷二〇，乾隆九年十月。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08页。

⑥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第157页。

在十八世纪上半期，商业资本的独立活动和高利贷资本的盛行是事实，但这不等于说当时的商业资本和手工业生产完全没有结合，根据上面的叙述，我们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商业资本已经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内开始和手工业生产及商业性的农业生产结合。如象我们在上面所说的，在拥有几百张织机的丝织业中，在拥有几万乃至十几万人的采矿业中，在非有大量资金不能举办的制盐业中，在每天冶铁达七百多斤的冶铁业中，在需要几百万几千万资本的造船业中，以及其他具有工场手工业规模的事业中，没有商业资本的参加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在那些规模较大或需要成本较多的商业性的农业经营中，没有商业资本的参加也是不可想象的。可惜我没有找到具体的数字，不能确切地说出在当时投入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性的农业生产的商业资本究竟有多少。

在当时商业资本和手工业生产的结合是采取极其复杂的多样性的形式，除了直接投资以外，还有采取借贷工本、分发原料、包买成品或者成品加工等等的形式的。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并不改变商业资本之转向工业的性质。同样，投资的人也是各种各样的，有些是地主、富农，有些是商人或者是富裕的小作坊的老板。不论投资的是怎样的人，也不改变商业资本之转向工业的性质。因为不论是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将其资本投入手工业生产，其意义都是把这笔资本从商品买卖或高利盘剥的活动中抽调出来把它投入手工业生产，其作用同样是加强工场手工业的发达，摧毁封建经济所固有的小经济单位的分散性、闭关性，从而把小手工业生产者组织在工场手工业的周围。

可以肯定的说，在十八世纪上半期有一部分商业资本——不论这一部分少到什么程度——已经和手工业生产结合。也是无可

置疑的，这一部分商业资本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正起着积极作用。

由于商业资本和手工业生产的结合，就使得原有的一些工商业中心城市，包括那些在清初的战争中遭受过毁灭性的破坏的城市在内，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发达起来。刘继庄在其所著《广阳杂记》上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①刘继庄所说的这些城市只有北京是一个政治城市，其余都是工商业城市，其中汉口和佛山还是新兴的工商业市镇。

当时的北京，正象《红楼梦》第三回所说的：“其街市之繁华，人烟之阜盛，自非别处可比。”

当时的佛山镇，据李调元《南越笔记》所载，已有数十万人^②。又《佛山忠义乡志》也说当时的佛山镇，“万瓦齐鳞，千街错绣，棋布星罗，栉比辐辏，炊烟乱昏，灯火连昼”^③。

当时的苏州，顾禄《清嘉录》曾有如次的描写：“吴城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④又据徐锡麟《熙朝新语》所记：“苏州府城阊门外南濠之黄家巷……明时尚系近城旷地，烟户甚稀，至国朝生齿日繁，人物殷富，闾阎且千，鳞次栉比矣。”^⑤

① 《广阳杂记》卷四。

② 《南越笔记》卷五：“佛山有真武庙，岁三月上巳，举镇数十万人竞力醮会。”

③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一一，《艺文》下，引梁序编：《佛山赋》。

④ 顾禄：《清嘉录》卷五。

⑤ 《熙朝新语》卷一六。

当时的汉口，据钱泳《履园丛话》所述，也是“商贾毕集，帆樯满江，南方一大都会也。”^①范锺《汉口丛谈》亦云：“汉镇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鹺商典库咸数十处，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珍奇之所聚。”^②

四聚以外，江宁、杭州是丝织业的中心，扬州是盐商聚居的城市，这几个城市的繁华并不在四聚之下。吴敬梓《儒林外史》描写当时的南京说：“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由此可知，南京在当时是一个丝织业的中心城市，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

杭州的情形，陆以湜《冷庐杂识》曾有这样的记述：“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如杭之茶、藕粉、纺绸、纸扇、剪刀，湖之笔、绉纱，嘉之铜炉，金之火腿，台之金橘、鲞鱼，亦皆擅土宜之胜，而为四方之所珍者。”^③

扬州的情形，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述甚详，《画舫录》跋文中说当时的扬州也是“楼台画舫，十里不断”。

此外还有广州、厦门，是当时对外贸易的城市，也很繁华。

以上的资料说明了当时主要的工商业城市的繁荣，而其繁荣则表现在“人烟稠密”、“人物殷富”、“千街错绣”、“商贾毕集”等等。显然，这些辞句所表示的内容就是城市人口的扩大和工商业的发达。

① 《履园丛话》卷十四。

② 范锺《汉口丛谈》卷三。

③ 陆以湜：《冷庐杂识》卷八，《土物》。

城市人口的扩大，表示了农业人口向工商业区域转移。而农业人口向工商业区域的转移又是表示商品经济的发展。列宁说：

“商品经济底发展就是表示日益众多的人口之与农业分离，即表示工业人口之由于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①因此这种现象的产生，其意义是重大的。可惜我没有找到当时城市人口的具体数字，不能确切地说明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口从农业区域转移到工商业区域，但从上面的资料是可以看出这种倾向是存在的，而且也必然要出现这种倾向，因为这些工商业城市的繁荣不能不对乡村整个机构显示深刻的影响。

很多的资料证明当时农村人口向工商业城市流入。苏州就是一个例子，这里人口的增加已经超出了这个城市所能容纳的限度而不得不把市区扩展到阊门以外的郊区。江宁也是一样，不仅城里的大街小巷住满了人，城外也变成手工业工人的居住区域^②。不仅城市附近的农民移入城市，甚至更远的农民也向工商业城市集中。例如居住在景德镇的十万户居民，其中只有十分之二三是土著，其余十分之七八的窑户与铺户都是从江西的其他州县乃至安徽的婺源等地移来^③。

移入城市的居民，贫民占大多数，佛山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佛山忠义乡志》说到佛山镇的情形云：“四方商贾萃于斯，四方之贫民亦萃于斯。挟资以贾者什一，徒手而求食者则什九也”。^④这些萃集工商业城市的“徒手求食”的“贫民”，他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第11页。

② 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七：“攻韦之工聚牛头巷，通济门外民善柔治竹木，雕刻文字为折扇……城内民剪通草茸彩为花”。

③ 道光《浮梁县志》卷二，《风俗》；卷八，《食货》，《陶政》。

④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乡俗》。

们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或以乞丐为生，是没有其他的求生之道的。资料证明，当时的政府对于城市贫民是强迫他们“习艺佣工，自食其力”的①。

不仅城市如此，在非城市的工业区如四川的制盐业中也有这样的情形。严如煜《论川盐》中说：“业盐之人愈繁。川中沃饶，为各省流徙之所聚，其他陆路来者无论已。即大江拉把手，每岁逗留川中者不下十余万人，岁增一岁，人众不可纪计。岂山中垦荒，平畴佣工所能存活？幸井灶亦岁盛一岁，所用匠作转运人夫实繁有徒，转徙逗留之众得食其力，不至流而为匪。”②此外，云南的采矿业中的工人也大半是来自各地③。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农业人口向工业区域的转移。

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就必须有更多的商品，特别是生活资料和家庭必需的日用品来供应这数量愈来愈多的新的城市居民，因而就扩大了消费市场，许多以前不是出卖的家庭手工业产品这时也卷入商业交换的过程中。新的情况也向郊区的农民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郊区的农民替城市服务，供给城市以蔬菜、水果、鲜花及其他家庭手工业所能作出的日用品。郊区的农民也接受了这种要求，因为这对于他们是有利的。

上面已经说过，在某些大的工商业城市的郊区已经出现了商业经营的园艺业，现在再举出无锡郊区的例子，《锡金识小录》云：“开化乡民皆织席，不能为布；新安乡半之；延祥乡之荡口则兼绩麻为手巾及织草缣；南门近城十余里则多劈竹为米簾、篋

① 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三八，〈告示〉三：“除年力精强，懒惰自弃，理应以厉言教导，俾其习艺佣工，自食其力，不当在周急之例。”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五〇，〈户政〉。

③ 《续云南通志》卷四五，〈厂员〉，引岑毓英，杜瑞联奏稿。

架、筲帚、竹箬之属；东南景云乡之近城者多窑户，居民亦多团土为砖瓦胚；然皆未尝废之也。”^①由此可以看出无锡郊区的农民已经把供给城市的日用品当作自己的任务。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表示了工商业城市的郊区已经被当作城市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卷入商品经济的体系中去了。

跟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里出现了比以前更多更大的店铺。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把当时存在着的各种各样的店铺列举出来，只要指出有这样新的情况就够了。例如以数量而论，如象前面所说的，当时的江宁城内就有酒楼数百座、茶社千余处，这个数字说明了消费市场的扩大。说到当时店铺的规模，我们可以举出苏州孙春阳南货店的例子。关于孙春阳南货店的组织，钱泳在其所著《履园丛话》中曾有如次的记载：“其为铺也，如州县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售者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总管掌其纲。一月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十四年，子孙尚食其利。”^②据钱泳说，孙春阳在明朝是一家小铺，发展到上述的规模是清初的事。象孙春阳这样的店铺，说明了当时某些大的店铺已经有了精细的分工和会计制度，而其规模则是前所未有的。

由于城市人口的扩大，城市居民的成分也引起了变化，以前城市的主要居民是零卖的小商人小作坊的老板和徒弟，其余是少数本地的大商人以及坐食租税的大地主、退职的官吏。到了这时，拥进了成群的外来的大商人，特别是出卖劳动力的工匠，而

① 《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力作之利〉。

② 《履园丛话》卷二四，〈杂记〉下。

这些新来的商人和工匠在工商业城市中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佛山镇的情形就是如此。《佛山忠义乡志》云：“佛山地广人稠，五方杂处，习尚盖歧出矣。故家巨族敦诗书、崇礼让，祠祭竭其财力，妇女罕出闺门，此其大较也。至于异地新迁，或宦成名立，始来卜居，或拥资求安，爰得所处，类皆谨敕和厚，少蹈悖淫。然商贾猬集则狙诈日生，佣作繁滋则巧伪相竞。兼以旅麀逼闹，游手朋喧，优船聚于基头，酒肆盈于市畔，耳濡目染，易以迁流，遂或失其淳实之素矣。”^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佛山镇市区内的居民有被称为“故家巨族”的土著地主，这些人略读诗书，坚持封建礼教、迷信、压迫妇女，是城市中最保守的分子。其次是所谓“宦成名立”的退休官僚、“拥资求安”的富豪，这些人慳吝、狡猾、虚伪，是寄生在城市中的废物。此外猬集城市的是被指为“巧伪相竞”的商人，这些人不象地主官僚那样保守、慳吝、迷信，他们随便进出于优船酒肆之中，这些人是城市中未来的主人。此外就是被指为“游手朋喧”的“工匠”，这些人是新的生产力的奠基人。

没有疑问，当时支配着城市的命运的还是那些最保守的封建地主分子，这些人和统治城市的官吏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他们是官吏的爪牙。佛山镇有商人建立一个硝厂，就是因为当地的地主反对而被撤毁了的^②。

很多资料证明当时各城市的商人都有自己的行会。商人的行

^①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乡俗习尚》。

^②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一三，《乡禁》，《举人区宏绪禁设硝厂碑》“乾隆四十四年九月内有李润汉、冯焕承办高要县麒麟硝厂，瞒禀迁在佛山棚下河旁设厂，未经详准，遽行筑造。闾镇绅耆行铺人等以其干碍水道，贻害无穷，各联名上控，蒙宪批飭禁押拆，永利商民，并准录批勒石，以杜后患。”

会有两种，主要的是按行立会，此外也有按地区立会的。前者如丝行，缎行、棉花行、布行、油灰行、铁锅铺行之类；后者即所谓会馆。顾禄《清嘉录》记载着居住在当时苏州的“他省商贾各建关帝祠于城西，为主客公议规条之所，栋宇壮丽，号为会馆”^①。

不仅商人有行会，工匠也有行会。《白下琐言》谓江宁的丝织工匠以蒋公庙为行会^②，《东城杂记》谓杭州的丝织工匠以机神庙为行会^③。

不过，当时的商业行会大半控制在官僚地主商人手里，因为这些官僚地主商人不仅拥有较为雄厚的资本，而且在某些城市中，他们还是多数。《广东新语》曾说到明末清初时广东的情形云：“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近而广之十郡，远而东西两洋，无不有也。”^④ 这些人是商人，又是官僚地主，他们一方面要从商业方面获得利润，另一方面也要巩固他们在封建地主经济方面的利益，因而当他们把行会控制在自己手里以后，就迫使行会替封建主义服务，如协助政府征取捐税等，当然在不损害官僚地主商人的利益的条件下，一般商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会向政府提出要求。

新的城市居民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因而跟着城市居民成分的改变，又改变了城市的风气，风气改变的程度不同，一般都是趋于奢侈，因此普遍地引起城市中保守的绅士老爷们的慨叹。

① 《清嘉录》卷五，《关帝生日》。

② 《白下琐言》卷四：“蒋公庙祀汉蒋子文，后殿有女像，其妹小姑也，俗讹为织女，又称为云机娘，机匠祀之。”

③ 《东城杂记》卷下，《机神庙碑》：“（杭州）城东旧有机神庙，地狭制陋，隶于局者与自为增以鬻者，率私钱拓而新之。”亦见《杭州府志》《祠庙》引。

④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九，《事语》、《贪利》。

早在明朝中叶以后，城市生活就开始变化，乾隆《湖州府志》引明人王道隆《菇城文献》中所述湖州的情形云：“成化以前，谋瓮煨者以兴贩为能，养子弟者以读书为讳……细民重释而信巫，今则市廛以质当相先，宴席以华侈相尚……拥资则富屋宅，买爵则盛舆服，钲鼓鸣笳，用为常乐。”^①

城市生活的改变在十八世纪上半期继续发展，《锡金识小录》说到无锡的情形云：“邑中风俗，旧志略备，然岁月迁流，今昔殊致……以予所见，四五十年间，方康熙时，衣服冠履犹尚古朴，常服多用布，冬月衣裘者百中二三……今则以布为耻，绫缎绸纱争新色新样……间有老成不改布素者则目指讪笑之……习俗移人，方领矩步之风不可复见矣……妇女衣饰近日反尚雅淡，昔衣裙多刺绣盘金……今服绫缎，绣者绝稀。”^②

钱泳《履园丛话》说到苏州的情形云：“余五六岁时，吾乡风俗尚朴素……今隔五十余年，则不论富贵贫贱，在乡在城，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货愈贵而服饰者愈多，不知其故也。”^③

应该指出在这些大的工商业城市中，除豪奢的商人以外，还有不少从农村移入城市的人口找不到工作，他们流浪在街头巷尾，成为城市流氓无产者。其中有些流为乞丐。例如《扬州画舫录》记当时扬州天宁街口一个牌楼下面就“棲乞儿数百”^④。有些沦为娼妓。钱泳《履园丛话》曾说到当时的大城市都有卖淫的市场，如“在江宁则秦淮河上，在苏州则虎邱山塘，在扬州则天

① 乾隆《湖州府志》卷三九，《风俗》。

② 《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风俗变迁》。

③ 《履园丛话》卷七，《骄奢》。

④ 《扬州画舫录》卷四。

宁门外之平山堂，画船箫鼓，殆无虚日”^①。有些甚至卖身为奴。很多资料都说明当时贵族官僚和豪富的商人都拥有几百乃至一千以上的丫环奴仆^②。甚至一个小小的游击，也“家蓄优伶数十人”^③。至于当时扬州的盐商，他们家里的奴婢，自己都不知道数目^④。《红楼梦》中也有这样的反映，《红楼梦》第十六回说到贾蔷“下姑苏请聘教习，采买女孩子”。第十七回又说到“采访聘买得十二个……小道姑，都到了”。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当时城市的手工业作坊和店铺尚没有足够的容量足以容纳从农村中涌进城市的人口。自然，就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也不是经常能够雇佣全部工人，还是有一部分留在失业后备军内，因而这种情况的存在是不足为奇的。

最后说到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于国内市场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城市与城市间的联系是通过商品流通来表现的，而商品的流通又是依靠交通运输工具来实现的。关于当时内河水运的船只，我找到的只有一些零碎的材料。钱泳《履园丛话》曾说到乾隆年间在一次大火中，停泊在汉口的船只被烧者有“粮船一百余号，客商船三四千只”^⑤。另外的资料说到往来运河运输漕米的船只在明

① 《履园丛话》卷七，《醉乡》。

② 《皇清名臣奏议》卷二四，康熙四十一年山西道试监察御史刘子章《奏请裁节外官家口疏》：“见外任官员，除携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有多至数百人，甚至千余人者。”

③ 《皇清名臣奏议》卷十五，湖广道试监察御史萧震《请正人心以垂世道疏》：“闻大名游击有宜大名者，家蓄优伶数十人，昼夜酣歌。”

④ 黄钧宰：《金壶浪墨》卷一，《盐商》：“左右执事类皆绮岁俊童……其服役堂前而主人终世茫然者，不知凡几。”

⑤ 《履园丛话》卷十四：“毕秋帆尚书镇楚时，尝失火烧粮船一百余号，客商船三四千只。”

末有一万只，清初坏了一些，但总还保存一定数量的漕船^①。这些漕船是允许装带商人货物的^②。据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载，献县的枣子就是“南随漕舶以贩鬻于诸省”^③。又乾隆五十六年四川总督鄂辉《筹议铜运疏》中曾说到运铜船的载重量，其中有云：“装载铜船，每夹舢船一只，以七万斤为率。”^④

这些资料当然不能说明当时交通运输的全面状况，但当时的交通运输状况可以从当时商品流通的情况得到反证。例如当时棉花产于豫省而行銷江南^⑤。蚕丝产于湖州而运销于杭州、江宁，远至山西潞安^⑥。陕西的烟草利用汉水的商艇运贩襄、樊乃至汉口^⑦。江宁的丝织物，“北趋京师，东并高句骊、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溯、淮、泗，道汝、洛”^⑧。四川的耕牛运到湖广^⑨，甘肃的猪运到四川^⑩，四

① 《皇清名臣奏议》卷一，顺治元年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奏漕务八要：“查前朝粮船约万只，近年冻损及烧毁甚多……为今之计，除搜整旧船外，江南投顺各将兵船颇多，择其坚完者改作粮艘，不足再议造可也。”

② 《东华录》，康熙朝卷五五，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庚申谕：“从来总漕未尝禁漕船带货，而漕运并未迟误……装带些微货物，于事何妨？”

③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余乡产枣，北以车运供京师，南随漕舶以贩鬻于诸省”。

④ 《皇清名臣奏议》卷六七。

⑤ 《熙朝新语》卷九，引尹会一：《敬陈未议疏》。

⑥ 乾隆《湖州府志》卷四一，《物产》：“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又，乾隆《潞安府志》卷八，《物产》，《货属》，《丝》：“近桑蚕渐废，所出无几，潞编所资，来自远方川、浙之地。”

⑦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户政》，岳震川：《府志食货论》。

⑧ 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七，《食货》。

⑨ 郭琇：《郭华野先生疏稿》卷五，《纠参州牧》：“该州（彝陵）有川客贩卖耕牛，每次一二千只不等。”

⑩ 咸丰《阆中县志》卷三，《物产》：“猪虽家家所饲，然亦不足以应本地之需，贩者多于甘肃阶州文县所属采买。”

川的米运到长江下游诸城市^①。山东章邱的铁器散行奉天、直隶、山西、河南、江南数省^②。云南铜运到北京、江、浙、江西、福建、两湖、陕西、两广、贵州、四川^③。这种商品流通的情况就说明了当时已有足够的运输力量，并且通过他们把城市与城市间的、区域与区域间的经济联系起来，替国内市场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清朝统治者对于国际贸易基本上是采取闭关政策的，但由于当时商人的要求，特别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扩张，这个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终于与世界经济发生了接触，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被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去了。

根据历史的记载，在康熙年间大陆贸易方面，已经和帝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在海洋贸易方面，已经在粤、闽、江、浙设立了海关，并且成立了为外国商人服务的十三行。到雍正时，又和帝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在厦门也出现了为外国商人服务的洋行八家，商行三十余家。这些事实说明闭关政策已经逐渐被打破。

关于闽、粤、江、浙已有洋船进口事，《红楼梦》有如次的反映：《红楼梦》第十六回曾说到王熙凤的爷爷就是“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很多资料证明当时的国际贸易是愈来愈发展的。资料证明早在康熙五十五年，仅仅苏州一地的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

① 《东华录》，雍正朝卷二二，雍正十一年正月丁亥谕：“川省为产米之乡，历来听商贾贩运，从长江至楚，以济邻省之用。”

② 道光《济南府志》卷十三，《风俗》：“章邱……邑中铁业甲山东，工良器坚，散行奉天、直隶、山西、河南、江南数省。”

③ 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第12—19页。

多至千余”^①。广州、厦门尚不在内。当时出口商船的载重量，“大者可载万余石，小者亦数千石”^②。商船的组织也很完备，有船主、司货、水手等数十人。出口的货物，主要的是丝织物、瓷器、茶叶、药材、铁器，以及雨伞、木屐、纸札、花砖等。当时到外国去做买卖的商人是很多的，大观园里的薛宝琴就曾经随同他父亲到过交趾，到过南海。

从外国进口的商船，也愈来愈多。据《粤海关志》所载，乾隆十四年有十八只，三十年增至三十一只，四十二年增至三十八只，五十年增至四十六只，五十一年增至六十八只，五十二年增至七十三只^③。这些外来的商船主要的是荷兰、葡萄牙、英、法等国的商船。也有吕宋及其他各国船只。根据《广州府志》及《厦门志》所载，这些商船带来的货物，有各种织物，如哆罗呢、哔支、纱缎、大小绒、织金毯等等；有各种工艺品，如玻璃、自鸣钟、表等等；有各种香料，如丁香、胡椒等等；有海味，如海参、燕窝等等。此外有各样油、葡萄酒、琥珀、珊瑚、乌木等等。

由于这些洋货的输入，首先就在广州市场上排除了中国的手工业出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梁田《庭立记闻》看得出来。该书中说：“夫居处之雕镂，服御之文绣，器用之华美，古之所谓奢也，今则视为平庸无奇，而以外洋之物是尚。如房室舟舆无不用颇梨，衣服帷幙无不用哆罗、哔支、羽毛之属，皆洋产也。而什物器具无不贵乎洋者，曰洋铜，曰洋磁，曰洋漆，曰洋藤，曰洋锦，曰洋布，曰洋青，曰洋红，曰洋貂，曰洋獭，曰洋

① 《东华录》，康熙朝卷九八，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谕。

② 道光《厦门志》卷五，《洋船》条。

③ 《粤海关志》卷二四。

纸，曰洋画、曰洋扇，遽数之不能终其物。而南方诸省则通行洋钱。”^①

当时的洋货不仅泛滥于广州，也打进了北京贵族官僚的家庭。大观园就有不少外国东西，《红楼梦》一书中说到洋货的地方很多。第三回说到“猩红洋毯”。第六回说到“挂钟”。第十四回说到“钟表”。第二十八回说到“茜香国的汗巾”。第四十四回说到“西洋布手巾”。第四十九回说到“羽毛缎斗篷”，“哆罗呢对襟褂子”，“洋钱番邦丝的鹤氅”。第五十二回说到“西洋珐琅”的鼻烟壶和“真正上等洋烟”，又说到“西洋药”——“贴头疼的膏子药，叫做依弗哪”，又说到“俄罗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雀金呢”。第六十回说到“西洋葡萄酒”。第六十二回说到“波斯国的玩器”。第七十二回说到一个卖了五百六十两银子的“金自鸣钟”。第九十二回说到值得两万银子的“四种洋货”，“一件是围屏”，“还有一架钟表”。第一百五回抄家单内开列大批洋货，其中有“玻璃大屏二架”，“玻璃盘四件”，“天鹅绒四卷”，“洋呢三十度”，“毕叽三十三度”，“羽缎羽纱各二十二卷”，“钟表十八件”。所有以上的东西，都是外国输入的商品，只是没有发现鸦片。

根据以上的叙述，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第一，当时的商业资本已经开始和手工业生产，特别和工场手工业结合。第二，由于这种历史性的结合，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发展了原有的和新兴的工商业城市，扩大了劳动市场，引起了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第三，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改变了城市人口的成分乃

^① 梁田：《庭立记闻》卷四。

至生活方式。第四，通过商品流通的关系，在一定程度内紧密了工商业城市之间的联系，替国内市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第五，国际贸易逐渐发展，中国已经在一定程度内和世界经济发生了愈来愈多的接触。这一切，都表示了在当时的某些大的工商业城市的商业活动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由于商业资本的活动主要的还是从事于商品买卖或高利盘剥，手工业生产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很多中小城市依然保持几百年以前的古老的面貌，这些城市依然是封建统治阶级镇压农民的军事堡垒和政治据点。在这些城市里，除了零卖商人、小作坊以外，就是地主老爷们的住宅，根本没有可以容纳农村人口的余地。

因为商品生产的不发达，中小城市间的联系也很松懈，有些城市，特别是偏僻地方的城市，不但没有和世界经济发生接触，也还没有加入国内市场的活动。

这一切都说明了在当时商业资本的活动中，资本主义的因素只是萌芽。

五、结束语

根据以上引证的资料和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到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烂熟的程度，并且在它的内部孕育着从明朝中叶以来就已经萌芽的资本主义的因素。这种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以极其复杂的多样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出现于当时某些地区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组成部门中；它出现在农业生产中、手工业生产中，也出

现在商业资本的活动中。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和一定的范围内对当时的封建经济起了一定的分解作用。但是由于这种因素还是处于萌芽状态，因此它所起的作用，不论在深度上或广度上都没有达到足以摇撼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程度，如象上面所说的在农业生产中还是封建地主经济的统治，在手工业生产中，家庭手工业还是象汪洋大海一样弥漫全国，在商业资本的活动中，还是商业资本的独立活动和高利贷资本占主要地位。因此，关于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的性质，我同意邓拓同志的看法：“作为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决定着社会性质的还是封建经济，因而当时的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它和以前的封建社会不同的地方，只是在它的内部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

由于当时封建经济体系中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因而在当时的生产关系中，除了封建社会所固有的诸矛盾——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矛盾——代表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的新的市民和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政府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当时的新的市民必须展开对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政府的斗争，才能摆脱封建政治和经济的压迫，也才能摆脱封建传统和惯例的束缚，把自己从封建隶属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另一方面，当时的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政府为了巩固他们的阶级统治，他们不仅压迫农民，也要反对代表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市民。他们限制商业性农业经营的发展，限制手工业工场的扩大，限制矿山的开发，封锁商业资本的海洋活动，一言以蔽之，他们利用国家机器抗拒社会发展中的经济规律的实现，迫使这种新的历史因素长期地隶属于封建经济体系之内，为封建制度

服务。利用他们的力量促进封建经济的繁荣，促进国防力量的增长，加强对边疆各族人民的武装进攻。应该承认，当时的市民已经开始向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斗争，他们是封建地主阶级从来没有遇到的一个新的敌人。但由于他们代表的力量还是处于萌芽状态，由于他们还没有学会利用农民群众去争取他们的历史胜利，因而他们的斗争还不能对封建统治起冲击作用，从而这个新的力量也还不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威胁。在当时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威胁的，还是那些拿起武器来反对封建统治的农民群众。因此，我以为虽然由于新的历史因素的萌芽而使得社会的矛盾复杂化，但作为当时社会主要的支配一切的矛盾，还是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红楼梦》第一回所说的“盗贼蜂起，官军剿捕”，正是这种矛盾的反映。后来嘉庆年间爆发的白莲教、天理教的起义，还是这种矛盾的反映。

以上就是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阶级关系。《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正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状况和这样的阶级矛盾之中，《红楼梦》这部杰出的文学作品正是创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中。因此，作者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在他的作品中反映了他的时代，反映了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经济情况和阶级关系。

非常明白，在《红楼梦》这部作品中，作者是把一个走向没落的封建贵族地主家庭作为他的主题。也是非常明白的，作者并没有把自己禁闭在这个贵族地主家庭的花园里，他的目光已经越出了大观园的围墙，投射到当时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阶级的活动。在他的作品中，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某些部门的情况，也反映了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斗争。他提到了皇帝、贵族、官

僚、大大小小的地主、形形色色的商人、高利贷者，也提到了农民、工匠和城市流氓无产者。当然作者并不是企图写出一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史或社会史，但是他却有意无意地在大观园的周围安置了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历史。这些事实有力地粉碎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胡适之流所说的《红楼梦》这部书是“空中楼阁”的谬论。

大家都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一个没落的封建贵族地主的儿子，他所属的阶级是封建地主阶级。但是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他自己的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的当权派，表示了深恶痛绝的态度。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那些走向没落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为了维持他们已经不能继续的奢侈、腐朽和堕落的生活而拼命地去寻求金钱，他们从地租中、房租中、高利贷中，乃至不惜用逼死人命的手段去获得金钱。在这部作品中也反映出当时的贵族地主愈是走向没落，愈要用众多的奴婢，用对人类尊严的侮辱来掩盖自己的没落，装饰自己的高贵。同时在他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已经意识到象这一类依靠地租、房租和高利贷为生的封建贵族地主，在社会经济的变化中，即使用尽一切的努力，也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没落的。这一切都使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感情上已经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可以说他已经是自己阶级的叛徒。

另一方面，作者把他的最大的同情放在那些追求个性发展、想望自由生活而在当时又还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的人们身上，亦即放在那些企图挣脱封建政治经济压迫和一切封建统治束缚的人们身上。他反对封建家长制度，反对八股，反对科举，鄙视功名富贵，这些都表示了他不愿意在封建家长制度之下

继续生活下去，也不愿意在封建社会中寻找自己的出路。所有这一切决不仅是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或者是他个人的性格的表现，而是作者在新的历史因素的影响下，不自觉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在成长中的新的市民的要求。

由于明史条件与阶级性的限制，《红楼梦》的作者始终没有找到也不可能找到他的希望应该寄托在什么阶级身上，因而他始终没有找到摆在他前面的历史道路。虽然如此，作者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反对封建社会中一切过时的、腐朽的、丑恶的东西，他想望一种适合于个性发展的自由生活，并且为了新的生活而进行了斗争。因此《红楼梦》这部作品就决不象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胡适所说的是“随手拈来，初无成意”的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而是一部具有鲜明的倾向性，思想性和人民性的杰出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也决不象胡适所说的它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而是在于他以批判的态度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时代，完成了他的时代使命。

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所学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专门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全部著作合拢起来所学的还要多。我们读了《红楼梦》也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觉得没有一个和曹雪芹同时的历史学家的著作，象《红楼梦》一样用那样具体、生动的现实生活，那样深刻、细致而又大胆的批判态度和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了我们一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历史。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问题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所作的报告

吴 晗

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和讨论展开后，学术界在探讨《红楼梦》这部作品所描述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同时，注意到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这是十分可喜的事。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和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历史上有关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到目前为止，已发表的文章都根据若干史料提出一些看法，但是所提供的史料的时间性都很不肯定。从八世纪，十世纪到十六、十七世纪都有。那末，到底什么时候算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呢？《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时期怎么会有这样长呢？固然，后一时期的某些史料可以说明前一时期的情况，但如果生硬地把后一时期的某些局部情况当做普遍性的例子来说明前一时期所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那就会发生错误。因之研究这一问题要从大量收集材料，调查研究工作入手，要花时间，付出力量，分工合作，从各方面来综合分析，然后才有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至于我自己，也还没有来得及抽出时间进行充分而仔细的研究，只能根据二十年前接触过的一些资料，给大家提供几点参考性质的意见。在这里仅仅提出问题，并要求把

问题局限在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所发生的主要事件上面，特别是十六世纪中叶这个明朝人自己感觉到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着重提出那些在这时期以前历史上所没有发生过，或发生过而不很显著，这个时期以后成为比较普遍、显著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手工业工场

我在1936年《清华周刊》45卷第5期《十四世纪时之纺织工厂》一文中曾举出元末明初学者徐一夔在《始丰稿》的《织工对》中叙述到钱塘相安里的手工业纺织工场的情况。工场主自备纺机，雇工多人生产。工人领取计日工资，作为家庭生活费用。手艺高的熟练工人，还可获得加倍的工资，并为工场主争着雇用。工场技术改进，成品质量不断提高，很受市场的欢迎。同样情况的记载，在这以前的历史书中尚未见到。

关于手工业工场问题，我认为应该按照当时行业系统、从纺织、制磁、冶铁、木材、造纸等方面大量搜集材料，进行深入的综合的研究。

二、新的商业城市的兴起

许多文章笼统地提到明代有南京、北京、苏州、松江等三十三个新的商业城市。这个数字是不错的，但是时间有问题。因为并不是整个明代都是这样情况。事实上从明成祖以后，运河南北畅通，到宣宗时沿运河的某些城市才繁荣起来。那时，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贸易市场扩大了。另一面为了保持钞法流通，沿

长江、运河及各布政司所在地，建立了三十三个钞关。据《明宣宗实录》卷五十所载，这是宣德年间的事情。在此以前，没有钞关，在此以后的二百年中还有其他的一些新的商业城市兴起。以此，不标明确切的时间，以一个时期的情况来概括整个明朝，是不符合当时存在的客观事实的。

关于明代商业城市的兴起、发展和变化以及市民阶级的形成，我们还应该认真作专门的研究。

三、倭寇、葡萄牙海盜与沿海通商问题

元末倭寇侵略朝鲜，明初转而侵略山东、江苏、浙江沿海地区，到嘉靖时（十六世纪中叶）大肆骚扰东南沿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当时的倭患对国际贸易和国内生产起很大破坏作用。除倭寇外，欧洲人也到东方来了。主要的是葡萄牙海盜，明代称为佛朗机的，在沿海通商、做买卖，买卖作不好，就进行武装抢劫。中国沿海商人，因为政府禁止对外贸易，也往往和倭寇、葡萄牙人结合进行通商和海盜活动。

明朝政府最初是允许与外人通商的，在沿海几个重要地区广州、宁波等地设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由于倭患严重，明朝政府认为通商是它的祸源，于是撤废市舶司，禁止与外人通商。这问题引起很大的争论。沿海地主把资本转移到对外贸易的，主张通商；内地地主则反对通商，主张完全禁止海上贸易。这一争论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发展到最高峰。

何乔新《何文肃公集》卷三一《福建按察司副使辛公（访）墓志铭》中提到：“奉敕巡视海道，濒海大姓私造海舰，岁出诸

番市易，因相戮杀。”徐学聚《世庙识余录》卷十一说：“钦州知州林希元……居乡，专通番舶。”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餉税考》和《明史》卷一三九《朱纨传》中也都讲到十五、六世纪时沿海地主官僚私造海舰的情形。尽管明太祖时规定片板不许下海，海船的大小也有一定限制，但是到十五、六世纪时，官僚政府的法令并不能阻压东南沿海地区人民对外通商的要求了。

《东西洋考》中提到，福建沿海人多地少，失业者纷纷下海，“半年生计在田，半年生计在海”。沿海官僚地主也参加活动。“富者出资，贫者出力，悉迁居利”。明朝中叶十六世纪前期，通商热潮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高涨。平民乃至官僚要求打破海禁，恢复市舶司，和反对派形成政治斗争。内地官僚地主的代表人物朱纨（长洲人）等人主张禁止海上对外通商，以军事力量控制海口，断绝对外关系。在这方针下，朱纨以“都御史总督闽浙军务”（这是新官衙专防倭寇）前往闽浙，采取严厉手段，用武力镇压。当时葡萄牙人及沿海海盗活动中心地区是浙江的双屿和福建漳州的月港，葡萄牙海盗入侵漳州，朱纨派兵迎击，擒获后处死了九十余人。朱纨向政府报告中提出，“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沿海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所谓“衣冠之盗”就是指支持、组织沿海巨商的浙闽官僚地主。朱纨等人和这些人发生利害冲突，检举了其中的福建官僚地主专通番舶的林希元。被检举的人也连结了一批有共同利益的通商派（多为福建人）结成力量进行斗争。浙闽的在朝官僚弹劾朱纨，说朱纨所捕杀的九十多人是良民，是滥杀。闽籍在朝官员周燾、叶健、陈九德等合力攻击朱纨，朱纨被取消“总督”名号，改为“巡视”，解除兵权。明朝政府并派兵科给事中杜汝楨处理这案

件，于是主张禁海的都不敢说话了，朱纨被迫自杀。这一斗争说明了主张通商派和反对通商派之间的激烈斗争达到高潮，结果是反对通商派的失败。

这种性质的斗争，在过去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汉、唐、宋、元以来都曾进行对外通商，而且有些时候还很繁盛，但是代表通商利益的官僚地主形成政治上的新兴力量——商业资本家和代表内地农业封建地主利益的保守派形成两个敌对的派别，进行拚死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还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对外政策，这种情况则是以前所从来没有过的。这是由于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商业资本的发展，他们在政府里的代表，代表沿海通商派地主和一部分人民的利益，提出坚决的要求，和进行顽强斗争。从这个斗争的实例说明了商业地主的代表出现于政治舞台上的历史意义。

四、内地官僚地主也进行商业活动

和经营手工业工场

不仅沿海官僚地主，甚至内地某些官僚地主也在进行商业活动和经营手工业工场。

著名的正德皇帝开设许多皇店，这是十六世纪初期的事情。嘉靖时贵族如郭勋（魏国公）（印行过《三国演义》）在京城开设店舍多至千余区，外戚周璘于河西务设肆通商，周寿出使多挟商艘。例子很多。

在地方上，原来明朝制度规定四品以上官员禁止做买卖，与民争利，但这一条始终行不通。事实上是官愈大，作买卖愈多愈

大。例如苏州黄省曾《吴风录》中说：“自刘氏毛氏创起利端，为鼓铸圜房，王氏债典，而大村名镇，必张开百货之肆，以榷管其利，而村镇之负担者俱困，由是累金百万，至今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酪，其术倍克于齐民。”由此可见一般。

过去官僚固然也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但在明初以武官居多，到明朝中叶，这种情况改变了，文官也经商了，并且还开设手工业工场。于慎行的《谷山笔麈》记载吴中退休官僚乃至在朝者都经营商业。华亭徐阶做宰相时，家中“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

十六世纪中期的这种现象，也是过去所没有过的。过去的官僚认为做买卖有失身份，社会上看不起商人。十六世纪以后，这种看法改变了，不止武官，连皇帝，贵族，大官僚都抢着作买卖了。商人的社会地位改变了。

五、当时人对于这个时期社会情况变化的总结

上面所指出的这种变化，明朝人自己看得很清楚，有不少人就各方面变化的情况作出他自己的总结：

首先，从风俗方面说，明朝人认为嘉靖前后是两个显著不同的时代。顾起元《客座赘语》中记述南京风俗在正德嘉靖前后的变化，妇女服装由朴素而华丽，宴会由菜四碗、六碗到菜八碗、十二碗甚至十六碗等等。山东《郛城县志》（崇祯七年刻本）说正德嘉靖前百姓老实，易于治理，其后生活竞尚奢侈，例如：“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服，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

改旧意，贫者亦槌牛系鲜，合羸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溢衢巷，货杂水陆，淫巧姿异，而重侠少年复聚党招呼，动以百数，槌击健讼，武断雄行。胥隶之徒，亦以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博平县志》说：“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过去乡社村保中无酒肆，亦无游民。由嘉靖中叶以至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纓帽细鞋，纱裙细袴，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漫淫，靡焉不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风。”当时人好起别号，皇帝有，官僚有，在博平县甚至别号“下延于乞丐”。关于当时风俗的记载，我们还可以在范濂的《云间据目钞》、郎瑛的《七修类稿》、陶奭龄的《小柴桑喃喃录》和余永麟的《北窗琐语》周玄暉的《泾林续记》中看到很多。

其次，在文化娱乐方面，沈德符的《野获编》卷二五《时尚小令》中提到正德以前流行的歌曲主要是北曲，举曲牌名如琐南枝、傍妆台、山坡羊等；此后流行的则是要孩儿、驻云飞、醉太平等；嘉靖后则流行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千荷叶、粉红莲、银纽丝等关于男女生活淫逸情态的歌曲。官僚贵族的园亭建筑，正德嘉靖以后，南京园亭有一百多所，苏州有好几十所。盖花园、筑假山，一时成为风气。明代前期禁止官吏嫖妓女，正德嘉靖后禁令成为虚文了。文人捧妓女成为风气，甚至选妓女为状元、探花。《儒林外史》所写的也就是当时风气的反映。戏剧方面，男戏之外，又有了女戏，南曲盛行，士大夫多蓄戏班，写剧本。后期盛行赌博，官吏、士人至以不会赌博打纸牌

为耻。

再从政治方面来看，《明史》《循吏传》序提到明初休养生息、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嘉靖隆庆以后做官讲资格，吏治既以日偷，民生由之日蹙。私人记载如明末陈邦彦的《陈岩野先生集》卷一《中兴政要书》《保民篇》第三称嘉靖、隆庆前，士大夫敦尚名节，游宦归来，问他赚得多少钱，他要生气；此后则自大吏以下做官等于做买卖，商较赚钱多寡，公开不讳，故官到富饶地区，群相酒宴庆贺。贪污少者，回家时人们都加以耻笑。念书为了做官，做官为了发财，成为当然的事。升官主要靠行贿，时称“送礼”。所谓送上黄米，白米若干担，即指送黄金，白银若干两。后来改称送书若干册，叫做“书帕”，送书时附上金银。因此，到地方作官上任先刻书，书刻得很滥，很粗糙，有很多书都是乱抄一起，没有什么道理。

以上这些例子说明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化，即手工业、农业、商业的发展，影响到了各个方面。大地主把一部分从土地剥削所得的投资于工商业，因之过去遭受鄙视的商人，地位也提高了。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也都逐末营利，经商成为风气了。商人的奢侈浪费的生活，造成社会上的繁荣现象。封建礼法和秩序开始受到冲击了。从而文学戏曲方面也出现了反映这种社会生活的作品。

六、货币经济的发展

在明代以前，白银已部分使用。元朝曾用钞，明初铸铜钱，社会上已习惯用钞，反而不习惯用铜钱，只好仍然用宝钞。不久由于钞币发行无限制，通货膨胀，钞价贬值，由一贯钞值银一两

贬至只值一、二个钱。钞法失败，铜钱又不便于大量和远地的交易，于是白银日渐流通于市场，社会对于白银的需要日趋迫切。

明初赋税收实物粮食。每年北运四百万石至北京，运费都由农民负担，运费数倍于粮食。每石粮食由浙江运到南京，运费二、三石，由北京至北边边境运费三、四石。至英宗时有些地方税收开始改折“金花银”，四石粮食折交一两银子，所收银两用作赏赐戍边官兵费用。这样实际上大大节省了一笔运费，对地主和人民大有好处。

由于国内市场扩大和税收折银的结果，银两不敷使用，出现了采银高潮，政府征发许多人夫，到处开银矿，苛征勒索，引起各地农民的反抗。

通过对外贸易的出超，大量白银输入了。西班牙人从墨西哥运白银至吕宋，由吕宋转运中国，换取丝织品和磁器。到后期墨西哥银元也大量流入中国。

经过长时期的采银和对外贸易的收入，到万历初年，将田赋改写一条鞭法：赋役合一。大部分地区赋税和徭役改折银两。

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远距离的大量交易需要共同的货币做媒介，白银普遍地应用起来了。这种情况，也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

七、文学作品的反映

唐宋传奇小说的主角主要是官僚、士大夫、文人等等，写市井人物的很少。到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以市井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例如白蛇的故事，在《西湖三塔记》（《清平三堂话本》）

中的三怪是：乌鸡、水獭、白蛇，男主角是将门之后——奚宣赞（岳飞手下将官奚统制之子），而《洛阳三怪记》（《清平三堂话本》）中的三怪是：赤斑蛇、白猫精、白鸡精，男主角却是开金银铺的老板——潘松了。流传到现在的白蛇传，只剩下二怪，白蛇和青蛇，男主角则是开生药铺的许仙。故事的主角从将门之后的奚宣赞转换为开金银铺的老板，到开生药铺的许仙，这一变化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又如《金瓶梅》，是万历二十二年以后的作品，写嘉靖、万历年间的事。主角西门庆也是开生药铺的。与西门庆来往的簪片、清客都是官僚地主的后人，原来地位比西门庆为高，后来没落了，成为西门庆的门客。《三言两拍》中，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倒运汉巧遇洞庭红》等，也都是当时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反映。研究资本主义萌芽，还必须从文学作品中发掘这一类的材料。

总的说来，上述这些问题，是明代以前所没有发生过或发生过而不很显著的。当时人也明显地感觉到正德、嘉靖前后所发生的这种重大变化。关于这一类材料，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是应该考虑到的。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组织更多的人力进行艰苦的劳动，搜集和整理出更丰富的材料，进行认真严肃的研究。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以上的意见不很成熟，只供参考。

（原载《光明日报》1955年12月22日）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 萌芽及其增长

尚 钱

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

中国社会在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是否有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存在的问题，过去还没有很多的同志从事研究。最早的如吕振羽同志在其所著《简明中国通史》中就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自由商人（市民）的活动，国内外市场的扩大，肯定了明代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其次侯外庐同志在其所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就清初学术思想的反映，曾提出在封建社会的内部，已经有了新的东西，出现了“城市异端”，肯定了明末之际中国社会已有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萌芽的存在。

我们在讲授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历史课程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过去学者的研究，自1950年即提出远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已有资本主义最初的萌芽。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呢？

据我们的看法，所谓资本主义，即在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

段出现的人们相互间一定的关系，并且不管人们在比较的各个范畴的发展程度大小如何，当这种关系开始存在时，我们就可以看见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并渴望着购买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他所占有的价值量；另一方面是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自由”的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两者由相互对立而发生接触的关系就是资本的关系，也就是在一个地方，或在同一的工作场所，在同一资本家的命令之下，被雇佣的较多的劳动者，生产着同种商品的关系。马克思称这种关系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自然，在这种关系之下，我们所说直接劳动者的“自由”，指的是就他已脱离了生产资料^①，再不受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及行会、师徒等封建关系的束缚的意思。

如果这种关系，可以称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最初有这种关系萌芽的现象，并不晚于西欧。在西欧，这种资本主义最初萌芽在十四十五世纪，已经在地中海沿岸若干城市，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意大利的佛罗伦斯、米兰、威尼斯等城市，在十四世纪中叶所出现的手工业作坊。如佛罗伦斯城拥有一二十个工资劳动者的呢绒作坊有二百家以上。它们由简单协作，每年能生产呢绒四万匹。

这种类似的现象，中国早在南宋末和元初，就已隐约看到。就生产工具说，在这一时期，中国江西地区出现了水转连磨。这种工具，当时是专门用之于对外贸易的制茶手工业的。据元初王桢《农书》，把这种制茶的磨改作制米的碾，^②“日得谷食，可给千

^① 在东方，在较晚时期俄罗斯也同样，而且这种劳动者，有时还保有一点耕作经济。

家”^①。在北中国同时也出现了水转大纺车，可以“日夜纺绩百斤”。而当时中国繁盛的大商业城市，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南京城“大半经营商业”，“出产生丝，织成大量的金线布，并有各种各样的花样”，镇江府的居民也是以工商业维持生活，重要手工业是“绉缎和金线布”，常州较镇江为大，“产生丝甚多，并用以织成各种分量和花样的绉缎”，苏州的丝织业就更繁荣，“周围有二十里，居民有巨量的生丝，不仅以之制成绉缎，供自己的消费，……并且还运销其他市场。他们中间有一些富商大贾，而居民数目之多真是惊人，然他们……只以工商为务。在工商业上的确表现很大的能力。”这里，他虽说明了这些丝织业制造是商品生产，但还不明确这些手工业中的劳动者的性质。在当时的杭州，他却给了我们比较明确的概念。杭州是当时中国最繁庶的大商业都会，他描写当时杭州的情形，除各街道无数商店外，还有十二种发展较高的手工业，每种手工业都有较多的手工业作坊。这些作坊中，拥有劳动者十人、十五人、三十人，乃至有少数大作坊，竟拥有四十个工资劳动者，“各受主人支配”。他叙述这些作坊中的生产关系说：“这些工场中富裕的手工业主人并不亲自劳动，且表现缙绅的风度，装腔作势地撑起架子来。他们的妻子也同样不作工。……只要他们有了财富，可以雇佣工人经营父亲的职业，自己不必亲自劳动。他们的住宅建筑华丽，并且雕梁画栋地装饰起来。……花在……建筑上的费款确有可观。”

不过，这种生产关系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的关系还很难说。因

^① 王桢：《农书》。

为从工人“各受主人支配”的话来看，究竟手工业主人对于劳动者“支配”到如何程度，是否是人身依附的关系？抑或是“资本家的命令”？都有可能。同时，这些劳动者，是否仍受行会的束缚，都不够明确。另一方面，由《东京梦华录》所载，“凡雇觅人力，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雇，觅女使，即有引至牙人。”《梦粱录》亦记“凡雇倩人力，俱各有行老引领”，劳动者似乎还没有完全脱离封建行会的束缚。就是说，劳动者似乎还不是“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商品的所有者，至少是不完全的所有者。

《马可孛罗游记》所记载的，是公元1279年前后的情形。由于马可孛罗是生长于比较中国落后的威尼斯^①，对于当时中国比较发展的商业经济和大商业城市，处处流露惊异的口气，有时候或有些夸大，如对于人口数的估计就是如此。对于手工业的描写，因为在他是一种新奇的事物，虽然是比较真实的，但因他是元朝的官吏，当然不会有很深入的认识。不过，在他所描写的这一地带，正是中国在以后的年代里，史不绝书的工商业最繁荣的所谓苏杭三角地区。由此可以推知，正是这个商品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为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这一地带的繁荣，不久之后便在元朝强暴统治下遭到残酷的破坏，如杭州在1290年以后，繁荣的城市数毁于兵燹，造成“昔时歌舞之地，悉为草莽之墟”（陶宗仪《辍耕录》《占验》条）。但它虽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中断和社会秩序的破坏，却并未能完全阻绝已有生产的发展。如吴兴双林镇，在元代，《双林镇志》

^① 马可孛罗的父亲和叔父都是意大利威尼斯商人，他对于工商业特别注意。

卷一六《物产》条载：“有绢庄十座在普光桥东，每晨入市，肩相摩也。”到了十四世纪中叶，即元末农民大起义时期，杭州被方国珍解放后，一种新形式的丝织业生产设置着四五具丝织机，就开始见诸记录了。徐一夔在其所著《始丰稿·织工对》一文中记载杭州相安里的丝织业作坊，在一所朽旧衰老的住宅中，十多个工资劳动者，在机户主人的压迫之下，为着自己及家人的生活，夜间劳动到深更，累得面黄肌瘦，“苍然无神色”。由这里可以看见手工业主人对工人剥削是如何残酷。在同一文章中，也反映出技艺高明的熟练织工，还有选择其他资本家“倍其值而佣之”的自由。从这里，我们开始看到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者从封建义务和行会束缚解放出来的运动”的现象存在。紧接着，由于中国农民杰出的领袖朱元璋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恢复中华”和“复汉官之威仪”的政治号召下，团结了一部份有民族意识的地主阶级士大夫分子，率领着广大农民群众，推翻了元朝以后，不仅解放了元朝统治下的农奴和工奴，而且为着保证自己政权的巩固，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明帝国。这个强大的政权的建立，主要的为着防止被赶走的蒙古族卷土重来，镇压坚持附和蒙古或张士诚、方国珍等反对明帝国的顽固地主的反动，以及打击元朝时代落后习惯所造成的官吏残暴贪污作风，和保障明王朝对农民和手工业者所作的一些让步政策的实行。特别是他的统一币制，发行大明宝钞，设宝源局铸钱，提高铜钱的质^①。

其次是罢官家垄断铁冶业，令民自采而岁输课程“三十分取其二”，这就使中国社会经济，在南宋亡时那样的基础上获得了

^① 洪武间铸钱的则例，百分之百用铜，完全不用其它低级金属，虽未能完全实行，但对元时币制混乱状况，却有一定澄清作用。

迅速的恢复与发展。适应着国内市场的恢复与发展的要求，通西域的道路为帖木儿帝国所阻塞，开始了郑和七下西洋“取宝”^①的探险大航行，基本上建立起中国通南洋群岛、印度、波斯、阿拉伯及非洲的航路。

于是，到了十六世纪初叶，中国工商业已经恢复和发展。洪熙、宣德年间（1425—1435），国内约有三十三个大商业城市。这些城市之间交通和交换的发展，加上海外市场的开拓，若干种生产品，如丝织品、瓷器等，已成为亚洲国际市场上的主要商品。因之货币需要量增加了，银币成了普遍交换手段。这，一方面刺激着对金银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刺激着资本主义的手工业作坊和工场进一步的发展。明初，统治者虽因掌握的金银数量不足，企图禁止用银，而袭用元朝的钞票制度，并铸铜钱以为辅币，但为着吸收金银，“商税鱼课仍征银”^②。民间交易，也始终都用的是金银^③。至英宗即位时（1436），就被迫不得不放榜用银的禁令，于是白银便成了上下人等谁也不能缺少的物品。

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情况之下，前述中国丝织业中心地区的苏、杭、湖、松、常诸府一带的丝织业，因之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到成化末年（1487）杭州张瀚的祖父张毅庵，由资本银一锭，购机一张开始，织诸色绉币，获利润能高达五分之一，因之，积两旬又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机。其后，“四祖继业，各

① 《明史·夏元吉传》。

② 《明实录》，《宣宗实录》卷八〇，宣德六年六月甲辰浙江温州知府何文渊言。

③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二五一，“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禁民间不以金银交易，时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由是钞法阻滞，公私病之，故有是命”。

富至数万金”^①。这种资本急剧增殖的情形，正说明明中叶因国内外市场的发展，刺激丝织业商品生产中扩大再生产的速率是惊人的。

正德（1506—1521）前后，苏州“郑灏尝娶后妻，设席，既罢，失去一银杯，重数两。其家织帛工及挽丝佣各数百人，欲自明其非盗也，相率列名书状为誓，投之城隍神祠。灏止之不得，亦不复觅杯（后发现杯系灏之孙儿所偷）”^②。在雇有几百位工人的郑灏织绸手工厂中，至少已采用“挽丝”和“织帛”的初步分工，这里，资本主义的单纯协作已经变为资本主义的工厂手工业了；这些佣工的身份和行动都是“自由”的，因为他们能团结一致，为抗议资本家郑灏侮辱他们的人格而进行斗争；尽管采取的是设誓的方式，也迫使资本家“止之不得，亦不复觅杯”。

到了明代末叶（十七世纪初），苏州丝织业更加发展，府城之中居民大半工技，这就是“比间以纺织为业，机声轧轧，子夜不休。贸易惟棉花布……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而农村被排挤出业的手工业者，即“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相望，如流民相聚，粥后俱各散归。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③。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丝织业已有相当细密的分工，而工匠也各有专能，同时，劳动市场已有相当的规模。在这里，我们就明显地看见，由于市场

① 张瀚：《松窗梦语》卷七，《异闻纪》。

② 陆燾：《庚巳编》卷四。

③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七六，《苏州府部·风俗考》。

的扩大，大量商品的供给，就使“同一手工业者依照时间的次序，顺次作各种工作的方法不行了。工作被分割开来，个别化了，成为空间上并存的了。每一种工作，分给一个手工业者，其全部则由协作者同时进行。这种分割，最初原是偶然的。但这种偶然的分割愈实行，愈能表示它的特别优点，因而渐渐硬化为系统的分工”^①。这种情形到明中叶以后，究竟进行了多么长久的时间，现在无从稽考，但从上面这些材料看，已经是丝织业中普遍的现象了。

随着丝织业专业城市苏州府发展起来的，还有江南丝织业专业重镇——盛泽镇^②。明代说部《醒世恒言》记载嘉靖年间（1522—1566）这个市镇丝织业异常繁荣，街市经常是蜂拥蚁集，拥挤不堪；机户已有大户小户之分，远近商贾趋之若鹜，因此吸引着市镇四周的远近农村家庭手工业都来此上市。而市镇的丝织品交易都控制在牙行之手。他们领着商人到“大户”去包买，小户则把绌匹送到牙行去出售。光是这种绌丝牙行即有“千百余家”之多。特别是这篇说部记录的一个施姓小户，由一张机，资金银一锭（五十两）六年后就增加到三四张机，此后不过十年就积累到数千金资本，开起三四十张绌机的资本主义的手工业工场或大作坊。明末周栻《盛泽》诗：“吴越分歧处，青林接远村，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逐利民如鹜，多金贾自尊，人家勤机杼，织作彻昏晨。”^③

康熙二十三年《吴江县志》卷十七《物产》也载：“绌罗纱

① 《资本论》第1卷，第406页。

② 据《盛湖志序》，陶保潜说：“前明吴江县尚无盛泽镇，嘉靖以后，居民渐众。”

③ 《盛湖志》卷二引。

绸出盛泽镇，奔走衣服遍天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肩连袂，如一都会矣”。由此可见，《醒世恒言》所反映的盛泽镇，实系明末之情况。据《乌青文献》载：“蚕毕时，各处大郡商客，投行收买。平时则有震泽、盛泽、双林等镇机户零买，经纬自织。又有贸易诣各镇卖于机户，谓之贩子。”这种贩子，实际上就是操纵家庭手工业的包买商。

由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辉煌例证。它具体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的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如表现在简单协作形式的商品生产；其次，它又说明，“由于商品经济而积聚在各别私人（‘包买主’和商人）手中的‘储金’怎样变为资本，首先是垄断着销路，因为只有这种‘储金’所有者才拥有为批发出售所必要的资金，使得他们能够等待时机把商品拿到远方市场去销售；其次，它又向我们说明，这种商业资本怎样奴役着大批生产者并组织着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组织着资本主义的家庭手工制的大生产”^①因此，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苏州织工被迫起来反抗明统治阶级的惨重榨取和压迫时，江苏巡抚曹时聘说：“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又说：“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②在这里，我们不仅看见了苏州府城的织工与染工的数量之大，而且从曹时聘的奏疏中，我们也听见了后代作为资本家代言人欺骗工人的声音。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第111—112页。

^②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还有，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苏州机户的变化。如万历“癸未甲申间（1583—1584）临邑邢子愿（侗）以御史按江南，苏州有富民潘璧成之狱”。这个潘璧成家致富的原因是“潘氏起机房织手，至各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①。同时，张瀚的《松窗梦语》卷四也记载着：“余尝总览布利，天抵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纴，而三吴为最，即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

这些材料不仅反映出丝织业织工和织户的分化，而且反映出由丝织业发展起来的机房主人，有的富致百万，有的富致数千金。这些豪富的存在，决不是对于社会和政治没有影响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

其次，就棉纺织业说，顾公燮叙述棉纺织业中心城市松江的情形说：“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②由此可见随着棉纺织业的发达，与之有关的专业和商业资本也随之而至，或以其资本来组织家庭手工业。棉纺织业还不囿于丝织业，因为它是一般人民生活必需的资料，因此，在这棉纺织业的中心地区的情形，根据明末清初叶梦珠所辑的材料看，已经成了当地社会经济的重要部份。

“吾邑（上海）地产本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绩成布，蒙被天下，而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故种植之广，与粳稻等。”^③又说：

“棉花布，吾邑所产，已有三等，而松城之飞花、无

① 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八，〈守土吏狎妓〉条。

②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芙蓉谱》。

③ 叶梦珠：《闻世篇》卷七〈上海掌故丛书〉。叶梦珠所记系明末情况，清顺治年间，这一带棉织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一度衰落，康熙以后才逐渐恢复。

敷、眉织不与焉。上阔尖细者曰标布，出于三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邑城为下，俱走秦、晋、京边诸路。每匹约值银一钱五六分，最精不过一钱七八分，至一钱而止。……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挟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率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牙行非藉势要之家不能立也”^①。

棉纺织业不仅松江，即在嘉定太仓一带也很发达。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松江出现了棉布的再制品——暑袜店百余家。“松江旧无暑袜店，暑月间穿毡袜者甚众，万历以来，用尤敷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走。故郡治四郊广置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糊植尚亦便廉新巧”^②。又：“郊西尤敷布轻细洁白，流肆取以造袜，诸商皆置肆于四方，号尤敷暑袜，妇女不能织，多受市售，为之感织。”^③褚华在《木棉谱》中自叙其家由明代起做布商，主要的是包采布匹：“明季从六世祖，……精于陶埴之术，秦晋布商皆主于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集其格成行，时，辄以银与布辄载而去。其利甚厚，以致富里余邑，至国初犹然。……商业资本在怎样组织着家庭手工业和作坊，这些现象就明显地告诉了我们。”

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决不只是在丝与棉纺织业这两方面，作为世界贸易商品的瓷业制造业，表现的就更其明显。就以用景德镇瓷器中心城市景德镇来说，景德镇瓷业的繁荣，发

① 叶梦珠：《阅世篇》卷七《上海掌故丛书》。叶梦珠所记系明末情况。清顺治年间，这一代棉织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寸草不生，康熙以后才逐渐恢复。
②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
③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九六，《松江府部》。

展成市场广阔十三里许，烟火于十万家的大专业城市^①。王世懋说：“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尝以分守督运至其地，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②。全市陶户除官窑外，民窑有二三百区之多。其中陶户与市肆（商户）占镇上的户口数当十之七八，匠人不下数十万人。而且这些匠人都是“四方远近，挟其技能以食力者”。至陶瓷的制作，内分工已十分细密，如淘泥工、拉坯工、印坯工（拍模的）、饬坯工、画坯工、上釉工、春灰工、抬坯工、烧窑工、开窑工、乳料工、砂土工、填彩工等等，约数十部门。其分工之细，由宋应星所说，“共计一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③可见一般。同时还有专业作坊，如上古器作，中古器作，鞞器作、洋器作、雕镂作、定单器作、仿古作等。（作者，一户所作器也，各户或有兼作，统名曰作。）此外，还有随着陶瓷业发展起来的各业的专业户，如柴户、匣户、砖户、木匠户、箍匠户、铁匠户、修模户、盘车户、磨刀户等等。至于工人的工资待遇，则因工之粗细差别甚大，如砂土工之挑瓷土，由一百六十余里的远路挑到景德镇，每百觔仅工食二分^④。又如乳料工，每料十两一钵，经月始能用，工资每月三钱，若“两手乳两钵，夜至二鼓者，工值倍之。”^⑤

其次，不论是官府或私人资本家陶户对于陶工的防御是十分严密的。他们为着镇压工人反抗，还设有工头来监督工人工作。

① 《陶录》引黄墨舫《杂志》。

② 王世懋：《二酉堂杂录》。

③ 《天工开物》商务版，第144页。

④ 《江西通志》。

⑤ 唐英：《陶冶图说》卷十。

“户坯作人众，必用首领辖之，谓之坯房头，以便稽查口类，出入雇人，其中有众坯工多事，则令坯房头处平；有情工坏作，亦唯彼是让。”^①

发工资有定期，有扣留，防备工人怠工。

“坯房发给人工，其为地下印刊作坯等工，则皆四月内给值，十月找满，年终再给少许。其为画作上工，则按五月底节，七月半至十月半及年竣分给。至供饭一例，则陶镇皆三月朔起有发市钱。”^②

“坯工多事问坯头，首领稽查口类陶，三月有钱称发市，年终找满情工愁。”^③

陶瓷业手工工场就其结构而言，是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经营，根据上述记录是毫无疑义的。但从工资之低，发工资的限制及坯房头管制之严上看，景德镇的陶瓷工人身上，还压着沉重的奴役负担。而且陶户还经常倚恃地方势力，不给工资，并强迫遣散工人^④。

综上所述，从丝织业、棉纺织业及陶瓷业上看，就其结构说已经都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但就工人的性质说，因为压在劳动者身上的，除资本外，还有奴役，封建关系的媒介等，因而还带着浓厚的工役雇佣的性质。其他如冶铁业、制茶叶、制盐业，无不如此，这里不必列举了。自然，这些城市手工制资本主义经

^① 清嘉庆间蓝滨南著《陶录》，该书不仅记述作者所见，并综合摘录前人有关景德镇陶瓷业的记载，其中有一部份反映了明代的情况。

^{②③} 《陶录》。

^④ 《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五〇载：嘉靖二十年（1541）“六月辛酉，初江西乐平县民尝佣工于浮梁，岁饥艰食，浮梁民（陶户资本家）负其衙直，率遣逐之，遂行劫夺，二县凶民，遂各集党千余，互相仇杀。”由此可见，不仅陶户还依恃地方的封建关系，无理关窑，遣散陶工，不给工直，陶工亦依恃地方封建关系进行反抗斗争。因此，这一阶级斗争，便被蒙上一层封建地区的仇杀的烟幕。

营，即工役制与资本主义制结合的存在。特别是丝织业与棉纺织业的原料，完全依靠农村，因此，它就不能不影响到农业生产及改变农业经营方式。

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渗入农村

马克思指示我们说，资本主义的发生不是在农业中，而是发生在城市手工制造业中。农业生产上的资本主义的萌芽，是由城市手工制造业的发展渗入到农村的。我们考察明代的农业生产中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存在，与城市手工制造业的发展相对照来看，却正是这种情形。

首先，就丝织业和棉织业发展的中心地区江南一带的情形看。由于丝织业和棉织业的商品生产的发展，需要桑棉农业生产原料的供应，因此就影响到农业上桑棉种植的发展。如湖州的情形：“湖俗以桑为业，而（菴）处士治生喜种桑，则种桑万余唐家村上”^①。据《吴兴掌故》：“蚕桑之利，莫盛于湖：大约良地一亩可得叶八十筒，每二十斤为一筒，计其一岁垦锄壅培之费，不过二两，而其利倍之。”^②又“归安诸乡统力农，修蚕绩，极东乡业织，南乡业桑，西乡业薪竹，北乡负郭东业蔬菘，荻港业藕，湖跌断头业苇，埭溪业苕，善连业笔，菱湖业蚕，捻丝为缙尤工”^③。又“湖民力本射利，计无不悉，尺寸之堤必树之桑，环堵之隙必课以蔬。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而别墅山

① 唐顺之《荆川集》卷十六《茅处士妻李孺人合葬墓志铭》。

② 徐献忠《吴兴掌故》卷十三《物产类·香桑条》。

③ 《湖州府志》卷二十九《輿地略·风俗》转引《归安唐志》。

庄求竹木之胜无有也”^①。而桑叶生产，如茅坤在与甥顾御史书中说得比较明确：“大略地之所出，每亩上者桑叶二千觔，岁之所入五六金；次者千觔，最下者亦不下一二金”^②。桑叶的需要既有时间性的限制，又为蚕丝业之必要物质，所以桑值受市场自发性的支配很厉害。

“叶之贵贱，顷刻天渊，甚有不值一文委之道路者。”^③

在另一方面，则有遍购不得者：

“湖州人以养蚕为生，……弘治中……（大姓伍氏）……其家每岁畜蚕，因蚕多桑薄，饲之不继，乃弃蚕十余筐，瘞之土中，……（命家丁三人）驾船往市桑叶，不得，舟还。”^④因此，畜蚕之家，为着保证桑叶的充足供应，就出现了预租桑叶的办法。朱国桢著《涌幢小品》记载着：

“湖之畜蚕者多自栽桑，不则豫租别姓之桑，俗曰秒叶。凡蚕一觔用叶百六十觔。秒者先期约用银四钱，既收而偿者约用五钱，再加杂费五分。蚕佳者用二十日，辛苦收丝，可售银一两，余为绵为线，矢可粪田，皆资民家切用。……本地叶不足，又贩于桐乡洞庭，价随时高下，倏忽悬绝。……故栽与秒最为稳当，不者谓之看空头桑。”^⑤

这些材料不仅告诉我们随着丝织业的发展，农田也转入了为丝织业原料生产的过程，而且受市场自发性的支配很厉害。其次，就其经营方式来说，“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当然是

① 《湖州府志》卷二九，转引谢肇淛《西吴枝乘》。

② 《乌青文献》卷九引。

③ 《湖州府志》，转引《东林山志》。

④ 《治世余闻》卷四。

⑤ 《蚕报》卷二。

丝织业的豪富以其雄厚的财富，排挤小农所造成的。从其经营桑田的方法看，点滴（包括肥料在内）都连续到市场的价格和利润的计算，就恰恰是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下才会出现的。马克思指示我们说：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跟着社会分工也发展的地方，种子甚至一部分肥料，当作商品加到再生产过程里面去的，为了要得到补偿，必须购买进来。”^①

由此可见，就明代中叶以后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增长的个别地区城市手工制造业与农业土桑田的经营，互相配合着看，已经在萌生着原始积累的现象。

其次就农村植棉业来考察，亦无不然。关于植棉，除上述的松江府地区盛种木棉以外，全国各地尚多种棉之区。

“（棉花）至我国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②

“窃惟三区虽隶本县（昆山），而连亘嘉定迤东沿海之地，号为冈身，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土人专事纺绩。”^③

“嘉定……地产棉花”，“其民独托命于木棉。”^④

太仓也是“近年郊原四望，遍地皆棉”（《太仓州志》卷一四）。“棉花（八月熟）……，九月中，南方贩客至，城中男子多轧花生业。”^⑤

① 《资本论》第3卷，第1028页。

② 《农政全书》卷三五引邱浚《大学衍义补》。

③ 归有光：《震川集》卷八，《论三区赋役水利书》。

④ 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苏松引《嘉定县志》。

⑤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

植棉的地区不仅江南，河南也是棉产的重要地区，但因其本地棉织业不发达，就变成了江南棉织业的原料供给地。就明初河南南阳大经营地主李义卿的经营看，可知一般：

“南阳李义卿文达公，贤之曾大父也。家有广地千亩，岁植棉花，收后载往湖湘间货之。是时价颇贱，停于邸舍，越三月，适临江三商议值三百两交易讫。”^①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初。^②

山东兖州“地多木棉，……转贩四方，其利颇盛”，又“鄆城县……土宜木棉，商贾转鬻于江南，为市肆居焉。五谷之利，不及其半矣。”^③

此外，如茶叶的生产，亦十分繁盛。《明史》卷八〇《食货志》载：“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商人于产茶地买茶，纳钱请引，引茶百斤，输钱二百，不及引曰畸零，别置由帖给之。”这种茶引，后经多次变动，都表现出明统治者与茶商的斗争。而此处所欲阐明者，为产茶的地区，据记载：“其他产茶之地，南直隶：常、庐、池、徽；浙江：湖、严、衢、绍；江西：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广：武昌、荆州、长沙、宝庆；四川：成都、重庆、嘉、定、夔、泸。”其他行于北边者，如汉中、金川、石泉、汉阴各县之茶；行西南边区者如四川之巴、松、茂、碉门。广东的茶生产，“珠江之南，有三十三村，谓之河南，其土沃而人勤，多业艺茶”^④。福建的情形，《天工开物》载：“闽人种山皆茶蓝，……山中结箬篓，输入舟

①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近古录》卷一。

② 参看《经世文编》卷三六，尹会一《教陈农商四务疏》。

③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三〇，《兖州府部·风俗考》。

④ 《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

航”。以此，可知茶商品生产之普遍。更就制糖的甘蔗看，明末清初人屈大均叙述明清之际广东蔗的生产情形说：“糖之利若溥。粤人开糖房者，多以致富。盖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矣。”糖的制造很精细，销路亦很广，“最白者售于东西二洋曰洋糖，次白者，售于天下”^①。《天工开物》并谓：“凡甘蔗有二种，产繁闽广间，他方合并，得其十一而已”。其种蔗业的繁盛，实足惊人，《闽大纪》卷一载“种蔗皆漳南人，遍山谷”。《广东新语》称“筓林河西甘薯白紫二蔗，动连千顷”^②。因此，由于糖的市场大，在福建已呈现排挤食粮生产的趋势，“其地为稻利薄，蔗利甚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③。蓝靛的生产，《天工开物》载“闽人种山皆茶蓝”，又“青靛初出闽中”。关于蓝靛的产销情形，《图书集成》载：“（赣州城南人）种蓝作靛，西北大贾岁至，泛舟而下，州人颇食其利”^④。福建的蓝靛尤为驰名：“靛出于山谷中，种马蓝草为之，……利布四方，谓福建靛。”^⑤红色染料的红花，则盛产于闽、粤、江南一带^⑥。其他如“淡把姑烟草，万历末有携至漳泉者，马氏造之，曰‘淡肉果’，渐传至九边，皆衔长管而火点之，吞吐之有醉仆者”^⑦。又：“烟叶其初亦出闽中，予幼闻诸先大父云，福建有烟，吸之可以醉人，号曰干酒。……崇禎之季，邑城有彭姓者，……种之于本地（上

① 《广东新语》卷二七《草语·蔗》。

② 《广东新语》卷二《地语·茶园》。

③ 《泉南杂志》卷上。

④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九二三，《赣州府部·物产考》。

⑤ 《八闽通志》卷十一。

⑥ 《天工开物》。

⑦ 《物理小识》卷九，《草木类》。

海)，采其叶阴干之，遂有工其事者，细切为丝，为远客贩去”^①。是烟叶的生产，在明末已由福建而到江南地区，乃至九边，甚至不能禁止了。”烟草出自闽中，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人至以匹马易烟一觔，法轻利重，民不奉诏。寻令：犯者斩。然不久因边军病寒无治，遂停是禁。予儿时尚不知烟为何物，崇禎末，我地（嘉兴）遍处栽种”^②。福建广东的商品作物重要的还有果树，如荔枝、龙眼、桔、柚、香蕉、橄榄以及各种香草香花之种植，兹举一二例以概之：“番禺鹿步都自小坑火村至罗岗三四十里，多以花果为业。……每田一亩，种柑桔四五十株。……熟时，黄实离离，远近照映，如在洞庭包山之间矣。自黄村至朱村一带，则多梅与香蕉、梨、栗、橄榄之属，连岗接阜，弥望不穷。……番禺土瘠而民勤，其富者以稻田薄利，每以花果取饶。”又：“自海南之平浪三山而东一带多龙眼树，又东为番禺之李村、大石一带多荔枝树，……蔽亏百里无一杂树参其中。地土所宜，争以为业，称曰‘龙荔之民’”。^③

这种农业上的商品作物的生产，据屈大钧叙述说：“东粤故多荔枝，问园亭之美，则举荔枝以对。家有荔枝千株，其人与万户侯等。”又说：“广人多衣食荔枝、龙眼，其为枋箱者、打包者各数百家。舟子车夫皆以荔枝龙眼贖口。……作人多向彼中买卖，而予亦常为荔枝小贩”。这些材料就说明了闽粤农业生产，到明末商品生产不仅已在排挤粮食生产，而且在改变着农村的生活与习作。再如种排香草的农人，由于“重排草其利甚厚”，不

①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六，《种植》。

② 《蚓庵琐语》。

③ 《广东新语》卷二五，《木语》。

惜以重价佃种沙亭乡江畔有沙的土地^①。至于“重价”如何计算，在同书《蒲葵扇》条，可以得到说明：“新会之西沙头，……诸乡多种之，名曰葵田，周回二十余里，为亩者六千有余，岁之租，每亩十四五两，中人之产，得葵四十亩，亦可以足衣食矣。”蒲葵是制扇的原料，种植后五年始割下叶，八年始割上叶，割下后加以精制：“缘之以天蚕之丝，嵌之以白鳞之片，新之以青珊瑚之牌，缠之以龙须藤之线，铜钉漆涂，绘画为绚。然后粗者以货于近，精者以货于远。”因此，“凡新会若男与女，所以资生者，半出于蒲葵焉”^②。这里在高额货币地租下的佃耕葵田的农民，不仅不是小农，已经是富有资财的租地农业家了，因为没有一定的资金，不仅不能维持五年或八年的高额地租金，而且也不能维持生活。

自然，资本主义生产的经营方式既渗入农村，所影响的不仅只是作为城市手工业原料的桑、棉、茶、蔗、花果、香花香草等商品作物的经营方式，也影响一般的农业经营方式和改变着农村的生产关系。

首先，我们看看明中叶嘉靖四十五年（1566）常熟的一个大经营地主钱海山之覆败纪录，可以看见他所兼并其他地主和小农的土地，组成甲第庄大小四十余处，课租田亩三万有余，财货山积，家口千计。但因他世居傍江，为海盗及被迫劫掠的盐丁出没之所，由于他需要廉价的劳动人手和佃客，这些海盗和盐丁就乘隙或租赁他的房屋居住，或伪充劳动者受他的雇佣，或租佃他的土地为佃客以作掩护，依旧从事劫掠，而海山未察。因此，到这

① 《广东新语》卷二六。

② 《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

些人的劫掠败露，他便被其他豪强地主，或曾遭到他侵夺的地主，乘机起来“指称窟穴，腾播人耳”。接着就勾结官府，群起“分拉之”。于是，原来为他侵占他人的许多大村庄，如许庄、马路庄、李庄等等，“亦遂归原主，竟非钱氏有也”。从钱海山的经营，系以雇佣劳动者为主要劳动力，佃户亦与他无隶属关系，与其“财货山积”上看，这种生产关系就完全不是中世纪的农奴与地主的关系，同时，他的大地产也不是自然经济的整体了。

其次，与钱海山同时，常熟湖南人谈晓、谈照兄弟等对土地的侵占与经营，就更明确地表现出经营地主的经营形态。根据谈晓兄弟传的记载，他本为农家，乘荒年以廉价收买湖乡洼荒之田以万计，雇佣乡民百余人加以经营：“凿其最洼者为池，余则周以高陂辟而耕之，岁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架以梁为菱舍，畜鸡豕其中。”因为池上凉爽，鸡豕不易生病；而“鱼食其粪又易肥。陸之上植梅桃诸果属，其汗泽则种蓼茭菱芡，可畦者以艺四时诸蔬，皆以千计。凡鸟兔昆虫之属，悉罗取而售之。”特别课佃户每户纺织娘若干个，俱以麦秸编笼畜之，运至苏州城出售。其“室中置数十匾，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匾鱼，某匾果，入盈乃发之，月发者数焉，视田之入又三倍。晓、照俱纤音俸费，无纨袴服，非大故不宰割，于是费日益。”他们的经营方法是“穷天极地而尽人”。在倭寇之乱时，谈晓还“献万金以城其邑城”。①

安徽商人吴荣让的经营也不亚于谈家兄弟：

① 《常州先哲遗书戒庵漫笔》卷四，《谈参传》；《常昭合志稿》卷四八，《扶闻》。

“吴处士……歙西溪南人。……奉母帅妻子徙桐庐，卜焦山居焉。处士喜曰：‘此吾畏垒也。’于是部署土著，以身先之，度原隰使田，度山林使种树。山林故多薪木，于时易以茶漆楂栗之利，积薪水泔，以十岁市之，民利视昔有加。……三年而聚，三年而穰，居二十年，居士自致钜万，远近襁至，庶几埒都君云。”①

这就是一个大经营地主不仅“自致钜万”，而且带动乡里从事这种进步方式经营的记录。朱国桢记载吴江经营地主的情形，亦颇相似：

“堤之功莫利于下乡之田。余家湖边，看来洪荒时，一派都是芦苇之滩，却天地气机节宣，有深有浅，有断有续，中间条理原自井井。明农者因势利导，大者筑，小者塘，界以堤，分为塍，久之皆成沃壤。今吴江人往往用此法力耕以致富厚。余目所经见，二十里内有起自手致万金者两家，此水利筑堤所以当讲也。”②

其次，为着明瞭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关系的发展情形，进一步考察土地上的直接劳动者的性质及其与地主的关系是必要的。首先，就嘉靖隆庆时（1522—1572）人王道隆所记湖州情形看：

“成化（1465）以前，谋饔飧者以兴贩为能，……今则市廛以质当相先，……拥资则富屋宅，买爵则胜舆服，钲鼓鸣笳用为常乐，盖有僭踰之风焉。农人最勤，四体焦劳，终岁不休，无恒产者，雇倩受直，抑心殫力，谓之长至，夏秋

① 汪道昆：《太函集》卷四七，〈明故处士吴公孺人陈氏合葬墓志铭〉。

② 朱国桢：《浦幢小品》卷六，〈堤利〉。

农忙，短假应事，谓之忙工。收获之际，公私偿债而场遽空者，十恒七八。”^①

苏州一带农业经营的情形，也是如此。

“吴农治田力穡，夫耕妇馌，犹不暇给，雇倩单丁，以襄其事；以岁计曰长工，以月计曰忙工，诗所谓‘侯疆侯以’也”^②江西宁都一带，农业生产中的雇佣工人也占着很大的比重。魏禧（明末清初人）说：

“吾宁田旷人少，耕家多佣南丰人为长工，南丰人亦俵食于宁，除投充绅士家丁及生理久住宁者，每年佣工不下数百。”^③

不仅江南农业生产上雇佣工人占很大的比重，即在北中国农业上雇佣工人也很普遍。如《醒世恒言》载：

“卢楠田产广多，除了家人，雇工也有整百。每年至十二月中，预发来岁工银；到了是日，众长工一齐进去领银。卢楠恐家人们作弊，短少了众人的，亲自署名亲发，又赏一顿酒饭，吃个醉饱，叩谢而出。”^④

这些材料明确地反映出，明中叶以后有些地区农业经营基本上已采取了资本主义制^⑤，如江南苏杭地区及北方卢楠的经营。

根据河南省的记载，不仅雇佣劳动者占的比重相当大，而且由于这一地区是明末土地兼并最酷烈的地区^⑥，地主对于佃农还

① 《湖州府志》卷二九，《輿地略·风俗》转引王道隆《蕲城文献》。

②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七六，《苏州府部》。

③ 《魏叔子文集》卷七。

④ 《醒世恒言》卷二八，《卢太学诗酒傲王侯》。

⑤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是在于雇佣工人（年工、季工、日工等），这些工人用东家底工具来耕种土地。”

⑥ 参看《中国历史纲要》第329—330页。

残留着超经济的强制的压迫和剥削。

“……梁、宋间，百亩之田，不亲力作，必有佃佃。佃佃者，主家之手足也。夜警资为救护，兴修赖其精力，杂忙赖其使命，若不存卹，何以安生？近见佃户缺食，便向主家称贷；轻则加三，重则加五，谷花始收，当场扣取；勤动一年，依然冻饿。”^①

同时，在许多地区，农业上甚至还残留有早期农奴制的残余。如太仓王世贞叙述其伯母龚太太对农奴的压迫情形：

“孺人质明望裕，坐寝堂，男女大小数千指旅见，各报所业。孺人择其犹惰者与扑，而勤者为劳苦，手治卮酒……领之。……其领者……相勉亡负。其见扑者，望而自赍责……即孺人所任使，亡弗称材。陆葦畜特蹄角以百计，水攀鱼鳖以石计，圃人治果麻芥蔬以顷计，诸水陆之饶，计口程其美，时嬴缩而息之，醴酱盐豉不食者新之，手植之木可梓而漆，寸石屑瓦，必任毋废。以故子母之利归焉。”^②

由此可见，农业上使用的僮奴，已不是秦汉时代的僮奴（即奴隶）。所以这个龚太太采取鼓励劳动兴趣的办法，是“手治卮酒”。惩罚虽然有打，但杀僮奴的事，则为法律所严禁。同时，地主使用僮奴从事生产的记载，在明代还相当多，如吴宽的《匏翁家藏集》、归有光的《震川集》均有记载。而蓄奴僮数量之多，以江苏太仓王锡爵家有奴婢仆从千余人，湖北麻城刘、梅、田、李四家达三四千人，河南褚、范、苗、曹等家亦各有千人以上。所以有的史家说，明末权势之家畜奴之风很盛。

① 吕坤：《实政录》卷二。

② 王世贞：《弇州山人稿》卷八五，〈龚孺人传〉。

当然，这些奴婢仆从虽然不等于古代的奴隶或早期的农奴，但却是这些古老形态的残余，另外却也夹杂着如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成分：

“资本主义制度所要的，正是民众的奴隶状态，是他们转化为佣工，他们的劳动手段则转化为资本。”^①

“要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久的自然法则’，要完成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对极，使人民大众转化为工资劳动者，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转化为近代史上这样一个人为的产物，需要有这种种苦难。”^②

在上面我们简略地考察了，中国社会生产事业由十四到十六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在城市手工业制造中，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萌芽增长的惊人迅速，同时，这种新的因素也渗入了农村。为着适应市场扩大、竞争加强的要求，不仅促进了城市手工业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与发展，同时，也在改变着农村的生产关系。

首先就手工业说，如采银矿，“旧取矿携尖铁及铁锤竭力击之，凡数百下仅得一片。今不用锤尖，惟烧爆。”^③特别是冶铁，在明代已由“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而逐渐改为全部用“铁炭”，即焰平之煤炭。这就使明代的铁的生产量大大超越于前代，从而为农业与手工业准备了空前发展的条件。其次，就纺织业说，《古今图书集成》引《福州府志》：“闽缎机故用五层，弘治间（1488—1505）有林洪者工杼轴，谓吴中多重锦，

①② 《资本论》第1卷，第909—910、960—961页。

③ 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〇六，《广西》二。

阔织不逮，遂改机为四层，名为改机”^①。在纺织业中，《农政全书》引王祯《农桑通诀》卷三十五所载：“搅车两人（元初——一铍），今止用一人；纺车容三纆，今吴下犹用之，间有容回纆者。江西乐安至容五纆。”“玄扈先生曰：今之搅车，以一人当三人矣；所见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二人可当八人。”这些材料所说明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丝织业和棉纺织业的生产工具，从织机、纺车、轧棉花的搅车都有很大的改进。正如徐光启所说：“其他善巧，所在有之，且智巧日穷不尽。后之制作，若能虚访勤求，即吴宫机绝，尚有进乎技者，何况其他”。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渗入农村，农业生产技术，亦有颇多改进。如周亮工《闽小纪》所载：“去闽会二十里，东南隅多龙眼树，三接为顶圆。核之初种经十五年始实，实甚小，俗呼为胡椒眼。妥善接者，锯木之半，取大实之幼芽接之，至四五年又锯其半，接如前。若此三数次，其实满溢，倍于常种。若一二接即止者，形小味薄，不足尚也。三接者曰针树，未接者曰野箸”^②。而这种接枝的特别技术，见于记载者，有广东顺德之陈村。陈村居民不仅多以种“荔枝龙眼为货，以至未富”，而且，“又常担负诸种花木分鬻之，近者数十里，远者二三百里。他处欲种花木及荔枝龙眼橄榄之属，率就陈村买秧。又必使其人手种搏接，其树乃生且茂。其法甚秘，故广州场师，以陈村人为最”^③。至于一般农业工具之发明，技术之改进，徐光启著《农政全书》之《农

① 《考工典》卷十，《织工部》。

② 卷上，《接龙眼》。

③ 《广东新语》卷二，《地语·陈村》。

器》，《农事》之《营治》，以及《水利》各节所载，均超过前代，直到解放前，中国的农业生产工具与技术，一般的尚没有很大的差异。

在商业性农业发展的情况下，土地就必然转入商品流通过程。因此，明中叶以后，中世纪以来的豪强兼并土地，虽仍然存在，但主要的是由土地买卖而产生的高度集中的现象。如江南豪家就有占田达七万顷者，这是张居正在《答应天巡抚论均粮足民书》^①反映出来的，当非虚语。在河南一带，也并不逊于江南，如商邱郑廉所记崇祯十三年情形：“是时中州鼎盛，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就四家而论，曹褚为上，苗范次之”^②。这种土地集中的例子还很多，不必多述。问题在这种形式的土地高度集中，就必然是另一方面失掉土地的人越来越多。早在宣德年间周忱语：“苏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艰窘不得已而遁逃，及其后也，见流寓者之胜于土著，故相扇成风，接踵而去，不复再怀乡土。……天下之民常怀土而重迁，苏松之民常轻其乡而乐于转徙，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③。就是，农村被迫逃亡的人，依其技能工巧到处流亡，有些变成了城市或他处工资劳动者。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之下，不拘是工业或农业，对于雇佣劳动者的剥削，都比封建剥削要好些，就是说，待遇要高些。这就煽动着农民大批地离开农村。这里所说的，虽然主要的是小农，但一般中小地主，在比较强大的经营地主资

① 《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

② 《豫变纪略》。

③ 《皇明文衡》，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

本主义经营压逼之下，而变成半无产者，或走上日趋衰落的道路，也比比皆是。如顾亭林所说徽州的情形也可作例证：“小民多执技艺或负贩就食他郡者常什九。……田少而值昂，又生齿日益，……以故中家而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①

由于资本主义萌芽渗入农村，不仅改变着农业经营方式，把为自己消费而生产的农业，改变为商业性的农业，同时，它也改变着农村的生活习惯。过去，固步自封的农民，到明中叶以后，江南一带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引赵吉士语：“吾闻之先大父曰，嘉隆之世，人有终其身未入城郭者。……有少与处事者，父兄羞之，乡党不齿焉。今（明末）则武断者比比矣。而闭户不出者，即群而笑之，以为其褊褊若此也”。自然，这不是笑的问题，而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一方面明中叶以后，国内各大商业城市的形成，吸引着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在商业资本腐蚀下，利用特权勒索农民，又驱迫着农民离开土地。《苏州府志》引何元朗言：“明初，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乐于农亩，无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给人足，乐于为农。自后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矣。”^②

这就说明了商业性农业经济已开始了与墨守陈规的自然经济的单调性进行斗争，也就是同千百年来家长制农民经济或家长制工役制度开始分离。所以，朱国桢惊讶地说：

^①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二，〈徽州府〉。

^② 卷五，〈风俗〉。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略同。

“近年（万历天启间）农夫日贵，其直增四之一，当由务农者少。可虑！可虑！”^①

但另一方面，“商业性农业的形式，是以最大的多样化而著称，它不但在各种区域中各自不同，而且在各种经济中也有多种多样”^②。因此，就必然引起各种农业区域之间的、各种农业之间的、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如嘉定为产棉地区，《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王锡爵言：“嘉定米不土出，常不能豫具以待事，运船之至城下，舳舻相次如鱼鳞。”^③福建蔗田地区，“稻米益乏，皆仰给于浙直。”所以，一切专业（如丝织、棉织、陶瓷等）城市和市镇，都逐渐变成“百货所辏会”而“不事耕种”的地区。同时，我们知道，农产品越是卷入商品流通，农村居民满足个人消费的工业制造品的需要就增长得越快，因而有些能适应市场需要的专业农村，就有可能发展成工商业大市镇。如前述盛泽镇嘉靖时还是一个小市集，至明末便发展成丝业中心的巨镇。其他如吴江的黎里镇，嘉兴的梅里镇，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宋元时，或明中叶以前都还是很荒凉的小市集，中叶以后便“第宅连云”而“拟诸通邑大都焉”。特别是震泽县的震泽镇，“元时村落萧条，居民数十家。”因均以织绉为业，到明末清初已经是“货物并聚，居民且二三千家”的大镇。平望镇也是如此。至于明初的三十三个大城市，到明中叶成化弘治以后更加发展起来。如南宋时百余万人口的杭州，在元初破坏以后，到明代“嘉靖初年，市井委巷，有草深尺余者，城东西僻有狐兔为群者。今

① 《涌幢小品》卷二。

②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第278页。

③ 《苏松嘉定县志》引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

（万历时）民居栉比，鸡犬相闻，极为繁庶”^①。所有这些都 是在方志上有明显记载的情形。到明末，不仅城市经济日益繁 荣，而且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工商业市镇，如淮安、九江、芜湖、 沙市、天津、保定等以及前述各市镇，总计在四十个以上。

从明中叶以后大城市大市镇的急剧发展和形成，就反映出社 会分工的迅速扩大，同时，也说明了非农业人口的增加。相对地 也反映出农业人口的减少，农民的商业价值就愈使人注目了。由 此可见，朱国桢“农夫日贵”的惊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历 史性的重大意义的呼声。

这种现象，就进一步破坏家长制农民经济制度。特别是苏、 杭、嘉、湖资本主义生产比较发展的地区，农民分化的程度就愈 来愈剧烈了。《皇明文衡》载：“苏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艰窘 不得已而遁逃，及其后也，见流寓者之胜于土著，故相扇成风， ……又加倍焉”^②。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生产的剥削下，较之 农村的封建剥削比较轻的条件就有力地扇动着农民大批逃亡， 变成了“可变资本（消耗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底物质因素 了”。

由于资本主义经营渗入农村，我们就在苏杭一带看见了极富 代表性地主经营农业的方式，在明末也有了很大改变。这就是随 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农业上雇佣劳动者的斗争，已迫使地 主老爷们认识到如何才能发挥雇佣劳动者对生产的积极性。明末 清初张履祥在其所著《补农书》中写着：

“自古农人只有劝之一法，《小雅》《大田》诸诗可考

① 万历《杭州府志》卷十九，《风俗》。

② 周忱：《与行在户部谏公书》。

也，曾孙田峻其与农夫贵贱悬隔，然其相亲不啻家人父子。今士庶之家，骄蹇呵胥，使人不堪，毋论受者怨之，自顾岂不可耻？劝之之道，……即廉称事，别忙闲一也，异勤惰一也，分难易一也。……惟情者与勤者一体，则勤者愈矣。若显然异情于勤，则情者亦能不平。惟有察其勤者而阴厚之，则勤者即奋，而情者亦服。

“至于工银酒食，似乎细故，而人心得失，恒必因之。纹银与九色银，所差不过一成，等之轻重所差尤无几。假如与人一两，相去特一钱与三分五分耳，而人情之憎与悦迥别。岂非因一钱而并失九钱之欢心，因三分五分而并失九钱五分七分七分之欢心乎？出纳之际，益为紧要。……盖其人分所应得，不求而与之，宜也；求而与之，斯已后矣；可令屡求而后与乎？人情缓急，朝暮不同，早晏亦异，不可不察也。

“酒食益甚，丰啬多寡，待衣之物，所差总亦无多；或缺酒食，不过半盞一箸便怏怏而去，短少鱼肉亦然，岂特缺少，冷热迟速，亦所必计。谚曰：‘食在厨头，力在皮里。’又曰‘灶边荒了田地。’人多不省，坐踏斯弊，可叹也。惟夫准绳定于平时，有无谅于彼此，则有求既无奢望，有时不应，退无怨心。如是则在者无不满之心，去者不复来之志，切不可乘人之急，将低作好，措少为多，使人有伤心之痛。书曰：‘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劳苦不知恤，疾痛不相关，最是失人心之大处。’^①

这是一篇封建地主的自觉书。从这个自觉书上，不仅意识到地主

^①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五〇。《补农书》下。

阶级对雇农的“骄蹇呵督”是可耻的行为，而且是阻碍直接劳动者发挥生产积极性的重大原因，因之，他提出地主对雇农的关系，应该从“劝之之道”来建立。而“劝之之道”，第一是别忙闲，异勤惰，分难易；其次是工银，再其次是酒食。在这里，他也如明清之际一般思想家一样，以托古说今的办法，提出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平等的立场上，所谓“不啻家人父子”，要恤劳苦，关心疾痛。

在这里，他所表现的却是主张地主与农民平等，把封建关系改为契约关系。可知这是明清之际社会发展的一般要求。同时，关于地主与雇工的关系在明末的变化，崇祯时涟川《沈氏农书》表现的特别明确：“作工之法，旧规每工种田一亩，锄荡耘每工二亩，当时人习攻苦，带星出入，俗柔顺而主令尊。今人骄惰成风，非酒食不能劝，比百年前大不同矣，只要生活做好，监督如法，宁可少而精密，不可多而草率也。”因此，沈氏《农书》在计算农业上雇佣工人时说：“长年每一名工银三两，吃米五石五斗，平价六两五钱，盘费一两，农具三钱，柴酒一两二钱，通计十二两；计管地四亩，包价值四两，种田八亩，除租额外，上好盈米八石，平价算银十两，此外又有田壅短工之费，以春花稻草抵之。”这里所计算的项目，不仅有长工之消费，还有农具的消耗费，无一不连系市价，把这些当作成本加到再生产过程里面去，并从这里去寻找利润。因此，对于长工的供给，就计算的更仔细：

“供给之法，亦宜优厚，炎天日长，午后必饥罢，冬日严寒，空腹难早出；夏必加下点心，冬必与以早粥。若冬日雨天烂泥，必早与热酒，饱其饮食，然后轰其工程，彼既无

词谢我，我亦有颜诘之。……古云，‘善使长年悉使牛。’又云‘当得穷，六月里骂长工。’主人不可不知。旧规：夏秋每人朝粥二合，昼饭七合，点心饭二合半，粥二合，夜粥二合半。春冬每人朝粥二合，昼饭七合，点心粥三合，夜粥二合半。一年升算：每日一升五合，每人半之，猪犬别加料。

“旧规：夏秋一日荤，两日素，今宜间之；重难生活连日荤。春冬一日荤，三日素，今间二日；重难生活多加荤。旧规：不论忙闲，三人共酒一杓，今宜论生活起，重难生活每人酒一杓，中等每人酒半杓，轻省及阴雨留家全无。旧规：荤、日鲞鱼每觔食八人，猪肠每觔食五人，鱼亦五人。旧规：素、日腐一块，值钱一文；当年一文值银九毫，豆一石值价五钱。今钱值减半，豆值差倍，是今腐五块才抵前一块，岂得尚以旧例行之？今后假如舍与人吃腐，不须付与腐钱，而多与油水，令工人勤种瓜菜，以补其不足。旧规：生活人供酒：斗米买三十杓，谓之长行酒，水多味淡，徒为店家出息。若以斗米自做麴酒，当有二十四觔，以十二两抵长行一杓，滋味力量竟是加倍。所虑者，自作易于耗损，若烦发于领袖作工之人，计日算给，似亦甚便。与其利归店家，孰若加厚长年，以其精养猪，尚有烧酒出卖，亦可供给长年。”^①

这就完全是一个经营大地主的算盘了，这里边没有丝毫宗族、亲戚、乡邻的家长制残余的痕迹，所有者只是冷冰冰的商品利润，自然也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整体，就更明显。同时反映出农

^① 《学海类编本沈氏〈农书〉》，参看《杨园先生全集》卷四九，《补农书》上。

村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在明中叶以后的近百年间。

其次再就地主与佃客的关系来考察，如福建省遗存下来明代的一件买卖田产的契约，^①记载的地主与佃客的租约情形，也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

“在城住人魏佛清续置苗田二段，坐落二十七都、黄历凹头洋路上，计收租谷贰石。又一段坐落栋头巫坵屋基后，计收租谷贰石肆斗。内田照上手契四斗，承载苗贰升，只在冯景五户内，其随民苗四升。今来要物使用，托中召卖，先尽房亲邻佑人等，各不成就，遂中引至本里。邓法富出头承买。当凭中三面言定，时置价银壹拾陆两。其银就日交领××收×。无收欠少分厘。其有田见今造册，且买户收户当差。如有来处不明，卖人当头抵当。今来意见甘心，各无反悔，用立文约，付与买主收执为照。

计开田段：一段坐落凹头，计收租谷贰石正，冬牲乙双。一段坐落栋头路边，计收租谷贰石正，冬谷乙斗。一段坐落巫坵尾屋后，计收租谷肆斗正。

嘉靖叁拾壹年 六 月 日

立 约 人 魏佛清

依照代书人 许世宁

在这里，佃户冯景五对地主的的关系，不问是魏佛清，或是邓法富，都只是交纳租谷和冬牲的契约关系，而无隶属关系是很明显的。此外，佃户赁租地主的土地，在明代已出现了押租（即保佃

^① 傅衣凌：《明清时代福建佃农风潮考略》，载《福建文化季刊》第1卷第1期。

银)及顶佃银(即粪土银或认佃银)①。

“长泰县旧学田，一彰信里岩前田四斗，人和里陶唐洋田三斗四分，二项系推官龙文明卖戴湖等田价，凑借田租谷及佃户认佃等银凑买送学。”②

“盖佃头、粪土原系两项；佃头乃系保佃之银，佃户无欠税，业主欲召佃，宜清偿之；粪土乃兑佃之银，新旧相承，多寡无定。”③。

所有这些材料，都在说明明代的农业生产，在城市资本主义萌芽比较增长的地区及在其影响之下，也在起着变化。这种情形张履祥也有记载：“今日之小人(佃户)刁悍成风，……今日掉臂而来，异时不难洋洋而他适。”这就迫使地主不得不“加意团结”讲究“羈縻之道”④。所以他对佃户便是：“本宅有事，佃户若来效力，仍计工值酬劳”⑤。自然，在这里还不能想象为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已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什么主要的地位。尽管如此，这种变化却在说明着直接生产者与土地所有主的关系，已在开始着一种新的关系。即代替中世纪农奴与地主的封建隶属关系，在江南沿海一带广大地区上出现了契约关系。⑥

自然，中国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仅就江南沿海一带城市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比较增长的地区而言的。至于就中国社会的整体说还是封建社会。就农业或土地所有关系说，在当时中

① 傅衣凌：《福建佃农经济丛考》，第8页。

② 《漳州府志》卷七，《学校》。

③ 《云霄厅志》卷四，《土田》。

④ 《杨园先生全集》卷十九，《给徐敬甫信》。

⑤ 同上书，《赁耕未议》。

⑥ 关于这一点，最近发现厦门大学傅衣凌教授也有同样的意见，见《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第5期(文史版)他所著《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一文。

国的封建制度下，比较广泛地检查一下，就发现存在着很多不同阶段的生产关系和不同的形态，如奴隶占有制、农奴制、自耕小农和封建大地产，还有经营地主与富农等等，总之，是极其复杂而多样化的，而明末主要的形态，是封建大地产和自耕小农，是租佃关系的地主与佃农。但是这种封建大地产和自耕小农的经济，除最落后的边僻地区外，一般的都不是中世纪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整体了。

这正是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在明代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中，契约关系是相当普遍存在的。

正是因为城市手工业和农业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所以中国中世纪历史上，随着农奴制度而来的徭役制度，亦开始解体。

这种徭役制度，在中世纪长时期的历史上，虽然在名义上是每一个国民的义务，但因封建特权及其庇荫作用，自始至终都落在小生产者的头上。这种徭役的主要担负者，是手工业者和自耕小农。这种残酷的徭役制度，在中世纪的历史上，虽然名义上有一定的时限，但实际上统治阶级很少按着它所规定的时限（如每年二十日、三十日等类）来实行，经常超过不知多少倍。因此，这种无偿劳动的榨取，经常成为中世纪中国历史上阻碍生产发展，并造成小生产者破产的重要原因。其后，在手工业方面，担负这种徭役的，被规定为专门的匠户，但也时常征得匠户以外的手工业者。至于农民，则仍然普遍地实行着。这种徭役制度，到明初还存在。

首先，就手工业来说，洪武时，全国入籍匠户共有二十三万二千零八十九名。这些匠户在封建制度下是世袭的，子孙相承，不得改业。服役方式有二，一为“住坐”，即就地每月上工十

天，一是“轮班”，即每年要到京师服役，甚“至有无工可役，亦不敢失期不至”。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令按京师各衙门役作繁简，规定各种工匠服役班次：“有五年、四年一班者，有三年、二年、一年一班者，其造作若干，成器若干，糜费若干，皆因其多寡大小而差等之”^①。到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年）轮班诸匠，因路程遥远，奔走道路，苦痛不堪，匠户纷纷逃亡。于是到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统治者遂不得不允许班匠不愿服役者，可以银折代。到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因匠户多以逃亡，脱籍避役来进行反徭役制的斗争，全国在籍匠户只有十四万二千四百八十六名。就是说，徭役制度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派的日益扩大，一方面社会上已经分化出一批失去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另一方面，由于手工业者反对徭役负担，而宁愿出银代役。于是对手工业者的徭役制度，就成了封建统治者无利可图的了。因此，封建统治者就不得不取消轮班服役制，一切改为征银^②。改徭役为以银雇工，对它是更有利的。因此，中世纪以来的工匠徭役制度至此便基本上宣告废除。

至于农民所担负的徭役，初，明王朝亦承继过去封建统治阶级的徭役制度，驱役农民，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徭役不均，命造黄册，其后经度田编制鱼鳞册，以田为母，以户为子，这在自然经济占统治的条件下，虽一时收到一些效果，但不久，因土地兼并，鱼鳞册坏，于是代之而起的为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产生，实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因为这样，一方

①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

② 参看《中国历史纲要》第320页。

面造成了“恒产之民，百无一二”，即按户则规定原来负担徭役的民户，为着逃避徭役而大量隐避了；另一方面，由于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农村经济（包括地主与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日趋密切，如前述大量商品食粮和棉花及其他农产品投入市场，就使地主与农民的收入（包括主业与副业，乃至出卖劳动力）有颇大一部分变成了货币。在这种条件之下，再加上农民反对封建特权超经济强制的斗争，如逃亡、怠工和暴动，日趋剧烈。因此，就使统治阶级从事实上感觉到征银比强征徭役是更为有利的。同时，交纳一部分货币，使统治阶级专雇人代役，比之自身去负担动辄差交加的徭役，在可能时，是宁愿交纳货币的。这就是一条鞭法实施的物质基础。所谓一条鞭法，即政府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即将田赋、丁役及其他杂税合并折银。实质上即摊丁入地的税法的开始。因此，一条鞭法的实行，即基本上要取消封建政权对人民的奴役，所以，一条鞭法虽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另一方面也必然遇到旧势力的顽固反对，所以，我们看它实行的历史就可明瞭这一点。在它实行之前，先是朱元璋在洪武九年曾命陕西、浙江税粮，以银钱代输，至英宗时，又仿洪武之制，命江南各地田赋折征银两。到世宗时开始试行一条鞭法，至万历九年（1581年）便成为明王朝征收赋税的法定制度。自此，中世纪以来农民对封建统治者所担负的赋税和徭役，就基本上货币化了。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一条鞭法的实行，并非万历九年一下就全国全部实行了，是仅就立法的标志来论断的。事实上，由于各地发展的不平衡，也不可能全部实行。如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区勉强实行，不仅对于政府不利，也会遭到农民的反抗。

在这里，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群众的徭役制度，由力役改成货币，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人民群众不断的斗争，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使统治阶级感觉征收货币比强征徭役，更为有利，更为稳便的结果。这是与上述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产生于同一的增长着的新的经济成份之上的。所以，在世宗前后，有些皇庄、官庄也采取了新的货币地租的剥削形态^①。到明末，广东种葵蒲的沙田，更是每亩地租银高达十五六两。其他租地从事商品生产者，大抵也类此。

对小生产者——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徭役制度的废止，和货币地租的出现，当然是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进步，虽然在剥削阶级对农民的剥削量上甚至有些地方还有相当的增加，但直接生产者对政府的封建隶属关系却被基本上取消了，从而小生产者就能获得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来改良生产。自然，我们还不能说，徭役制度的废止，以后工资劳动者和农民就不被强迫征服徭役了，而是就法律明文废止徭役制度这一历史事件说，对于生产力的解放的意义是重大的。实际上，地主对于佃农的超经济的剥削和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劳动者超经济的奴役，是与封建制度相终始的。而且封建统治者特权在握，不仅实行时不可能是彻底的，而且在必要和有利的时候，他随时都可以使这种中世纪的野蛮的徭役复生。

在明代资本主义生产萌芽增长的过程中，明末商品流通也有了超越前代的发展。郭子章《蚕论》称明穆宗时（1567—1572）“东南之机，三吴、闽、越最伙，取给于湖（湖州）茧，西北之

^① 参看《中国历史纲要》，第328页注。

机，潞（山西潞州）最工，取给于闽（四川闽中）茧”^①。万历时张瀚也说：“贾人之趋厚利者，不西入川则南走粤，以其利或当五，或当十，或至倍蓰无算也”^②。“洞庭叶某，商于大梁。……叶将金去，买布入陕，换褐，利倍；又贩药至扬州，数倍，贸易三载，货盈数千”^③。沿海商人活动就更广泛，如《海运新志》所载：“辽东、山东、淮、扬、徽、苏、浙、闽之人做卖鱼虾、腌猪及米豆、果品、瓷器、竹木、纸张、布匹等项，往来不绝。”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也载：“凡倭段起东夷，漳泉海滨效为之。丝质来自川蜀，商人万里贩来，以易胡椒归里。其织法亦自夷国传来。……北虏互市者，见而税之。”《惠安县志》卷三七《风俗》载：“滨海业海，亦不度农业。自青山以往，又出细白布，通商贾犖货之境外，凡遍天下”。杭州资本家林氏的发展就更明显：“林氏，……世为杭之钱塘人。……林氏始以造币，籽抽不可胜用焉。继以积陈贸新，有无不可胜穷焉。继以行囊居货，予夺不可胜计焉。故乡人称富贵者，必曰林氏”^④。这里所反映的是以纺织业起家的太富豪，发展成富盐商，实行屯积居奇，以操纵市场。山西商业资本家的经营，已经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结构，萌芽着连锁分枝的形式。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为伙计。

①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一引。

② 《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

③ 陆燾：《说听》。

④ 邵经邦：《弘艺录》卷十八，《林益庵传》。

估人产者，但数其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①

从这些商业资本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它决不是没有活动的，如前举松江市民之从事做暑袜的工作，即“从店中给筹取值”，即商业资本组织家庭手工业的经营。当然，商业资本对农业也未放弃剥削，如《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载广东开塘坊的“春以糖本分与种蔗之农，冬而收其糖利。……开塘坊者，多以是致富。”《闽小纪》卷上《稜荔》亦载，吴越贾人，对于福建种龙眼、荔枝的果农，“春时即入费估计其园”称作“稜”，实际与现代商人之买青同。广东亦然，称为“买培户”^②。此外，还有些资本主义手工业作坊老板或工厂主托人或直接派人向海外采购贵重原料，加工制造物具，以获厚利：

“海澄有番舶之饶，行者入海，居者附费，或将麈子奔儿，养如所出，长使通夷，其存亡无所患苦。犀象，玳瑁、胡椒、苏木、沉檀之属，麇然而至。工作以犀为杯，以象为栴。其余玳瑁或栴或杯，沉檀之属，或为佛身，玩具，夷费之外，又可得直。”^③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之下，海阳的“居民市者多工贾，工多奇技，逐末者多居货挟费以航海，而视家如寄”^④。同时，海澄是“田多斥卤（指月港）……饶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盖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乐轻生，鼓柁相续，谓生涯无逾此者”^⑤。

① 沈孝思：《晋录》。

② 《广东新语》卷二五，《木语》。

③ 何乔远：《闽书》卷三八，《风俗志》。

④ 《海阳县志·风俗志》。

⑤ 《澄海县志》卷一，《风俗》。

江南商业资本之活动，就新安的情形看：“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蓄粟，其富甚于新安”^①。就在这个新安，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许多封建堡垒——闾閻之家，都被卷入商业经营的洪流之中。“新安土饶狭，田蓄少，人庶仰贾而食，即闾閻家不憚为贾。向程长君、少君亦间出为贾。……少君兄弟长者大度，鲜算计，曾东襄、北贾鲁，吴鲁人皆乐与少君兄弟游，益就之”^②。而闽粤滨海地区商品流通的情形，尤其使我们惊异，如王世懋《闽部疏》所载：“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延之铁，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胜计。”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货语》记载广东的情形，“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走沙漠口。其跼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自宋帆脚二洋，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

由于商品流通过程的加速和扩大，金银与货币成了人人必需的物品，因而刺激着贪官污吏和大商巨贾，拼命搜刮金银。这里有一个明中叶以后的富豪排队名单：

“严世蕃积货满百万，辄置酒一高会。其后四高会吴，而乾没不止。尝与所厚客屈指天下富家屈首等者，凡十七家，虽溧阳史恭甫最有声，亦仅得二等之首。所谓十七家者，已（世蕃自指）与蜀王、黔公、太监黄忠、黄锦及成

①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② 唐顺之：《荆川文集》卷十六。

公、魏公、陆都督炳。又京师有张二锦衣者，太监永之侄也。山西三姓、徽州二姓与土官贵州安宣慰。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前是无锡有邹望者将百万，安国者过五十万。今吴兴董尚书家过百万，嘉兴项氏将百万，项之金银古玩实胜董，田宅典库资产不如耳。大珰冯保、张宏家资皆直二百万之上，武清李侯当亦过百万矣。”^①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存在过。它们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对于促进旧的所有制的破坏上，虽然有着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它们不能创造新生产方式，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所以在汉、唐、宋都有大商业资本的活跃，而未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只有在封建制度解体的明代，特别是明末，资本和自由劳动力这两种商品在市场上相遇，资本能购买劳动力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剥削它的时候，资本主义萌芽才出现了。商业资本也只有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时候，即当它购买劳动力组织作坊、工场，或组织家庭手工业的时候，它才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并不是一般商业资本都是资本主义的资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上述这些富翁所积累的财富，有半数被埋在地窖中，而绝大部分变成了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即非生产性的资本。这一点由明代的典当业与银钱业的发展，也可以看得出来。明代典库或当铺、质库均为典当业，与后代当铺不同。因为它除了典当业以外，还兼营买卖军粮，兑换铜钱，乃至经营高利贷放款^②。上述这个严世蕃的父亲严嵩，是嘉靖间著名

^① 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六。

^② 《拍案惊奇》卷二二：“原来那个大商，姓张名金，混名张多宝，在京都开几处解典库，又有几所绸缎铺，专一放官吏债，打大头脏的”。

贪官，他搜刮积累的金银，除埋藏地下的以外，则寄商店或典当业以生息。由《明史》严木传载“拘役籍其家，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万余两，……追其受寄金钱垂二十年不尽”可知。这些贪官污吏搜刮的金银，虽然当时窖藏起来恐怕暴露，如《泾林续集》所叙述的严世蕃贪污的金银“不啻万万”，但他们只从事“田宅典库资产”的经营。因此，这些资本，不但没有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反而是阻碍手工业作坊工场或农业上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的。但是这些财富的积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腐蚀明王朝及封建制度，使之更进一步趋于解体的作用是很大的。

不过，由于商品流通的扩大，明代也产生了银行前身的金融业——钱庄^①，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种钱庄的势力之大，如嘉靖八年常常颁布禁止铸造和使用私钱的条例，而当时奸党们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致货物翔踊，其禁遂弛”^②。到了明末，钱庄已经成了具有近代意义的金融机关。它们兑换铜钱和金银^③，并且揽收放款，对顾客签发票帖取款。^④兑换铺相当普遍。明末汇兑事业，可证以顾亭林文中《会票》之记载，更可证以《崇禎长编》卷一载崇禎十六年十月谕户部：“军需浩繁，兑会一事，奉行得宜，亦足济目前急需。着该部多方鼓励，或一面兑会，一面

① 钱庄，称谓不一，有钱肆、钱米店、钱庄等等，如《金瓶梅》九十三回、曹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等，均有记载。

② 《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一九一。

③ 《醒世姻缘》第十一回：“又想起那一日在钱庄上换钱，是在那钱庄上换金子”。

④ 同前书，第一回：“期城中开钱庄的，放钱债的，备了大礼，上门馈送。开钱庄的说道：如宅上要用钱时，不拘多少，发帖来，小庄支取，等头比别家不敢重，银数每两比别家多二十文，使下低钱，任凭兑换。”又：“不十日内，家人有了数十名，银子有了数千两，日费万钱，俱是发票向钱庄支用。”

差官赴各关照数支給。务使国用商资，两得便通。”另据《云间据目抄》卷三《记祥异》载：“时有里人马姓者，携资客于京。克温闻知之，往交纳。……曰：闻君将以某日归，而孤身涉数千里，得无患盗乎？我当为君寄资徐氏官肆中，索会钞若券者，持归示徐人，徐人必偿如数，是君以空囊而赉实质也。”这还是由官肆中取会票。由崇祯时倪元璐指责蒋臣的钞法，说：民间的会票，宋时谓之钱引^①。足见会票不仅是官家发，也有民间发的，同时，会票不仅可在市面上通行，而且还兼汇兑之用。

由此可见，明末时金融机关的钱庄和汇票，在金融市场，已有相当的势力。但是，这种金融机关，很明显的只是为商业资本和统治阶级服务的，另一方面在加速和扩大商品流通这一点上，它又有刺激生产事业发展的作用。这一点，在客观上就反映出它是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从而也就有了破坏自然经济的作用，是必须明确的。

在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就自然产生了许多大商业城市。北京城人口，孝宗时（1488—1505）达六十六万余，南京城在明初人口已达百余万。南京和北京工商业都很发达。各业因便于顾主，都集中于一定街道，如南京有绫庄巷、锦绣坊、颜料坊、铜作坊、铁作坊等等，北京亦有缸瓦市、米市、煤市、骡马市等等。到明末，南京已发展成“百物皆仰给于贸居”的大商业城市。

正是由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北京和南京不仅成了政治中心，也成了经济中心。围绕着这两个大中心，全国已发展起来四十个以上工商业都市。而这些大商业都市，只有四分之一在北

^① 《明实录·毅宗实录》卷十六，“崇祯十六年九月”条。

方，而三分之一则在江浙。由此可见一方面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主要的大的丝织业、棉纺织业和陶瓷业、制茶叶的中心地区，已经变成了中国的重要经济重心区域。在这里，我们举几个典型的大工商业都市来看看。首先就苏州府城来说，这是一个丝织业中心，前面已经叙述过，织工、染工都有数千人之众，市场规模之大，“自关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①，而“城连万雉，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棊列，桥梁栉比。梵宫莲宇，高门甲第，货财所居，珍异所聚。歌台舞榭，春船夜市，远土巨商，它方流妓，千金一笑，万钱一簪，所谓海内繁华，江南佳丽者……”^②。这期间，“货物店肆充溢金阊，贸易辏至辐辏，然倚市门者称贷鬻财，多负子母钱，远方贾人挟资以谋厚利。若枫桥之米豆，南濠之鱼盐、药材，东西汇之木算，云委山积”^③。至于繁盛情形，“逮成化间，……观美日增，闾阎辐辏，棹楔林丛，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榼盒，交驰于通衢永巷之中，光采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歌，与市声相杂。凡上贡锦衣，文贝花果，珍饈奇异之物，岁有所益。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巧而物产愈多。”^④

其次杭州到明中叶以后，也是“内外衢巷，绵亘数十里”，民物繁庶的“水陆之要冲，盖中外之走集，而百货所辏会”的大工商业城市^⑤。武昌府治江夏县也是“商贾之牙侩，丝帛之麈

① 《松江府志》卷五四。

② 《苏州府志》卷二引，莫旦：《苏州赋》。

③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七六，《苏州府部风俗考》。

④ 《苏州府志》卷三，《风俗》引王筠《寓圃杂记》。

⑤ 《杭州府志》卷三四，《衢巷市镇》。

肆，鱼米之市，肥其妻子，雄视里闾。下至百家技艺，土木食工，卜筮阴阳之属，以及俳优侏儒趋利于鬻者，又未尝不趾相错而踵相接也。”^①

特别是中世纪以来，长期作为中外贸易大商埠的广州，据《羊城古抄》卷七《珠江朱楼》引明孙典籍《广州歌》云：“广州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朱楼十里映杨柳，帘栊上下开户牖。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啾啾。巉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此珠江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今（清初）皆不可问矣。”

其他各大工商业城市，到明中叶以后，大抵都是“生齿浩繁，民居稠密”（松江），“商工辐辏”（景德镇），“五方杂处，商贾辐辏”，“水陆珍者，舟楫捆载，靡不备至”（汉阳汉口）。又如济南、南昌、临清、扬州在明末清初都有百万或将近百万人口的记载。而城市人口的增加所反映社会分工的扩大，农业人口向工商业人口的转移。这种现象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而是商品经济相当高度发展的结果。

商品经济的发展既然在全国经济生活中有如此重大的作用，它就不能不影响到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观点和制度的改变。

三、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上层建筑的影响

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适应着新生的经济因素的要求，

^①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一〇。《武昌府部风俗考》。

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观点与法律观点，也在起着相应的变化。在政治制度上，明初以朱元璋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为着巩固政权，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已见前述。在另一方面，朱元璋为着缓和阶级矛盾，企图了解人民情形和恢复与发展生产，还特别规定普通人民可以上书言事，并可以推荐大臣官吏^①。而且这些措施，均曾见诸实行。明初，统治者对于贪官污吏的真正严惩，和对于反明的残暴封建地主的广泛惩办，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所仅有的，如迁江南十四万家豪富于濠州屯田，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创举。所有这些，朱元璋总的目的无非为着巩固他的政权，但在客观上却起着打击中世纪封建农奴主势力的巨大作用。自然，他所能建立的政权和巩固的社会秩序，仍然是封建特权的政权和秩序，但却把中国社会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这一点更明显地表现在法律上。洪武时，曾经为着解放元朝时代大批被掳掠和强迫做奴隶和农奴的汉族人民，不仅明令解放，而且还制定与颁布《明律》，以保障这种解放命令的实行。在这些法律条文中，我们看见严禁诱骗和略卖人口为奴隶的条文，列在“十恶”“常赦所不原”之列，即略卖自己子孙及亲属，亦处很重的徒、杖之罪。而窝主及买者也与犯者同罪。收留人家迷失子女不交官而卖为奴婢，徒杖之罪就更重。就是和同相诱及相卖良人为奴婢，罪亦一同。即一般庶民之家，也不许占有奴婢^②。贵族勋戚虽得占有奴婢，却有一定的限制。

明初的法律这种严禁任何形式的人身买卖，包括典雇妻妾子

^① 《明史·选举志》。

^② 日本享保利本《明律》卷一，《名例·常赦所不原》；卷十八，《略人卖人条》五款、七款；卷四，《户律》一《户役》五；卷十八，《略人卖人条》三款；卷四，《户律》一《户役》四。

女在内，就基本上废除了农奴制。但地主与佃客、庸工的关系，在《明律》上还不是平等的，这就反映出朱元璋在变成全国最大的地主以后的地主阶级的思想。所以洪武以后，不仅农奴制度在个别地区仍然存在，就是买卖奴婢的事件仍然不绝。到万历年间，洪武时所制定的《明律》关于这些禁止买卖使用奴隶的条文，又被重新颁布全国。这一方面说明了明末蓄奴之风很盛，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并不是明神宗对于奴隶和农奴有何爱护，而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人身的商品价值被统治阶级所发现，废除农奴和奴隶制的残余，对于它榨取更多的货币是有利的。当然，这些禁止买卖和使用奴隶的命令，究竟有多大的效用，是很难说的。因为在当时，不仅旧的残余还存在，而且新的经济在开拓自己的活动场所时，正是豪富为着增殖自己的财富，开始马克思所说的“对于神圣所有权的最无耻的凌辱，对于人身生命的极狂暴的掠夺”的时期，因之奴役贫苦人民，乃至把他们变为农奴和奴隶又成了重要条件。因此，旧的残余和新的需要相结合，造成明末的“蓄奴”之风，是很容易理解的。

其次，就明帝国统治阶级对外关系说，亦与历代帝王有所不同。譬如，中国历代皇帝与外国交换物品的所谓“贡”与“赐”，明统治者虽仍然采取“贡”“赐”之名，但实质上已是由政府所执行的国际间货物交易，自己与对方都带有浓厚的商业行为。①

① 关于外国对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进奉，唐宋以来，常度价返以相当之礼品，如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对大食国船主蒲希密之贡献，“答赐蒲希密黄金，准其所贡之直”(《宋史》《大食国传》)；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10月，日本国太宰府进贡使周良史，将土产物色进贡，明州市舶司牒称：“所进奉物色，若肯留下，即约度价例回答，如不肯留下，即却给付；晓示令回，从之”等等(《宋会要》)，俱无斤斤计较价格的商业行为。

这是中国历史上，明帝国以前的封建的乃至奴隶的帝国的帝王所没有的。这种情形，特别是明中叶及以后的统治者表现的更为明显。现在，举两个明中叶的例子来看：

一是明帝国与帖木儿帝国的商品交易。帖木儿死后，其继承人兀鲁伯与明帝国正式建立起外交关系。景泰七年（1456年）兀鲁伯遣使“贡”马驼玉石。“礼官言：‘旧制给赏太重，今正副使应一等二等赏物者，如旧时。三等，人给彩缎四、表里绢三匹，织金紵丝衣一袭。……所进阿鲁骨马，每匹彩缎四、表里绢八匹；驼三，表里绢十匹；达达马不分等第，每匹紵丝一匹，绢八匹、折纱绢一匹；中等马如之，下等者亦递减有差。’制：‘可’。又言：‘所贡玉石，堪用者止二十四块，六十八斤，余五千九百余斤不适于用，宜令自鬻，而彼坚欲进献。请每五斤赐绢一匹。亦可之。’^①

明帝国与日本的“贡”“赐”就更加突出：“宣德初（1426年），申定要约，人（进贡的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而倭人贪利，贡物外所携和物增十倍，例当给值。礼官言：‘宣德间（1426—1435年）所贡硫黄、苏木、刀、扇、漆器之属，估时直，给钱钞，或折支布帛，为数无多，然已大获利。今（景泰四年——1453年）若仍旧制，当给钱二十一万七千，银价如之。宜大减其直，给银三万四千七百有奇。’从之。使臣不悦，请如旧制。诏增钱万，犹以为少，求增赐物。诏增布帛千五百，终快快去。”^②

这样的关系，尽管它还蒙着封建帝国“贡”“赐”的外衣，

①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撒马尔罕》。

② 《明史》卷三三二，《日本传》。

从双方斤斤计较价格上看，实际上都是在进行商品交换的商业行为。在十五世纪时代，在西方，西欧及阿拉伯的盗贼商人以入贡为名，对明帝国实行敲诈勒索；在东方，当时日本正值足利幕府时代，商品生产正趋发达，但流通手段却专恃中国古钱，^①因之，日本海盗商人，在它各地封建地主（即所谓“大名”）的支持和豢养之下，为着劫取中国钱币及丝织品等以与南洋各国交易，对明帝国便采取了“朝贡”与劫掠并行的海盗政策。

所以，这些国际间的来往，无一不是在当时世界范围的商品经济的支配之下进行的。西欧与阿拉伯的所谓“使团”实际上只是一些武装的盗贼商队。这正是十五世纪西欧及阿拉伯的盗贼商团以入贡为名，对明帝国实行敲诈勒索，得间，并实行抢劫。这正是他们创立世界市场，劫掠东方封建国家，为资本主义制造登上历史舞台的准备工作，但是，他们所遇见的明帝国，却也正在东方寻找金银，创造东方的世界市场。因之，就发生如上述的斤斤计较的现象。

明帝国对撒马儿罕、土鲁番、天方等国的关系，亦无不知是。特别是对于日本的计较就更厉害，随着日本海盗商人的侵扰，明帝国的统治者不明世界大势，遂以它的封建权力实行禁海，造成日本勾结葡萄牙、西班牙的海盗商人与中国内部的豪强世族和流氓，对中国实行劫掠，造成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倭寇之乱”。

在“倭寇之乱”中，所谓“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

^①《麻植纪闻》（中）《日本乞师》：“会日本有西洋为天主教者作乱，方严逐客之令，京第至长崎岛不得登岸……撒斯玛……复为首于大将军……赠洪武钱数十万，盖日本不知鼓铸，专用中国古钱。舟山行洪武钱自此始。”

这些从倭者都是“资衣食于海”的世家大族、工商业者和流氓恶棍。所以朱纨说：“去外国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滨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因此，朱纨便遭到明王朝中这些“衣冠之盗”的代表人物御使陈九德等的交章劾奏，被迫自杀。陈九德等与朱纨的斗争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东南沿海工商业实力人物主张开放对外贸易与明王朝统治阶级中腐朽封建势力的禁海或限制对外贸易政策的斗争，至于朱纨不过是因图保卫国家的边疆而遭致牺牲。这一点，从不久之后的开倭名将俞大猷《呈总督军门在菴杨公揭》^①中表现的很明确，“市舶之开，惟可行于广东。盖广东去西南之安南、占城、暹罗、佛郎机^②诸番不远。诸番载来乃胡椒、象牙、苏木、香料等。货船至，程水计货辄分，故市舶之利甚广。数年之前，有徽州、浙江等处番徒，勾引西南诸番，前至浙江之双屿港等处贸易买卖，逃免广东市舶之税，及货尽将去之时，每每肆行劫掠。故军门朱虑其日久患深，禁而捕之。自是西南诸番船只复归广东市舶，不为浙患。”但是自朱纨被迫自杀后，边防废弛，遂引起大规模的倭寇之乱。东南沿海的工商业遭到惨重破坏时，他们才认识到没有国防就没有对外贸易，于是支持杰出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组织新军，抗击并歼灭了倭寇。

这就已经在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内部表现出新的矛盾和斗争的形态来。

^① 《正气堂集》卷七。

^② 佛郎机，大概由佛郎克音译而来。明人不知佛郎克在何处，因他们与南洋群岛各国通商并与之同来中国，故有此语。至佛郎机人，明人所指乃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当时西欧人之总称，并非专指佛郎克人。

四、新的矛盾和新的斗争的萌芽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原理，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新的矛盾和斗争也发生了。我们考察明代社会的变化，特别是明末社会的变化，光是从社会经济的变化上看，还不能全面地认识这一问题。因此，从明代，特别是明末社会的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上看，就能使我们对明代中叶以后的中国社会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这种新的矛盾和斗争，主要的是城市市民反腐败封建势力压迫和榨取的运动。由上所述，我们知道这种运动是有它长远发展的经济基础的，所以，这种运动也反映出统治阶级集团中一部分官僚的政治思想的变化，而形成明末所谓“党争”的特有形式和内容。

作为这一新的矛盾和斗争导火线的事件，主要的即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王朝由于逐倭援朝战争的庞大战费及统治集团腐朽生活的浩繁开支，明神宗派出大批中使到各地去开发金银矿，甚至听说吕宋岛产金，派使臣到吕宋去搜罗。这些中使到全国各大商业都市，借开矿为名，搜罗金银珠宝。随着又派出一大批中使往各地植税，即所谓“凡店租、市舶、珠椎、木税、船税、盐茶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无不领于中官”的矿监和税监。这些中使依恃极端君主专制的封建特权，到各大工商业城市，敲诈勒索，“矿税交横，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弄得“天下骚然，生灵涂炭”。《古今图书集成》载：“近年以来，以增课为能事，以严刻为风力，筹算至骨，不遗锱铢，常法之外，又巧立

名色，肆意铤求。船只往返，过期者指为罪状，辄加科罚，商贾资本稍多者，称为殷富，又行劝借，有本课该银十两，科罚劝借至二十两者。少有不从，轻则痛行笞责，重则坐以他事，连船拆毁。客商狼籍，号哭水次，见者兴怜。……其科罚劝借，或倚称修理合磨，或倚称打造坐船，率皆借名入己，……肆无忌惮，莫敢谁何，以致近年客商畏惧征求，多至卖船弃业”^①。而且税网又密，如万历二十九年五月《实录》所载：“重征叠税，明旨丁宁告戒。以臣所属：上有湖口，中有芜湖，下有仪扬，旧设有都臣，新设有税监，亦云密矣。湖口不二百里为安庆，安庆不百里为池口，池口不百里为荻港，荻港不百里为芜湖，芜湖不数十里为采石，采石不百里为金陵，金陵不数十里为瓜埠，瓜埠不数十里为仪真，处处抽税。长江顺流扬帆，日可三四百里。今三四百里间，五六委官拦江把截，是一日经五六税也，谓非重征叠税可乎？”这就严重阻碍着工商业的扩大与发展。而特别厉害的，还有利用封建特权对于城市居民强盗式的抢劫，如高采在福建“肆虐日久，逼取各铺行若米若金及诸物，价总不肯给。……各铺行匠作人等，齐往税监告讨欠价”^②。而高采屠杀讨价市民，因而引起市民“万众”的大暴动。由此可见，以皇帝与宦官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最腐朽的集团所劫掠的对象，虽然名义上是商人，实际上却是城市工商业者。这就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事业，打击和阻碍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增长。因之，明王朝中代表工商业者的官僚分子与各大城市的广大市民群众，都为着保护工商业的利益展开了反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劫掠人民的剧烈斗争。

① 《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三〇，《杂税部·艺文》二。

② 《定陵纪略》卷五，《福州民变》。

在明王朝中，当年（1596年）就爆发起“廷臣谏者无虑数十百疏”的劾奏运动。在这些奏疏中，如左副都御史张养蒙说“今奸宄实繁有徒，采矿不已，必及采珠；皇店不止，渐及皇庄；继而营市舶，继而复镇守；内可以谋坐营，外可以谋监军”；就直接指斥皇帝派遣和支持的中使，所搞的破坏工商业及地主和农民田产的矿税监及皇店、皇庄为“奸宄”。在明代极端君主专制的淫威之下，实非中世纪地主与农奴式的君臣关系所可想象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春正月戴士衡陈天下大计也说：“前此用财有节，今则岁进月输，而江右之瓷，江南之纴，西蜀之扇，关中之絨，悉取之逾额。”大学士张位、沈一贯陈朝鲜事宜，建议于“开城、平壤置重镇，练兵屯田，用汉法教朝鲜之人。通商、惠工、开利源以佐军兴之资”。特别是刑部侍郎吕坤陈天下安危疏中指出：“天下之人，乱心已萌。”接着，他分析人民萌乱心的原因：“关陇……民生实艰，自造花絨，比户困趣逼。……山西之絀，苏松之绵綺，岁额既盈，加造不已。至饶州瓷器，……徒累小民。官店租银收解，自赆承助……造四千之说，而皇店开。……且冯保八店，为屋几何？而岁有四千金之课。课既四千，征收何止数倍，不夺市民，将安取之？”就明确指出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利用封建特权，对城市市民、工商业者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以及用皇店垄断市易等等，造成了革命的危机。

这些言论和事实告诉了我们：（一）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法律制度，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之下，已濒于解体，革命危机在积极的酝酿中。（二）封建统治阶级中最腐朽的统治集团，对人民财富的劫夺，严重地打击了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它已经成了社会生产力的致命的桎梏。（三）明统治阶级集团在商品经

济冲击之下，分成了两大集团，以皇帝宦官为首的最腐朽的封建势力破坏工商业的劫掠政策，遭到市民中等阶级代表者——主张保护工商业分子的严重反对。他们指出皇帝宦官的横行已经造成革命危机。所以，他们所提出的缓和革命危机的办法，是统治阶级对工商业和农业停止超经济的强制榨取，并以通商、惠工、开利源代替劫掠。总而言之，他们一致地反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阻碍和打击工商业及农业发展的惨重剥削和劫夺。但是，他们的主张不仅未为统治者所采纳，而且有些还遭到所谓“帝怒，严旨切责”或遭贬谪。而以明神宗和宦官为首的腐朽封建势力，于是“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天下咸被其害矣。其最横者为陈增、马堂、陈奉、高淮、梁永、杨荣等。”从而，全国各大城市的市民群众，主要的是中等阶级及平民的群众，为着维持自己的生存与生产事业的继续，便与这些腐朽封建势力的爪牙，展开了流血大斗争。

其中最著者，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马堂之横暴在临清所引起的市民大暴动，先是“有脚夫小民三四十名，聚集围绕马税监衙门，声言本监招募，……小民度日不支，……群皆叫喊。本监衙内捕出多人，各持弓箭木棍，赶人射打，锁拿五、六人进衙。只见外面众呼：‘衙内杀人了！’以致众心愤激。冲入放火，将衙门尽行烧毁，内外互殴及践踏死者三十余人。……马堂救出在署，合城闭门罢市，真异常大变也。”^①

“按临清之变，倡议者王朝佐也。朝佐者以负贩为业。”时马堂在临清横甚，“诸亡命从者数百人，白昼手银铛通衢，睨良家

^① 《定陵注略》抄本卷五，万历二十七年临清民变山东巡抚尹应元疏。

子富有力者，籍其业之半，庸夫里妇负斗粟尺布买易者，直扼而夺之。……于是中家以上破者大半，远近罢市。朝佐……杖马箠挝马堂门清见，州民欢呼，随者万数。堂惧不敢出，则令战士乘墉，发强弩，伤数人，众益沸。朝佐攘臂大呼，破门而入，纵火焚其署，毙其爪牙三十七人。”当统治者来镇压时，“时议欲尽戮诸协从者，朝佐挺身而出”，独任首难，从容就义。临难时，“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天地昼晦，观者数千人，无不叹息泣下。”连东冒知府李士登亦厚恤其母妻，而“临清诸大贾心德朝佐，岁时馈贻不绝，而中涓虐焰，从此顿戢。州民益思朝佐不置，为立祠以祀焉。”^①

这是一场有声有色的市民的大斗争，市民群众的领袖是小贩王朝佐。他在被审时，陈词：“吾实为首，奈何诛及无辜！”这种独任首难的态度与气概，充分地表现出中国的平民在新的市民运动中的领袖精神，绝非其他的腐旧的阶级所能有。

其次是陈奉在武昌激起市民一再暴动，最后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冤民万余，围绕陈奉公署，誓必杀奉。奉从后潜逃匿楚王府中，众民将番校耿文登等十六名捆绑手足，投之于江。”神宗闻状，召还陈奉。户部尚书陈粟疏陈三事指出：“中使四出，吞噬无厌。矿利些微，创为包矿买砂名色，头会箕敛，……则矿非遗利也。商税抽于此，仍推于彼，密如鱼鳞，惨于抢夺，则税非商之羨余也。征一解百，杀人如麻，岂独陈奉一人。”给事中田大益更进一步严重地指责统治者说：“皇上嗜利心滋，布满虎狼，飞而食人，使百姓剥肤吸髓，剜肉刻骨，亡家

^① 《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临清民变〉各条；《明史·宦官列传》。

丧身，掘塚剖棺，补充皇上私藏，而未曾辘铢佐国，皇上所自知也。天下百姓无如皇上分置虎狼何，口誓而心嗔，人愁而鬼哭，吁天天灾，控地地赤；……愤怨不胜，而挟不平聚不逞以幸不可冀，又皇上所备闻也。……今楚人以陈奉故至沉皇上使者不返矣，且欲甘心抚臣矣，……朝廷之人不敢入楚……。”皇上不为楚人诛陈奉，陈奉必受诛于楚人；夫使陈奉受诛于楚，则柄下持。皇上不为楚人捐矿税，矿税必自捐于楚。……皇上不尽撤天下矿税之使，天下必尽效楚人以要皇上。使天下尽效楚人以要皇上，天下事尚在皇上掌握哉！”^①

大学士沈一贯说：“陈奉入楚，始而武昌一变，继之汉口、黄州、襄阳、武昌、宝庆、德安、湘潭等处变经十起，几成大乱。”^②

由此可见，腐朽的明封建统治者不仅因敲骨榨髓摧残工商业和农业，遭致城市市民和农民此起彼伏的暴动，而且就在朝廷中亦渐趋于孤立，由王朝中各派官僚的愤怒奏疏，对他们提出的严厉控诉可以看得出来。

陈增在山东横行，不仅遭到东林党首领巡抚李三才的打击和阻止，而且三才上书指斥神宗对人民的酷虐劫掠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米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又言：“臣为民请命。……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惊，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① 《定陵注略》卷五。

② 《明纪》。

这些奏疏告诉我们，他们不仅承继了并发挥出中国历史上大臣直言极谏的优良作风，而且告诉我们明末的君臣关系，皇帝与人民的关系，已较中世纪有了很大的转变，隶属关系已经开始动摇。统治者不能指望人民大众再如中世纪时代牛马一样听他任意剥削和压迫。这些奏疏还告诉我们，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被视为末业的工商业，现在已经有了影响帝国的基础和社会秩序的重大作用。这不是中世纪任何时代所能有的现象，是很明显的。

其他，如梁永之在陕西、高淮之在辽东、杨荣之在云南、高采之在福建、李敬之在广东的劫掠等等，无不引起成千成万市民群众的空前大流血斗争。这里，我们要特别叙述的，还有市民以工资劳动者为主体的壮烈反抗大斗争。

首先是江西瓷器业中心的景德镇，以陶工为主体的“冤民万余”，欲杀矿监潘相，烧焚厂房。江西广昌县人民烧毁矿监王虎生祠，并焚毁银厂。其次在北京，即明帝国的首都，西山煤业工资劳动者的斗争。

西山只有官窑一处，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正月，中官王朝，率军劫掠西山诸处，激变窑民。王朝诬称窑民抗税，有旨逮窑民领袖王大京等。于是煤户“薰面短衣之人”，群入京师，填街塞路，持揭呼冤，诉失业^①。同时，也引起明王朝中的激烈论争。辅臣言：“煤利至微，煤户至苦，而其人又至多，皆无赖之徒，穷困之辈。……马穷则攫（嚼讹）兽穷则啖（攫讹），一旦揭竿而起，犖鞞之下，皆成胡越，岂不可念！……乞下严旨取回

^①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三八〇；《定陵注略》卷五；《明纪》卷四五，《神宗纪》七。

王朝，立止煤税。”于是大臣疏奏纷纷，神宗被迫乃召回王朝，以中官陈永寿代之，虽云“以暴易暴”^①，也反映出煤业工人群众性的反抗斗争，已能迫使统治者不能置之不理了。

而工资劳动者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规模最大，情况最激烈的还有苏州的织工反孙隆的大流血斗争。

关于苏州织工的大斗争，根据应天巡抚曹时聘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上神宗的报告，大概是这样的：他首先叙述江苏人口最多，有恒产（土地）的绝少，家家户户以丝织为业。生产关系是“机户（资本家）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②

过去税监初派时，人民曾罢市反抗。孙隆在吴日久，是知道人民的情绪的。他于是分别九则，设立五关，欺骗市民说：只准外来行商，不征本地工商业税，一时人心才安定下来。但税网异常繁密，又奏请以本地流氓任查税吏。因此，商旅均裹足不来苏州。织户（机房主人）因而被迫日益减少织机，加之大水灾的继续，这就岌岌乎断绝了以织为生的织工的生路。到五月初旬，孙隆到苏州，检查五关之税，额数不敷，就暂借库银挪解。参随黄彦节，勾结本地流氓汤莘、徐成等十二家，委之查税，又妄议每机一张增税银三钱。织工自觉在封建统治者这样残暴苛剥和机房主人停机关厂的压迫之下，非饿死不可，于是掀起大暴动，一呼响应，满街填塞着身穿白布短衫的工人，在二十七个首领手执团扇指挥之下^③，群起反对孙隆及其爪牙。黄彦节出来镇压，激起织工群众的愤怒，将其乱石打死，并纵火焚烧孙隆的税署，把藩

①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三八一，顺天巡抚刘四科言。

②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③ 参看《定陵注略》卷五，《苏州民变》条。

莘等狗腿子的家属推到火中烧死。特别是“有童某者，为州判，拥资数万，亦充税官，收到河税，及民变起，泗河奔避，中寒死”。如是者三日，诸税官皆次第芟尽”，至第四日，六门各有榜文云：“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义，为民除害。今事已大定，四方居民，无得藉口生乱等语。”^①孙隆乘夜逃往杭州。

这些织工虽愤激异常，但却不持任何武器，不掠取一物，焚税官房屋时并预告邻里，以防大火延烧。在行动中，谁要乘机偷窃即被打死，他们并抛弃被抓住的坏蛋买免的财物，地方官出来劝止，他们说：“他们（指税官）残害人民残害得太厉害了，我们自愿除掉他们，不敢有其它的行动。”到地方官被迫把汤莘等流氓恶棍逮捕枷示大众，织工群众就一挥而散。到第五日“道府下令捕诸为乱者，有葛贤者，挺身投官曰：‘倡义者我也，以我正法足矣。若无故株连平民，株连则必生乱。’当事者乃止就葛贤具狱。”^②

曹时聘接着说，江苏的人民都是依手艺为生的老百姓，生新朝不保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据他所见染坊关门，染工失业者数千人，机房关门，织工失业者又数千人。这些人都是自食其力的善良人民，一旦强把他们置之死地，是很不应该的。特别是江苏四个州，每年税额不下数百万，又何必强征这六万的机税。因此，清立罢机税以安定苏州府这个财赋的重地。

在苏州织工这次大规模的英雄的反抗斗争压力之下，明神宗最后考虑到数百万赋税，才不得不下命令说：“苏州府机房织手，聚众誓神，杀人毁屋，大干法纪，本当尽法究治。但赤身空

^① 参看《定陵注略》卷五，《苏州民变》条。

^② 《明实录·神宗实录》三六一；《定陵注略》卷五。

手，不怀一丝，止破起衅之家，不及无辜一人。……原因公愤，情有可矜。召祸奸民汤莘及为首鼓噪葛贤等八名，着……正法具奏，其余胁从俱免追究，以靖地方。”^①

这种平民反对派新式的群众性的英雄斗争，不是由什么行会组织的，而是工资劳动者在大作坊或手工工厂中，在共同的资本家的命令之下，由进行同一商品生产的简单的分工协作的劳动过程锻炼和组织出来的。因之，也就是中国近代意义无产者的前辈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反对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记录。他们不同于中世纪的农民或城市市民的任何斗争。他们有组织，有计划，^②有纪律；目标明确，不妥协，并且不为个人私利而破坏集体行动的纪律。特别是织工领袖葛贤，当残害织工的税官们的被惩办和汤莘被政府逮捕起来之后，立即挺身而出，把由织工暴动所破坏统治阶级的法律和秩序的举动，靠自己一人承担起来。这种集体主义的英雄行为，绝不是中世纪手工业工人和其他阶级所能有的卓越品质。他们不同于农民，因为他们不是依靠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维持自己及家属生活的。所以他们必须守在城市，守在产业周围。由此，我们可以看见，葛贤及苏州织工群众的斗争，只有近代无产阶级及其前身的工资劳动的无产者才能有的。自然，此时还是封建社会，他们基本上还是“聚众誓神”，还不能因这一次斗争即建立起自己阶级的组织。虽然如此，中国城市的市民运动，特别是江南地区的许多工商业城市以

^①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② 六月七日暴动的织工们曾“误入一民家，其家以经纪为业，无他过犯，跪而迎之门，请罪。首者取腰间手折视之，曰：‘误矣。’盖一税官家与其人俱与商店为邻故也。首者即率诸人罗拜惊谢，仍趋被税官家。”可知他们的行动是有计划的。见《定陵注略》抄本卷五《苏州民变》条。

工资劳动者为主体的市民运动，却自此开始负担起自己的历史任务，在此后三百余年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斗争中，日益扩大，日益深入地流着自己的血汗，直到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而始终没有停止。

所以，从这些斗争中，我们不仅看见了随着中国社会中新的资本主义萌芽而出现了新的矛盾，新的斗争形式，同时，也看见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反对封建特权的新的力量，即以无产者为主体的市民等级中平民反对派群众的力量。

自然，万历年间的市民斗争，不但没有停止，而且在急剧地发展着。紧接着到熹宗时（1621—1627年）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专政，在屠杀为市民为农民争取权力的若干东林党首领时，市民运动曾又一次大爆发，而且这一次较之万历时更大，参加的人物包括了中等阶级反对派和平民反对派，如杨涟被逮时，“都城市民数万，拥道攀号，争欲箠宦旗而夺公。公（杨涟）北向叩头，告以君臣大义，始得解散”^①。魏大中“就逮，士民号哭者几万人”^②。特别是周顺昌在苏州“就逮，百姓来道执香，哭声干云。既入宪署，诸校尉拥龙亭绯衣捉械……观者蜂拥，不下数十万人。三学诸生肃而前，述士民意曰：‘大人有事，地方诘不知？吏部（周顺昌曾任吏部尚书）居乡，立朝者盍为请于朝？’抚（巡抚毛一鹭）按（巡按徐吉）战栗不许。一尉厉声曰：‘今日事与秀才何与？’诸尉各举械将击诸生，忽人丛中一人从人肩上跳出，拽拳奔堂上，急持尉之捉械者，诸尉竞抨之，人丛中复有四人继出，一跃登堂，遂与诸尉殿，首一人者即颜佩韦，余四人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杨涟〉条。

② 黄煜：《碧血录·人变述略》。

者马杰、沈阳、杨念如、周文元也。五人持问尉：“此旨（逮捕周顺昌旨）何从出？”尉曰：“实是魏上公（忠贤）命我来。”于是五人大呼：“共击杀伪旨者！”值天雨，来者各以伞展，喧声震地，堂下万展齐掷，诸尉伏抚按胁下曰：“爷救我！”抚按复趋匿诸尉后……逡巡俱却入署内，士民喧从之。”后魏阉“勒令抚按搜捕渠魁。五人者挺身自投曰：‘渠魁胁从皆我也，无波及！’直向抚按大笑：‘尔陷吏部死，官大人小；我为吏部死，百姓小人大！’抚按无如之何”。其次，李应升就逮于另一丝织业中心城市“常州郡城，士民聚观者亦数万。方开读时，有发垂肩者十人，各挟短棍直呼：‘入宪署杀魏忠贤校尉！’士民号呼从之。诸尉踉跄走，越墙脱履，状甚狼狽。”①

在天启年间，棉纺织业中心的松江、青浦、上海的市民，在松江华亭也爆发过反乡宦（即市秩等级中的阉宦之家，大恶霸官僚地主）的大斗争。这一斗争爆发的原因，是松江合郡士民反对乡宦董其昌平日纵容其爪牙陈明随意“拘责监候平民”。因此，平时受害的松江、青浦、上海人民并卫所居民，便藉生员范启宋受董其昌冤害事，鼓集三县百姓，喧称报怨，填满街道，先后烧毁陈明、董其昌的房舍。市民在行动时，“其非系宦房，一椽不动”，并提出“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口号，以激励群众。在松江华亭这次市民反董宦的斗争中，市民群众的首领之一金匱，并“当众夸许，自谓葛成”（即前述苏州织工暴动领袖葛贤，原名成，苏人因讳其名，改称贤）。因此，松江府申各院道公文说：“第百姓众多，恐致激成大变，屡经出示，严谕安辑，

① 黄勉：《碧血录·人变述略》，参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

理合呈报，伏候详夺施行”^①。由此可见，所谓“民抄董宦”，实际上是董其昌勾结官府，操纵柴米市场，以扼制人民生活必需资料，至激起以金留为首的中等阶级及平民反对派广大市民群众的大暴动。在暴动中，金留并提出学习苏州织工领袖葛贤的口号。

这些史料，“士民”即中等阶级反对派，其他大抵都属于平民反对派。在万历时，中等阶级反对派参加市民斗争，还是个别的。到天启年间，中等阶级反对派参加市民斗争，就发展成群众性的。这是中国市民斗争运动的一个新发展。由此可见，明末中国社会的矛盾所反映出来的朝廷的党争和市民群众斗争，不仅日趋剧烈，而且目的都指向腐朽的封建特权势力，并且规模也越来越大，反对派所包括的社会阶层也越来越广泛。因之，这就绝不是中世纪封建社会所能有的现象。而且这些斗争，不拘从形式和内容上看，都带着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过程的特征，从这里也开始表现出旧的生产关系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矛盾，到明末已经是如何尖锐了。

这一点，从代表中等阶级反对派——士民的东林党人的斗争，主要的着重在反对腐朽封建势力阻止和破坏工商业发展上看，不管他们主观如何，但客观上都是为资本主义萌芽开辟发展前途的。所以他们受到广大市民群众，特别是平民反对派织工集中的苏州、常州等专业大城市的士民、平民和织工的拥护。从这里，我们不仅看见了市民运动，而且也看见了他们在开始联合一起进行政治斗争。这就给许多资产阶级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武断

^① 《民抄董宦事实》。

地说中国社会在西洋资本主义侵入以前，没有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荒诞的，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理论和历史根据的妄言，以有力的批判。自然，此时还是封建社会，封建势力和封建的传统习惯的反动势力，还十分强大。所以，市民运动在万历年间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虽然在个别地区，某些经济的胜利是获得了，但还未能组织起自己的力量，或争取与配合农民斗争，夺取政治权力。但由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开始到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为时不过二十八九年的短期间，中国各大城市的市民斗争，特别是丝织业中心城市苏州、常州、松江等处，以士民和织工为主体的市民斗争，由几千人、万余人、数万人发展到能影响数十万人，同时由完全经济性的斗争，发展到带有政治色彩的斗争。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正确地指出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高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富有反侵略反压迫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特别是无产者大众的英雄的反抗斗争，就是促进封建社会的崩解和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物质基础。

当然，此时中国还是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中主要的矛盾还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但是，封建社会末期的农民与地主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不同于中世纪的。

首先，就明代特别是明末的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技术发展的情形看，几乎与明末民初没有太大的差别。关于治田的方法，已有圃田、架田、柜田、梯田、涂田、河田，即泽卤之地，均可因人工而变为沃土，符合于农艺学原则的高度生产技术，在江南地区已经相当普遍地实行了。因之，地主老爷兼并农民土地的方法也

花样翻新，特别是明中叶以后，他们对农民更展开“对于神圣所有权的最无耻的凌辱，对于人身生命的极狂暴的侵夺”。所以，明代的土地分配情形，如以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国垦田数字的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为标准来看，洪武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日益增多，土地日益垦辟，而全国垦田数字和人口数字，却在官府会记录上不但未能增加，反而在减少。这种数字减少所说明的是负担国家赋税的小农土地为特权大地产所兼并而隐匿，是很明显的。

这个数字变化的谜，只要看看明代官僚，豪强地主、富商巨贾侵夺土地的方法之多，就可以看出。这些方法，有“飞洒”、“隐身”、“养号”、“挂虚”、“过都”、“受献”、“包纳”、“畸零带管”、“县挂淘回”等等不下数十种，而“飞洒”又有“活洒”和“死寄”。在这种花样翻新的侵夺魔法之下，早就造成“豪民有田无粮”而粮无归，则“俱令小民赔偿”。朱国祯《大政记》亦载：“时（英宗天顺五年—1461年）松江积荒田四千七百余顷，皆重额久废不耕，税加于见户”。

因此，到明代中叶，如弘治二年（1489年）皇庄官庄共占地三万三千余顷，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年）这种庄田扩大到二十余万顷，约占有籍耕地总面积的二十分之一。其余还有大量土地集中于贵戚和私人地主手中，到万历时（1573—1620年）除其他亲王、公主、贵戚占田不计外，赐福王庄田四万顷时，各省政府已无地可拨。其余还有赐惠、桂二王庄田三万顷，据《明史》到崇祯二年惠，桂二王还在湖广一带括田，巡抚洪如钟被迫奏请摊派，酌定大州县摊派一百五十顷，中等一百顷，下等五十顷。按每顷地租银三两六钱之数征银输解惠、桂二王府。如此，

则湖广农民未佃亲王庄田也要交纳租银，即凭空每顷增加三两六钱的地租。

在商业性农业发展的情况下，食粮生产变成了商品生产，土地就愈益卷入商品流通过程。因此，不仅封建贵族利用特权兼并土地的欲壑越大，同时官僚地主、豪商巨贾运用他们的资力和权力吞噬土地的胃口也越大，即所谓“贪绅豪民，富商大贾，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不仅如此，由于土地的生产是当作商品来生产的，这些侵占了土地的大地主，为着榨取更多的利润，就拼命剥削农民。这种情形，特别在南中国纺织业中心地区的苏、松、嘉、杭一带就更严重。据广西布政史周幹自苏、杭、嘉、湖巡视回来说：“苏州等处，人多有逃亡者。……如吴江、崑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顾亭林说：

“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明日乞贷者。”^①

这就反映出，这些地主不仅采取了封建土地占有制的形式，而且把佃农的剩余劳动，乃至必要劳动的大部分占为己有。而土地是农民的资本和劳动力发挥作用的场所。这种超经济的剥削在商业性农业发展，特别是商品食粮和经济作物占很大比重的苏杭一带，是违反农业和工业发展的要求的。因此，这就一方面迫使农民“多有逃亡者”，另一方面就刺激着广大农民群众的“均田”

^① 《日知录·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的要求。关于明末清初均田思想的传播，我们将在下面明清之际学术思想的文章中加以论述。

由此可见，明末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虽然还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但它不同于中世纪的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就是说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已经有了新的内容。这，正是因为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因素萌芽渗入了农村，地主与佃农的关系，也开始由隶属关系转变为契约关系。所以，这种矛盾就主要地表现在农民反对封建特权和封建大地产，而要求土地的平均化。这种要求，不仅反映在先进的代表市民等级反对派的思想家的思想与理论上，也反映在明代的农民斗争的政治和经济要求上。这种斗争，早在明代中叶即已开始，如正统年间（1436—1449年）福建沙田佃人邓茂七倡议不给地主送粮，租粮要地主自取，这是反对封建地主对佃人超额剥削的特权——“其俗佃人输租外例馈田主”——的斗争^①。政府干涉，因而演成大暴动起义，扩展到数十州县，波动全省。而且起义的领袖自称为“铲平王”。这就是说，他们起义的目的是为着铲除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不平，从而也就是要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一切社会传统、习俗中的不平等。这种思想和实际行动，如果我们从中国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化的情况加以研究，就可看出，邓茂七所领导的农民斗争，是为农业经济中萌生起来的新的因素开拓发展前途的。

到万历年间我们就看见“佃田者不输租”^②。有的佃户预租约订：“不许输租巨室”^③。秀水县也有同样的情形，“佃

① 《明史》卷一六五，《丁廕传》。

② 万历《无锡县志》卷四，《輿地志》四，《风俗》。

③ 万历《泉州府志·风俗》。

农……虽丰岁辄称歉收，迁延甫负，……聚党相约，勿得输租巨室，……渐成风气。官司催科甚急，而告租者或置不问，于是称贷完官，而田主病”^①。这种抗租斗争是中世纪以来绝无的现象。

因此到了天启六年（1626年）爆发的明末农民大起义，不仅在组织上、政治性上、顽强性上都超过了中世纪历代农民暴动和起义。尤其是这次大起义的最后一阶段，由李自成领导推翻腐朽的明王朝政权的阶段，这些性质就表现得更明确。

就组织上说，各路起义军为着应付明统治阶级的全力进攻，竟能集十三家于柴阳举行大会，议定共同的攻战计划。这决不是在自然经济下闭关自守的农民所能有的出之于全面战略思想的思想意识和行为。^②其后，在李自成领导时，不仅有相当完整的军事与政治组织，而且于决定大的战略计划时，还开军事会议商讨，即所谓“集思广益，阴用其长”。至于战略、战役的决定与布置，又有很高的秘密性，所谓“虽自成左右，亦不知征伐之方向”。其次，就起义军与明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上说，李自成除提出了“朝求升，暮求合，逐来贫汉难存活”，及“不当差，不纳粮”等政治口号外，并进一步提出“贵贱均田”和“均田免赋”。关于自成的均田，见于历史记载者甚少，但亦有足征者，如丁耀亢所记：闾阎落任，……以割富济贫之说明通衢，产不论远近，许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产，忽有一二窃樵认为祖产者”^③。这就明确地提出取消封建大地产和封建特权，取消赋税田租。同时对于工商业也提出“公平交易”的口号，如他克

① 万历《秀水县志·风俗》。

② 参看恩格斯著《德国农民战争》中分析农民失败原因两节。

③ 丁耀亢：《出劫纪略》（抄本）。

归德时，使百姓担着各种货物到军营中去贩卖，而以“平买平卖”来树立榜样。特别是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时，并提出了废八股而代之以策论的取士制度。

所有这些，都是符合明末中国社会中封建制度的解体、新的制度正在起而代之的现象。因此，李自成领导起义军时期的政治方向，不仅是符合农民要求的，也是符合于当时市民的要求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所以，李自成的起义军在崇祯十四、五年（1641、1642年）进攻开封时，虽然腐朽的封建贵族和官僚坚持城守，另一方面，不仅乡民起而助其攻城，城内的铁匠也在积极打造箭镞，准备城下时供应起义军应用；十五年（1642年）冬自成攻襄樊时，汉水以东的人民远迎犒军，樊城市民则自动任乡导，引起义军绕过官军所设伏雷、暗弩和汉水的险滩。特别在攻荆州时，市民不应官吏之城守倡议，而携牛酒打着旗帜出迎。这种市民群众参与起义军的实际情形，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兵部的奏疏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兹节录以概见一般：

“兵部为死贼假仁假义，众心如醉如痴，仰思圣明，严飭地方官吏，急剪倡迎之奸，以维节义，以固封疆事……巨郡大邑，高城深池，人烟辏集之地，尽可与贼相持，从未有随攻随破，不攻自破如近日者也。迩来，降贼绅士，实繁有徒，负垂三百年作养之恩，甘心为贼运筹，簧惑无知百姓曰：‘开城款迎者，兵不血刃也；婴城拒守者，尽数杀戮也。’地方二三奸徒，贼尚未薄城下，辄先倡说远迎。深可恨者，不肖怯死守令，及几幸苟免绅衿，往往相率出城，望风迎伏。”^①

^①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29页。

从这个奏疏，我们可以看出万历天启间的市民运动，当时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并未停止，因之随着明末的农民革命战争的高潮到来，市民运动又起而配合农民起义军，直接进行颠覆腐朽的封建堡垒——明王朝的统治了。这是中国市民运动的一个新发展。但是，当时中国社会的这种总的形势，是李自成为首的起义军的首脑部，所无论如何不能认识和掌握的。因此，起义军进入北京之后，政权还未稳定，他们立即展开了对腐朽封建势力——大官僚、军阀和大地主乃至大富豪的“拷掠”斗争，这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之前，却是对新政权极为不利的。所以，在明王朝垮台之后，散在各地的大官僚、军阀和大地主立即向满清卖国投降，勾引其入侵，把民族斗争转变为阶级斗争，并带动了市民等级中的中上层分子，这就使起义军陷于孤立，而终至失败。

自然，我们不能忽视李自成为首的起义军所提出并贯彻在实际行动中的政治纲领，如民主制度（虽然是很原始的和不完整的）设施，均田免赋，平买平卖，废八股取士之制，等等，无一不是适应着明末中国社会经济解放的要求而提出的，因之，这些政治思想就成了有清一代先进思想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始终斗争的目标。不了解这一点，对于清初启蒙主义的思潮、十七到十九世纪的市民运动和农民斗争的特有形式，乃至太平革命运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观点，便都成了偶然现象而无从索解了。

五、总结

根据以上不成熟的研究，不拘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社会矛盾和斗争的内容与形式上，我们都可以看见明代，特别是明末

三五十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已在开始起着本质的变化。自然，我们并不否认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史学家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的问题时，所提出的中国有许多特殊性，诸如原始公社家长制，乃至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残余，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结构，地主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统治阶级的顽固性和野蛮残暴的掠夺，等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阻碍。但仅只看见这些，而忽视了明代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以及这个萌芽对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就很难全面地揭示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也就很容易陷入于把特殊性强调到出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一般性之外的错误观点。事实上，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

“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为了这个缘故，当我们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然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①

显然，过去许多史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中，有些什么现象属于特殊性的，又有那些现象属于一般性的，大致都没有加以深刻的研究。所以过去断言的特殊性，似亦未见其特殊；从而也就不能透过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揭示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关于中国社会发展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71页。

所具有的一般性的现象，大家也就很少提及，就是提及也是否定的态度。解放以后，关于这一问题，许多同志都有了新的认识。自然还有少数同志仍旧坚持着说：只有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中国社会才有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并且还确定其以前的观点，说从江南一带手工业生产中嗅不出半点资本主义萌芽的气息。有的还误解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的话，而说：毛主席说中国封建社会母胎中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即萌芽还在母胎中没有出现。也就是说在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前，还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这话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不仅是没有了解毛泽东同志的话，而且连毛泽东同志所用名词的含义也还没有弄清楚。譬如说：“商品经济”这一名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中是有它特殊含义的，是与自然经济不同的经济范畴，列宁在他著名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第一章中，就说：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底基础。”

又说：

“在自然经济之下，社会系由许多同类的经济单位（家长制农民家庭、原始农村公社、封建领地）所组成，每个这样的单位都进行一切种类的经济工作，从采取各种原料起，到最后制成消费品止。在商品经济之下，创造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单位，增加了单个经济部门底数目，减少了发生同一经济作用的经济单位底数目。社会分工底这种递进的增长，正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创立过程中的基本契机。”

又说：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底基

础。”

特别重要的还有：

“商品经济发展薄弱（或全未发展）的国家底人口，差不多完全是农业人口；然而不应该把了解为人口都只是从事农业的，这只代表从事农业的人口自己加工于农产品，交换和分工差不多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商品经济底发展就是表示日益众多的人口之与农业分离，即表示工业人口之由于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①

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是正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实际运用。而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还在“母胎中”没有出来，直等到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才萌芽出来，显然是不正确的。

又有整同志虽然承认了在鸦片战争以前，即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前，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明清时代中国有了许多大工商业城市，以及商业资本的活跃等等，但却怀疑当时是否有市民运动，甚至根本否定有市民这个等级存在。这种认识也是有偏差的。这个偏差或者出于误解，因为他们一看见“市民”就硬去与“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前身”类比，不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发展，去看中国也有中国的“市民”。这种误解显然是由于：一方面，他们的主观意识中，还保存着中国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前，是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萌芽的存在。另一方面，就是对于“市民”的认识，受了一些形而上学的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第9—11页。

影响：“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此外所有一切，都是由于误信邪说”^①。因而就认为：与欧洲封建时代现代资产阶级前身相同的就是市民，与欧洲不同的就不是市民。

因此，在这里我们就不能不加以解释。关于“市民”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绝不是从欧洲搬来，在明代甚至更早的时代即已出现。譬如，前引吕坤在其《陈天下安危疏》中说：“课即四千，征收何止数倍，不夺‘市民’，将安取之？”这个“市民”倒确实有点象欧洲城市近代资产阶级前身的味道。但我们并未这样说，因为它有中国的特点。同时，因为我们所了解封建社会中的“市民”也绝不只此，它的内容比资产阶级分子要广泛得不知多少倍。现在将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市民等级”提出来与大家商讨一下。

《共产党宣言》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育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又说：“中世纪的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辈。”（点是我加的——钺）

由此可见，这个市民等级所包括的分子，在中世纪就是城市自由居民。这个市民等级是异常复杂的，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原来的分化就急剧地展开来，有的发展成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成了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辈。有的，恐怕是绝大多数，还沦落为流氓和乞丐，有的则是“在兴发着的资产阶级旁边苟延残喘。”

由此可见，这个市民等级在资本主义生产萌芽和增长的时候，比过去分化得更厉害。这种分化的情形，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给了我们异常明确的指示：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第100页。

“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从中世纪原来的市民内面，产生了三个不同的集团。”

显而易见，这三个不同的集团，原来都是现在仍然是属于市民等级的分子。这三个大集团包括些什么成分呢？恩格斯指示说：

“城市人民以阔阔之家为首，即所谓‘名门望族’，这是最富裕的家庭。（点是恩格斯加的，下同。这里要注意的是他们并未如封建早期的贵族领主和地主住在农村的庄园中——钱。）……他们饶有财富及其古代贵族地位，是经帝王和帝国承认的，他们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剥削城市公社，同样剥削属于城市的农民，他们以谷物和货币放高利贷，他们为自己而垄断一切，他们从公社夺取森林和牧场的使用权，为自己的私有利益而直接使用这些东西。”

本多抄了，总之，用中国术语所说的“豪强”及其所干的胡作非为的罪恶勾当，德国十六世纪的“阔阔之家”的市民都在很热烈地干着。这种“市民”在明清时代乃至更早的时代，对于我们不会是面孔很生疏的吧！

其次是“反抗阔阔之家的城市反对派分成两派”，其中的一派是“中等阶级反对派”。恩格斯指示说：这是“现代自由主义者之先辈，包括富裕的中等阶级，温和的中等阶级，以及按照地方情形多少有点差异的较贫分子。……由各处贫乏的阔阔之家不满意的分子所联合起来之党派，在公社一切常会中，在行会中，已有了大多数。……中等阶级反对派要求制裁这些贵人的卑污行动，要求废止僧侣的内部裁制权和免税权，要求限制僧兵的人数”。这种反对派为着斗争所组成的党派，与明末东林党人相较，除了反对目标在十六世纪的德国为僧侣，在中国为阉宦，以及因两国不同

的具体情形而有所差异外，还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而目标不同以及某些具体情况因国情而差异，这正是中国社会特点之所在；而要求的相同，这又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所制约着的，并不是东林党与他们所代表的中国“市民等级”与德国的有本质的差异。

其三是平民反对派，“包括中等阶级破产的分子和无公民权利的城市居民群众，如手工业工人，日工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各种萌芽，这种萌芽在城市生活发展的最低阶段即能遇见。……没有一定职业和固定住所的人民，当时由于封建社会的崩溃而渐渐增加起来，在社会中的各种职业，各种生活区域，都为享特权者所蚕食。……这些漂泊者，一部分在战时从军，一部分沿途行乞，另一部分则到未加入行会组织的工业部门中去做日工糊口”^①这三部分人的第三种，到城市党派斗争爆发时期参加斗争，当时他们还保存有农民性质。这种典型的例子，在中国最为特出而且最多，即明末各未城市的反矿税监反豪强的斗争，巴恩士说：“如果我们到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封建社会中‘市民等级’的各种人物及其活动了。而且，市民不仅在明清时代，乃至远到唐宋时代，都已经出现了。”

那末，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既然在明代即以存在，而且还有所增长，到十七、十八世纪，世界各先进国家都已先后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呢？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还须考察清代前期中国社会变化与发展的具体情况，这里暂且收住。

（原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① 《德国农民战争》，第13—17页。

略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

吴大琨

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家，只考证《红楼梦》的作者与版本，只承认《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完全不去注意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不去注意研究《红楼梦》里所反映的清代社会经济制度的特点，这样就完全抹煞了这部巨著的思想内容与社会意义。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们的这种研究《红楼梦》的方法，乃是一种领导人们去“钻牛角尖”的方法，我们必须反对。

我们认为要正确地认识《红楼梦》的人民性，就必须首先从正确地认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着手，从研究《红楼梦》里所反映的清代社会经济制度的特点着手。但这一工作也正是非常艰巨的工作，毛主席指示我们说：“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①我认为：我们要研究《红楼梦》也必须如此。

譬如，首先，《红楼梦》里所反映的封建社会，究竟是什么性质，什么阶段的封建社会呢？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大家来加以讨论确定的问题。现在有些同志肯定《红楼梦》里所反映的社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8页。

会，乃是“濒临崩溃瓦解的前夕”的封建社会^①。有的，甚至说：

“《红楼梦》是中国三千年来的封建社会走向崩溃时期的历史性的纪录与总结。”^②这种说法，就都说得太笼统或是太夸张，并没有抓住《红楼梦》里所真正反映了的时代特点。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很长，各个朝代都有各个朝代的社会经济特点，《红楼梦》里所反映的封建社会，显然不是任何一个别的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而只是清统治下的封建王朝。所以把《红楼梦》看成了是三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总结，事实上不但是“夸大”了的说法，而且还是忽略了《红楼梦》时代特点的说法。《红楼梦》里所反映的清王朝，在十八世纪中叶也就是乾隆时代，达到了它的统治力量最强盛的顶点，从此就开始“由盛而衰”，开始走向下坡的道路。清王朝为什么到乾隆以后就“由盛而衰”，这个我们且留到以后再谈。现在要说明的是，乾隆时代的清王朝——也就是《红楼梦》中所反映的时代情况——显然还不能就算是已到了“崩溃瓦解的前夕”的封建社会情况。当然所谓“前夕”，原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只要是在崩溃以前的社会，就都能笼统地算是“崩溃前夕”的社会。但我们如果把乾隆朝就看成了是“崩溃前夕”的社会的话，那么到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的时候，我们又将把当时的社会看成是什么社会？

所以我认为：把《红楼梦》里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看成是什么“濒临崩溃瓦解的前夕”的封建社会，是说得太笼统的。我们应该具体地指明：《红楼梦》里所反映的社会，就是十八世纪中叶的清统治王朝，而且仅仅是这个时期的清统治王朝。这

^① 何其芳：《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人民日报》1954年11月20日。

^② 李希凡、黄翎：《论〈红楼梦〉的人民性》，《新建设》1954年11月号。

个清统治王朝，到了十八世纪中叶，确已发展到了它的统治力量强大的最高峰，从此，就向衰落的途径发展了，但也毕竟还没有就到了“崩溃瓦解的前夕”。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指出的：乃是清王朝的所以会在乾隆朝由盛趋衰的原因，也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固有发展规律在那里发生作用，而并不是由于当时的社会里产生了什么“资本主义的萌芽”，或者甚至发生了什么“资本主义的原始蓄积过程。”^①

斯大林指示过我们：封建制度的基础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②。所以，考察封建社会，就必须从土地制度出发。一般的说来，中国过去的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土地是早就可以买卖了的商品。每一封建王朝，当它在战乱之后初期建立的时候，为了恢复生产力，自耕的小农往往总是能得到一些“保护”的，但只要时间稍久，统治者群的榨取日多，再加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土地兼并之风就会盛行起来，地权集中的结果，广大的农民就要丢失土地，无以为生，最后就不得不迫使这些农民们起来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终于使得原有的统治王朝趋于灭亡。清统治王朝，对于这个中国固有的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也未能例外。这个王朝，到了乾隆时代，土地兼并之风就已经盛行起来，而且发生了显著的恶果。乾隆十三年（1748）湖南巡抚杨锡绂曾写过一篇《陈明米贵之由疏》，疏中说：

“国初地余于人，则地价贱；承平以后，地足养人，则地价平；承平既久，人余于地，则地价贵。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至七八两，向日七八两者，今至二十余两，贫而后卖，既

① 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0日。

②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37页。

卖无力复买；富而后买，已买可不复卖。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必须买米接济。而富户登场之后，非得善价不肯轻售，实操粮价低昂之权。”^①

这就不但把当时地权集中的情况说得很清楚，而且把当时的地主富户们如何操纵粮价使农民挨饿的情况也说得很明白了。

为什么清王朝发展到了乾隆时代就要“由盛趋衰”，这就是一个最主要的理由，那些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如果多起来，当然就会爆发农民起义，动摇整个清王朝的统治。事实上，我们知道，清代历史上有名的“白莲教”“天理教”起义，也就正是在乾隆朝开始先后爆发起来的。

所以真正动摇了当时清王朝的统治的，依旧还是由封建社会内部的固有矛盾所造成的农民起义。毛主席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那么，在乾隆朝，究竟又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商业资本的发展呢？回答是有的。但由于这种商业资本，乃至高利贷资本，都早已与土地资本结合在一起，所以商业资本乃至高利贷资本发展的结果，都只会更加促进土地的兼并，而并不会象欧洲社会那样产生出什么独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资本来。而且清代社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可以作为商业买卖对象的不仅有土地，而且还有官爵。清自入关以后，就开捐纳的例。京内捐纳的官，最初不过是中书闲曹，后来便上及主事员外等项；京外捐纳的官，最初不过是有司

^① 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此处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2页。

下僚，后来便上及道府等项。（这种官爵买卖的事，《红楼梦》里也有反映，例如贾家赖大家的儿子，就曾用钱买到一个县官。）官爵既可买卖，有钱的人自更不会设法去发展什么手工业，而只会去买“官”做了，这样的“官”自然也更只会“贪污”，“括地皮”，使农民更丧失土地，更造成地权的集中，促成农民的起义。

所以我认为：倘把乾隆一朝，看成是什么中国“资本主义的原始蓄积期”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所谓“资本主义原始蓄积”，倘依照马克思的定义，就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一方把社会的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他方就把直接生产者转化为工资劳动者”^①。乾隆时代的社会发展过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显然并不是。

至于若问，在乾隆时代有没有“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这也要看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究竟是如何定义而言的。现在有些同志，误把商业资本的发展，就看成了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是不对的。马克思是第一个人在《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提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的人。他说：

“工资劳动者及资本家所由以发生的发展的起点，是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此后的进展则在于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上的变化，在于封建剥削到资本主义剥削的转化。要理解当中的变迁，没有追溯过远的必要，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在十四世纪十五世纪，已经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903页。

城市看到，但资本主义时期是从十六世纪开始。在资本主义出现的地方，农奴制度的废止早经实行了；中世纪光辉的顶点，主权城市的保持，也早经褪色了。”^①

在这一节文字之后，马克思又用了—个注，来说明这问题。他说：

“资本主义生产，最早是在意大利发展，而农奴关系的分解，也在那里最早发生。在意大利农奴在有任何人确实获得土地时效权以前，就被解放了。所以，他的解放，使他立即转化为象鸟一般自由的无产阶级；在当时，那些大抵是由罗马时代传下来的城市，又已经有了欢迎他们的新主人。……”^②

由此可见，马克思所指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实际上乃是指的在农奴解放以后的有雇佣工人的生产。当时社会所能有的有雇佣工人的生产，当然也只可能是一种手工业的生产。它可以是简单的“协作”，也可以是有了分工的手工制造业，但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必须是私有的。斯大林同志说：

“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这样的场合开始的，即生产资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没有这种情形，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③

中国不但在乾隆时有规模较大的手工制造业，即在这以前很久就已经有了大规模的手工制造业了，但所有这些规模较大的手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904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905页。

③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13页。

工制造业，绝大多数都是“官营的”。既然是“官营的”，生产资料并未集中在私人手中，因此是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的。私人所有的“手工制造业”，虽然也有一些，但因为是“被压抑在“官营手工业”之下，所以至多只能在某些特殊的地区得到一些发展，在这意义上可以作为“萌芽”存在，但却决未曾成为“大树”。所以若说在乾隆朝，中国就已经有了可以动摇整个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的萌芽”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

以上所说，乃是我所要指出的有关《红楼梦》时代的一般的经济情况。现在我还要进一步指出的，乃是《红楼梦》里所反映出来的有关清代社会经济制度的一些特点。

我认为要彻底了解《红楼梦》的背景，有两件事值得特别注意。一是《红楼梦》里所反映的主要的并非是一般的清代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生活，而是清皇朝中所特有的满州贵族地主家庭的生活。《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中所记的黑山村乌庄头向贾府交的租银以及其他海产、野味等物就不是普通的地租而是满州贵族所特有的“庄田”制度下的地租。满人进关以后，上自皇帝下至八旗兵丁，都各圈占土地，总称“官庄”，这些“官庄”中的土地一般都由汉人代为耕种，满人自己并不劳动，他们只收取租粮，过着完全吃、喝、玩、乐的寄生的生活。这些“庄田”都不但有一定量的土地，而且有一定量的壮丁，并由这些壮丁中指定一人为“庄头”负责收租，壮丁们的身份是不自由的，可说是一种典型的农奴生产。

清的统治者，最初大概以为建立了这样的一种剥削制度后他们满族的经济生活便可永远不发生问题了，但实际的情形并非如

此。到乾隆时代（甚至早在雍正时代），不但这些“庄田”中的生产日趋减退，而且由于社会上的土地兼并之风已经盛行，所以即使是旗人的“庄田”，是由皇帝用统治的力量所维持着不准买卖的土地也还是敌不过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在那里被典卖，兼并了。当时的清代统治者曾经下了许多的查禁上谕要挽回当时盛京的旗人盗卖田产之风，可是实际上并未能生效，满族的经济生活还是发生了危机。我们从《红楼梦》里看，就可以看出，发生这种危机的原因实际上是必然的。因为建立在这种“庄田制”上的满族寄生生活，实际上是无法长期维持的。在这种制度下，寄生的人口会愈来愈多，日常的靡费会愈来愈大，而剥削来的收入则总有一个限度，到了一定期限，就非崩溃不可了。因此作为整个清代的封建社会来说，乾隆时代虽然还只是清代社会“由盛趋衰”的一个时期，但作为整个的满州贵族社会来说，这时的生活却已彻底腐化，经济基础也已开始动摇。《红楼梦》里所反映的主要的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满州贵族地主社会，它与当时的汉族地主社会还是有区别的。

其次，那就是《红楼梦》里所反映的清代满州贵族家庭中的奴婢制度问题，当时的满州贵族家庭社会中，存留着大量的奴婢，即以《红楼梦》里所描写的人物来说，其中有很大一部份就都是奴婢（鸳鸯、晴雯、金钏儿等都是奴婢），这些奴婢，有的是所谓“家生子儿”，是家庭中原有的奴婢所生的奴婢，也有的是幼年被买进贾府的奴婢，这些奴婢们是被视为主子们的财产的一部份的。所以不但随时可以由主子们责打侮辱加以买卖，而且到主子们犯了事，要籍没财产的时候，也还要随同“入官”。《红楼梦》里，奴婢们的总数，实在是不少。所以到宁府被抄没

七
二

以后，贾政把阉府的“家人”（也即是奴婢）“花名册”点一点的时候，竟还有三十余家，共男女二百十二名。当然，贾府的奴婢，实际上还不止此数，因为一个奴婢的手下，也还有他的亲戚们等，所谓“奴才还有奴才”呢①。

所有这些奴婢们的生活，除了一些特殊例外就都是万分痛苦的。《红楼梦》的作者，就曾用了具体生动的例证来告诉了我们许多这些奴婢们的悲剧，特别是婢女们的悲剧。金钊儿的死，晴雯的死，乃至鸳鸯的死，不都是动人的悲剧么？

《红楼梦》的作者，不仅用突出的笔调来描述了所有这些女奴婢们的痛苦与死亡，而且也还描写了在这种满州贵族家庭里的其他某些贵族妇女们的痛苦与死亡。为什么？我认为：就因为在那时的制度下，妇女乃是最受到迫害的一群，某些在形式上被列入“主子”队伍内的妇女，在实质上也依然还是“奴婢”，是男子的玩物，不过是主子们的高级“奴婢”而已。即以《红楼梦》里所描写的贾元春来说，她贵为天子“皇妃”，可是实际上，她过的又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生活！她每次见到家庭里的骨肉时，就总要哭得象一个泪人儿似的。由此可见，她平时生活的痛苦。

《红楼梦》里为什么突出地描述了一些奴婢们，以及妇女们的悲剧，我以为这与满州社会里当时还有较强的“父家长奴隶制”的残余力量是有密切关系的。当然，这种“父家长奴隶制”的残余力量，在当时已与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力量密切结合而不可分，但这到底也还是一个当时满族社会的特点，是值得我们大家在分析《红楼梦》的背景时加以注意的。

① 见《红楼梦》第一〇六回，作家出版社版，下册第1024—1205页。

总之，我认为：《红楼梦》这部作品的人民性，就在于作者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给十八世纪中叶的满州贵族地主的家庭社会作了一个典型的描写，从而也就使我们具体地了解了当时整个清代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腐朽、荒淫与黑暗，以及在这种黑暗统治下的被迫害者的惨痛命运。但由于作者的阶级限制以及时代限制，使他并未能看到一条足以改变当时社会不合理制度的具体途径。存在在中国固有封建社会内部的社会发展规律，足以使每一封建王朝由盛到衰到灭亡的发展规律，在作者的主观认识上，因此就变成了是一种不可抗违的“神”的力量。作者在书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定命论”的思想，要求“出世”，要求脱离社会的思想，就都是一个看到了社会的黑暗面，而又没有勇气，没有力量来对它作充分坚决斗争的统治阶级中的人物所必然会产生思想，而这也正是《红楼梦》这一部伟大作品里所包含的不健康的因素之一。对于今天的广大进步青年读者来说，不指出这一点来，我认为也是不对的。

以上，就是我所要指出的，有关《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及其中间所反映的有关清代社会经济制度的特点的一些意见，请大家指教。

〔原载《文史哲》1955年第1期〕

中国封建社会手工业中的 资本主义萌芽

孔经纬

早在唐朝中叶以后，分散的小生产者即已有了开设较大一点的作坊的可能。列宁正是说：“从分散的小生产生长出资本主义的简单合作。”^①唐天宝中，有名为刘清真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安徽寿县）作茶，人致一驮为货，至陈留……。”^②这可能已经是作为具有资本主义单纯协作制性质的大作坊而存在了。不管工人是否已脱离了农民身分都可以这样认为。恩格斯说：“最初的资本家，遇见的是现成的雇佣劳动的形式。但雇佣劳动还只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过渡状况。不时出去作短工的农人，自己有着小块土地，它至少能够维持他的贫困的生活。”^③列宁也说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情况下，“工业者（按即工人）仍是那按照传统方法制造原料的农民”，“工业者还未完全从农民蜕变出来”，“不论是大资本家以及无产阶级广大阶层，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5页。

② 《太平广记》，卷二四。

③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5页。

在这里都还没有”^①。至于是否只有场主脱离生产不参加劳动才算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问题，那取决于其资本的数量大小，

“资本底数量决定着业主个人参加企业的形式：或者如果他的资本还很小，他自己也就作一个工人。”^②。

唐朝后期小说——温庭筠的《乾膈子》，生动地叙述了窦×的发家史。从这个记载可以使我们了解到窦×此人虽然起初也得到了比较有财势的亲戚和家族的一点资助，但他利用亲属的资助，开始时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而一步一步的获得利润的，这就是搞园艺：种榆荚、养榆材。由于有了金钱的积累，后来逐渐成为剥削者。但其发财之道并不是购买土地或买官当，而是通过手工业和商业的活动来达到致富的目的。窦×很善于把组织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的活动结合起来：把从市场上买到的原料品、半成品或其他旧物，再经过手工业的加工和生产的步骤变成商品出卖。窦×买蜀青麻布，“雇人作小袋子”。在雇“小儿”拾槐子时，则每人发给一个袋子。又令“小儿”拾破麻鞋，以买得的每一辆新麻鞋去换三辆破麻鞋。“雇日佣人”“从洗其破麻鞋，”晒干后暂贮起来。又买各地堆弃的碎瓦子，雇人洗其泥滓，积贮起来。此外又从市场买到油靛数石。加上由于卖榆材（车轮材料）而得百余千，遂以破麻鞋、槐子、油靛作原料雇工从事“法烛”的手工业生产。置石嘴碓五具，剉碓三具，雇人烧饭，“广召日佣人”，“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再使其和槐子，油靛相溶合，“命工人团握”后，便成“例长三尺已下，圆径三寸”的“法烛”。窦×因此而获得了“无穷之利”。窦×曾以三万钱买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第500、502页。

②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第316页。

下了十余亩的“坳下潜汗之地”，看来似乎无利可图，但由于窦×在其附近设了六、七个铺子制造煎饼及团子，并用以“召小儿掷瓦砾”，“遂经度造店二十间”，“日收利数千”。窦×在胡人米亮的建议下，买宅地的目的，更主要的无非是为了得点便宜；宅内有捣衣砧（异石），经玉工琢成“腰带铐”，“果得数百千价”，另外从这里“又计获钱数十万贯”。窦×为逢迎一位中郎将曹遂兴之人，出钱五千文买下了一颗“有碍庭宇”的大树，看来好象是曹遂兴占了便宜，从而使得这位“中郎大喜”，可是窦×照样有办法达到获取利润的目的：雇匠人伐断，“选就众材及陆博局数百”卖之，“计利百余倍”。窦×献一小宅于李晟太尉之事，因为求得庇护，但主要不是为了自己当官或有政治势力并以此为归宿，而是以“二百十千”的献礼，通过作别人买官的中间人，从中“获钱数万”。这也说明窦×一直是一个普通的工商业者，并由于剥削雇工，组织商品生产，不断获得利润和积累金钱而成为食于人的资产者。

郑还古《博异记》中《奚禾山》一节的下述记载，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上都通化门长店，多是车工之所居也。广备其财，募人集车，轮辕辐毂，皆有定价。每治片辘、通凿三窍、悬钱百文，虽敏手健力，器用利锐者，日止一、二而已。”从这里看到了“广备其材”的人家雇车工制车的情形。在唐朝的一些地区内，雇佣劳动关系已有相当发展。据一个小说的记载，乾祐年间“……富商大贾，力皆有余，而佣力负运者力皆不足。云安（四川省）之贫民，自江口负财货至近井潭以给衣食者众矣。”①

① 《酉阳杂俎》卷五。

另据一个材料载道：“皇建僧舍，傍有糕坊，主人由此入资为员外官，盖显德（五代，公元九五四年）中事也。都下人呼为花糕员外”。^①这里说明该糕作坊的主人原来（可能在唐时就已如此）本是一个普通工商业者，由于富裕了才出钱买了一个“员外官”（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贱商或“抑末”的关系，出现这种事例也是难免的），可是这时还仍袭旧业，当一个“花糕员外”而已。如结合当时雇佣劳动关系的发展情况来看，上述糕作坊必为雇佣工资劳动者从事生产。五代小说——徐铉《稽神录》《广陵贾人》一节所载“广陵（扬州）有贾人，以柏木造床几什器百余事，制作甚精，其费已二十万，载之建康，卖以求利”的这一史实，无疑也当是一个很重要的旁证。

还有唐朝中叶以后，在个别地方似乎也出现了商业资本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最初资本主义萌芽形式。如传说武宗会昌二年（公元八四二年）在荆州附近，有的妇女“常造雨衣，与胡氏家佣作，凡数岁矣，所聚十三万。”“汴州百姓赵怀正，住光德坊，太和三年（公元八二九年）妻阿贺，常以女工致利……阿贺今住洛阳会节坊，成式家雇其组针。”^②五代小说——范资的《玉堂闲话》载道，“襄州有民家妇，姓贺氏。里人谓之织女。”

“其姑已老且病，冻馁切骨，妇佣织以资之。所得佣值，尽归其姑，己则寒馁。”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宋朝继有发展。从北宋开封的情况来

^① 《清异录》卷四。

^② 《酉阳杂俎续集》，卷三。此外，我们从白行简《李娃传》记载长安“佣凶器”的东西二肆“互争胜负”和经双方同意后举行竞争性的商品展览会故事中，从柳宗元宋清传记载长安西市药商宋清“远取利”“卒以富”的情形中，都不难看到唐朝后期富裕普通工商业者的成长。

看，有这样的历史记载：“凡饼店，……每案用三、五人，扞剂、卓花、入炉，自五更，卓案之声，远近相闻。唯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胜，每家有五十余炉。”^①开封这类作坊，我们从下列两个事实可以证之其中必有普通工商业者经营的场家。

第一，据一个材料所载，北宋私人作坊出售笼饼，每枚为八钱，则已有百分之三十三以上的利润，若售二十，利润率即为百分之三百以上了。如据载：“公先呼作坊饼师至，讯之曰：自我为举事时，来往京师，今三十年矣。笼饼枚七钱。而今二十何也？……此饼与汝所市者，重轻一等，而我以日下市直……枚止六钱，若市八钱，则已有两钱之息。”^②

第二，北宋开封已出现了私人出卖劳动力的工夫市之类。据载：“……即早晨、桥、市、街、巷口皆有竹木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罗立会聚，侯人请唤，谓之罗斋。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③

据施彦执《北窗炙輠》记载，“禹黜，高祖谓之陶四翁。开染肆，尝有紫草来，四翁乃出四百万钱市之。数日，有狙者至，视之曰：此伪草也，四翁曰：何如？狙者曰：此蒸坏草，色泽皆尽矣，今色在外，实伪物也，不可用。四翁试之，信然。狙者曰：毋忧，某当为翁遍诣小染家分之，四翁曰诺。明日狙者至，翁尽取四百万钱草，对其人一蒸而尽曰：宁我误，岂可误他人耶。时陶氏资尚薄，其后富盛累世，子孙登第者亦数人。”从这里可以看到陶四翁原是一个普通工商业者，能够购买得起四百万钱的紫草充为染料的染肆，其规模已经不能算是很小了，而且从别人

①③ 《东京梦华录》卷四。

② 《春渚纪闻》卷四。

把其所买的“蒸坏草”转分与各“小染家”的情况来看。陶四翁显然是区别于“小染家”的大染家。从陶四翁借此营业以致“其后富盛累世”的事实和“子孙登第者亦数人”的情况来看，他开那样大的染肆是不可能不雇用较多的人来为其工作的。

其次，举出两个知名普通手工业作坊的材料：其一，《老学庵笔记》卷四载道：“承平时，鄜州（属陕西省）田氏作泥孩儿名天下，态度无穷。虽京师工效之，莫能及。一对至直十缗，一床至三（毛本作直）十千。一床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余，无绝大者。予家旧藏一对卧者，有小字云：鄜时田记制。”其二，《老学庵笔记》卷六载：“亳州（属安徽省）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一州惟两家能织，相与世世为婚姻，惧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来名家，今三百余年矣。”这两个材料表明，他们的手工业品都是颇受欢迎的，因而赢利必为不小。“泥孩儿”的手工技术，使京师工虽效之莫能及，织“轻纱”的手工技术，一州之内只被两家所掌握，这就是他们成为“名天下”和“名家”的前提条件。成为“名天下”和“名家”的普通手工业作坊应该是较为富裕之户。

另外在北宋，私人商业资本支配家庭工业的历史事实也同样存在。如在制墨业中，除有私人普通制墨作坊外，也有私人商业资本的活动。据载：“黄山，张处厚、高景修，皆起灶作煤，制墨为世业。其用远烟、鱼胶所制佳者，不减沈珪。常和沈珪、汪通辈，或不自入山，亦多即就二人买烟、令渠用胶，止各用印号耳。”^①墨上印号乃是宋朝墨产品的商标，普通商人这种“买

^① 《春渚纪闻》，卷八。

烟”，“印号”的活动当属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相结合的形式。

南宋的情况，表现的就更加突出了。据马可波罗说，在南宋末的临安（即杭州），“有十二种职业，各业有一万二千户，每户至少有十人，中有若干户多至二十人四十人不等。其人非尽主人，然亦有仆役不少，以供主人指使之用，诸人皆勤于作业。”

“城中有商贾甚众，颇富足，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应知此职业主人之为工厂长者，与其妇女，皆不亲手操作。”^①又说：

“商店富裕而重要之店主，皆不亲手操作……妇女妻室亦然。……其旧主虽命居民各人子承父业，第若致富以后，可以不必亲手操作，惟须雇佣工人，执行祖业而已。”^②这里表明了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关系的因素，而且多数工人又同在一起参加劳动。马克思说：“较多数劳动者在同时，在同地（或在同一工作场所），在同一资本家的命令下，生产同种商品，在历史上，和在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③同时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更可以了解到南宋临安的大作坊经营者大抵只参加商业活动，它的资本也多半从商业范围内积累起来的。正如列宁说：“要进行更大的生产并同时雇佣许多工人，就需要有相当数量的资本积累，这个资本常常不是在生产范围内而是在商业或其他范围内形成的。”^④

南宋临安中资本主义萌芽势力之成长，是和当时市民等级经济势力的逐渐抬头相适应的。因为也只有从这些自由的居民或市民中间才能发育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说：

①② 《马可波罗行纪》，中册，第151章，冯承钧译。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4页。

④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16页。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育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①

《都城纪胜》及《梦粱录》的作者，都列举了南宋临安私人大小铺户（在数量上以一般市民经营者为居多数）到处林立的盛况。”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②客贩往来，整日不绝。在坊巷、桥道、院落，“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③如果把《梦粱录》的作者所列举的临安有名的私人市肆加以归类的话，有下述若干铺户：杂货铺、油靴铺、白衣与白衣铺、金银与金银交引铺，彩帛与生帛生绢铺、纸铺与纸札铺、裱糊铺、牙刷铺、头巾铺、馒头铺、腰带铺、胭脂铺、颜色铺、绒线铺、冠子与枕冠铺、粉心铺、丝鞋铺、犀皮铺、针铺、布铺、烛铺、七宝铺、扇子及画团扇铺、铁器铺、锡铺、漆器铺、磁器铺、珠子铺、花朵铺、面食店以及各种小饭馆、海鲜蜜饯等铺。

临安的地主、官僚或大富商，有的利用自己雄厚的钱财，修造所谓“塌房”，赁与一般铺户，供寄藏物货之需。如北关水门里，有水路周回数里，自梅家桥至白洋湖、方家桥，直至海物库市舶前，“有慈元殿及富豪内侍诸司等人家，于水次起造塌房数十所，为屋数千间，专以假赁与市郭间铺席宅舍，及客旅寄藏物货并动具等物”。④这种“假赁”事业在客观上无疑给予市民等级所经营的工商业以某些发展的可能性。其他“赁物”事业，如

①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4页。

②③ 《梦粱录》卷一三。

④ 《梦粱录》卷十九；《都城纪胜》，《坊院》一节也有此类记载。

“盘合（盒）”之类，也同样有便于小贩买卖，如临安那些顶盘担架卖吃的小贩，每日三更不绝，冬天虽有大雪，也经常盘卖至深夜三更。^①这些贫苦的小贩可能就是靠着“鬻物”业而租得盘具的。据周密说，这些小商贩，混个最低限度的生活还不算十分困难，因为“凡买卖之物，多与作坊行贩已成之物，转求什一之利，或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于作坊，至晚始以所值偿之，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②

临安还出现了大批流动手艺人 and 沿街叫卖各种物品的货郎。如手艺人有“錮路、钉铰、修补锅铤、箍桶、修鞋、修幞头帽子、补修鱿冠、接梳儿、染红绿牙梳、穿结珠子、修洗鹿胎冠子、修磨刀剪、磨镜，时时有盘街者，便可唤之。”街上叫卖商贩有卖铜铁器、熨斗、泥风炉、镜子、木梳、篦子、刷子、扫帚、针线、胶纸、胭脂、姜、瓜茄、菜蔬、猪羊肉等等。另外在巷陌街市又经常有“使漆修旧人……闲早修扇子、打蜡器、修灶”等等手艺人。^③

这种市民等级经济力量的成长，使临安的行会组织较前增多，工商行业大抵各有其行会或公会组织。手工业方面有“名为作分者，有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打钹作、裹贴作、铺翠作、裱褙作、装奁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冥器作等”。商业方面有“名为团者，如城西花团、泥路青果团、后市街柑子团、浑水闸羹团。又有名为行者，

① 《梦粱录》卷十三。

② 《武林旧事》卷六。

③ 《梦粱录》卷十九。

如官巷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城北鱼行，城东蟹行、姜行、菱行、州北猪行，候潮门外南猪行、南土北土门菜行、坝子桥鲜鱼行、横河头布行、鸡鹅行。更有名为市者，如炭桥药市、官巷花市，融和西坊珠子市、修义坊肉市、城北米市。”^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行会或公会还没有达到束缚普通工商业者发展的地步，而是起着保护作用的。

市民等级经济势力的成长，就其发展趋势来说，必然使自己的手工业作坊不断扩大，并从市民等级中逐渐分化出资产阶级分子。由此可见，我们根据《马可波罗行纪》来推论南宋临安的资本主义萌芽似非牵强。

再据明人冯梦龙撰《古今小说》第三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一节载道：“说这宋朝临安府，去城十里，地名湖墅。出城五里，地名新桥。那市上有个富户吴防御。妈妈潘氏，止生一子，名唤吴山，娶妻余氏，生得四岁一个孩儿。防御门首开个丝绵铺，家中放债积谷，果然是金银满篋、米谷成仓。去新桥五里，地名灰桥市上，新造一所房屋，令子吴山，再拨主管帮扶，也好开一个铺。家中收下的丝绵，发到铺中卖与在城机户。……吴山蚤晨到铺中卖货，天晚回家。这铺中房屋，只占得门面，里头房屋都是空的。”吴山一日自述道：“家中收丝放债，新桥市上出名的财主。”又一日吴山告其父说：“在城神堂巷有几家机户赊帐要讨。”还有吴山在一天分付主管说：“我入城收拾机户赊帐，回来算你日逐卖帐。”

这个材料表明，吴家是一个普通的富商，而且所经营的铺

^① 《梦粱录》卷十三。

子，生意又很兴隆；吴家共有两个铺子，其一由父执掌，专门收买丝绵，其一由子经营，专门出卖丝绵于在城机户；吴家的商铺雇有外人为其工作，为了另设一铺，吴防御专门拔“主管帮扶”少掌柜，而吴防御这个老掌柜也必然会有“主管”之类与其他方面的雇人；吴家的商铺已经超越了一般商业经营的性质，而具备了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相结合的发展趋向，那就是说吴家专门收买农家或家庭手工业者的丝绵，并将收下的原料再发卖给在城机户，又加上放债等情，这必然会使那些卖丝绵的家庭手工业者和需要丝绵的手工业作坊受其支配。

关于南宋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事实，下述二例也可充为它的旁证。第一，唐仲友所开的彩帛铺原是一个普通工商业者经营的作坊，后来虽然在当上台州知州的时候，也借势扩展过自己家所开的作坊，但总的来说还是属于雇工生产的私人大作坊。如一个材料载道：“往仲友，私家婺州所开彩帛铺，高价买到暗花罗，并瓜子春罗三、四百匹，及红花数百斤。”“又乘势雕造花板，印染班斓之属，凡数十片，发归本家彩帛铺，充染帛用。”“仲友因修造兵器……所买生丝，除量支作弓弩弦用外，并发归本家彩帛铺，机织，货卖。”^①第二，在矿冶方面，抽分制比北宋似乎更有发展，使一般私人下户也可能借官家的坑冶，自备物料，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官家基本上不干涉生产过程，只抽十分之二的税，其余十分之八许坑户自由当作商品出卖。^②如绍兴七年（公元一一三七年）官家以金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取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据说这

① 《朱文公文集》卷十八，〈按唐仲友第三状〉。

② 《宋会要稿》，〈食货〉三四之十六。

种制度，在南宋曾成为“经久可行”的手工业形式。同时在绍兴十四年（公元一一四四年）还有所谓“不得别有抑勒，抱认虚数，令有力之家计囑幸免，切致下户受弊”^①的诏令，这里已经看到了“下户”在矿冶手工业中的某些成长。

当然，南宋的资本主义萌芽可能尚在封建行会的束缚和支配之下（在临安，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但这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初期情况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就西欧国家的历史发展作出总结说：“工资劳动者阶级，发生于十四世纪后半期，但在当时，乃至在次一世纪，它还不过占人民的极小部分。他们的地位，稳固地，由农村方面独立的农民经济和城市方面的行会组织保护着。”^②这对于我们正确的理解在封建行会正在发展的条件下而产生出资本主义萌芽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继宋朝之后，元末明初在杭州一个普通的丝织手工业作坊就有十几个手工业工人。资本家握有丝织机，叫工资劳动者每日工作到夜间二鼓。工人还有了一些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技术一旦提高，愿求多得工资亦可另觅雇主。

徐一夔所作的《织工对》说：“……仁和之相里（原曰钱塘之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二鼓。……老屋将压，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吾虽贱，日佣钱二百，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所入，养吾父母妻子，虽食无甘美，而亦不至饥寒。……于凡织作，咸精致，为时所尚，故主人之聚易以售，而佣之直亦易以入。……顷见有业吾同者佣于他家，受直略相似。久之乃曰，吾

① 《宋会要稿》，《食货》三四之十七。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32—933页。

艺固过于人，而受直与众工等，当求倍直者而为之佣。而他家果倍其直，佣之主者阅其织果异于人，他工见其艺精亦颇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胜十工、倍其直不吝也。”^①

从这个记载同时还可以看到类似这样性质的手工业作坊在同一里巷之中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大作坊主似乎是兼商人身分，由自己抛售生产品；由于有了单纯协作，经营这种作坊很有利可图，技术高的工人虽可得比一般工人多一倍的工资，但资本家不只不能因而少赚钱，反而要赚的更多。

不过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作坊在明初尚属少见，只有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才在部分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生长。

明朝中叶以来，不论农业与手工业都较前有着显著进步。农业中，如代耕法的发明：以坚木制辘轳两具，两端设轴并贯上人字样的架木。在辘轳两端的尽处安上木橛，中间缠以绳索（其绳索之长为六丈，在中间设安犁用的小铁环）。绳索两端各系辘轳一具，将犁安于辘轳中的铁环上。“一人坐一架，手挽其橛，则犁自行矣。递相挽，亦递相歇，虽连扶犁者三人乎，而用力者则止一人。且一人一手之力足敌两牛，况坐而用力，往来自如。似于田作，不无小补。”^②据说这种农耕法曾经试验还确证有效。不管其推行情况如何，仅就这个事实本身，即已表明人们农业劳动经验的逐步提高和在力求改进农具上所作的努力。手工业技术方面，在南方出现了水碓造纸法。据《浙江通志》所记，于水碓中放黍数斗，截竹置其中间，不用人力，只“待水自舂，捣烂为

^① 明沈朝宣：嘉靖《仁和县志》卷十四，载《武林掌故丛编》第十七集。

^② 明王征：《新制诸器图说》，《代耕图说》。

泥，辄用竹帘捞起，堆积蒸曝，便可成纸”。其他如纺织手工技术的进步更不胜枚举。《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以图示列举了明末纺织生产工具若干种，其中有如南纛车、北纛车，纺车，溜眼，掌扇，经耙，印架过糊，腰机，花机等是。

不仅如此，明朝中叶以来，在江南以及河南等地的个别角落里已出现了雇用农业劳动者而从事商品作物生产的经营地主。其中比较显著者如湖州、归安、番禺、常熟、吴江、苏杭等地，即是桑、麻、棉、茶、蔗、荔枝、花果、橄榄、蒲葵、香花、香草等商品作物的生产区域。因此这些地区的商品流通也是比较发展的。除了上述地区以外，如河北、山西等地的农村市场关系在明末也有些变化。当时河北省元氏县，在县城有四个集市，各县共有十个集市。其中旧设集市有六个，都是“货物殷繁，人烟接集”，其余四个系新增的集市^①。山西省在明朝中叶以来新建的一些小地方都已成为大小市场的所在地。阳和道所属新平路四堡、东路八堡、新平堡、守口堡及分巡道所属北东路八堡，镇羌堡各皆同时是一处大市场。大同道所属北西路九堡、中路十一堡、威远路四堡共设有小市场四处：助马堡、宁虜堡、杀胡堡、灵石堡各有小市场一处。分守道所属西路三堡，井坪路四堡、迎恩堡、灭胡堡亦各设小市场一处^②。明末就全国来说，虽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商业交通也是比从前有所发展的。所谓“滇南(云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两广)一带宦商衡游蓟北(河北北部)，为方万里中柯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③即是此证。

① 崇祿十五年张慎学修：《元氏县志》，《市集》。

②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七册，《山西》。

③ 宋应星：《天工开物》，序。

所有这些，便给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创造了前提。在政治上统一的封建帝国中，个别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和其他地区的经济状况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明万历年间，甚至在矿冶中都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万历二十三年（公元一五九五年），江西吉安，泰和县土民段永等，曾借产石膏的官山——姥山岭，“自备资本，立厂招商开采，岁可得万担”，国家只征其税收。正因如此，曾引起明臣萧近高的反对，并认为江西税监潘相之允许私人开采官山的作法是“凌殿宗室”，“宇宙一大变”^①。所谓“宇宙一大变”，应是指变为封建主义的对立物而言。其次，江西景德镇很早即以制瓷业而著名。到明朝中叶以后不仅有生产规模巨大的官窑，而且也出现了不少的民窑。万历年间有人说是景德镇的制瓷工人每日不下数万人，他们又都是一些所谓“四方无籍游徒”。这些工人中的绝大部分当是受雇于民窑中的制瓷工人。我们和清初的情况联系起来看，似乎此时的制瓷业已经有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

当然，就部门来说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一直是在丝织与棉纺织业方面有较突出的发展。

成化（公元一四六五——一四八七年）末年，在江南的机户中出现有由一张织机发展为二十余张织机的丝织手工业资本家之事例。嘉靖（公元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年间，在吴江县盛泽镇有人只十年光景，就由拥有一张织绸机的机户发展成为拥有三、四十张织绸机的手工业资本家。

万历年间，苏州东北半城大抵多为机户，特别以营丝织为生

^① 《江西通志》，卷四九，《輿地略》。

者居多。各个织房的织作，缎与纱相区分。工匠各有专能，内部有分工。“匠有常主，计日受值。”如果长工因事不能上工。“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日唤找。”找不到职业的工人，“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①织工的职业和机户生产的增减相依为命。“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织户之机张日减……穷民之以织为生者岌岌乎无生路矣。”^②苏州织业从纺织到成为色布，又有染与织的分工。因此除机户、织工外另有染坊、染工。所谓“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③这种染坊当亦属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作坊。

但是封建统治者对于苏州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作坊乃是仇视的，“榷纲之设，密如秋荼”，加上各种“擅自加征，”遂在万历二十九年（公元一六〇一年）引起了苏州机户与织工的联合反抗。斗争很激烈，“苏州民葛贤等缚税官六、七人投之于河，且焚官家之蓄税棍者。”^④

同年除苏州有“民变”发生外，“即如湖广一省激变已四、五次，而独……武昌为甚。”^⑤“楚民激变，势欲滔天。”^⑥万历三十年（公元一六〇二年）又有“临清、武昌、苏州之变，而……广东、陕西、云南尤纷纷未已……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今市井奸民犹复肆为欺罔。”^⑦同年“苏、松、

① 《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卷十，《织工部》。

② 《明实录》，万历朝卷三六一。

③④⑤ 《明实录》，万历朝，卷三六〇。

⑥ 《明实录》，万历朝，卷三五九。

⑦ 《明实录》，万历朝，卷三七六。

常镇税务改用刘成，因陆邦新等营干机务，众机户嫉之，土人管父等借口激变，煽众抢掠。”^①天启三年（公元一六二三年），湖广一带仍不断有“民变”之继起，声势也相当激烈。

这些事实说明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势力和市民等级业已开始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而与封建政府进行了斗争。

商业资本支配家庭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形式在明朝中叶以后也已经有了了一定的发展。松江“以棉布衣被天下”^②，“邑（按即松江）之贩户，皆自崇明、海门、两沙来，土人惟碾去其子（棉花）卖于诸处，以性坚强不中纺织也，邑产者另有行户展挂一杆于门，俟买卖者交，集户外乃为之美恶而贸易也。”^③“纱（棉纱）有成经纬者，有止卖纱者，夜以继日，得斤许即可糊口（按指贫家）。善纺者三缫为常，两缫为下。”“列肆卖之，名布经团。”“或有多自搜罗至他处觅售者谓之水客，或者零星赚得而转售于他人者谓之袱头小经纪。”“凡布密而狭者为小布，郡城谓之扣布，疏而阔者为稀布，产邑中极细者为飞花布，即丁娘子布。”^④在松江，商业资本支配家庭工业的情形不论城乡概皆有之。所谓“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红女有力焉”。^⑤松江的“郊西尤墩布，轻细洁白，市肆取以造袜，诸商收鬻称于四方，号尤墩暑袜。妇女不能织者，多受市值，为之缝纫焉。”^⑥但“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间能者率

① 《明实录》，万历朝，卷三七二。

② 《松江府志》，卷六，《疆域志》，《物产》，注引梧得杂俎。

③④ 《松江府志》卷六，《疆域志》，《物产》，注引褚华：《木棉谱》。

⑤ 《松江府志》卷五，《疆域志》，《风俗》，据前志。

⑥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松江府都》。

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①浙江嘉善县也有类似情况。万历年间该地“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布列肆”，“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归，仍治而纺织之，明旦复持以易无，顷刻间纺者可得四、五两，织者日成布一匹。”^②

这些材料证明有的商人已经通过对家庭工业的支配榨取剩余价值（虽然还未脱离商人身份），有的城乡家庭手工业者则不知不觉在原有分散的小生产者状态下成为被剥削的工资劳动者（尤其是妇女更较多）。

这条向着资本主义过渡的道路在西欧和俄国照例是一种常见的形态。“例如十七世纪英国的毛织物商人，曾把那些仍然独立的织工人，放在自己的统制下，把羊毛俾给他们，而购买他们的织物”，“甚至在这个世纪中叶（按即十七世纪中叶），法国丝工业和英国织袜工业和花边工业的工厂主，大部分仍然不过名义上是工厂主，实际上不过是商人；他让织工人在他们的旧式的分散的方法中继续劳动，不过实行商人的统治，他们实际也是为商人劳动的。”^③俄国在大机器工业出现以前，织物业中的大作坊主”大规模地购买原料，部分地把这些原料在自己作坊中加以精制，部分地把纬线和经线分配给小生产者（小作坊主、匠人、农民、‘家庭手工业者’等等），这些小生产者在自己家中或小作坊中把材料织出来以赚取计件工资。”“织工在其中工作的小作坊或家庭，不过是手工业工场底场外部分”。^④

①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松江府部》。

② 《浙江通志》卷一〇二，《物产》二，注引《涌幢小品》。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419页。

④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第344页。

列宁说：“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底特征，就是少数比较大的作坊与数量巨大的小作坊之同时并存。”^①“其所固有的工人同土地的联系之保存，大作坊周围之有许多小作坊，——如果没有家庭工作底分配，是很难想象的，差不多是不可能想象的”。^②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情况那就更是如此了。然而在这种形态下劳动着的家庭工人都比直接在场内受资本支配的工人所处的条件要恶劣得多。

清初，对明朝已有的资本主义萌芽曾有过较严重的摧残，但历史是前进的，随着康熙前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兴旺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作坊和工场手工业便在一些地区又开始复兴起来。

屈大均在叙述广东私人冶生铁工场情形时指出：“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二十名，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每版约三百斤）则赢利，八、九版则缩。……诸炉之铁冶既成，皆输佛山之埠（按：输此用以鼓铸）”。^③佛山冶熟铁场的情况“则以生铁团之入炉，火烧透红，乃出而置砧上。一人钳之，二、三人锤之，旁十余童子扇之，童子必唱歌不辍，然后可炼熟而为镞（铁片）也。计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一肆数十砧，一砧有十余人，是为小炉。”^④这种冶铁工场手工业虽不能确认其全属资本主义性质，但从其规模、雇工人数以及赢利目的和生产商品这些事实，也已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第396—397页。

②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第399页。

③④ 《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看出了其中的某些资本主义因素。还有据乾隆《佛山乡志》说，佛山全镇数十万人口之中，“挟资以贾者什一；徒手而求食者则什九也。”

次从云南铜矿场中尤不难看到私人商业资本投向产业并产生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事实。康熙年间，云南铜矿场的内部分工很细：由“槌手”，“凿手”打洞，由“龙手”排水，还有“砂丁”，“领班”之类。矿砂出土后有“捶矿工人”，“配矿”工人在那里工作。此外“煅窑”，“炼炉”又各有其专门的技术工人。该地铜矿场的投资人有场主，管事，锅头之名。矿丁和投资人是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这种关系又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是“月活”，不论开采是否有得，矿丁按月领工资。第二，是“亲身”，矿丁只按规定的比数分得矿砂，不另取工资。一个大场往往开凿二、三十个矿洞，但投资范围一般是以一个矿洞为其基本单位的。官府丝毫不干涉铜矿场的生产过程，只委人监收百分之二十的矿税，其余百分之八十的出产听民自由贩卖。^①

乾隆时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比明末更有发展，除官窑外民窑有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靡不借瓷资生。”^②这些匠人大部分都是“挟其技能以食力者”的受雇工人，而民窑中的一些陶户已有纯系普通资本家身分的场主。陶磁制造的内部分工尤其十分细密：如有淘泥工，拉坯工，印坯工（拍模的），斲坯工，画坯工，上釉工，眷灰工，抬坯工，烧窑工，开窑工，乳料工，砂土工，填彩工等等。显然那些制瓷业多是一种工场手工业的形式。

^① 参见严中平编著：《清代云南铜政考》。

^② 唐英：《陶事图记》。

据赵翼的《檐曝杂记》《广东艇船》一节载：“广州珠江艇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猝难禁也。艇户本海边捕鱼为业，能入海挺枪杀巨鱼，其人例不陆处。脂粉为生者亦以船为家，故冒其名，实非真艇船也。珠江甚阔，艇船所聚，长七、八里，列十数层，皆植木以架船，虽大风浪不动。中空水街，小船数百，往来其间，客之上艇船者，皆由小船渡。……七、八千船，每日皆有客，小船之绕行水街者，卖果食香品，竟夜不绝也。余守广州时，制府尝命余禁之，余谓此风由来已久，每船十余人，恃以衣食，一旦绝其生计，令此七、八万人何处得食？且缠头皆出富人，亦衷多益寡之一道也，事遂已。”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广州珠江艇船中的普通脂粉手工业作坊是相当发展的，每船有十余人“恃以衣食”，“缠头”则“皆出富人”，一共七、八千船，达七、八万人之多。这里存在着资本主义因素是毫无疑问的。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在江宁、杭州、湖州、成都、苏州、无锡各地皆有资本主义性质纺织手工业存在。江宁自康熙年间起，私人机房渐已获得“畅所欲言”的发展机会，“至道光间，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①

乾隆时期在湖州丝织业中存在着支配织绢户的绢庄。《双林志》中说：“取绢者曰绢主，售绢者曰机户”。^②素称“布马头”的无锡，家庭棉织户甚伙。无锡“布有三等，一以三丈为匹，曰长头，一以二丈为匹，曰短头，皆以换花（按即换取棉花原料），一以二丈四尺为匹，曰放长，则以易米及钱。坐贾收之，

① 《续纂江宁府志》，卷一五，〈拾补〉。

② 同治《湖州府志》卷二三，〈輿地略〉，〈物产〉下注引。

捆载而贸易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坐贾之开花布行者，不数年即可致富。”^①当时苏州布亦很出名，该地出现了很多支配家庭织布业者的坐贾字号，“自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市各有其人。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惟富人乃能办此。”^②据钱泳的《履园丛话》《换棉花》一节所载：“余族人有名焜者，住居无锡城北门外，以数百金开棉花庄，换布以为生理。”这些都同属商业资本支配家庭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形式。

此外如在鸦片战争前夕，广东佛山之地从事丝织业的男女工人合计不下一万七千多；从事棉布制织的有五万多人，手工业工场约有二千五百家。广州以北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茶叶手工制造场，使用男女童工共约五百人。河北宁津县大柳镇的统泰升记杂货店，兼营了铁器轧花等手工业工场，仅轧花场中就有一百多工人。在陕西汉中一带有很多规模较大的冶铁、木材、造纸等手工业，据说在那里也出现了手工业资本家和雇工的对立生产关系。

这些史实充分表明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③不但关内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前已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就连开发较晚的东北地区也不例外。

顺治十年（公元一六五三年）起，清朝政府开始注意东北的农业开发。与此同时，一方面由于军事防御（帝俄势力）上的需要，经康熙至雍正兴起了如下的若干城市：奉天、吉林、宁古塔、

① 《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力作之利》。

② 乾隆《元和县志》卷十，《风俗》。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20页。

阿尔楚喀、伯都讷、瑗琿、墨尔根、齐齐哈尔。在这些城市中除军事官僚之外，居住着汉人商贾、工匠、佣工、仆从等等。

从康熙七年（公元一六六八年）到乾隆五年（公元一七四〇年），东北虽进入了被封禁（停业辽东招民令及颁布辽东流民原地归还令）的时代，然乾隆以来至嘉庆年间，由于关内农民的贫困破产和清朝政府关于禁止流民整理、惩戒诸法令的颁发，流民群乃不断冲过封禁网而移入东北。自乾隆末年轻嘉庆至道光初年，使东北开原以南，吉林、长春、舒兰、双城堡、昌图、怀德等地人口大大充溢起来并从而得到开发。与此同时，关内的商业资本势力也冲向东北，使商品生产随之而发展。

关内商业资本势力之移至东北，其最初首先是采取杂货商的形式渗入农村的。后来由于在他们手中逐渐积累了大量的货币，从而有的便开始以高粱为原料，运用关内已有的生产经验，开烧锅造酒（嘉庆元年东北已开始课烧锅税）。嘉庆初年，山东人把榨蚕饲育与制丝法传到了盖平——海城的地方。道光初期，按照关内经验设立的麻子油坊改以大豆为原料，于是在铁岭、开原的大豆产地出现了豆油坊。又乾隆年间，本溪湖御巴成为东北采煤和制铁的中心，经过嘉庆、道光，在咸丰、同治年间则达到了相当兴盛的地步。

由于东北地区无强大的封建势力（与关内相比）可言，所以当时的手工业和商业随着东北的被开发而很快的发展了起来。东北的商业资本势力有所谓直隶帮、山西帮、山东帮、广东帮等等，他们不但成为商品交换的中介人（关内与东北以及本地区内部），而且也成为手工业的经营者和家庭工业的支配者。由于货币财富的积累和丧失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劳动者之更大量的移

入，加上从关内传来了较进步的手工业技术，则在烧锅、油坊等手工业中出现了私人工场手工业的萌芽。

油坊和烧锅具有一种农产品加工的性质，因此它通常是由粮栈商兼营的：如油坊除了从事豆油豆粕的制造以外，还进行大豆等的买卖事宜（除了为收购原料外还为客商代办这类交易）。柞蚕制丝业本多属家庭工业的经营，但随着商业资本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则渐成为商业资本经营者的附属品。其他如小规模造纸坊，皮坊、染坊亦皆隶属于商业资本之下。

总之，在营口开港以前东北地区早已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是颇易理解的。①

但是必须指出，直到鸦片战争前后为止，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还是处于萌芽期，并没有经历过工场手工业的特定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之在全社会中普遍成长并构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只有与盛行着的“原始积累”相伴随才有可能。

〔原载《新史学通讯》1955年12月号〕

这篇文章是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以来，在已发表的看法的基础上经过充实后写成的，但是还很很不成熟，希望得到指正。

1956年9月

① 可参见满铁经济调查会编：《满洲经济年报》，第3章第1节，1934年改造社版。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问题的考察

黎澍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这句话很好地驳斥了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事业辩护的资产阶级学者，他们歌颂殖民地冒险家，认为中国如果没有这些冒险家的“开发”，就会永远停滞下去。然而这句话也应当使我们的历史家了解到，在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中孕育着的还只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它的发展是缓慢的。

目前有好几位历史家却正在从事于一项很吃力的工作，企图证明我国在明朝即十四至十七世纪或明朝末叶即十六至十七世纪，已经不仅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它的发展，特别是在苏州、松江、杭州、湖州、常州一带的发展，不仅是缓慢的而是“迅速惊人”的。他们报道说，明朝或明朝末叶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大量存在是它的特点。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20页。

这样的报道立即唤起了一种把明朝的中国历史近代化的倾向，有人断言资本主义生产在明朝已经成为把汉族联系为民族的纽带，有人把农民暴动解释为“市民”运动，有人把属于上层建筑的许多现象一一贴上“市民意识”的标签，等等。但是，这些标签实在贴得太早了。因为有许多关于资本主义的萌芽的论文脱离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把非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混淆起来，把农奴式劳动当作雇佣劳动，把农村副业和行会手工业当作工场手工业，从商业资本引出工业资本主义，表现了显著的片面性，贴标签的基础并不稳固。

何以见得？下面是对于历史家们所持的几项主要论据的一些考察。

一、关于非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

非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被混淆在一起，在关于丝织业的论述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几乎所有的论文都只对丝织业作了一个简单的分类：一部分属于政府的织染局，这是从事非商品生产的手工业；一部分是机户，这是从事商品生产的手工业。在弄不清究竟是非商品生产或商品生产的地方，就一律看作商品生产，并且断言在这里存在着手工工场，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但是事实并不如此简单。这里先从一个材料说起。

在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中摘录的郭子章《蚕论》的一段话里面有这么几句：“今天下蚕事疏阔矣。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夥，取给于湖茧；西北之机，潞最工，取给于闾

茧。”①

尚钺同志得出结论说，这足以表明“商业资本的活跃”②。

杨则俊同志得出结论说，这足以表明“原料生产和加工过程间的分工的发展以及区域分工的发展”，是“国内市场形成的起点”③。

张正明同志得出结论说，这足以表明“一定程度的区域分工”④。

事实上，有了“今天天下蚕事疏阔矣”一句就可以看到下面几句话是说明养蚕业和丝织业在明朝末年的衰败状况的。试想一想罢，三吴、越、闽之机取给于湖茧，还不算太困难；至于潞安机户取给于闽茧，那就不仅在明朝的交通条件下而且在近代的交通条件下也是违反资本主义利润原则的。那么，当时何以必须不顾这样严重的困难来继续维持丝织业呢？原因就在于这种丝织业不是生产商品的，而是为皇家生产贡品的。从顺治、康熙和乾隆《潞安府志》所载的一些文件中可以看到，潞安本来没有丝织业，自从明初成为朱元璋第二十一个儿子的封地以后，才由外地征集几千机户来这里住坐，并且在这里植桑八万株，开始织造一种叫做“潞绸”的粗绸，作为进贡之用。这些机户不是集中在政府设立的工场中工作，而是散处在潞安府所辖的长治、高平、潞州三个县里。按照《明会典》所载的规定，这些机户必须在当地附籍，种田纳粮⑤。他们是由政府发了登记牌的特别户口，有生

①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一。

② 《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③ 《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6期。

④ 《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

⑤ 《明会典》卷一九。

产贡品的义务。当时各地物产凡是进贡的，都被看作是最好的，所以潞绸成了一种很有名的产品。除了山西本省的衙门以外，其他各省的衙门都派差官差役前来定货。本来，如果生产贡品和官方定货同生产一般商品一样，是有利润的，那么，在当地丝织业中发展资本主义经营也是可能的。但是事实完全相反。生产贡品和官方定货即使给价与一般商品相同，也必然要因为官吏和差役的残暴的勒索而失去任何利润。于公允在《条议潞绸详》中记述生产贡品的情形说：

“每岁织造之令一至，比户惊慌。本地无丝可买，远走江浙买办湖丝。打线染色，改机挑花，顾工募匠，其难其慎。既惧浆粉，复恐溃潑。沿途差解，扛箱、雨具，百费运盘。到部投收，例有铺垫。上司深恐浮冒，駁查駁减不休，穷民割髓。支吾引领，望允何日？南北奔驰，经年累月，饥弗得食，劳弗得息，地不能种，口不能糊，咸为此也。”^①

可见在潞安丝织业中虽然也有“顾工募匠”的现象，但显然是一种为了赶任务来找的临时工，而业主竟是“口不能糊”的。生产官方定货也并不比生产贡品好些。王鼎《请抚恤机户疏》写道：

“独苦本省衙门之取用以及别省差官差役织造者一岁之中殆无虚日，虽各请发价，而催绸有费，验绸有费，纳绸有费，所得些须尽入狡役积书之腹，化为乌有矣。机户终岁勤苦，夜以继日，妇子供作，俱置勿论，若线若色，尽取囊中，日赔月累，其何能继？”^②

①② 乾隆《潞安府志》卷三四。

于公允和王肅所记述的潞安丝织业的困苦显然是继续明朝而来的。因为明朝初年潞安丝织业除了生产贡品和官方定货以外还生产商品，到了明末，当地桑树已不剩一株，养蚕业完全没落，机户大量逃亡，丝织业已经到了末路。可是当地生产贡品和官方定货的义务仍旧存在。那些没有逃亡的机户因为不能脱离匠籍，必须从河北、山东、江苏，甚至从自古以对外交通困难著名的四川运蚕丝来交差，以致陷入了“支价赔累，荡产破家”的悲惨境地。所以，如果从潞安机户取给于闾茧便得出商业资本活跃或区域分工的结论，如果不区别非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那是完全错误的。

潞安丝织业的状况对其他几个地区的丝织业，例如，对宁国府和泉州府的丝织业的状况，具有说明意义，因为这些地区也是不出产蚕丝而政府规定有进贡丝织品的义务并设有织造官的。

但是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状况与潞安有很大的不同。这里的丝织品的市场较大，明朝规定各地方政府的解绢任务有许多是派人在这里买了来完成的，而这里的农民因为担负着全国最重的赋役，必须从事副业生产才能维持生活，所以丝织业的小生产普遍地散布在好几个府县的乡村和城市里面。但是丝织业和其他手工业一样，是由政府管理，并且首先要为宫庭服役的。明朝在南京设有内织染局，而在苏州和杭州只派了一个织造官，没有设立政府的工场。顺治三年织造侍郎陈有明《建织造总局记》说：

“行次虎林（即杭州），查接总织局业为设法营造，已成一巨模，而姑苏詎可缺然？且向来机设散处居民，无监督典事之人，率以浇薄贖货塞责报命，上积弛而下积玩，织染

之流弊浸淫已极。皆由无总织局以汇集群工，此明季之所以坐废也。”^①

这就是说，明朝派在苏州和杭州的织造官所管理的机户是“散处居民”的。所谓“居民”是否城市和乡村的都包括在内，缺乏详细的材料。不过可以确定地说，城市机户是由织造官管理的。下面是一个为许多人所引证过的记载：

“东城之民，多习机业。机户名隶官籍。佣工之人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又有以车纺织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粥后始散。”^②

又《苏州府志》的同一记载有如下补充：

“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每桥有行头分遣，今织造府禁革，以其左右为利也。”^③

这个记载可能是从明朝的旧志上抄下来的，因为“机户名隶官籍”是明朝的制度，清朝在顺治二年就已经把它废除了。所有引证这个记载的人一致认为，它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显著存在，可是，既然“机户名隶官籍”，织造官对他们的管理又是很严格的，那么，所生产的究竟是商品或非商品，就很难说。朝廷对江南丝织品的需要是很大的，除了规定的“岁办之供”以外，还有“额外坐派之供”和“不时坐派之供”，据《明史·食货志》所载，额外坐派的彩缎在天顺四年为七千匹，正德元年为一万七千余匹，到万历中达到每年十五万匹，并且“相沿日久，

① 乾隆《苏州府志》卷二一。

② 乾隆《元和县志》卷十，“风俗”。

③ 《古今图书集成》，“经济篇”，“考工典”卷十，“织工部”。

遂以为常”，而彩缎绫罗的织造每天所能达到的进度很小^①，可能那些“名隶官籍”的机户因为必须有很多的时间为朝廷服役，实际上完全为政府所控制。

同时雇佣劳动的存在也不足以证明这里有大量的丝织工场。因为丝织木机与棉织木机不同。棉织木机只需织工一人。而丝织木机，素纱机须用织工二人，一人为织匠，一人为纬纛匠；花机须有织工三人，一人为织匠，一人为挽花匠，一人为纬纛匠。假定机户有织机一张，如果自己家里只有织工一人或二人，还须雇工一人或二人。机户既多，雇佣劳动的市场便随着出现了。

当然，江苏和浙江是养蚕业和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这里机户多，除了在官厅登记的以外，可能还有新增加的和没有登记的。他们供应宫廷的需要有余，生产商品的可能性比较潞安机户大得多。因此，在这里个别地出现有织机四五张的机户，如徐一夔《始丰稿》卷一《织工对》所记；个别地出现有织机多至二十张以上的机户，如张瀚《松窗梦语》第七卷《异闻记》所记；甚至个别地出现有“其家织帛工及挽丝佣各数十人”的作坊，如陆粲《庚巳编》卷四《郑灏》所记，是可能的。但是要确定这些机户是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还必须能够说明：第一，这些机户中的雇佣劳动的性质；第二，丝织业中是否有行会制度的支配。这

^① 《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一：“陕西抚按言：每岁御用袍服以四千匹为额，自二十八年九月进贡后起织，至九年四月已织完者共三千二百匹。乃于本月内始奉新命改织盘梭，又奉钦降柘黄、暗花二式，每絨一匹各长五丈八尺，每机日织一寸七分，二机合织，计半年方织完一匹。今改织盘梭，采妆及刺样暗花等絨每机日止织一寸二分，二机合织，八月余方成一匹”。就是织潞絨的进度。织彩缎如何呢？不久以前，北京历史博物馆装置了一张织机，织工三人在紧张地进行工作的情况下，装经纱费时一个月，装好以后织就宽约二尺的青团花大红缎三尺左右，据说每日进度为五寸。

种说明的所以必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雇”、“佣”与资本主义的自由雇佣劳动往往有着很大的甚至是本质的不同，而行会制度在中国是很早就产生并广泛发展的，上引《苏州府志》已经表明在待雇的工匠中“有行头分遣”，在机户中是否同样有行会支配？以一般情形而论，绸和绢的织造比较简单，可能为行会支配所不及，他如彩缎绫罗的织造都需要有高度的技术，那就难于判断了。

二、关于农奴式劳动和雇佣劳动

如果从字面上看，雇佣劳动在中国可说很早就已经存在了。特别是在明朝和清朝的记载中，人们很容易就可以遇到它。几乎很少人怀疑它同马克思表述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有什么不同，所以有很多文章大量地把有“雇”、“佣”一类字眼的材料摘引下来，以证明资本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古老性。

然而这种摘引是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很可怀疑的。

马克思指出，货币所有者要在市场上发现当作商品的劳动力，有种种条件必须具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商品交换自身只包含从商品本身性质发生的从属关系。在这个前提下，劳动力能在市场上表现为商品，是因为它的所有者（有劳动力的人），把它当作商品来让渡或出卖，且以此为限。但它的所有者要把它当作商品来卖，他就必须能够处分它，必须成为他的劳动力，他的人身之自由的所有者。他和货币所有者相遇在市场上，彼此以平等的商品所有者的资格发生关系，不过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所以是法律上平等的人。这种关系的继续，需要劳动

力的所有者只出卖劳动力的一定时间；因为要是一次卖尽，卖绝了，那就等于出卖自己，把自己从自由人变为奴隶，从一个商品所有者变为一个商品。他，当作一个人，必须不断地把自己的劳动力，看作是自己的所有物，是自己的商品。要能做到这样，他就只能在一定时限内，任买者支配它，使用它，并在让渡时，不放弃他对于劳动力的所有权。”^①

可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所谓“雇”、“佣”具有很特别的性质。例如采矿业，现在有不少的论者认为无疑地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在这一部门里面出现的“雇”“佣”最多，动辄以万计。如果这种“雇”“佣”确乎是资本主义的自由雇佣劳动者，那么，应当认为中国至迟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已不仅存在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存在资本主义的大企业。可是只要稍加考察，就可以发现，采矿业中的“雇”“佣”并不是自由雇佣劳动者，他们是一种因为无以为生而自愿在一定时间内按照农奴条件出卖自己的失业者。他们在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以前，是自由的。他们能够处理自己的劳动力，所以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在市场上的出现，“来如潮涌，去如星散。机之将旺，雇之不去。势之将衰，招之不来”^②。同时他们还可以按照最小的比例分取实物或得到雇价。当然，他所分取的实物或得到的雇价很难认为是象马克思所说的，“够在正常生活状态下，把劳动的个人，当作劳动的个人予以维持”^③，并且包含劳动力补充员——劳动者的儿女的生活资料^④。但是他所卖掉的不仅是他的劳动力，而且包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7页。

② 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

③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81、182页。

括他的整个人身和人格。所以他一经受雇便在野蛮的封建制度之下丧失了他的全部自由，变成了农奴式的劳动者。王崧《矿厂采炼篇》写道：

“一厂之礮洞多者四五十，少者二三十，计其数曰口。其管事又各置司事之人，工头以督力作，监班以比较背境之多寡。其刑有笞、有缚，其笞以荆，曰条子；其缚以藤，曰撞，繫两拇悬之梁栋。其法严，其体肃。”^①

尽管管事人说，“人无尊卑”，把砂丁叫做“弟兄”，但在冒险事业上，砂丁的使用却真好象是砂子一样的：

“直攻、横攻、仰攻、俯攻各因其势。依线攻入，一人掘土凿石，数人负而出之。……攻者不得出，常闷死或数人，多至数十百。……死于礮洞。即委之死所，不取以出。”^②

然而这还是官督商办的大矿^③，那些私营的小矿是不是更好一些呢？由于缺乏关于明朝和清朝的这种小矿的雇佣劳动状况的详细记载，让我们采用摩尔根研究古代社会的方法，从现代旧式采矿的遗留来看看旧式矿山管理的细部罢。下面是国民党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专员黄开禄所作《云南个旧锡矿劳动调查报告》的有关部分的摘录。调查时间为一九三九年六至七月。

“私营矿厂因规模甚小，故其矿工管理多以厂房为单

①② 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

③ 王崧《矿厂采炼篇》：“凡厂之初辟也，……有成效乃白于官司，申请大府飭官吏按验得实，专令一官主之，称为厂主，听其治，下其讼，税其所采炼者入于金府。府以一人掌其出纳，吏一人掌官文书，胥二人供徭伺之役，游徼其不法者，巡察其漏逸者，举其货，罚其人。厂主所居曰官房。”

位。多数之私营矿厂，其厂房不止为管理人食宿办公及存砂之处，亦即为其全部工人食宿游息之处。老厂区之全部私营矿厂，可说每厂只有一厂房，俗名‘伙房’。此伙房为管理之单位。食宿于一伙房内之工人，皆由该伙房之管理人（俗名先生）管理之。

管理人多为出资办厂者（俗云供头）雇用之人，实质颇似旧式商业组织之‘账房’，以其兼有劳工管理及业务管理也。普通一经营洞尖之私营矿厂约雇有五六十名矿工，多只设有一伙房于矿区之中心。三年前各伙房管理人之权力几为起亩无上，矿工之生命及自由多系其手中。

个旧矿厂招工之事概非自办。除极少数矿工自投自荐外，招工事多由工头（鑛头）主持。大凡冬至之后，矿山上缺乏雨水洗砂，工作较少，各矿工多结算该年应得工资回籍过年，同时各矿主或管理人即供给其鑛头以相当盘费，使离矿赴各县招工，以备次年之采矿。最普通之情形为鑛头回籍招募其亲朋或同乡。

各矿工来矿之旅费例由矿厂供给，到矿之后矿主例须付给各鑛头以一种酬劳费，平均招得一名砂丁须付酬劳国币三元。因此砂丁与矿主间之劳资关系颇为复杂；因双方事前并未接头，谈不到任何种明文规定之雇佣契约；依劳方方面看，若本人未预支安家费，则可随时中止工作，但自资方方面看，则厂方已在劳方身上用去相当旅费及酬劳费，依习惯至少须在矿内工作一年始能脱离。因此，厂方对于矿工中途之脱离，视为‘赖债’，名之为‘逃走’。处罚之苛，在二年前常至枪杀。今虽未能证实仍有此事，然鞭打则仍不免。

厂方为预防‘逃走’，二年前常加镣于各矿工之脚上，今则滇省府已有明文禁止。调查时亦未遇见带镣之矿工。惟闻僻处深山之矿洞尚有加镣事，但未能证实。然为预防逃走事，厂方对矿工之管理多取监视态度，因此矿工之自由极受束缚。据调查所见，有私营矿厂于矿工每日工作之后即不许其离开伙房，常致全部矿工皆伏居于伙房之内，厂主于门外尚派有巡查者焉。

矿工工资之给付，在私营矿厂为每年一清。一年一清之制度弊端百出，矿工终年血汗应得之工资常为剥削净尽，盖矿工多童龄无知，即知有弊，亦多未能维护其应得之权利。一年一清之制度于年终清账时厂主间有以营业不佳为由乃不付给各矿工以应得之工资者，亦间有继续拖欠工资之全部或一部以牵制各矿工使次年仍回原矿工作以省招工之费用者。矿工对此因多不知诉苦之途，弱者（砂丁）多任其剥削，而强者（鑛头）常起仇杀之意。

决不能想在明朝或清朝的旧式矿管理比较这个报告里面所叙述的更文明一些。但是就在这个报告里面我们仍旧可以看到农奴式劳动的显著存在。

采矿业如此，其他简单协作的性质如何呢？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写道：

“山内营生之计，开荒之外有铁厂、木厂、纸厂、瓦厂各项。一厂多者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贼匪滋事之始，有议以各厂人多，恐被贼裹诱，当严行驱散者，是大不然。凡开厂之商，必有资本足以养活厂内之人，必有力量足以驱使厂内之人，工作利其资值，帖然为用。各商护其资本，仗

探贼踪，往往较官府为真。”^①

很显然，这种劳动者的性质同砂丁是一样的。他们的主人不但有资本，而且有比资本更神奇的力量足以驱使他们。他们被雇佣，被养活，但也因此失去了自由。他们与农奴不同，仅在于他们还没有被规定可以出卖给别的主人。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所谓“雇”“佣”与资本主义所谓雇佣劳动的性质是何等的不同。在中国，主人支付给劳动者的一定工作时间的工资即是支付给他的一定时间的身价，在此时间里面，劳动者不仅劳动力属于主人，而且人身和人格整个属于主人，在穷乡僻壤尤其如此，因为那里是最适于保存农奴式劳动组织的地方。可能在城市里面，在其他的行业中，情形不同一些，但是以丝织业而言，据徐一夔《织工对》一文所述，织工“日佣为钱二百缗”，然而织工和主人的关系并不止这一点，还要“衣食于主人”，工作“每夜至二鼓……苍然无神色”^②，卖掉的和得到的都与自由劳动者不同^③。可见就在城市手工业中，所谓雇佣的性质是否与穷乡僻壤有根本的不同，还是一个须要进一步证明的问题。

三、关于奴隶制度和行会制度对于 手工业生产的阻碍

尚钺同志在他的论文中曾经提到奴役制度对于手工业生产的

①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

② 徐一夔：《始丰稿》卷一。

③ 侯外庐同志在《论明清之际的社会阶级关系和启蒙思潮的特点》一文中曾经指出过这一点，但他认为这是明初的状况，万历时代不同了。万历时代有何不同？他所举出的例证是不够明白的，很难认为是足以说明当时生产者已经转化为自由劳动者。

阻碍，并对马哥李罗关于杭州手工业的记载注意到行会制度的考察，但是他在论及明朝景德镇瓷业的时候，完全没有作这种考察，并且认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这里“表现的就更其明显”^①。

《试论汉民族的形成》一文的作者张正明同志说得更果断一些：“景德镇是‘周围十方哩之大工业地也，人口近百万，窑约三千，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这类城市，已经不再象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城市’了，它们的存在和繁荣，已经不再是‘完全由政府的地方性支出生起的’了。”^②

好，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一下明朝景德镇瓷业的状况罢。

上述张正明所引“人口近百万，窑约三千”的记载是天启年间一个到过景德镇的法国教士留下的。他的报道大约同马哥李罗的一样，只是走马看花得到的印象，并且有意鼓励西方的商人到东方来，所以同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有很大的距离。先看《浮梁县志》所载该县在明朝的几个户口统计数字：

洪武辛未（一三九一）户：一万八千七百三十一，口：一十万四千九百七十；

永乐壬辰（一四一二）户：一万五千九百四十一，口：九万二千五百九十二；

天顺壬午（一四六二）户：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七，口：九万七千一百八十三；

宏治壬戌（一五〇二）户：一万七千六百六十，口：九万九千七百二十一；

① 《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② 《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

正德壬申（一五一二）户：一万七千二十；口：九万九千八百六十五；

嘉靖壬午（一五二二）户：一万七千六十；口：十万二十九；

嘉靖壬辰（一五三二）户：一万六千六百九十一；口：十万三十七；

万历癸卯（一六〇三）户：一万六千一百一十；口：十万一百九十二；

这个统计直到崇祯年间没有变化。景德镇是浮梁县的一个镇，地面只有十三里，不论人口怎么多，也多不过全县。当然，这个统计也可能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们再查清朝的统计罢。《江西通志》载浮梁县人口统计如下：

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户：五万五千八百九十六；口：二十五万二百九十；

嘉庆七年（一八〇二）户：五万八千七百九十二；口：二十八万一千四百七十七；

道光元年（一八二一）户：五万九千六百六；口：二十八万八千二百二十；

即使清朝的统计同样不正确，我们仍旧很难相信景德镇人口在明朝已经达到“数十万”或“近百万”。再说，景德镇如果是一个人口数十万或近百万的大城市，政府必然要在这里设立相当的管理机关。但是，据《浮梁县志》载，明朝在景德镇只设有一个巡检司，下辖弓兵十六名。另陶厂除管厂官以外，听事人役有门子一名，库子二名，听事吏二名，书手二名，阴阳生一名，里长十三名，机兵十六名，铺兵一名，蔡子一名，皂隶八名，轿伞夫五

名，吹鼓手六名，常川接应往来使客十三名，每日巡逻守衙地方夫二十名。这个编制与镇相当，与一个大城市的需要相距太远了。

然则景德镇瓷业规模到底有多大呢？官窑，据《浮梁县志》载，在洪武年间为二十座，在宣德年间为五十八座（内缸窑三十二座，余为青窑和有色窑。后因青窑数少，缸窑空闲，将缸窑十六座改为青窑，仍存缸窑十六座）。民窑，据《浮梁县志》载，在嘉靖年间有青窑约二十余座。民窑数目与元朝蒋祈《陶记》所说“景德镇陶昔三百余座”，及清朝雍正督陶使者唐英《陶冶图说》所说“民窑二三百区”相差很远，但是，我以为是合乎事实的。因为明朝政府烧造特别多，可能有许多民窑都被迫停歇或改为官窑服役了。同时这个数目与官窑合计起来也与隆庆五年江西巡按刘思问奏折中所说的情况相符，即当时全镇“大小工匠约有五百，奔走力役之人不下千计，日费百斛”^①。从这个数目之小，可见一般所谓景德镇瓷业繁荣的时代大约即是朝廷在岁造之外大量派造的时代。例如，宣德八年派造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②，隆庆五年派造十万五千七百七十桌^③、个、对^④，万历十年派造九万六千六百二十四个、副、对、枝、口、把^⑤，万历十九年派造十五万九千件，追加八万件^⑥，都是极大的劳役。每次

^① 《浮梁县志》卷五。按隆庆初即位时，曾根据嘉靖遗旨停止烧造，工匠因此多迁别业。官窑工匠平时为三百余，此时更少。故“约有五百”和“不下千计”之数，当系合全镇而言。

^{②⑥} 《明会典》卷一九四。

^③ 桌器的数量是不一定的。以嘉靖二十三年为例，每桌为二十七件；以嘉靖三十六年为例，每桌为五十三件。

^④ 《浮梁县志》卷五。

^⑤ 《明史·食货志》。

大量派遣都不仅必须竭全镇民力，而且必须使上饶府所辖各县为之骚动才能完成。唐英《浮梁县志序》记他访问当地父老所了解的情况说：

“前明遣官督造，间及中涓，擅威福，张声势，以鱼肉斯民。一逢巨作，功不易成，致重臣数临，邮驿骚动，令疲于奔走，民苦于捶楚。卒之大耗帑藏之金，重困闾阎之力，而于巨作迄无成。遂使饶郡数邑供应不遑，而浮邑之吏民更不堪命。是害在陶，而实害在浮矣”。^①

这就是景德镇的繁荣。

可是瓷器产量并不大。据《浮梁县志》说，官窑中的缸窑“前宽六尺，后如前饶五寸，入身（即高）六尺，顶圆。鱼缸大样二样者止烧一口，瓷缸三样者一窑给砌二台，烧则三口。溜火（即小火）七日夜，……紧火二日夜……止火封门，又十日窑冷方开”；有色窑“制员而狭，每座止容烧小器三百余件，用柴八九十扛”；青窑“前宽五尺，后五尺五寸，入身四尺五寸，每座烧盘碟中样器止烧二百多件，稍大者一百五十六件，大碗二十四件，尺碗三十件，大坛生烧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溜火对日，紧火一日夜，……火住封门则去顶，故窑易冷，首尾五日可出器。每窑用柴六十扛。若系大盂、大坛、拜砖等大器须量加柴十扛，或遇久雨窑湿又宜加十扛”；民间青窑多出粗瓷，所以“制长阔大，每座容烧小器千余件，用柴八九十扛，多者不过百扛”。冬季水冰土冻不能工作，雨季不能烧窑，只有秋季才是最适宜造坯烧窑的时间。因为有这样许多限制，隆庆五年派遣的十

^① 《浮梁县志》卷一。

万五千七百七十桌、个、对，据都御史徐枋估计，除这年九月可起解一运，十二月可起解一运以外，其余八运只能每年造解一运^①，共须九年才能造解完毕。万历十九年派造的十五万九千件及追加的八万件，据《明史·食货志》说，直到万历三十八年，即过了十九年，还没有造解完毕。^②

朝廷的经常和大量的派遣迫使民窑服从官窑的需要。据《浮梁县志》第五卷载，官匠约三百余，民匠必须在编役（开报民户，占籍在官）、雇役和上班等名义下为官窑服役。班匠“遇蒙烧造，拘集各厂上工，自备工食”，而且服役时间很长，在正德和嘉靖间有二十余年未得停止的。编役几乎同班匠没有什么不同，自正德年间“三十余年磨作与官匠同，而无分毫雇值”。只有雇役是有工钱的，“画役令各作募人，日给工食银三分五厘，各窑募役，龙缸大匠，敲青匠日给银三分五厘”。此外，官窑还用尽方法榨取民窑。《浮梁县志》写道：“今遇烧造，官窑户辄布置民窑，而民窑且不克事也，斯官匠独习其制，悬高价以市之（即民窑转雇官匠代作），而民窑益困矣。”

在这样的奴役和剥削制度下产生资本主义经营，已经是很困难的了。但是瓷业所受到的束缚还不止这些。首先，它没有脱离农业。据隆庆五年江西巡按刘思问的奏折说：“营作之劳，实必资于民力之裕。乃民遭时艰，畎亩陆沉，颗粒罔措，俯仰无

① 《浮梁县志》卷五。

② 有许多历史书，包括中国的、苏联的和日本的，都说1591年即明神宗万历十九年景德镇曾经出产瓷器十五万九千件。如果《明史·食货志》的记载没有错误的话，那么，这些历史书的记载便一齐错了。又《明史·食货志》原文仅为“十五万九千”和“八万”没有说明单位。这里的“件”字以及其他几个“件”字都是照着一般的说法加上去的，实际上可能也还是桌、个、对、副、枝、口、把，各种单位都有，所以数量不止十五万九千件和八万件。

资。”^①可见当时景德镇窑户还必须自己种田，如果不自己种田，也就做不出瓷器。

行会制度是与资本主义经营相反对的制度。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才可能被突破，并使得在它控制下的手工工场成为资本主义的。然而这个制度还是景德镇瓷业的早已存在和最难突破的内在的束缚。唐英《陶政示谕稿自序》写道：

“窑之高卑阔狭，大小深浅，暨夫火堂，火杖、火眼、火尾之規制，种种不一。精其工而供其役者为景德镇魏氏，专其业而得其传，元明以来无异也。故砂土无常工，而群窑之结砌补葺，则业有专属，他族无与也。”^②

这还只是指砌窑一行。其他各行各业，凡是须要技术的，无不有它们自己的业务秘密。徐珂《清稗类钞》说：“景德镇烧瓷，其用油、造坯、画花各有专行，而秘不示人。”^③这种现象一直到现在仍旧继续存在。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写道：

“至学校（陶业学校）所以离景德设饶州之故，因由煤产余干，瓷土产星子、乐平，均去饶较近。而最大原因，实由景德为瓷工势力范围，已则守成法不肯改，而复怵于一经改良，将立被淘汰，而无所啖饭，势且出乎合群抵制之一途，故迁地以避之。”

这种“秘不示人”的专行，“守成法不肯改”和反对扩大经营的思想在明朝当然不会更开通一些。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可以断言，景德镇瓷业的资本主义经营在明朝和清朝是不存在的。但是景德镇常常被称为出产瓷器的中心，是不是全国各地都用这里的

^{①②} 《浮梁县志》卷五。

^③ 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七册，“工艺类”。

瓷器呢？不是的。全国出产瓷器的地方，除了景德镇以外，还有很多。仅仅傅振伦同志《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一书所列举的明朝重要产瓷区就有如下各处：

河北省：曲阳县涧滋村和灵山镇，磁县，武清县，唐山；

山西省：阳曲县，榆次县，太谷县洪善村，晋城县，永济县，长治县，平定县，阳城县；

陕西省：铜川县陈炉镇，雒南县景村；

甘肃省：华亭县，武威县；

山东省：博山县，淄川县，邹县，峄县，滋阳县，临清县；

安徽省：祁门县，宣城县；

江苏省：萧县，江都县瓜州镇，仪征县，吴县，宜兴县蜀山镇和鼎山镇；

浙江省：龙泉县，庆元县，富阳县；

福建省：建阳县，德化县祖龙宫和十排岭，龙溪县石码，连江县，晋江县，邵武县，同安县，泰宁县；

河南省：禹县，登封县，宜阳县，汝宁县，开封县，陕县，许昌县，沁阳县；

湖南省：醴陵县，龙山县；

江西省：横峰县，弋阳县太平乡，九江县；

广东省：南海县石湾，阳春县，新兴县，潮安县，连县；

广西省：合浦县，钦县，南宁；

四川省：成都，泸县，荣昌县烧酒坊，巴县磁器口；

所有这些都是当地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产瓷区，其中如浙江省的处州窑，福建省的德化窑，广东省的石湾窑，山西省的泽州窑，江苏省的宜兴窑，都很有名。至于日用粗瓷，几乎到处都有

出产。可见由景德镇销售到远方去的瓷器只能是其中的精品，亦即官窑出品。这从现存的明代瓷器，包括展览的，旧货摊上出售的以及流传在外国的，多属官窑出品一点可以看得出来。而精品，除了使景德镇获得它的声名以外，并不能使它在全国市场上与其他地方分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瓷业中心，那是很明白的。

四、关于把农村副业和家庭手工业 当作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

吴晗同志的《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文说，在明初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以纺织工业为中心和批发绸缎棉布行号的 城市”^①。这许多以纺织工业为中心的城市，见于他的论文里面的，有两个：一是杭州，一是松江。其中，杭州是以丝织业著名的地方，是否棉纺织工业的中心城市呢？吴晗同志举出来的唯一证据是徐一夔《织工对》一文说明相安里有几个机户，其中一个有“杼机四五具，……工十数人”。但原文并未说明织的是棉布，而且看来多半还是织丝绸，因为四五具织棉布的织机用不着同时有十数人工作，只有织丝绸的织机才需要每具有二至三个织工照料，文中加于织物的形容词如“精致”和“精”等，一般也是用于丝织物的。除了徐一夔《织工对》以外，我们很难找到类似的材料。退一步说，即使徐一夔所访问的织工是织棉布的，也不能据以判定杭州为棉纺织业中心城市。

^① 《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至于松江为棉纺织业中心城市，其他历史家也有相同的判断，似乎是没有争论的。

可是事实上松江也不是棉纺织业中心城市。一般文字记载中提到的松江所指并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指松江府，在明朝下辖华亭县、上海县和青浦县。这里棉纺织业较为发达，当然，首先是因为当地人民非此不能生活，同时也因为纺织技术在元初传到这里，经过元明两朝，已经普遍地为农村妇女所熟悉，而且比较其他许多地方进步，是一种很方便的谋生手段。乾隆《上海县志》：“纺织之法，他邑止用指捻一纱（名手车）。吾邑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游手之徒，有贲妇女养生者。”^①可见在松江府各县，作为商品而生产的棉布相当多，但纺织仍旧是一种农村副业。关于这种农村副业，我们从英国植物学家复庆一八四四年在上海近郊看到的情形可以得到一些比较具体的了解：

“各小农户，各乡居人家，都保留他自家田地所产棉花的一部分以备家用。妇女家居，清（轧？）之纺之，织之成布。我国古时所习见而今日已被机器所代替的纺车和小手织机，遍布此地各乡村，随处可见。此等织机，都由妻女操作，有时不能作田野工作的老夫幼童也帮助工作，如果家庭人口众多，且善于生产，除自家服用外，还能余布很多，便将剩余布匹送至上海或近郊市镇出卖。本城（上海）各门，每天都有集市，便是此辈聚集出售小捆布匹的所在。”^②

^① 乾隆《上海县志》卷一。

^② 复庆：《在中国漫游的三年》，第251—252页，译文转引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34页。

正因为大量的布匹是在乡村生产的，所以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说：“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坊、踹房商贾悉随之。”^①枫泾和洙泾都是乡村市镇的名称，前者在松江府城西南五十四里，后者在松江府城西南三十六里。布号设在这些村镇上，而不设在城内，显然是为了直接向农民收买布匹的便利。还有一点值得指出，就是枫泾距离嘉善只有十八里，布号设在这里，当然不仅因为松江出产棉花，而且因为嘉善出产棉布。

从染坊和踹布坊也跟着设在村镇上，更可知棉纺织业生产是在农村中进行的。松江作为一个城市，不但不是生产中心，甚至还不是集散和加工中心，在棉纺织业发展中并不起什么作用。如果说松江是一个棉纺织业中心城市，那就把农村副业错作工场手工业，不免要作出一连串不正确的判断了。

松江农村纺织业发达，也与明朝政府推广植棉并规定征收棉布，可是植棉和纺织的技术还没有真正推广有关。《明史·食货志》说：“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这些规定是对人民的严重压力，但是否全国任何地方都适宜植棉，显然是有问题的。当时人的记载表明，不适宜种植的地方必须向外地购进棉花，结果有几处适宜植棉的地方的产品便取得了它的市场。从徐光启《农政全书》关于棉种的介绍可以看出棉花市场的大概：

“江花出楚中，棉不甚重，二十而得五，性强紧；北花

^①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芙蓉塘”。

出畿辅、山东，柔细中纺织，棉稍轻，二十而得四，或得五；浙江出余姚，中纺织，棉稍重，二十而得七，吴下种大都类是，更有数种稍异者：一曰黄蒂穰，蒂有黄色如粟米大，棉重；一曰青核，核色青，细于他种，棉重；一曰黑核，核亦细，纯黑色，棉重；一曰宽大衣，核白而穰浮，棉重；此四者皆二十而得九。”^①

由此可以推断：江花主要地解决了中南地区的需要，北花主要地解决了华北地区的需要。但是在北方因为做官的人多，还有一个细布市场。松江棉布主要是满足这个市场的。但是这个市场不大，并有缩小的趋势。徐光启《农政全书》写道：

“松江志又言，绌布二物，衣被天下，原此中之布，实不如西洋之丽密，曾见浙中一种细布，亦此中所未见者，徒以家纺户织，远近通流，遂以为壤奠，为利源也。第事势推移，无数百年不变者。元人称关陕而外，诸郡土地不宜吉贝。识者非之，今之艺吉贝者所在而是焉。何树艺之独然，而织纴之独不然也耶？安能禁他郡邑之人不为黄奴耶？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此皆事之不可解者。若以北之棉，致南之织，岂不反贱为贵，反贵为贱？余居恒谓北方之人必有从事者。若云彼土风高，不能抽引，此语诚然。顾岂无善巧之法，而总料其不然，亦未免为悠悠之论。故常揣度后此数十年，松之布当无所泄。无所泄，即无以上共赋税，下给俯仰，宜当早为计者，人情多未以为然也。而数年来，肃宁一

^①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

邑所出布匹，足当吾松十分之一矣。初犹莽莽，今之细密，几与松之中品埒矣。其价值仅当十之六七，则向所云吉贝贱故也。夫以一邑，渐及之他邑何难？既能其一，进之其十何难？由下品而中，由中品而上何难？吾欲利而能谓人已耶？北土既尔，他方复然，则后此数十年，松之布竟何所泄哉？”^①

正是因为当时还有别的地方棉纺织业不如松江发达，所以在这里便出现了许多随带成千成万银两的大商人。傅筑夫和李竞能同志在所著《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一书中认为，“标布”和“中机”一类规格的棉布是适应市场需要生产的，所以这些大商人即是包买主；又因为《木棉谱》作者褚华自述他的六世祖为居停在他家里的秦晋布商“设肆收买，俟其将戒行李时始估银与布捆载而去，其利甚厚，以故富甲一邑”，而把这位褚老先生称为包买主^②。这种忖测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这些外地商人当时除在本地设有坐庄的以外，都不直接与生产者发生关系，甚至并不直接与本地布商发生关系，而且经过牙行向本地布号收买布匹，所以叶梦珠说，“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③。那位褚老先生，不过是个兼代布商收买布匹的客店老板而已，他赚了本来应为本地布商和牙行所得的利润，所以“其利甚厚”。至于真正意义上的棉纺织业包买主，我相信严中平同志的判断是谨慎和可信的，这就是，在文献里，“还没有发现”^④。

①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

② 傅筑夫、李竞能：《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第36—37页。

③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

④ 《中国棉纺织史稿》，第41页。

五、关于明朝社会经济的一般状况的估计

从上面的考察已经可以概见明朝手工业的一般状况。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下明朝整个社会经济的状况罢。

侯外庐同志在《论明清之际的社会阶级关系和启蒙思潮的特点》一文中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以明朝嘉靖到万历年间即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初叶为转折点。他对于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估计如下：

“资本的形成是从商人的和高利贷的财富出发的，然而问题却以自由劳动者从农业的分离为前提。这样的分离过程，依据列宁的分析，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在农村市镇中的分离；第二阶段是城市手工工场业的独立形成；第三阶段是城市的大工业的出现。相应着这样的阶段，逐渐形成着以至建立着国内市场，逐渐由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发展而为近代资本家，逐渐由农村分离的手工业无产者发展而为近代的自由劳动者。我们的研究，认为十六、七世纪的中国社会，正是居于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发展时期，更正确地讲来，因为国内经济的不平衡，某些地区居于第一阶段，某些地区正走进第二阶段，某些地区依然没有走进第一阶段。”^①。

究竟居于那一阶段的地区占多数呢？既然“认为十六、七世纪的中国社会正居于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发展时期”，那么，当

^① 《新建设》1955年5月号。

然也就是说，居于这个发展阶段的地区占多数。目前一般论者还只是夸说江南地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经营，侯外庐同志比他们进了一步，把江南地区个别行业中的现象当作全国性的普遍现象了。

事实完全相反。在自然经济并没有什么改变的情况下，明朝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仍旧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而不是它们的分离，更不是城市工场手工业的独立形成。自然经济决定了人民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皇室和地主阶级的剥削方式。人民必须依靠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才能生存，皇室和地主阶级也只有从这个统一中才能榨取到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是农民愈益贫穷，愈益离不开手工业。明朝的暴政对于维持甚至巩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起着显著的作用。

明朝是中央集权的极端专制的王朝。比较以前的朝代，明朝的赋税是最重的，力役是最繁的，额外征收是最多的，以苏州和松江的田赋为例。宋末苏州税额不过三十万石，松江税额不过二十万石，元朝廷祐间（一三一四至一三二〇年）苏州增至八十万石，松江增至七十万石，元末张士诚统治时期，苏州增至一百万石，到明朝，苏州增至二百八十万九千石，松江增至一百二十万九千石。当然，明朝税额是轻重不等的，例如真定只有十六万六千石，河间只有六万一千石，而登州则为二十三万六千石，凤阳因为是朱元璋的故乡而赋税特别轻，而南昌、袁州、瑞州等地又特别加重征收。其他力役和杂派按田亩分摊。这种暴政曾经使得一部分有钱人对于土地的兴趣为之减低，说是“将钱买田，不如穷汉晏眠”，“有田膺户门，因田成祸门”。可是这种人大约都是经商致富的，至于那些大地主的兴趣并未稍减，因为他们可以

用种种办法把田赋转嫁给小地主和农民，而毫不影响他们从农民取得地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辑录的浙江《田赋书》对于这些大地主的恶毒行为有如下的生动描写：

“自洪武以来，凡几造黄册矣。然今之粮皆洪武初年之粮，而今日之田则什二三耗，非洪武初矣。……又况猾民作奸，乃有飞洒，诡寄、虚悬之弊，故无田之家而册乃有田，有田之家而册乃无田，而轻重多寡皆非的数。名为黄册，其实伪册也。何言乎飞洒？富人多田，患苦重役。乃以货啖奸书，某户洒田若干亩，某户洒田若干分厘，某户洒粮若干升斗，某户洒粮若干合勺，积数十户可洒田以亩计，洒粮以斗计；积数十户，可洒田以十计，洒粮以石计，而书手则岁收其粮差之算。其被洒之家必其昧不谙事，或朴懦不狎官府者也。甚有家无立锥之业，而户有田亩粮差之需，至岁佣其身以输，犹恐不给，孰知而闵之乎？”

“何言乎诡寄？多田之家，或诡入于乡官、举监，或诡入于生员、吏丞，或诡入于坊长、里长，或诡入于灶户、贫家，或以文职立寄庄，或以军职立寄庄，或以军人立寄庄，夫乡官于各乡占产寄庄犹可言也，而本县寄庄何为者哉？军官占产寄庄犹可言也，而军人寄庄何为者哉？率不过巧为花分，以邻国为罄耳。何言乎虚悬？赵甲有田而开与钱乙，钱乙复开与孙丙，孙丙复开于李丁，李丁复开于赵甲，李丁有开，赵甲不收，则并田与粮而没之矣。然飞洒者，损人所裕己者也；诡寄者，避重而就轻者也；至虚悬则一切欺隐以负国课耳。又有弊者，则专货书手，悉以田归书手，粮户亦随之。书手仍往豁其田，而粮则分十年之中，岁洒合勺于一里

百户之田，渐以消豁，此以影射为奸者也。又有根存而田不称，则捏官田，以一埋十，此以那移为奸者也，又有买田十而止开其八九，仍遗一二于原户者，又或收田而不收粮，俾卖主受其害，而已得减输，此以买户为奸者也。又有田本轻则而开作重则，田本八九而多开为十，以归于人，因得轻税之田，此以卖户为奸者也。又有买户已收其田矣，而于卖户则不为除，使一田而两户粮差，此以干没为奸者也。或欲加之粮，则不加其户之田亩，而以重则移轻则，或岁为之飞洒，见其粮之增也，则反诬为虚悬，此以欺罔为奸者也。凡此神妖鬼怪，不可殚述。”^①

类似的弊端，各地都有。例如江西，嘉靖时人唐龙《均田役疏》写道：

“江西有等巨室，平时置买田产。遇造册时，贿行里书，有飞洒见在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内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限者，名为畸零带管；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有过割一二，名为包纳者；有全过割者，不归本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撤，名为悬挂掬回者；有暗袭京官方面，进士举人脚色，捏作寄庄者，在册不过纸上之捏，在户尤皆空中之影，以致图之虚以数十计，都之虚以数百计，县之虚以数千计。递年派粮编差，无所归者，俱令小户赔偿。”^②

除田赋以外，还有各种力役。在这一点上，明朝和以前的朝代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们都是用地主管理田庄的办法来管理国家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二册，“浙江”下，第79—80页。

② 《昭代经济言》卷三。

的。政府规定人民进行无偿劳动，并直接向农民征收各种物品。

洪武时人王叔英《资治策疏》写道：

“今天下有司，役民无度，四时不息，由其不能省事故也。至于民稀州县，人丁应役不给，丁丁当差。男丁有故，役及妇人。……民稠州县，虽不尽其力，亦夺其时；民稀州县，既夺其力，又夺其时。”①

洪武时是开国盛世，其情况已经如此。到了嘉靖年间，力役、捐税和杂派达到了极端繁重的地步。何璠《民财空虚疏》写道：

“国朝使民之法，除里甲正办外，如粮长、解户、马头、船户、馆夫、水夫、马夫、祇候、弓兵、皂隶、门禁、厨斗之数，无所不役，固已多矣；近年以来，常役之外，杂派纷纷而出。如砍柴、抬柴、修河、修仓、运料、接递、站夫、铺夫、闸夫、浅夫之类因事编金，盖有不可胜数者。国朝取民之法，除田土税粮外，如盐课、茶课、金银课、铁课、鱼课税、商船钞、户口、食盐、皮角、翎毛、油漆、竹木之类无所不取，固已重矣；近年以来，额征之外，杂派物料又纷纷而出，如供用库物料，甲丁库颜料，光禄寺厨料，太常寺牲口料，南京则又供用器物料，随时坐派，盖有不可胜数者。”②

后来改行一条鞭法，规定田赋和各种差役统一征银。这个办法减少了征收的名目，节省了征收的时间，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征银不自一条鞭始，征实也不因一条鞭的实行而停止。万历年间又在一条鞭以外，以矿税为名，增加了大量的杂派。凤阳巡抚李三才

① 《昭代经济言》卷一。

② 《昭代经济言》卷四。

《请停矿税疏》写道：

“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陛下为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并其衣而夺之；不惟不食之，且并其食而夺之。征榷之使急如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①

繁重的赋役早在宣德年间就已经开始引起了农民的大量逃亡。江南巡抚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写道：

“以太仓一城之户口考之，洪武年间，见丁授田十六亩。二十四年黄册，原额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今宣德七年造册，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核实又止有见户七百三十八户，其余又皆逃绝虚报之数，户虽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户而当洪武年间八千九百八十六户之税粮，欲望其输纳足备，而不逃去，其可得乎？”^②

苏州和松江赋税最重，逃亡农民最多。其他各地赋税较轻，逃亡可能较少。苏州和松江的逃亡农民，据周忱说，出路有七：

一、大户苞荫：“其豪富之家，或以私债准折人丁，或以威力强夺人子，赐之姓而目为义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为仆隶者有之。凡此之人，即得为其役属，不复更其粮差，甘心倚附，莫敢谁何。”

二、豪匠冒合：“苏松人匠丛聚两京，乡里之逃避粮差者，往往携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创造房居，或开张铺店，冒作义男女婿，代与领牌上工。在南京者，应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顺天府亦无其籍。粉笔题监局之名，木牌称高手之作。一户当匠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

② 《昭代经济言》卷二。

而冒合数户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隐蔽数人者有之。”

三、船居浮荡：“流移之人，挈家于舟，以买卖办课为名，冒给邻境文引及河泊由帖，往来于南北二京，湖广、河南、淮安等处停泊，脱免粮差。”

四、军囚牵引：“苏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处，屠沽贩卖，莫不能之。故其为事之人充军于中外卫所者辄诱乡里贫民为之余丁，摆站于各处河岸者又招乡里之小户为之使唤。作富户于北京者，一家有数处之开张；为民种田于河间等处者，一人有数丁之子姪。且如淮安二卫，苏州充军者不过数名，今者填街塞巷，开铺买卖，皆军人之家属矣。仪真一驿，苏州摆站者不过数家，今者连拼接栋，造楼居住者，皆囚人之户丁矣。”

五、屯营隐占：“太仓、镇海、金山等卫，青村、南汇、吴松江等所，棋列于苏松之境，皆为边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调伍，因有所恃，愈肆豪强。遂使避役奸氓，转相依附，或入屯堡而为之布种，或入军营而给其使命，或窜名而冒顶军伍，或更姓而假作余丁，遗下粮差，负累乡里。为有司者常欲挨究矣，文书数数行移，卫所坚然不答。为里甲者常欲根寻矣，足迹稍稍及门，已遭官旗之毒手。”

六、邻境蔽匿：“蚩蚩之民流移转徙，居东乡而藏于西乡者有焉，在彼县而匿于此县者有焉；畏粮重者必就无粮之乡，畏差勤必役无差之处；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营新居而弃旧业者有之，倏往倏来，无有定志。”

七、僧道招诱：“苏松之僧道，弥漫于四海。有名器者因保举而为住持，初出家者因游方而称挂衲，名山巨刹，在处有之，故其乡里游惰之民，率皆相依而为之执役。眉目清秀者称为行

童，年纪强壮者称为善友，假服缙黄，伪持锡钵，或合伴而建高醮，或沿街而化缘财物。南北二京及各处镇市，如此等辈莫非苏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为之服役者常有数十人；以一人出家，而与之帮闲者常有三五辈。”^①

从上面列举的出路看来，逃亡农民蔽匿邻境的可能较多，因为当时还没有大城市，在城市里面也还没有从事大生产的工厂，能为他们提供的出路非常狭仄。大量的农民从这里逃到那里，最后还是不能不继续被束缚在土地上。既然必须继续被束缚在土地上，那么，农民的问题还是老问题：无法摆脱地主和官吏的压迫和剥削。为了缴纳地租和赋税或在缴纳地租和赋税以外还能生存下去，农民便不能不兼营手工业。试看松江农民在宋朝已经有人开始植棉，在元朝已经有人学得了当时最先进的纺织技术，但是直到明朝才普遍地把它当作增加收入的重要方法，就可以了解地租和赋税的加重对于农村副业的发展起着何等有力的推动作用。徐光启《农政全书》写道：

“（松江）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人，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棗纈，嘉、湖之丝纻，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②

江南农民兼营手工业的历史对于全国其他各地农民的兼营手工业具有很大的说明意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的难于打破，虽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主要原因是

① 《昭代经济言》卷二。

② 《农政全书》卷三五。

城市经济的不发达和地租和赋税的繁重。本来城市经济不发达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统一的结果，但是当农民被迫逃亡，不能在城市落业以致必须转移到其他农村的时候，又是保持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统一的原因。无路可走的不能不继续负担繁重赋税的农民不可能单独依靠农业而生存，也极少可能脱离农业转变为独立手工业者。因为如果这种手工业是其他农民所兼营的，势必不容许独立存在，反过来，如果这种手工业不是其他农民所兼营的，它的产品势必不是人们大量和经常需要的，在农村中独立存在也很困难。

这样，明朝手工业的发达便突出地表现为个体农民的普遍兼营副业，在有些地区，例如，在江南地区，并表现为简单商品生产的发达。

个体农民的普遍兼营副业使城市手工工场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城市手工工场只有在它所生产的不是农民的消费品或在技术上不是农民所能竞争的条件下才能存在。苏州、常州、吴江的丝织业中个别地出现有略具规模的手工工场，正是因为所生产的不是农民的消费品，在技术上特别是在织造锦缎绦罗的技术上也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能竞争的。反之，在松江的棉纺织业中所以没有出现手工工场，也正是因为产品不可能在农民中受到欢迎，而在技术上则是农民所能竞争的。当然，此外也可能还有其他的手工工场，例如，铁工场和漂染工场等等。这种手工工场是以农业和农村副业为基础的，在农业获得发展和副业脱离农业以前，它们的发展是困难的。

在明朝出现的手工工场，即使不是行会老板的，而是资本主义的，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也正好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再引用的伊璧鸠鲁的名言所说的，是住在世界的缝隙里面的神。可

是手工工场在封建主义生产中所占有的缝隙还不同于伊壁鸠鲁的神所居住的，它常常要合拢来，把生存里面的手工工场吞灭，因为工场主在发财致富以后往往并不继续扩大生产，而把资本投在土地上，变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我们试听一听一个拾到两锭银子的小业主的心里是怎样盘算着的罢：

“如今家中见开这张机，尽够日用了。有了这银子，再添上一张机，一月出得多少绸，有许多利息。这项银子，譬如没得，再不要动他。积上一年，共该若干，到来年再添上一张。一年又有多少利息，算到十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那时造什么房子，买多少田产。”^①

张瀚《松窗梦语》说：“余先世亦以机杼起。”^②“起”的意义当然不是起为资本家，而是起为地主。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当时手工工场还没有独立形成的显著表现。因此，手工工场也就不可能是明朝或明末成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标志。

有些历史家认为从明朝的商业特别是贩运贸易的发达可以看出商品生产的发达，可以想见必有不少的商品出自手工工场。是的，从许多记载看来，明朝的商业特别是贩运贸易是很发达的。但是按照马克思的意见，贩运贸易的发达正是社会经济不发达的表现^③。试从明朝贩运商所贩运的货物品种来看，贩运最远的是奢侈品，诸如珍珠、玳瑁、象牙、苏木、沉香、贵重药材和丝织品等；一般地在一个区域里面贩运的是日用品，诸如磁器、铁器、纸张、布匹等；所有这些商品，几乎都是农村副业产品。这

① 冯梦龙编：《醒世恒言》卷一八。

② 张瀚：《松窗梦语》。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06页。

些商品的产量在各个产地都不可能是很大的。它们在城市中所以能够集中为一个巨大的数量，主要是因为有大小的贩运商的辗转贩运。正是这些数量不大的来自各地农村的副业产品妨碍了城市手工工场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商业对于旧的生产方式的分解作用，在产地来说，并不显著，由此可见，从贩运贸易和汇集在大城市中的商品数量来推测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未必是正确的。

手工工场的发达使中国城市的性质不同于欧洲城市的性质。在中世纪，欧洲已经有些城市因为它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而成为中心，可是中国城市的兴起，多数依靠政府的地方性支出，少数依靠转运商业（如广州、扬州、泉州）或某些手工业（如苏州），较大的是消费所，较小的是收购站，它们集中财富而不生产或很少生产财富，吸收农产品而不供给或很少供给农村以自己的产品，在那些较大的城市里，居住着官吏和富豪，他们过着越来越奢侈的生活，是丝织品和其他农村产品的主要的消费者。请问官吏和富豪的奢侈的生活是建筑在什么上面的？嘉靖时人何塘《民财空虚疏》写道：

“今承平既久，风俗日侈，起自贵近之臣，延及富豪之民，一切皆以奢侈相尚。上下之分，荡然不知。……殊不知风俗奢侈，不止耗民之财，且可乱民之志。盖风俗既以奢侈相夸，则官吏俸禄之所入，小民（按：应即指富豪之民）农桑（按：应即指地租）之所获，各亦不多，岂能足用？故官吏则务为贪饕，小民则务为欺夺。”^①

官吏和富豪的奢侈的生活扩大了商品的需要，而农民则被迫着用

^① 《昭代经济言》卷四。

更多的劳动来进行生产或甚至把自己的必需品拿出来供给这种需要^①，以抵偿债务或应付官吏和富豪的勒索。这是明朝中叶以后商业日趋繁荣的根本原因。但是经商致富的人并不把他们的资本用来经营商品生产，而是到农村中兼并土地，造成更多的农民的破产和失业。所以当时人从商业的繁荣看到的不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是农民暴动大爆发和明朝统治全面崩溃的日益临近。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辑录的《歙志风土论》写道：

“国家厚泽深仁，重熙累洽，至于弘治，盖蒸隆矣。于时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绩，男子桑蓬，咸获服劳，比邻敦睦。……诈伪未萌，诤争未起，芬华未染，靡汰未臻。……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诤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

“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牟。于是诈伪有鬼蜮矣，诤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

迄今三十余年，则更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

^① 《古今图书集成》，《经济编》，《食货典》，卷三一四，引明徐献忠《布赋》：“夫广储丰积出自农夫之耕，一丝寸缕皆从匹妇之手；然而茧丝告成，置蚕不问；耕犁召丰，于牛何有？是固天下之风，惟江南为丛蔽，响钟之地税从升，泥途之末路计斗，是以手不停机而岁无衣，穷年乞乞而不贖其口。”

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于是鬼蜮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①

这个评论很好地描述了地主变商人又由商人变为地主的后果。它说明商业和商业资本对于封建阶级确有一种腐蚀的作用，使许多地主不安于土地剥削，走上了可能动摇封建制度的道路。但是由于当时新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商业和商业资本的腐蚀作用并不归结为用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而是旧的生产方式的继续延长。我想，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发生在明末的社会的严重动荡，比较把它当作资本主义萌芽的新时期可能更接近事实一些。

六、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基本估计

然则我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究竟应当怎样估计呢？根据我们现在所能接触到的材料，我以为清朝社会经济的发展比较明朝更显著一些。尚钺同志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一文中认为朱元璋在建立明朝政权的时候，“解放了蒙元帝国统治下的农奴和工奴”②，事实上元朝的世袭工匠制度在明朝并没有废除，不过做工的办法改成了轮班，不轮班的时候便顶着匠籍就地住坐，可以从事商品生产，也可能随时被征调到其他地方去住坐或轮班。这就是说，明朝对于

① 《天下郡国利病书》，第9册，第76页。

② 《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在籍的工匠仍旧同元朝一样，保有无限的支配权。工匠在没有什么重大工程之时轮班为朝廷做工或输纳班银，一遇大役就无所谓轮班不轮班，必须把工做完才能回家住坐。景德镇瓷业班匠服役时间有长达二十余年未得停止的，编役有三十余年庸作与官匠而无分毫雇值的，便是一个显明的例证。这种世袭工匠制度，前面已经说过，清朝在入关以后就宣布取消了。只有灶丁仍旧保留匠籍，并且是世袭的。据《清朝文献通考》说：

“我朝政平事简，与民休息。鼙鼓之征，公旬之召，几于直无其事。不独公家营造，一瓦一木不肯徒用民力，甚至修城浚池以及河工兴筑诸务，凡所以为民卫者，莫不按日计工，人予之直，殆实未尝役一民也。”^①

这些话虽然是歌功颂德的，但是也可以看出，清朝已经比较正式地实行一种使用民力的新的制度，即计工给值的制度。当然，如果认为这种制度就是雇佣劳动制度，那是错误的。因为这是给朝廷做工，计工给值并不等于受雇者有不受雇的自由，顶多不过是一种有工值的服役制度而已。这种制度的实行可以看作是当时民间雇工习惯已经广泛流行的反应。此外，清朝织造限于苏、杭、南京三处的官方手工工场，已不象明朝凡稍有丝织业的地方都规定有织造的任务了；清朝的田赋和税制也有一些改变，雍正年间并且发表一项法令，宣布士农工商四民“平等”，至少在表面上已给予工商以社会地位。应当承认，这些改变多少是有进步意义的。

尽管中国本部地区在清朝进行征服战争时期曾经遭受到极大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一，〈职役考〉。

的破坏，但是由于人民的辛勤劳动，仍旧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明朝的记载中，我们还只能在江南地区的丝织业中偶然看到有个别手工工场的出现，而在清朝的记载中，我们就不仅在江南地区的丝织业中，并且在其他地区的其他行业中，都可以看到有个别的类似手工工场的生产组织的出现。在明朝的记载中，我们还只能看到朝廷有利用商人拨兑边地驻军粮饷的个别现象；在清朝，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如象山西票号这样的汇兑和储蓄机关的出现。当然，关于清朝手工工场的生产关系的具体状况仍旧缺乏详细的材料，山西票号也仍旧只是封建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始终没有与手工业的商品生产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某些手工工场即使是资本主义的，也仍旧常常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但是，尽管有这些现象存在，清朝社会经济已经比较明朝向前推移了一步，而且这一步并没有在乾隆年间停止下来，我以为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清朝也不是工场手工业独立形成的时期。所谓工场手工业独立形成，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取得进一步的统治地位而言。这样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说，清朝社会经济比较明朝发达，见于记载的手工工场比较明朝多一些，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它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足以标志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清朝，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分离还是非常个别的和非常轻微的现象，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仍旧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仍旧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的这个基本结构是如此的牢固，所以到十九世纪中叶外国大工业产品才在中国遭遇到只有印度才能比拟的顽强的抵抗。一八五二年英国驻广州代办米特切

尔在他的报告中关于这种出乎意料的抵抗的描写可以给予我们以非常鲜明的印象：

“收获完结的时候，各农家的一切工作人，小的老的都去梳理棉花、纺纱、织布；这种家庭制造的、重笨而结实的、能够经受两三年内粗糙穿用的土布，中国人就用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把剩余的土布拿到近城去出卖，城市商贩就购买这种剩余土布去供给城市居民及内河船夫的需要。此地的居民，十个有九个是穿着这种土布制成的衣服的。布料的质量，从最粗的印度布到最细的大布都有，这种土布都是在农民小屋内织成的，生产者所费的简直只是原料的价值，确切些说，只是他用土布换来的那种糖的价值，而这种土布却是他自己的产品。我们的厂主，只要稍微考察一下这个制度的这种骇人听闻的节省性，考察一下这种制度与种田人的其他经济过程之联络关系，那么他们立刻就会相信：如果讲到比较粗糙的制造品，那么他们就没有任何希望与这种制度竞争。”^①

马克思说，这种小的经济共同体的内部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分解作用是一种障碍。英国人在印度曾经作为统治者和土地所有者同时应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来破坏这个共同体，但是即使如此，它的分解过程仍旧是极其缓慢地进行的。马克思指出：“在中国，因为没有直接的政治权力加进来帮助，所以程度还是更小。”^②在一八五八年十月八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马克思

^① 转引马克思《对华贸易》的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解放社版，第167—16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13页。

并且预言要铲除中国的小农业制度，“就将需要很长的时间”^①。这是指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的条件下的发展速度。至于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说，由于商品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现象的存在和它的逐渐增长，中国也将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这个发展是缓慢的。如果说，这个发展甚至在明朝和清朝就是很快的，并且在上层建筑的许多部分如此灵敏地反映出来，如象有几位历史家所说的一样，那就未免言之过甚，连近代史的许多问题都要因此而成为难于说明的了。

一九五六年二月

（原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87页。

《织工对》史料能说明中国手工业 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吗？

——兼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在
运用史料与论证方法上存在的问题

彭泽益

在我国学术界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为什么徐一夔的《织工对》通常会被引用来作为研究和论证的唯一的或主要的史料依据？因为它是“大多数史学家认为比较可靠的有关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记载”^①。不过，从现有的讨论情况看，《织工对》究系何时何业史料，所述的织工生产是否为资本主义的性质，显然还值得考虑和研究的。不久以前，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的一次科学报告讨论会上，曾就《织工对》史料提出了上述类似的问题，并曾给引起了一阵争论，但都“没有作出正面的意见”^②。本文的目的主要想就大家所公认为“可靠”的《织工对》史料本身，试图作一个初步的研究。关于这个史料的年代和业别问题，将在另外的场合提出讨论。以下所述，乃就我国经济历史学界对《织工对》所引起

^①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下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93页。

^② 详见《记南开大学二次科学报告讨论会历史学分会情况》，《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

的争论，着重探索《织工对》所述的生产究竟是什么性质，它是否能说明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同时，还拟环绕以《织工对》为例的讨论，考察一下有关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在运用史料和论证方法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提出个人不成熟的肤浅看法，是否正确，敬求同志们指教。

根据我的初步考订，《织工对》是一篇记述元代杭州路仁和县丝织手工业的史料，它是徐一夔约在至正十年后到十六年春末夏初之前（一三五〇—一三五六年），即在十四世纪五十年代间寓居钱塘时写作的^①。这篇文章因为是作者徐一夔本人亲自访问了一群织工生活的谈话记事，故题曰《织工对》。当时同徐一夔交谈的是一个姓姚的织工，当为真人真事，不是虚构凿空之谈。这是这篇记载的最大特色。

这篇《织工对》史料所述的生产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生产关系，这是我们所要着重讨论的问题。现有的论著对《织工对》的分析，只是从中摘引，或根据已有的引文转引，有的甚至随意删节有失原意。现在为了使我们能够全面地来分析它，不妨把原文引录出来，全文总共不过四百九十四字。这篇史料有各种不同版本的记述，文句有互同互异之处^②。在这里，姑且引用现在通行的清代刻本来看：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订，已另外写成专文《徐一夔〈织工对〉记事的年代和织业问题》，在这里不详加论述。

^② 拙编有《〈织工对〉五种版本记载异同比较表》。

“余僦居钱塘之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二鼓，一唱众和，其声欢然，盖织工也。余叹曰：乐哉！且过其处，见老屋将压，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仓然无神色。进工问之曰：以余观若所为，其劳也亦甚矣，而乐何也？工对曰：此在人心。心苟无贪，虽贫，乐也；苟贪，虽日进千金，只戚戚尔。吾业虽贱，日佣为钱二百缗，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养吾父母妻子，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余自度以为常，以故无他思。于凡织作，咸极精致，为时所尚，故主之聚易以售，而佣之直亦易以入。所图如此，是以发乎情者，出口而成声，同然而一音，不自知其为劳也。顷见有业同吾者，僱于他家，受直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艺固过于人，而受直与众工等，当求倍直者而为之佣。已而，他家果倍其直佣之。主者阅其织，果异于人；他工见其艺精，亦颇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胜十工，倍其直不吝也。久之，又以吾业织且若此，舍此而他业，当亦不在人下。去事大官，善其逢迎之术，竭其奔走之力，贵富可得也。奈之何终为织家佣？其后果事大官，厕在众奴中，服役于车尘马足者五年，未见其所谓贵富之机也。又如是者五年。一旦以事触大官怒，斥逐之，不使一再见。又所业已遂遗忘，人亦恶其狂不已分，不肯复佣以织，至冻饿以死。若人也，吾谨用以为戒，如之何而弗乐？余叹曰：工知足者也。老子曰：知足之足常足，工之谓也。因著于篇。工凡十人，与余言者，姚姓云。”^①

^① 徐一夔：《织工对》，见《始丰稿》卷之一，《杂述》。（光绪甲午钱塘丁氏嘉善堂刻本）本文以后引述《织工对》的文句，均据此刻本，并不再一一注出处。

关于这篇记事反映出来的生产关系和性质，我们将留到下面再作具体的分析。现在先就已有的论著对《织工对》所作的解说和论断提出来讨论。

从《织工对》史料所述的生产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如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论著都由此得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性质的结论。论据主要之点不外是：认为《织工对》所述，（一）“生产资料已经为作坊主人私有”；（二）“他们（指织工）是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出卖者，是雇佣工人”；（三）“雇主与工人之间除了雇佣关系之外，没有其他身份隶属关系”。因此断言：“毫无疑问，前述材料（按指《织工对》）中所说杭州的丝织业作坊应该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了”^①。我以为所有持这种见解的论著，论断显然是缺乏对客观经济历史情况作比较全面的分析，不能不说，这只是从片面的史事，由概念和逻辑的推演上作出来的结论。同时，必须指出，单凭这篇《织工对》史料的记事，如果不结合当时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其他有关材料来分析，显然是不能轻易地作出它的生产性质是资本主义的还是非资本主义的论断的。

所有认为《织工对》史料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的论点，归结起来，主要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条件之上，即是所谓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固然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基本因素，但是，也必须考虑到在历史上雇佣劳动的出现和存在有它的古老性的特点^②，可是这都不曾使它具有任何一点资本主义的意义。这是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的。

^①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册，第240—241页。

^② 请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2页。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观点，真正的具有资本主义萌芽和性质的雇佣劳动，只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和存在：

“在封建制度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企业所必需的工人骨干，是靠破产了的城乡劳动居民来补充的。封建制度时代的直接生产者变成无产者，这表示：第一，他们摆脱了封建劳役和行会强制，即摆脱了他们以前所处的人身依附地位，第二，他们的生产资料已被剥夺，并丧失了^①在封建制度下使生活有所保障的生存资料”。这就是使劳动力商品化，即把封建制度时代的直接生产者变为无产者所必需的历史条件。

当然，在封建社会历史中，直接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的过程，在各个国家内是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历史的研究，就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具体的分析。就我们所看到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著，当考察我国历史上雇佣劳动的性质时，不但没有或者很少结合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劳动者在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来进行分析，而且往往只强调（或者只看到）生产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的一面，而忽视了生产劳动者有无人身自由的一面。有的论著虽然偶尔附带提及一下生产劳动者有无人身自由，但往往是作了不正确的片面认识，而不是从它的科学涵义既包括封建劳役和行会强制两个范畴去理解。我以为在具体考察历史上雇佣劳动的性质时，毋宁说后一条件（自由得一无所有）应从属于前一条件（人身自由）。因为在历史上，我们一方面看到有生产劳动者经常不断遭受封建剥削榨取和灾害等等而失业破产分化，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使他们

① 《工人阶级》（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页。

变成为没有任何财产的自由；同时我们也看到有握有大量货币和财富的占有者，这样的结果并没有使货币变为资本，也没有使劳动力变为商品。显然可见，要确定某一雇佣劳动的性质，还应该同时考察这一时代生产劳动者在社会中所处的封建依附地位有没有摆脱为先决条件。简单地说，这就是我们考察雇佣劳动性质在理论上的根本立足点。

《织工对》所述的生产之所以被断言为资本主义的性质，其根据就是认为织工的劳动是自由雇佣劳动，即织工不仅是一无所有者，而且也是人身自由者，因为“没有其他身份隶属关系”。事实果真如此吗？《织工对》既然是元代史料，那么，只要稍稍考察一下元代封建社会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元代的封建依附关系是很强烈的，它并直接表现为各种人身隶属的形式。

首先，在元代，由于封建统治者极端野蛮和残暴强制的结果，使得当时从事工农业的直接生产者丧失了身份的自由，沦于被奴役的地位，因而在元代整个封建社会生产中渗透了“落后统治部族所带来的奴隶性生产关系”^①。例如，在工农业生产中就曾经使用了大量的公私奴隶作为生产者，奴隶为其主人的私属私产，主人有完全支配权，可私刑奴隶，国家刑奴亦须征求本主同意。不论官私奴婢都可任意赐赏或奉献于人，奴隶还可公开自由买卖。总之，元代封建主对待奴隶，完全视同牛马货财一样^②。农民佃户除受封建地租榨取和各种超经济强制的剥削之外，更严重的处境是没有人身的自由。它表现在：主户可自由买卖佃户，以

^① 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页。

^② 请参看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38年版，第173—196页所作的具体论述。

及主户干涉佃户的婚嫁。主户可设私刑，凌虐拷打佃户，主户还可生杀佃户，视若草芥。佃户还可代主受刑，如同奴隶之代主偿死^①。所以农民佃户与地主阶级的关系，在实际上呈现为主奴的关系，也就是说，元代的农民佃户乃是封建领主和封建地主的私民或农奴。手工业者在“匠户”制度下，更身受着残酷的封建奴役。当时全国绝大多数的手工工匠被搜括来编入所谓“系官匠户”的匠籍，一部分未编入系官匠籍的工匠则归入封建贵族的所谓“投下户”的匠籍^②，因此在元代最大多数的手工业工匠都是属于皇帝和贵族所有的匠户。元代匠户的社会地位，在法律上规定为子孙世袭其业，即“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黼绣”^③，永替官府充役。匠户因为地位世袭，其子女婚配亦须受官府管制，婚姻不能自由^④。凡系官匠户或投下匠户，除在各自所属的作场充役制造外，均可免除其他差科^⑤。因匠户事事承荫与例免差科，故元人名之曰“承荫”或称“任子”。可见，此“与魏晋南北朝佃客之受荫同。若魏晋南北朝之佃客，可认为农奴，则元之系官匠户，殆亦同于农奴工奴也”^⑥。这些就

① 请参看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38年版，第195—206页所作的具体论述。

② 参看《元典章》卷一七，〈户部〉三，〈诸色人匠〉，又见《通制条格》卷二，〈户令〉，〈诸色人匠〉。关于元代匠户问题，过去有些不够确切的研究，可参看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9期，第11—16页），《元代系官匠户补记》（《食货》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第45—47页）；吴晗：《元明两代之匠户》（《云南大学学报》，第一类第一号，第87—104页。）

③ 《元史》卷一〇三，〈刑法志〉五一，〈户婚〉，第273页。（开明《二十五史版》，下同。）

④ 参看《通制条格》卷三，〈户令〉，〈良嫁官户〉，第21页，卷四，〈户令〉，〈擅配匠妻〉，第19页。

⑤ 《元典章》卷一七，〈户部〉三，〈诸色人匠〉；《通制条格》卷二，〈户令〉，〈诸色人匠〉。

⑥ 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第71页。

是元代从事工农业直接生产者所特有的身份地位最本质的表现。

其次，元代的封建劳役即杂泛差役，是以繁重而又带有奴役强制性著称的。按元蒙封建统治的隶属关系，在封建贵族集团（包括皇族、宗王、公主、驸马、勋臣、贵戚以及一些有特殊身份的蒙古色目人）所领有的分地人户即投下户的待遇，和一般民户是有区别的。凡属分地人户即投下户，沿例并不和系官当差人户一样为中央政府所差发^①。同时封建官僚和寺院僧道等等也和贵族一样都是属于元朝上层统治阶级集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并享有各种特权^②。因此当时一般民户、军户、站户等等乃至“有力富强之家”为了“苟避差徭”，多纷纷自愿投充，以求获得荫庇；而诸王及投下、官豪、僧道便利用权势擅招大批户计，影占人户，以扩殖自己的财富。这就益发加剧了元代封建依附关系的深化。

在当时各种人户都为了苟避杂泛差役争取依附荫庇的潮流下，民间手工业者自然也不能例外。我们知道，元代系官匠户和投下匠户除在各自相属的作场服役制造外，都例免其它科差。而投下匠户生产又比在官局工业中的官人匠户生产服役的条件稍为好一些，因各投下有的设局制造，有的不设局，只令投下匠户关支物料或自备物料造作生活，然后赴各投下送纳的^③。这样，便引

^① 参看至元八年户令（《通制条格》卷二，页二），至元二十年的奏文（《元典章》卷二四，〈户部〉，〈投下税粮许折钞〉第7页），大德十一年的减差令（《元典章》卷二五，〈户部〉，〈纳绵府杂泛〉）。

^② 参看黎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第115—149页。

^③ 《元典章》卷一七，〈户部〉三，〈诸色人匠〉；又见《通制条格》卷二，〈户令〉，〈诸色人匠〉。

起了两种后果：一方面，当时的系官匠户大都愿意“辄投诸王及各投下给使者”^①。据元朝政府禁令载：“诸投下官员招占已籍系官民匠户计者，没其家财，所占户归本籍”^②。这说明各投下招占系官民匠，乃为事所常有。另一方面，甚至有“各处富强之民，往往投充人匠，影占差役，以致靠损贫难户计”^③，故元朝政府便有“敕民避役窜名匠户者复为民”^④，的法令。可见，系官匠户和“富强之民”尚且如此，而民间手工业者又岂能独外生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民间手工业者如果不是系官当差或者投充荫庇的话，在当时“匠户”制度下不仅会常有为官府“窜毁匠籍，而牵连追求，溢及民伍”^⑤之事发生，并且还有为诸受封位下或投下“拘刷”充役的遭遇^⑥。特别是元代封建贵族，官僚僧道以及豪势之家大多兼营高利贷商业和手工业，为了攫取劳动人手或增益分地收入，各投下常在各郡邑民户人匠中进行拘刷括取，据元朝政府法令载：

诸投下差使臣告奉到圣旨及旨令文字，不经由本路官司，径直于州县开读，拘刷民户人匠，便行拘收起移及取索钱债搔扰。为此特降圣旨。今后遇有各投下拘刷起移人匠民户，取索钱债，先须经由本路宣抚司行下达鲁花赤管民官，若不系大数民匠合拘收起移者，依上拘刷，并不得似前径直于州县一面搔扰。如委实不系大数合拘刷起移底民匠，各路官

①② 《元史》卷一〇三，《刑法志》，第五一，《户婚》，第272、273页。

③ 王恽：《便民三十五事》，见《秋涧文集》卷九。

④ 《元史》卷一一，《本纪》第一一，《世祖记》八。

⑤ 黄潜：《茶陵州判官许君墓志铭》，见《黄文献公集》卷八。

⑥ 据《元史》载：“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妇常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卷一〇三，《刑法志》第五一，《户婚》，第273页）按此系指系官匠户而言。可见系官匠户都敢拘刷，则民匠更可随便拘刷，是自不待言的事了。

司却不得遮当。^①

上述文件中所说的“不系大数民匠”，是指未编入系官匠户的民匠，即是极少数的所谓“畸零人匠”。这个法令是中统二年（一二六一年）六月颁发的，足见各投下可在各州县拘刷起移民匠，乃为法令所早已承认的事实。

据此可见，在元代杂泛差役加深封建依附关系的情势下，即使有极少数没有编入匠籍的工匠，要完全摆脱封建劳役的强制显然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

以上两点，只就元代封建劳役和对手工工匠人身的封建束缚方面，略加论述。现在再来考察元代手工业者所具有的人身依附表现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行会强制。

中国商业行会和手工业行会的起源时期，尚待考索。但在隋唐时已有行会组织，故有所谓行头、行首、行人等名称^②。自宋以来，行会组织日益周密，其作用也逐渐加强；后历元明清三朝，行会制度在继续发展中又获得进一步的巩固。杭州在历史上是一个手工业发达的城市。这里的城市手工业几乎都有它自己的行会组织，据十三世纪三十到五十年代间宋人耐得翁《都城记胜》和《西湖老人繁盛录》的记事，当时杭州的商业和手工业行会组织是很发达和普遍的，其目的在于保护本行业的利益，并借以抵制封建官府的压榨科索^③。如以手工业行会来说，它对于维护当时杭州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是起着有利的作用。

^① 《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投下收户》，又见王恽：《中堂记事下》，《秋涧文集》卷八二。

^② 参看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第138—145页；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店1934年版，有关各章节。

^③ 见《东京梦华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91—92、125页。

到了元代，杭州仍然是“城宽地阔，人烟稠集”^①的工商业城市。由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达，“杭民借手业以供衣食”者的从业人户数就很多。这些手工业者因“小民屋狭，夜作点灯”，“是以数致火患”^②。据不完全的历史资料统计，从中统二年到至正三年（一二六一——一三四三年）八十多年间，就有十八个年份连续不断地发生了二十三次火灾^③。如从至正元年即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一次火灾事件中可以看出，当时被烧的民居铺房占百分之八十三，被灾人户数共一〇，七九七户，大小共三八，一一六口，其中受灾可以自贖者户数占百分之九，口数占百分之十一，被賑济者户数占百分之九十一，口数占百分之八十九^④，这显然其中以属于小工商业者和城市贫民为多。而元代杭州城市手工业在行会支配下生产，早在至元年间即十三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已经相当发达。据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记述：

前述文件还说到这个城市有十二个不同的手工业行会（twelve guilds of the different Crafts），每一行会有一万两千所容纳手工工匠的房屋（houses）。每所房屋至少有十二人，有的有二十人和四十人左右，——这些人并不全是老板，里面有为老板们做工的短工（journey-men）。然而这些手工工匠却经常有工做，因为中国许多其他城市都

①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豪霸》。

② 均据杨瑛：《山居新语》，第28页；又见吴庆坻等纂光绪《杭州府志》，卷一七二，《杂记》一，页一三引。

③ 据吴庆坻等纂光绪《杭州府志》卷八三，《祥异》卷一七二，《杂记》一，页二四记载计算。

④ 据杨瑛：《山居新语》，页三〇记载计算。

从本城取得他们所需要的东西。①

根据这段记载，应指出三点：（一）马可波罗所记杭州行会手工业每户拥有工匠的人数少则十二人，多则二十到四十人。按《织工对》所述杭州丝织业生产有“工十数人”来印证，不能认为马可波罗此记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夸张。因为元代手工业发达，作坊工场规模一般较大以及从事生产的人数较多，这时和当时手工工匠处于封建依附与被奴役的地位相联系的（在下面还要谈到）。（二）不少论著引据这个游记的另一译文，把杭州“有十二个不同的手工业行会”译成为“有十二种职业”②，不详考记载的原意，并由此作为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的依据，显然是不确切的。（三）马可波罗记述杭州有十二个不同的手工业行会，只是他所见到规模较大的一些重要行业，因而才引起他的注意并加以描述，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当时杭州的手工业仅有此十二个是行会手工业。

现在应该加以论证的问题，乃在于杭州丝织业是不是行会手工业。马可波罗的记述虽没有说明这十二个不同的行业是什么，但据他在游记中对杭州丝织品的注意赞赏来看，其中必然包括丝织这一重要著名的行业在内，即当时元代杭州的丝织业是一种行会手工业。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推论，而是可以举出历史证据来的。

按杭州丝织手工业的起源，是由唐人褚遂良的九世孙褚载所

① Henry Yule,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2 Vols, edited by H. Cordier, London, 1926), Vol. 2, P. 188. 按马可波罗(1254—1323年)到中国时期约为元代至元十二年左右，离去时为至元二十九年，即(1275—1292年)，约在中国一共居住了十六、七年。

② 沙海昂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中册，卷二，第570页。

传习，因他善织绫锦，死后当地人替他在仁和县忠清里修了一座庙叫通圣庙，作为机神来祭祀。据明永乐年间姚震撰的《通圣庙碑记》写道：

先是，〔褚〕遂良九世孙名载者，……其先家广陵，获织绫锦法，世袭为业。载歿，厥后数显灵于人，……于是里人相闻。郡邑大夫立庙祀之，祭以牲牢，题曰通圣。凡有水旱灾患，经营出入，祷之无不响应。迄今一乡之人，皆织绫锦为业，由乎神之始也。助圣（按指祀褚遂良的庙名）通圣，初皆有碑，以纪厥事。元季兵火，居民雕敝，庙宇坍塌，碑亦颠复瓜分，独遗神象，风雨剥落。士人李用、沈荣富虔奉香火年久，永乐癸卯（二十一年，一四二三年）二君叹曰：神君有唐忠臣之后，复庇吾乡，人多赖之。今兹庙貌颓圯，神何依焉？尚义之士，一十有八，乃各捐资，鸠工重建，……肇始于是岁六月甲子，落成于九月丙戌。①

这个通圣庙始建于何时，还没有查考出来。据碑文所记，此庙在元时已有，但其初建当早于此无疑。这个庙除受当地一般人民因迷信而供奉香火之外，还受到经营丝织工商业者的祭祀。这又何以见得？因为按照中国手工业行会的传统历史习惯，行会老板和工匠对本行业的祖师极端崇拜作为加强行会成员之间团结的手段，并且还以某一有关寺庙作为本行同业者集议和酬神的会所。如碑文中说：“迄今一乡之人，皆织绫锦为业，由乎神之始也。”又说：“复庇吾乡，人多赖之。”这就是说，自元以来杭州丝织手工业者以褚载为其祖师，即作为机神祭祷。碑文中所撰

① 沈朝宣纂嘉靖《仁和县志》卷七，〈坛庙〉。

“经营出入”或“讼词经营”^①，“祷之无不响应”，这就是以通圣庙作为解决行会成员之间的争议和同行业者酬神集会之所。此庙因元末兵火坍塌，明代（一四二三年间）重建后直至清代仍然存在。据雍正年间钱塘人厉鄂的记事说：

杭东城机杼之声，比户相闻。郎仁宝（按指明人郎英字仁宝）云：起于褚河南九世孙载，善织作绫锦。今褚家塘通圣士神是也。其中一二供尚衣之匠。

杭于东南为大府，桑土饶沃，筐篚织文之贡，于是乎出，国家常以内务重臣董其事，置局城西，而群工匠多家城东。旧有机神庙，地隘制陋，隶于局者，与自为给以鬻者，率用钱拓而新之，独无表石之文，不知神所缘起，惧无以示将来，……因谒记于余。^②

从上引历代的记载来看，杭州丝织业至少历元明清三朝都是行会手工业，当地丝织手工业者始终是以唐人褚遂良的九世孙褚载作为本行业的祖师而加以祭祀，并以通圣庙即机神庙作为行会集议的会所。这正如苏州南京丝织业是行会手工业的历史情况完全一样。同时也与马可波罗所记元代杭州城市手工业是行会手工业的历史情况完全相符，可证杭州十二个不同手工业行会中必包括丝织行会手工业无疑。

根据手工业行会制度的历史证明，只要有行会组织的行业和地方，这种行会强制的力量必然存在并发生它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元代，手工工匠身受封建劳役较历代封建社会更为强化的情况下，行会组织的作用必然要随着大大地加强它的行会强制力

^① 沈朝宜纂嘉靖《仁和县志》卷七，《坛庙》。

^② 厉鄂：《东城杂记》卷下。

量。如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年）三月元朝官府文件中指出：

“数年以来，所在商贾，多为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①这就说明了当时商人利用封建权势，通过行会垄断把持行市的情况是严重而又普遍的。

在手工业行会方面，首先，我们看到杭州有垄断酿酒手工业的产销情况：“杭之豪民十家，入赂于官，大为酿务，高其估而专其利，酒日醜恶。”^②能够垄断当地酿酒手工业产销的，显然是只有通过封建行会的力量和“入赂于官”取得专利的结果。杭州的酿酒手工业如此，其他各业也不会没有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其次，我们还看到对雇觅人力的封建行会把持。据一二七五年左右吴自牧记述杭州“凡顾倩人力及干当人，……俱各有行老引领”^③。这个历史传统的习惯自宋至元，并未有所改变。据元人记载当时雇觅仆役都必需通过“牙僧”^④，那么，手工业者按照行规一般都要入帮上会，如果要取得就业的机会显然是不能有所例外可以不通过行会组织的。这些事例，都表明了元代商业行会和手工业行会所具有的严格的强制性。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根据元代封建社会的具体的历史情况，从两方面——封建劳役和行会强制——考察了元代手工业者在当时封建社会所处的人身依附地位。不难看出，元代手工工匠的身份地位，比起中国历代封建社会的手工业者来只有显得更坏而不会稍好。如果否认元代手工业者“没有其他身份隶属关系”，那显然是无视历史的实际。试问在元代社会封建依附关系强化的历

① 《通制条格》卷第一八，《关市》，《牙保款蔽》。

② 姚燧：《平章蒙古公神道碑》，见《牧庵集》卷一四。

③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九，“顾觅人力”，见《东京梦华录》，第301页。

④ 陶宗仪：《辍耕录》卷七，《雇仆役》。

史情况下，有什么条件和有什么可能使元代的手工工匠变为自由劳动者呢？就从元代史料中看到的所谓雇佣，不但没有丝毫“自由”的气息，恰恰相反，而表现为各种极端落后的奴化的形态：（一）凡盗贼不能退还赃银，法令规定令其折用役于事主之家。“折庸视各处庸价而会之”。“妇女日准男子工价三分之二。”^①（二）平民有因负债，而“举家入庸”于债主之家，乃至有“岁满没为奴”的^②。（三）贫民有因“依庇豪右”，并“以身佣借衣食”的^③。（四）贫难小民有因事故以自身定期典雇于有力之家，限满无可偿主，“致有父子夫妇”^④一同折佣的。这些事例，大体上可以反映元代社会民间流行的所谓雇佣的本质和特色，这也是和元代社会所特具有的强烈的封建奴役性相适应的。如在元代官局作场作工的工匠，按规定也支领官府的口粮、衣装、钞、盐，这也好象是“雇佣”，实际上是不存在有所谓雇佣的性质的^⑤。即如元代的手工业生产，除了在投下匠户形式支配下采取个体经营的小商品生产的作坊和小手工业者以外，还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生产者人数较多的封建所有制的大作场，在这里，对工匠的雇佣也是和上述的雇佣形态类似的。如博都欢利用投下匠户，包采“宣德州德兴府等处银冶”^⑥。马月合乃在河南颍州光化以“领己括户三千兴煨铁冶”^⑦。马扎儿台“于通州置榻坊，开酒馆糟坊”，酿酒原料消费“日至万

① 《元史》卷一〇四，《刑法志》第五二，《刑法》三，《盗贼》。

② 程巨夫：《梁国何公神道碑》，《雪楼集》卷八。

③ 《元史》卷一六三，《列传》第五〇，《张德辉传》；并参看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〇《张德辉行状》。

④ 王恽：《为典雇身良人限满折庸事状》，《秋涧文集》卷八四。

⑤ 参看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第71页。

⑥⑦ 《元史》卷五，《本纪》第五，《世祖纪》二。

石”^①。吕侯的夫人经营“蚕织”业，也是大量利用“家僮数十人，称工艺，廩食之，无惰游者，以故资用丰裕”^②。这些大生产都是封建贵族官僚和具有特殊身份的权势之家所经营，以大量利用和剥削奴隶、农奴和投下工匠的劳动为基础，生产的目的是主要不只是为了直接满足封建贵族官僚的需要，而且是为了市场而生产的商品生产。这种封建所有制的大作场的商品生产，在元代各地都有而且还相当普遍。这是因为在当时，从事工农业的直接生产者没有摆脱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样，他们就具有最充分的条件和最大的可能在所谓雇佣的形式下广泛地被利用来在各种生产中提供封建剥削的源泉。

综上所述，根据我们对元代封建社会中手工业者的身份地位和雇佣劳动本质所进行的分析，不言而喻，现有论著对《织工对》史料解释所赖以建立的所谓自由雇佣劳动的根本论点是难以成立的。只有揭示了元代手工业者所具有的身份地位的真实情况，才有可能对《织工对》所述的生产性质作出符合或接近历史实际的估计。

二

元代手工业者在当时封建社会所具有的封建依附身份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依据元代社会条件和历史事实认真的重新来估计《织工对》所述的生产性质呢？

根据我们在前面的论证，《织工对》史料是记述元代杭州仁

①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② 陆文圭：《武节将军吕侯墓志铭》，见《墙东类稿》卷一二。

和县丝织手工业的情况，而元代杭州的丝织业则是一种行会手工业。《织工对》所述的丝织业生产既然是当时当地的一个同业，自然它毫无例外应该是属于当地的丝织手工业行会组织。这就是说，《织工对》所述的生产组织中的业主和织工，各为构成当地行会组织中的成员。如果他们没有加入行会，即入帮上行，按照例来行会的规章，行会就要用集体力量严厉地把他们排斥出生产经营之外，即业主不能在当地开业建立作坊生产，织工就不能受人雇请以劳动来维持生活。而《织工对》史料反映出来的情况，则是业主在开业，织工在作工，可见《织工对》所述的丝织业乃是在当时杭州丝织手工业行会支配下的一个生产组织。

从《织工对》史料本身反映出来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具体地证明它是一个封建行会手工业，和它所具有的强烈的行会强制性。

首先，据《织工对》所记姚姓织工叙述另一织工的故事，这个织工虽有较高超的手艺并能赚取较高的工价，但是，他并不因此满意自己这个有手工艺的职业，反而想“去事大官”，宁愿放弃自己高超的技艺和较好的收入，甘心替“大官”去做一个仆役。所谓“去事大官”，即是“投充诸王及各投下给史”，求得荫庇。这个事实，一方面说明了这个织工还没有摆脱当时封建劳役的束缚，要争取投充做附；另一方面正符合我们在前面揭示元代手工工匠在当时封建社会内所处身份地位的真实情况。我们的问题还不在这里，且说这个织工“去事大官”的结果，固然日久不免使他自己原来从事的手织业务荒疏，即“所业已遂遗忘”，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曾经擅自脱业，所谓“人亦恶其狂不己分”，这就是指责他破坏了行会的行规。从行会的立场看，当然是一种

不好的行为。尽管后来他还想复业从事手织，可是各“织家”却不肯复用以织，至冻饿以死”。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了：当地丝织手工业行会为了维护行会的利益和行规的约束力，并不因为他过去曾享有高超的手艺，而使他能够重新恢复行会会员的权利；事情与此相反，行会乃采取集体的力量对他进行制裁和排斥，即各“织家”都拒绝再雇请他，使他不能在当地丝织业中获得就业的机会，终于不得不使其忍受冻饿而死。这就是一种行会强制力量施加在这个织工身上的后果表现。

其次，又据姚姓织工叙述这个织工没有脱业“去事大官”以前的情况：“顷见有业同吾者，佣于他家，受值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艺固过于人，而受直与众工等，当求倍直者而为之佣。已而，他家果倍其直佣之。”这就是说，这个织工在没有脱业的时候，他为了赚取较高的工价可以随意随时转雇于另一愿出高价的业主。现有的论著，据此解释为“自由雇佣劳动”的表现。其实，这个织工之所以有这样的可能和便利，那是因为他当时在封建行会行规允许限度内的一种“自由”。可是，当他脱业后而想复业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尽管他这时仍然是一个一无所有者，却不能够使得他和先前一样“自由”地受雇于当地的任何一个丝织业的业主。这就说明这个织工不是一个自由劳动者。问题很清楚，就是因为这个织工曾经一度“去事大官”脱离了行会，在没有重新允许他加入行会取得行会会员资格时，他就再没有和先前一样有“自由”就业的权利和机会。这也是当地丝织手工业行会的行会强制性的一个具体表现。

总之，我们从《织工对》史料本身记述另一织工的前后对比的事实来看，它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一）杭州丝织手工业决不

是一个能够雇佣“自由劳动力”的具有所谓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事业。恰恰与此相反，它是一个封建行会手工业，本身具有极其严格的封建强制性和制裁力量。（二）这个织工也决不是一个自由劳动者。从他本身前后的情况就可说明：他要“去事大官”争取依附荫庇，这反映他还没有摆脱封建劳役的束缚。当他在业或脱业时，行会的作用和强制性表现在他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可见，从这个生产组织和这个织工两方面的关系和性质来看，都是完全一致而又相互适应的。从这里，《织工对》史料中的所谓“雇佣劳动”性质的封建本质不是很清楚的暴露无遗了吗？

我们既然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究明了《织工对》所记织工的“雇佣劳动”的封建本质，同时还有必要对《织工对》记述生产的具体内容，和现有论著据此所作出的论断，进一步展开分析讨论。现在就从这个丝织手工业生产的内部和外部关系的几个主要方面来分析，我们都可以说明它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

先从这个丝织业的内部关系来看，它也是表现为封建行会手工业组织的生产关系的特征。按《织工对》记述姚姓织工的自述：“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养吾父母妻子。”由此可见，织工“衣食于主人”，并由业主支给工价，不是正充分反映了封建社会行会手工业的老板和帮工（织工）之间在生产和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一种依存关系吗？这种关系即是伴随着家长制关系表现出来的一种人格依存的形式。在这里面，老板雇佣帮工虽有剥削关系存在，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行会的学徒和帮工，不仅是为着工资和伙食去劳动，他们更多的是为着学习手

艺，为着获得独立师傅的名义去劳动”^①。马克思曾经对帮工和老板（师傅）之间的这种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作为帮工（真正的），对于那在师傅支配下的消费储备享有某种共同性。如果这种储备也不是帮工的财产，那末，按行会的法规，按行会的习惯等等，帮工至少仍然是它的共有者之类”^②。这是因为“在这里，劳动本身一半还是技艺，一半则是目的的本身等等”^③，从我们在前面所作的分析和论证，《织工对》史料反映出来的这个丝织业生产关系的性质，对它作这样的认识和理解，才足以符合元代封建社会行会手工业的历史实际。

在生产规模和织工待遇方面，据《织工对》所记“杼机四、五具”，不一定全部都是花机，其中可能有只要一人操作生产的卧机^④。如果都算作两人协作生产的花机，按徐一夔所记织工的确数“工凡十人”计算，其中至少有半数是学徒。因为按提花机生产的古老习惯，需要“提花小厮坐立花楼架木上”。^⑤提花，这就是学徒所担任的一种辅助性的劳动。因此，真正从事全劳动的工匠，不会超过四、五人。如果和元代一般较大的手工业作坊比较，只能算作“细户”或“小户”的生产。丝织业生产正因为是一种高度技巧的手艺，织工必需为高手工匠，故待遇也较一般其他工匠稍高，并按日计工受值^⑥。《织工对》所记姚姓织工能“日佣为钱二百缗”，这一方面因为他是高手匠，本来待遇就较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82页。

②③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38页。

④ 参看元人王桢：《农书》卷二一，《农器图谱》一七，页四九六所载图。

⑤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服》第二，《机式》。

⑥ 按这个计算工价的习惯，自元明清以来在江南苏杭一带丝织业中是一个通行的办法。

一般工匠稍为优厚；另一方面，在当时元代纸币膨胀恶化的情况下，这“二百缗”已为我们所考证出来的，只是一种几乎没有购买力的钱本位的至正交钞（或至元通行宝钞）的纸币收入^①，因此在原有较高工价的基础上随着纸币的贬值，就显得工资水平很高，这乃是一种水涨船高的现象。不过，据这个姚姓织工叙述另一织工的情况，说他的这个同业“佣于他家，受值‘与自己’略相似”。又说这个同业认为自己“艺固过于人，而受直与众工等”，想“求倍直者而为之佣”，后来，“他家果倍其直佣之”。这就证明，“日佣为钱二百缗”的每日工价，在当时杭州丝织业对有技艺的织工按日计工受值的待遇上，只不过是一般通行的工价水平，还不是最高的工价，最高的工价可达到“二百缗”的一倍。所以，从姚姓织工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工作“每夜至二鼓”，这“二百缗”的收入不但不能补偿织工因延长劳动时间所增加的劳动耗费，并且以他的收入养父母妻子，也只是勉强维持他家庭“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极其低下的生活水平。以此联系起来看，就可以对“日佣为钱二百缗”的记载，得到合情合理恰如其分的认识和理解。

同时，还必须指出的，在现有的讨论意见中有这样一种误解，认为只要有以货币来支付工价的现象，而不考虑其他条件，就由此确认为资本主义关系的特征的。这正如认为资本主义地租的特征，就是用货币来支付一样。尽管工资和地租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但在人们的认识上往往仅以货币支付这一点来论断一种生产关系的本质，这种误解却是有它的共同之处。马克思在分析地租时批

^① 关于这点，请参看拙作《徐一夔〈织工对〉记事的年代和织业问题》，其中已有具体论述。

判了这样一种观点指出：“但是货币地租并不一定就是资本主义地租。如果货币地租仅仅是实物地租的转化形态，它就仍然是封建地租，而不是资本主义地租”^①。大家都知道，中国封建社会的货币流通关系开始发生和发达很早，在官私力役雇佣方面也早流行有以货币计工的偿付形态。很显然，如要确定以货币支付工价的特质，是资本主义的还是非资本主义的，那是要从它所反映的生产关系的实质来说明。而这个织工的收入虽是以钱缗计算的货币工价，联系我们所揭示出来的这个丝织业的生产关系表明，不论在事实上或理论上都不能和近代意义上的货币工资混为一谈。

我们既然讨论到织工的待遇，就不能不谈劳动剥削的问题。现有的论著据《织工对》所记织工生产“每夜至二鼓”“皆苍然无神色”的情况，由此断言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有的并强调说：“这鲜明的显示了资本家是如何的通过对雇工的残酷剥削来不断增殖扩大自己的资本”^②。其实，如前所述，元代杭州手工业生产一般多是劳动到深夜，并因此经常引起了火灾。直到清代，这个情况仍然是没有改变的。如清人毛大可《杭州治火议》中说：“贫民昼夜趋逐，往多夜作。诸凡治机丝煨金锡，皆通夕不寐。”^③据此可见，《织工对》所记杭州的织工生产“每夜至二鼓”并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特殊现象，手工业者工作时间通常超过十二小时乃至更多，那是历来中国封建社会手工业生产中

^① 郭大力：《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1957年版，第220页；并请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章《资本主义地租的发生》。

^②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编：《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页。

^③ 陆燿：《切问斋文钞》卷二一。

的一个极普遍极经常的现象。劳动时间长固然要严重影响生产工作者的健康，乃至恶化到使其“苍然无神色”，这是自不待言的。在这里面，显然是存在着业主对织工的残酷剥削。因为织工的劳动时间长，不仅超过了维持自身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还替业主提供了剩余劳动。但是，必须着重指出，我们不能因为只要有剩余劳动的榨取，就可以认为任何一种生产的性质都是资本主义的。按照马克思分析所指出的，“剩余劳动不是资本发明的。”这就是说，对于剩余劳动的贪欲，不是由近代的地主和资本家发明开其端，而是早在奴隶占有制和封建徭役制度下即以流行^①。特别在元代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产，还不存在着一种无限制的以剩余劳动为目的的欲望。所以，《织工对》中反映出来的业主对丝工剩余劳动的剥削，如其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倒不如说是落后的封建榨取，更为符合历史的实际。按照徐一夔另一记载说，元代杭州金玉府官局作场的生产，“所督集局工，类多单人细户，或内府需用急，工集局昼夜并作，面有寒饿色”^②。这正说明元代手工工匠不论在官或私的作场中深受着极端残酷的封建剥削，都有它的一致性和共同基础。归根到底，这显然是和元代手工工匠在身份地位上所具有的封建奴役的特征分不开的。

以上是就《织工对》所记这个丝织行会手工业组织的内部关系所作的分析。最后再来考察一下这个生产组织的外部关系。按《织工对》所记：“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这个记事应作怎样正确的理解呢？现有的论著都把它说成为资本家直接开设作

^① 请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65—266页；并参看恩格斯：《资本论》第1卷提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9页。

^② 徐一夔：《元故将仕郎金玉府军器提举司同提举夏君（应祥）墓志铭》，见《始丰稿》卷三九。

坊，雇工生产经营。这个解说是不恰当的，因而也是值得商榷的。

在实际上，这“饶于财者”不应理解为徐一夔是泛指一般拥有财富的人。按元代史事主要是指贵族官豪地主僧道以及具有特殊身份的势要兼并之家而言^①，因为这些人在当时元代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完全是处于封建统治的地位，他们的身份多半是双重性的，即具有亦官亦商的本色。所以，这“饶于财者”，应是指元代社会封建政治与封建经济相互结托而人格化了的体现者，而不是其他一般占有财富的人。我以为根据《织工对》原记文义并结合元代史事联系起来看，把原文作如下的理解似应更加符合事实些。在这里，按“率”字本义作“用”解，“居工”乃指丝织业的“织家”或“机户”或“机户之家”^②而言。所谓“率居工以织”，是指这“饶于财者”利用丝织手工业者在自己家内或作坊内为其生产织造。所以《织工对》又说：“故主之聚易以售，而佣之直亦易以入”。这就是说，这个“织家”以所生产出来的丝织品供应这“饶于财者”去满足市场的需要，然后取得某种形式的收入，以支付织工的伙食工价等等。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式的生产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的性质，这又不得不提及元代丝织业生产经营形式的基本情况。

我们知道，元代丝织手工业的发达，除了为满足供应封建统治者及其他各阶层人民服用的需要之外，还与元代的租赋制度有关系。元代征收租赋，税粮仍为谷粟，科差则改收丝料，而不收

^① 如元人白珏在《河南妇》诗注中有“千户某饶于财（《湛渊遗稿》卷中，第2页），徐一夔替杭州金玉府官吏夏应祥作的墓志铭中有“家故饶财”（《始丰稿》卷之九）等句是，类此记载还多。

^② 按“机户”或“机户之家”，见《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蠲金》；《元典章》卷五八，《工部》，《缎匹》。

绢帛。按征收丝料的一般办法^①：（一）每二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官者，即为中央政府的收入。其用途多作为官府局院丝织作场的生产原料而消费掉；（二）五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料输于“本位”者即为分地的封主的收入。其用途则为请受封“本位”、“投下”或自设局织造，或不设局但令所属匠户从事织造，以供自己的享受消费，并用以经营谋利。这样，便不仅促进了元代丝织业的发展，并且还在很大的程度上促使了农村育蚕缫丝与丝织两业的分离。所以在元代丝织手工业的生产，除了官府经营的官局丝织工场外，基本上多为“本位”或“投下”利用投下匠户经营的丝织作场占着主导地位。如前引陆文圭的记载，就是贵族官僚利用“家僮数十人”的劳动自行从事织造的例子。投下织造还有另一种经营形式，即令投下匠户“每年自备物料，或本投下五户丝内关支物料，造作诸物赴各投下送纳者^②”。而这些投下匠户都各有其“造作生活”的工作场所，这即是“织家”或“机户”所组织经营的机坊。这些“机户之家”在表面上看来好象是“独立”的生产者，实际是处于封建依附的地位，因为他们都是“于各投下送纳生活者”^③。投下匠户生产所需的物料，其所以有“自备物料”和“关支物料”之别，主要是由于各匠户的生产规模和资金大小所决定的。因此，各投下所属的匠户经营的手工业作场就有大有小，而送纳的办法亦当有所不同。

①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第四二，《食货》一，《科差》。按元代科差包括两种：一为丝料，一为包银。本文所指“二五户丝”，系泛指一种租赋名目而言。实际征收，不仅“二五户丝”税额前后时期有所不同，即科户负担亦有轻重之分。

②③ 《元典章》卷一七，《户部》三，《诸色人匠》；又见《通制条格》卷二，《户令》，《诸色人匠》。

这样看来，我们在上面就《织工对》记述“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所指明出来的生产关系情况，是完全可以与此相互印证的。十分明显，这个“居工”与“饶于财者”之间的关系，即相当“于各投下送纳生活者”的关系。而《织工对》所记的这个丝织业的外部关系，就有很大的可能应是属于元代“本位”或“投下”匠户生产的类型。实际这也是元代丝织业最广泛盛行和最基本的一种生产形态。因为在元代各投下能从租赋中取得五户丝料，为了把五户丝料尽量用来扩充和控制丝织业的产销，不仅充分利用投下匠户从事生产，甚至有不顾中央政府的禁令而把五户丝料俵散民户^①和当差人户^②去织造的。这就反映了元代丝织业生产为各投下控制利用所已经达到的广泛范围。由此可见，徐一夔的这两句记述，就不是一般的泛泛所指，而应是对当日社会经济生活中这样一种现实的概括。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织工对》所记元代杭州路仁和县丝织业的一个生产组织，它本身是属于一个封建行会手工业。作为这个“织家”的业主，一方面是行会老板，另一方又当是属于投下匠户。所以这个丝织手工业，即使我们对它的外部关系存而不论，只从它的生产本身直接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而言，就已充分证明它完全是封建性质的，根本不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和特点。这就表明了：徐一夔《织工对》的记事，是不能说明和论证中国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于元末杭州丝织业的问题，那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有的论著之所以从《织工对》史料引伸出杭州

^① 请参看《通制条格》卷三〇，《营缮》，《投下织造》，又见《元典章》卷二五，《户部》一一，《投下五户不科要》，按民户系指农民而言。

^② 请参看《元典章》卷二五，《户部》一一，《投下五户不科要》。

丝织业呈现有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论点，那是因为他们利用了《织工对》史料，“在从周围世界抽出自己的定义之后，就完全脱离现实基础演绎出结论”^①。显而易见，这是几何学家的论证方法，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从这里，又重新提醒了我们要经常注意遵循列宁的一个重要指示：那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不应引用单个例子与单个材料”，“而是一定要引用所有关于一切……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因为“在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的情形下，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单个事实来证实任何一种意见的”^②。

大家都知道，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问题，乃是中国社会经济史上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它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和特点，还需要各方面从现有的基础上把问题的研究提高一步，然后取得应有的科学的结论。本文仅在这两方面提出了问题：第一，论证《织工对》史料不能说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只是证明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的萌芽，不是开始发生于十四世纪五十年代间的杭州丝织业中；第二，以《织工对》为例，说明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运用史料和解释史事时，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论证的问题既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而又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只有这样，才可以克服对经济史的研究中存在着把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近代化”的一种倾向。

〔原载《经济研究》1958年第4期〕

^① 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6页。

^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法文版与德文版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82页。

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①

傅筑夫

(一) 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和萌芽的具体过程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②所以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在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内孕育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开始，这种生产方式，简单说，一方是占有生产资料因而也就占有货币和生活资料的有产者，一方是不出卖自己劳动力便不能生存的、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即无产者。有产者剥削无产者，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剥削关系，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建立的基石。

当资本主义的因素在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内开始萌芽时，或者表现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与雇佣工人；或者表现为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直接控制了生产，出现了商人雇主（或称包买人）和与之相连的“散工制”（Part-

^① 作者曾有《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一文，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对该文作了较大的修订和补充。

^② 《资本论》第1卷，第783页。

ing-outsystern)，从而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因此，商品经济（包括商品生产和发展了的商品流通——商业）的高度发展，乃是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历史前提。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最初只是在个别地区或个别生产部门中出现，即有多数雇佣劳动者在同时、在同地、在同一资本命令下生产同种商品，那时的雇佣劳动者还只是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实质上隶属于资本家；只有在必需的历史条件具备了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在社会生产中大量地、普遍地和经常地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在社会生产中确立其统治地位。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①

恩格斯所说的“雇佣劳动”，不言而喻是指在高度发展了的商品生产中的雇佣劳动制；而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不管什么性质的雇佣劳动，只要一出现雇佣劳动，就“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忽视了这一点，就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雇佣劳动制，在欧洲的产生时期是非常清楚的，在达到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以前，农村中有庄园制度的束缚，城市中有行会制度的束缚，那时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工资劳动者阶级没有产生的可能。马克思说：“雇佣工人阶级是在十四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它在当时和后一世纪内只占居民中很小的一部分；……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只是形式上的，就是说，生产方式本身还不具有特殊的资本主义的性质。”^② 中国的情形就非常特殊，因为早在春秋时期就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1页注文。

^② 《资本论》第1卷，第806页。

出现了雇佣劳动制，到战国年间就更为普遍，所谓“佣”、“庸赁”、“庸客”、“庸夫”、“流庸”等等即屡见于先秦的记载中，例如：

桓公之平陵，见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公问其故，对曰：吾有子九人，家贫无以妻之，吾使佣而未返也。①

齐闵王之遇杀，其子法章变姓名，为莒太史家庸夫。②

范雎曰：臣为人庸赁。③

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圯而正畦陌畦畴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糞且美，钱布且易云也。④

雇佣劳动制既已普遍实行，故早在战国年间即已有了出卖劳动力的固定市场，即所谓“佣肆”：

庄周贫者，往贷粟于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来而献之。周曰：……今周以贫故来贷粟，而曰须我邑粟来也，而赐臣即来，亦求臣佣肆矣。⑤

到了秦汉时期，雇佣劳动已成为各种生产劳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有关记载亦非常多，这里仅酌引数例：

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注：谓庸作于酒家，言可保信，故曰“庸保”。⑥

-
- ① 《说苑·贵德》。
② 《战国策·齐策》。
③ 《史记》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
④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⑤ 《说苑·善说》。
⑥ 《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注：师古曰：佣耕谓受其佣直而为之耕，言卖功佣也。①

始梁王彭越为家人时，尝与〔栾〕布游，穷困，赁佣于齐，为酒人保。②

〔儿宽〕受业孔安国，儿宽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及时时闲行佣赁，以给衣食。③

丞相匡衡者，……家贫，衡佣作以给食饮。④

欧洲到了十四世纪后半期方才稀疏出现的雇佣劳动制，中国则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到汉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再是稀疏的偶然现象，在汉代的各种大规模经营的企业中，如冶铁、煮盐、铸钱等工业，都是大量地使用雇佣劳动。从下引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所有的劳动者都是来自四方的自愿受雇的“自由”劳动者：

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濞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⑤

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⑥

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

①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并见《汉书》卷三一，《陈胜传》。

② 《史记》卷一〇〇，《李布栾布列传》。

③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

④ 《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补遗》。

⑤ 《盐铁论·错币》。

⑥ 《史记》卷一〇六，《吴王刘濞列传》。

坟墓，依倚大家。^①

上引文中所谓“山东奸猾”、“天下亡命者”、“放流人民”，正说明这些人的人身是自由的，所以他们能够“远去乡里”、“依倚大家”。这些现象的形成虽然有其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但是如与欧洲的历史比较起来，却是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绝不可以孤立地只以雇佣劳动的有无，来作为判断资本主义是否萌芽的标准。

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首先是在地中海的沿岸城市出现的。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②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为什么首先在地中海的沿岸城市出现和怎样在那些城市出现？马克思没有进一步说明。不过把那些沿岸城市的情况一加考察，就可以看出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会首先在那里萌芽和怎样在那里萌芽。

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本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但是封建时代的欧洲，工商业在城市行会制度的严格控制下，不可能自由的和充分地发展，特别是行会的各种严格管制，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彻底堵塞向资本主义转化的一切渠道。马克思曾指出其中的一点说：“行会的规章严格限制一个行会师傅所能雇用的帮工的人数，有计划地阻止了行会师傅变成资本家。”^③行会除了限制各个营业者所能使用的职工人数和合伙经营外，还严格禁止外部资本的侵入，特别是商业资本的侵入，从而阻止了商业资本

① 《盐铁论·复古》。

② 《资本论》第1卷，第784页。

③ 《资本论》第1卷，第397页。

向产业资本的转化。马克思说：“行会竭力抵制商人资本这种与它对立的、唯一自由的资本形式的任何侵入。商人可以购买任何商品，但是不能购买作为商品的劳动。他只许充当手工业产品的订购人。”^①可见在行会制度严格控制下的工商业中，是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的。

马克思所说的地中海沿岸城市，主要是指威尼斯、热那亚、佛罗棱萨等几个城市，其中尤以威尼斯为最重要。它在中世纪初，还是一个荒凉的海滩，后来一些逃避宗教迫害的工商业者聚集在这里，遂逐渐发展成为工商业中心。由于这里根本没有行会制度的束缚和它的特殊的地理条件，故工商业能够充分发展。其他沿海城市，也都是从中世纪早期以来一直垄断着东西方贸易，成为中世纪欧洲的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很早就冲破了行会的束缚，到十四世纪初年时，这些城市就有了专业化的商业，如专门经营布匹的布商和染整商，有经营各种香料、珠宝、丝织品等等的贩运商，有银钱兑换和汇票商等等。发达的商业是引导各种旧的产业向资本主义经营转化的前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商业是行会手工业、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封建农业转化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前提”。^②

由于这个地区的商业特别发达，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许多商号不仅从东方、从欧洲进行大规模的商品贩运，而且以其商业资本直接控制了商品生产。例如威尼斯，它除了大规模的商业外，也相应发展了工业。由于它经营大量海上贸易和拥有大批商船队（十四世纪时威尼斯约有三千艘商船），因而它的造船工业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397页。

② 《资本论》第3卷，第378页。

非常发达；其次，威尼斯的丝织工业也很发达；此外，它还有棉织工业、亚麻工业、呢绒、武器、玻璃、蜡烛、镜子等工业。它为了发展自己的工业，曾从希腊运入大批的丝织工匠，并从欧洲各国招募了许多逃亡工匠。它所生产的商品除运销欧洲各地市场外，大都运往东方。

另一个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是佛罗棱萨，它由于缺乏港湾，在海上贸易方面不能与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相竞争，所以它的发展是在金融业和工业方面。由于意大利商人经常转贩于众多的外国市场，需要大量的金钱兑换，以及用汇票方式清偿他们相互间的账目，故大大发展了银行业，从十三世纪末年起，佛罗棱萨的银行业就在西欧金融市场上居于统治地位，到了十四世纪，佛罗棱萨的银号在百家以上，经营银钱兑换、转运贵金属，进行商业放款、船运保险，并接受存款及经营各种政治性的放款业务。其中有几家大银行如比鲁齐（Peruzzi）、麦地西（Medici）等，都是势力雄厚的国际银行。通过他们的广泛业务活动，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佛罗棱萨除了有全欧规模的银行业外，并有独步全欧市场的工业。它的商业虽不及威尼斯和热那亚，但它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却充分利用了意大利各城市商业发展的形势，来建立毛织和丝织工业。佛罗棱萨的工业制造品很早即驰名欧洲，其技术造诣之高，常常达到惊人的程度，甚至有人认为佛罗棱萨人是无所不能的。早在十三世纪，佛罗棱萨就已经是欧洲呢绒工业的中心，在十四、十五世纪，它的呢绒在西欧市场上是所向无敌，并大批运往东方。

地中海沿岸城市的工业，由于直接联系着广大市场，所以大

都控制在专业商人之手，其控制方式，一是使许多独立小生产者给他们作定货生产，他们把原料分散于不同的手工业者，进行不同程序的加工，直到最后完成而可以运往市场为止，这就是后来的散工制，亦叫做商人雇主制。这时生产者已经不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在自己的原料上加工，然后出售自己的制成品，而是在商人的命令下——亦即在资本的命令下、在商人的原料上加工，然后换取工资。事实上，生产者已经成为一个出卖劳动力的工资劳动者了。尽管形式上他还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者，他还是在自己的原来工作场所进行工作，还是使用自己原有的工具，但是他的独立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马克思说：“亚麻外表上和过去完全一样。它的纤维一根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一个新的社会灵魂已经进入它的身体。”^①因为一个新的生产方式从这里开始萌芽了。

另一种控制方式，是由商人设置作坊或工场，把原来进行加工的小生产者招募到工场中来，这是在上述散工制的基础上，为了避免分散原料，收集成品之烦，把各种工匠（如呢绒业的纺工、织工、染工、剪工、整工、印花工等等）招募在一起来进行生产，于是资本主义的手工业工场出现了。在1338年左右，佛罗棱萨约有这样大型呢绒工场二百家之多。这就是十四、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城市所稀疏看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

这种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十五世纪时又可以在低地国家的沿海城市中稀疏地看到。因为这个地区是欧洲另一个重

^① 《资本论》第1卷，第816页。

要的商业中心，其港口是北欧与中南欧以及东方贸易的总汇，大城市如布鲁日、根特、伊普尔、安特卫普等，其繁荣情况与上述地中海沿岸城市相仿佛。佛兰德斯的呢绒大致可以与佛罗棱萨的产品相媲美，是这个地区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为了适应广大市场的需要，呢绒业与商业资本的联系是密切的。所以在低地国家的沿海城市中，可以看到与地中海沿岸城市大致相同的情况：规模宏大的商号、金融机构、大型的手工工场。雇佣劳动制就是随着这些情况的出现而出现的。

地中海的沿岸城市和低地国家的沿海城市，虽然在十四、十五世纪时先后有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并且低地国家的资本主义萌芽还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那里的萌芽并没有成长壮大起来，后来都随着客观条件的改变，特别是地理大发现以后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使那里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相继夭折，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是由这些城市的最初萌芽成长起来的。

从以上所述，可以总结出两个要点：（一）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是产生在行会的控制力量特别薄弱的地方，或者是根本没有行会的地方（如威尼斯），因为只有在没有行会的阻碍和干扰而商品经济能够充分发展的前提下，才能由商业的发展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起到“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①的作用，使商业资本能够自由地转化为产业资本，并使雇佣劳动制成为必要。（二）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还远远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也不是必然能够诞生的保证，不过只是显

^① 《资本论》第1卷，第322页。

示了有此发展的可能性而已，能不能由萌芽成长壮大起来，并诞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取决于商品经济能不能继续地、累进的发展。地中海和低地国家沿岸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夭折，是因为他们的商品经济的发展陷于停滞或者中断了。

（二）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

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历史前提。马克思说：“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①因此，要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概况。

商品经济包括商品生产与商业，商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开端。因为最初总是“产品在这里是由商业变成商品的，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②在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封建社会里，商业是引起封建自然经济各种变化的起点。

中国的商业早在战国年间就已经相当发达，商业资本也有了大量积累。到了秦汉时期，商业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关于这一时期的商业发达情况，本书已多所论述，这里不再重复。大体说来，中国古代商业，自战国秦汉历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在漫长的岁月里，虽然是经常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波动起伏而盛衰不常，但在各个历史时期，就当时整个社会经济所达到的发展水平

① 《资本论》第1卷，第167页。

② 《资本论》第3卷，第306页。

来看，商业的发展都是极为突出的。不过就商业的性质而言，不论是国内商业还是国外商业，基本上都是贩运贸易。不用说从海外贩来的“奇石异物”、“明珠琉璃”、“香药宝货”等等的奢侈品与国内产业无关，就是在国内贩运的主要物品，据历代史籍所载，也都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现成品——各地方的特殊物产，这些物品的生产不因商业的有无而改变，在这里，显然是商业发展了它们的商品形态，而商业资本却没有侵入生产过程，去支配生产。例如《史记·货殖列传》和《盐铁论》都于历数各地方的特殊物产和著名物产之后，指出所有这些“养生送终”之具，都是“待商而通”^①，而商业的主要作用，亦完全在使“财物流通”，使“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匮。”^②可见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还都是独立的，“生产过程还没有把流通作为单纯的要素吸收进来。”^③

商业既然基本上还是贩运贸易，则它所发挥的作用便是侵占、欺诈和掠夺，而被掠夺的民族、国家或生产部门，必然随着商业的发达程度而相应的萎缩下去。因此它的发展，正侵蚀着和动摇着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威胁着统治阶级的政权安定，促使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以各种方法来扑灭这个突起的破坏力量。另一方面，这种贩运贸易既没有把基础建立在生产过程上，而仅仅浮在社会的表层，仅仅辗转于流通之中，因而它就如一棵无根之草，很容易被封建王朝抑制下去。这就是中国古代商业突起突落的主要原因。所以，贩运贸易不但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的历

① 《盐铁论·本议》。

② 《盐铁论·通有》。

③ 《资本论》第3卷，第367页。

史前提，反而会促使社会经济萎缩，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①所以中国的商业虽然发达很早，但是对整个社会经济所起的却是消极阻碍作用。

唐代是从这种古代型的贩运贸易开始向近代型商业转变的过渡期，一方面，虽还保持着自古以来历久相沿的传统，另一方面，商业的性质已与过去显著不同。首先可以指出的，是由过去的偶然交换和特产品贩运，发展为固定的城市商业，有了经常开设的肆和店铺；同时商业内容也有了一些变化，即由特产品、奢侈品的贩运，转向于出售普通日用品。其次，由于商人不再是临时聚合，而有了固定的市肆或店铺，所以唐代商业有了一定的组织形式，工商业者的“行”就是从唐代发展起来的，虽然在性质上和作用上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行会，但却是行业专门化的结果，即某一种行业专门从事某一种商品供应，如见于唐人著述中的肉行、衣行、靴鞋行、秤行、绢行、熟行、药行、金银行、鱼行等等，经营都是日常消费品。唐代城市中的行，种类很多，例如西京（长安）的东西二市，各有二百二十行，东京（洛阳）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都是“货賂由积”。这些行不完全是纯商业组织，其中有不少是自行制造、自行销售的手工业行，即作坊店铺，《唐六典》称之为“玉作贸易者”。在市内开设店铺的“工作贸易者”，所销售的当然都是自己制造的商品，不再是从远地运来的奇珍宝货，这说明商品生产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唐代都市中除普通商店外，还出现了杂货铺、邸店、柜坊。邸店

^① 《资本论》第3卷，第367页。

是兼营货物存放批发和银钱保管拨兑的货栈，经营者是一种资本雄厚、经营大宗贸易的中间商人。当时是“邸店遍海内”，大小都市无不有此类组织。柜坊则是由兼营金融业务的邸店分化出来，专营代人保管财物的。当时邸店柜坊既遍海内，则各地货款往来就可以互相拨兑，不必完全运现，因而又产生了汇票制度，这就是唐代的“飞钱”或“便换”。这些金融机构的大量出现，充分反映了唐代商业的发达。此外，唐代除了都市商业有了大量发展外，农村中还有各种形式的定期集市，如“草市”、“村市”、“墟”、“药市”、“蚕市”等等。

唐代国内商业的发展，在其货币制度的发展中亦可充分反映出来。唐以前曾长期杂用铜钱、布帛和谷粟，唐代已经开始由实物货币向贵金属货币（白银）过渡。唐代的日常交易和一般价值支付虽仍然杂用铜钱与布帛，但是白银已开始公私经济生活中日益显示其重要性，而岭南州郡已完全用白银为币：“五岭，买卖一以银”^①，中唐以后，白银已普遍流通。这说明了当时的商业已向前进展了一大步。此外，唐代的水陆交通都非常便利，政府更锐意开凿运河，发展漕运，除“岁漕东南之粟”以给京师外，南北货运亦赖以畅通无阻。交通的开发和便利是商业发达的结果，同时又是促使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唐代的对外贸易也开始有了大量的发展。陆上贸易主要是与接境的国家或部族如回纥等的边缘互市，中国商人向这些地区输出大量的丝织品、珠宝、金帛、铜器、铁器等等，有时因输出太多，政府还加以阻止。经营这种贸易的商人，无不大发其财。例

^① 韩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三七，《钱重物轻议》；参见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三四，《钱货议状》：“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

如武则天时（公元684年—704年）的裴旻先就是一个典型，他“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①此外，回纥和西域“商胡”亦多深入内地，甚至穷乡僻壤亦有他们的足迹。唐代海上贸易在中国贸易史上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后来长期发达的市舶贸易即始于唐。当时经常来华贸易的有日本、新罗、南海诸国、印度、波斯、大食（阿拉伯）等，其中尤以阿拉伯为重要。阿拉伯商人大都航海而来，由波斯湾经印度，绕马来半岛，以抵广州，然后再由此分往交州、扬州、泉州。此外若福州、明州、温州以及苏州之松江等地，亦都是当时重要的贸易港。外商来者既多，且复散居内地，唐朝政府为了搜罗珍奇和抽取商税起见，于是在开元初设置市舶使以掌之^②。其后贸易日盛，市舶之利遂为国家财政的一大收入。贸易既非常发达，外商来者必日益众多，当时重要通商都市，无不有大批外商常川寄居，且可“列肆而市”，广州因寄居的外商过多，特划定一个区域，谓之“蕃坊”，供外侨居留，并有“蕃长”以管理外国商人。^③从上述概况，可见唐代海外贸易之盛。

在国内外商业日益发达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都市的繁荣。唐代除两京外，在水陆交通的要道上出现了很多繁华的商业都市，其中尤以广州和扬州为唐代最大的国际市场，其繁华之状见于唐人小说或诗歌中的实多不胜举。

发达的商业是发展商品生产的前提条件，唐代既然有了相当发达的国内外商业，并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资本，则商品生产为了

① 《太平广记》卷一四七，〈裴旻先〉。

② 市舶使之名，最初见于《新唐书》卷一一二，〈柳泽传〉。

③ 李肇：《国史补》卷下，〈南海舶〉。

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必然会跟着发达起来，商业资本也必然要逐渐向产业渗透，开始向产业资本转化。因此，在唐代，无论在农业方面或城市手工业方面，都出现了与资本相结合的商品生产。以农作物的商品生产为例，唐代正在开始产生着如列宁所指出的“建立了农业的日益专业化的区域（和农业经济体系）”^①的过程，其中茶叶的栽培与焙制就是一个很突出的典型。

中国人的饮茶习惯至唐而开始普遍，中唐以后，茶几乎成为人人必需之物，嗜好之切，无异米盐，故当时“周流天下”的富商大贾，很多都是茶商。茶不仅在国内有广大市场，而且远销于国外，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互市”即始于唐^②。茶既是一种有国内外广大市场的重要商品，所以也就有了种茶的专门化的农业区域，史称唐代已有十五个名产茶区^③。同时，茶的栽培也成为产茶区农民的主要职业，如祁门一带，“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大家都靠茶来“给衣食，供赋役”^④。他们种茶不是当作使用价值来生产的，换言之，他们所生产出来的茶并不是生产者本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是完全为供应各地市场的商品。经营茶园的农户，大都是资本所有者，他们使用雇佣工人来经营，其中规模较大的茶园，在采茶季节常常雇佣工人达百名以上。例如，“九陇人张守珪，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工者杂处园中……。”^⑤象这样大规模的茶场当然不限于四川九陇一地，其他名茶产区的情况亦必大致相同。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18页。

② 参见《新唐书》卷一九六，《陆羽传》。

③ 参见李肇：《国史补》卷下。

④ 《全唐文》卷八〇二，张途：《祁门县新修间门溪记》。

⑤ 《太平广记》卷三七，《阳平谪仙》。

经营茶园的农户，一般都兼营焙茶的作坊。焙制茶叶所需的技术工人多来自各地，他们都是工资劳动者，到了制茶季节，他们成群结队地到产茶区去出卖劳动力，工作完毕后，他们应得的工资有时即以茶来支付，他们也往往兼作茶贩，顺便运一点茶到各处贩卖。例如，“唐天宝（公元742—756年）中，有刘清真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至陈留……。”^①

这样的情况，在同时期的欧洲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公元八世纪时还是欧洲封建社会的早期，自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城市还没有发展起独立的工商业，甚至有些城市还根本不存在，更很少使用货币，至于行会制度还要在两百多年以后才出现，这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是庄园制度，雇佣劳动制是根本不存在的。所有到十四、十五世纪方才在个别地区（地中海沿岸城市）能够稀疏看到的现象，在中国的唐代不但已经看到，而且已经不是什么新奇的现象了。因为商业的发展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雇佣劳动制也是古已有之，并且早已普遍实行了。所以在唐代，当商品生产随着商业的发展而有所发展时，使用社会上早已在实行的雇佣劳动，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也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这种以商品生产与雇佣劳动相结合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农业中，而且更多地出现在工业生产中。

唐代的工业结构和过去历代的情况相同，官工业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而唐代的官工业比过去历代又有了更大的发展，无论在制度上或设官分职上，都比过去历代为明确，至其门类之多、规模之大，又远非过去任何一代所能比拟。关于唐代官工业的具

^① 《太平广记》卷二四，〈刘清真〉引〈广异记〉。

体情况，本书已另有专文论述^①，这里从略。官工业不是商品生产，它制造出来的物品不是为了出卖，所以官工业的发展不但不能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它还垄断了许多部门，占有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独占了许多技术成就（占有当时最高的生产技术，并“禁示于外”。）统治阶级的公私需要，本来是工业制造品的一个最大主顾，当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消费品都由官家自行制造，而不通过公开市场，不由购买获得，则私人可能经营的项目已为数不多，而且市场也大大缩小了，结果遂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至于为实行禁榷制度而经营的官工业，其产品如盐、铁（农具）、酒、矾等虽然是作为商品出卖，但是经营的目的并不是要发展这些工业，而是借以剥削消费者，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达到重本抑末（即工商）的目的。这样一来，最有大量发展可能的工业部门被政府垄断，则一般的商品经济自然就难以发展了。不过官工业毕竟是一种大规模经营的手工业，所使用的工人数目既较多，而产品的数量亦较大，故在官工业中最早出现了协作和分工，提高了生产技术，所以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对于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对于社会上同类生产部门还是有一定的刺激或示范作用。

唐代官工业虽然在当时的工业结构中占统治地位，并妨碍了一般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它并不能完全堵塞住私营手工业的发展道路，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仍能随着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达，从层层障碍的夹缝中找到前进的出路。

唐代的手工业除官工业外，基本上都是商业生产。我们知道：

^① 参见《中国经济史论丛》中《抑商政策的产生根源，贯彻抑商政策的三项制度及其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第六节。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而社会分工在唐代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即不仅工业与农业已分离开，工业不再是农村副业，而且在工业中也已经有了部门分工和地域分工。例如唐代的纺织业，不仅与其他手工业分离开来，而且丝织业、麻织业、毛织业等等部门也都清楚地分开，即在同一部门中也还有显著的地域分工，各有其特殊的产品，这由唐代的土贡^①中可以略窥其梗概。所以从唐代开始，“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②

从组织形态上看，唐代的手工业一般说来都是小商品生产，即小经营方式。但是由于中国城市的性质与欧洲的不同，中国历代的城市不但不是独立于封建统治体系之外的一个自由的和自治的城市，而且是实施封建统治的一个中心环节，在这样的城市中不可能产生欧洲型的行会制度。正由于缺乏这种同行的组织力量的束缚，中国的工商业者尽管一方面受着封建礼法的种种干涉和管制，但在另一方面却获得了西方工商业者不能获得的自由，只要有能力、有资本，便可以任意扩大经营规模，而不会受到同行的干涉和阻挠。所以，在唐代就出现了同时期欧洲不可能有的大型作坊和手工工场，例如：“唐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裘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织机五百张。”^③这段记载虽然非常简略但也能清楚地看出何明远是一个资本所有者，而不是一个直接生产者。他是一个主管驿站的小吏，同时又开设旅店，接待商胡旅客。他的“资财巨万”的“大

^① 参见《抑商政策的产生根源，贯彻抑商政策的三项制度及其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五节。

^② 《资本论》第3卷，第718页。

^③ 《太平广记》卷二四三，《何明远》。

富”，显然不可能由驿吏俸禄或旅客宿费来形成，而只能由经营拥有五百张绫机的大工场的利润积累而成。唐代的定州是有名的丝织业中心之一，到宋代仍然盛产花绫和“刻丝”。何明远既然是“大富”，有充足的资本，他在盛产丝织品的定州开设大规模的织绫工场，招募当地有织绫技术的工匠到他的设有绫机的工场中来，在他的资本命令下进行生产，是非常自然的。当然，这种情况在有行会制度束缚下的欧洲城市中是不可能产生的，但是在没有那种行会制度的中国历代城市中则是完全可能的。并且这种情况，在唐代已经不是偶然一见，而是屡见不鲜。下引一段故事，更可以说明这种情况：

上都通化门长店，多是车工之所居也，广备其材（同材），募人集车，轮、辕、辐、毂，皆有定价。每治片鞞，通凿三窍，悬钱百文，虽敏手健力，器用利锐者，日止一二而已。有奚乐山者，携持斧凿诣门自售，视操度绳墨颇精。徐谓主人，幸分别鞞材，某当并力。主人讶其贪功，笑指一室曰：此有六百片，可任意施为。乐山曰：或欲通宵，请具灯烛。主人谓其连夜，当倍常功，固不能多办矣，所请皆依。乐山乃闭户屏人，丁丁不辍。及晓，启主人曰：并已毕矣，愿受六十缗而去也。主人洎邻里大奇之，则视所为精妙，辘铢无失，众共惊骇，即付其钱，乐山谢辞而去。^①

从这一段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以下几点：

（1）这是一个制造车的手工工场，开设这个工场的“主人”，显然是一个能“广备其材”的资本所有者，全部生产过程

^① 《太平广记》卷八四，《奚乐山》引《集异记》。

是在同一资本命令下进行的，所以这是一种雏形的工场手工业。

(2)这个工场内部已经在实行着简单的技术分工，即把车的全部制造过程，分为轮、辘、辐、毂等几个不同的工序，而各成为一个特殊的部分劳动。尽管分工的方法并非新创，仍然是“古之为车者，数官而后成”的遗制，但这是在一个工场内部实行的有协作的分工。

(3)在工场内工作的劳动者，都是应募而来的工资劳动者，实行着计件工资制度，是一种具有近代意义的雇佣劳动制。各个劳动者谁具有超越别人的技术，谁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谁就可以获得超越别人以上的报酬，甚至可以高出若干倍。

(4)劳动者都是原来的独立生产者，他们不但有生产技术，而且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只是加工对象——原料不再是自己所有，而是在“主人”的原料上加工。这种用自己生产工具在别人原料上加工的散匠，与欧洲十五世纪时商人雇主控制下的家庭工业所实行的“散工制”，基本上是相同的。

总之，雇佣劳动制在唐代已经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普遍实行的一种制度。不仅一般商品生产的工业中所有的工人都是雇佣工人，而且连政府主办的各种官工业，也在大量地“和雇”工匠，特别是需要一定工艺技巧的工业制造，更非“和雇”高手匠人不可。有关雇佣劳动的记载见之于唐代文献中的，有梓人（建筑工人）、木工、女红、井工、舆作、车工、金银作，以及脚力和家庭佣仆等等^①。其雇佣方式有按日计值的，名曰佣人，有按

^① 梓人，见柳宗元《梓人传》，《柳河东集》卷十七；木工、女红，见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二，续集卷三；余见《太平广记》卷八四，二四三，一三四，七四等。

月计值的，名月佣人或月作人，有按件包工的。受雇的工匠多系自备工具。有些劳动者自己沿门去寻找雇主；有些则在固定的场所等待雇主来招雇，这种场所，唐时称为“佣作坊。”^①

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同时期的欧洲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的，这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中的许多特殊问题之一。尽管唐代还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高峰时代，但是已经在这个经济结构的胎内孕育着资本主义因素的最初萌芽。如果由于这时它还是“个别地和分散地”^②形式下出现的，那么，把这些现象看作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历史前提，则是毫无疑义的。

自晚唐以迄五代，中国长期陷入封建割据与军阀混战之中，社会经济发生了一次巨大波动，直到宋初，长期的大混乱和大破坏方才停止。在宋代统治者所采取的安定农村、奖励生产等等一系列的政策之下，残破的社会经济得到一个喘息恢复的机会，经过一个相当时期之后，便又恢复和发展起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在宋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宋代的国内商业，其规模远大于唐代。就都市商业而言，唐代两京以至州县仍保持着自古以来的市坊制度和日中为市的遗习，政府对商业的干涉和管制也较多，市场限于一定的地点，聚散有定时，市中商店货肆必须以类相从。政府根据该市所属都会之等级而委任大小不同的市令、市丞等官吏，用以管理商人和征收赋税。入宋后，随着市坊制度的消灭，撤除了历久相沿的一切限制，使整个城市面貌转化为近代型，于是都市商业得到了自由

① 《太平广记》卷七四，〈陈生〉。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1页，恩格斯注。

发展。例如：北宋首都汴梁，其中热闹街道如南通巷，“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子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①其他街巷也到处有形形色色的商店以及酒楼、饭馆、货摊等，大小商贩人等日夜在进行交易，因此有晓市、夜市和“鬼市”等。都市中除常设的商店和货摊外，还有定期的庙会，东京相国寺的庙会，可视为这类市场的典型。到了南宋，由于江南一般社会经济的发达，都市商业比北宋时又有了显著的进步。例如南宋行在杭州，“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见钱，谓之看柴钱，……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谓之珠子市，如遇买卖，动以万数。又有府第富豪之家质库，城内外不下数十处，收解以千万计。……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每日侵晨，两街巷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盖杭城乃四方辐辏之地，即与外郡不同，所以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至于故楮羽毛，皆有铺席发客，其它铺可知矣。其余坊巷、桥道、院落纵横，城内外数十万人口，莫知其数。”^②城市中除普通商店外，有种类繁多的作坊商店，生产着形形色色的商品，工商业各按行业组成团行^③。货物的供应，除“江南海贾，……四方百货，不趾而集”^④外，有些铺家还自行掌握货源，组织运输，进行趸买批发等活动。一般小贩，则是从作坊“行贩已成之物”^⑤。于此可见南宋都市商业之盛。

①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

②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铺席》。

③ 同上书，《团行》。

④ 同上书，卷十八，《恤贫济老》。

⑤ 周密：《武林旧事》卷六。

宋代的地方性商业亦远比唐代为发达，而南宋又盛于北宋，例如唐代的草市，到了南宋期间很多发展为镇市，有的发展为全国性的大镇。镇在宋初还都是驻军地点，到了南宋时大都变为商业兴盛的地方市场，有些交通要冲的市镇，其繁华程度往往不下大都市^①。宋代国内商业如此发达，必然会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

宋代的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两宋的对外贸易，虽然在性质上是唐代市舶贸易的继续，但是在通商的范围上和贸易的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唐代，南宋尤为这种贸易全部历史的鼎盛期。宋初只在广州设市舶司，后来又于明州、杭州置司，故当时有三司之称。据日人藤田丰八的考证，北宋设市舶司或市舶务的，计有：广州、泉州、明州、温州、杭州、秀州、江阴、密州及传闻曾置市舶场之激浦，共九港^②。然海舶辐辏之处仍以广州为首，各港税收亦以广州为最多。通商的国家 and 贸易的内容是：“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朥、沙里亭、丹厝流，并通贸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磁器、市易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钿、宾铁、鼈皮、玳瑁、玛瑙、车渠、水晶、蕃布、乌楠、苏木之物”。^③到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贸易中心逐渐由广州转移到泉州。南宋建都杭州、泉州为距首都较近的一个出海港，而政府因财政困难，一切倚办海舶，故奖励招徕，不遗余力，因而对外贸易遂大量发展，当时来

① 参见陆游：《入蜀记》卷四，〈乾道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范成大：《吴船录》卷下，〈熙宁四年八月辛巳〉。

② 参见藤田丰八：《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条例》，《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第253页。

③ 《宋会要稿》，〈职官四四之一〉。

中国通商的有五十余国，输入的商品有数百种，除香药宝货等奢侈品外，还有各种布匹、染料、棉花、贵重木材等。当时因输入的数量过多，输出不足以抵补，致造成金钱外泄，引起国内严重的金融恐慌。这样繁盛的贸易，一直继续到元朝末年，所以元初马可波罗和稍后伊本·巴都塔到泉州观光时，都叹为乃当时世界的最大海港，贸易量要超过亚历山大港或他港百倍以上。尽管这种贸易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它却促进了货币资本的积累，并刺激了国内商品生产的发展。

宋代的商品生产，是在唐代已有的基础上又往前发展了一大步。在农业商品化方面，基本上与唐代类似，茶还是一种销行国内外市场的主要商品，但是在经营的规模上、制造的技术上和运销的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唐代。由于茶的运销量巨大，收入可观，故宋代政府把茶的产销完全收归官营，建立了“榷茶”的官卖制度，政府除自设茶园——“山场”和焙茶作坊——“官焙”外，并于全国各重要产区设置榷货务都茶场，来收购私营的“民茶”，并进行统销。仅在东南地区，北宋时产茶的州在三十五个以上，南宋时产茶的“州六十有六，县二百四十有二”。^①产茶区的不断增多和扩大，说明茶的生产在继续发展。从经营的规模上来看，宋代无论公私茶园和作坊，一般都比唐代为宏大。到了采茶季节，都雇佣大批工人来进行采摘和焙制。茶叶加工的作坊，尤其是官焙，很多都是大型工场，有时还使用水力发动的机械——水磨，来进行茶的加工^②。凡是使用水碾水磨来研磨茶叶

^① 《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

^② 宋时水碾水磨不仅通行于南方产茶区，在京师开封一带，亦利用汴水修置水磨，后又推行于河南河北一带，参见《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

的，都是大型的作坊或工场，使用较多的工人。从生产技术上来看，宋代各产茶区都有所谓“绝品”，其采择之精，焙研之工，品味之胜，都远出唐茶之上，制茶的工人多是有特殊技术和多年经验的专门工匠。就是一般行销最广的普通茶，也都是品类繁多，一类之中又细分为若干等级，价格悬殊。凡此种种，都说明当时茶已经是一种日益高度发展的商品生产，而不再是一种农村副业了。

糖是从宋朝开始普遍销售的新商品，成为茶以外一种经过加工而商品化的农产物。其主要产区有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等五郡，尤以遂宁产量最大，品质也最佳：“四郡所产甚微而碎，色浅味薄，才比遂宁之最下者”。^①遂宁一郡到处都是蔗田，有的专门生产原料，甘蔗成熟后榨出糖水卖与熬糖户；有的兼开作坊，称“糖霜户”，除用自己的原料外，并收买蔗农的糖水熬制糖霜（冰糖），其下脚料则熬制砂糖。制糖业虽然还与农业有密切联系，但是它本身却是一种专门性的工业，亦即使农业本身变成了工业，变成生产商品的经济部门，并且引起农产品之间的交换。特别是制造糖霜，既需要一定的技术，也需要相当多的生产工具，计有蔗镰、蔗凳、蔗碾、榨斗、枣杵、榨盘、榨床、漆瓮等等以及牲畜和其他设备，所以糖霜户都是富有资本的“上户”。到了熬糖季节，各糖场都需要雇用二十多名工人，在加工程序上还多少有一点简单分工：削皮、锉蔗、入碾、蒸粕、煎糖水^②等等。

宋代的手工业，无论在经营规模上或生产技术上，都远比唐

^{①②} 王灼：《糖霜谱》，《原委第一》。

代为进步。从组织形态上看，宋代的作坊工业已有了普遍发展。小贩们由作坊行贩的“已成之物”，自糖果点心到衣服、冠帽、家用杂物、文房用具、妇女装饰、儿童玩具等等，无所不有，见于文献记载的不下百余种^①。每一类商品都有专门制造的作坊，可见都市中作坊之多。宋时的作坊有时单称为“坊”，也有称为“作”、“行”、“铺”或店的，名异而实同。在这些作坊中有的因营业发达而发展为大型作坊或手工工场，并实行着一定程度的分工，即使是一个普通的饼店，亦能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例如在北宋年间，东京即有这种工场手工业式的饼店：“凡饼店有油饼店、有胡饼店。若油饼店，即卖蒸饼、糖饼、装合、引盘之类。胡饼店即卖门油、菊花、宽焦、侧厚、油锅髓饼、新样满麻。每案用三五人捍剂、卓花、入炉，自五更卓案之声，远近相闻。唯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②由于都市中没有欧洲型的行会制度，所以在商品生产发达的情况下，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分化现象是十分显著的。

宋代的各种手工业都远比唐代为发达。宋代的坑冶业（采矿冶金工业）与唐代相比，不但产区增多，而且矿场的规模都比唐代为宏大。矿冶系由私人经营，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名曰岁课，唐元和（公元806—820年）初岁课铁二百零七万斤为最高额；宋代铁产有四监、十二冶、二十务、二十五场，皇祐（公元1049—1053年）中岁课铁七百二十四万一千斤，治平（公元1046—1067年）时增至八百余万斤^③。北宋时已用煤炼铁，所

^① 参见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耐得翁：《都城纪胜》等书。

^②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

^③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下七》，《坑冶》。

炼之铁已甚精良，“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①宋代的冶铁业都是大规模企业，例如徐州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镗巨万。……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醵忍之民也。……^②可见冶户都是“藏镗巨万”的大资本家，每冶雇佣工人都在百人以上，说明矿场规模之大，被雇佣的都是“饥寒亡命，强力醵忍之民”，说明这些人都是除劳动力外别无所有的无产者。

各种金属品铸造业一般都是大规模经营，铸钱业规模尤大，铸钱虽是官营工业，但其组织方式和分工办法，都是仿照私营企业办理的，例如韶州永通监是：“即韶置监，分遣金工以往模之。……模沙冶金，分作有八，刀错水莹，离局为二。……雇工于巧，凡手指之勤，筋力之用，率评价而与之金，不发帑贖，不徭民籍，而功用成。”^③又如蕲春铁钱监是：“其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钱作，末曰排整作。以一监约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铸一万缗，一岁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万缗。”^④于此可见官营铸钱业的规模之大与分工之细，其所用工人都是工资劳动者，并且是根据各人的技术熟练程度（雇工于巧），经过评议而付与工资。至于其他各种金属品制造如：“太原铜器名天下”^⑤。此外，^⑥“如浙东路绍兴府温、台、明州，浙西路临安、平江；镇江府湖、秀、常州；江东路建康府句容县、信州，福建

① 苏轼：《东坡集》卷十，《石炭行并序》。

② 苏轼：《东坡文集事略》卷三三，《徐州上皇帝书》；又《东坡奏议》卷二。

③ 《金石续编》卷十四，《韶州永通监记》。

④ 张世南：《游宦记闻》卷二。

⑤ 《宋史》卷二八一，《毕士安传附子仲游传》。

路福、泉、建州；江西路虔、吉州、丰城县、临江军新淦县等处，铸造铜器尤盛。”^①他如梧州、雷州“铁工甚巧”，“以之铸器，则薄几类纸，无穿破，凡器既轻，且耐久。”^②所有这些驰名全国并且远销国外的大宗商品，进行这些商品生产的大多数都是大型作坊，工人众多，产量巨大，为适应工作的需要，都实行着一定程度的分工。

盐业特别是井盐，都是由有钱人投资、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型企业，这由文同所述井研县的情况中可窥见其梗概：“井研县……盖自庆历以来，始因土人凿地植竹，为之卓筒井，以取咸泉，露炼盐色。后来其民尽能此法，为者甚众，遂与官中略出少月课，……广专山泽之利，以供侈靡之费。访闻毫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减七八。……今本县界内，已仅及百家。……每家须役^③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著之徒，……尽来就此，佣身赁力。平居无事，则俯伏低折，与主人营作，一不如意，则递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工直，偃蹇求去，聚墟落，入镇市，……已复又投一处，习以为业。切缘井户各须藉人驱使，虽知其如此横暴，实亦无术可制，但务姑息，滋其狡暴。况复更与嘉州并梓州路荣州疆境甚密，彼处亦皆有似此卓筒盐井者颇多，相去尽不远三二十里，连溪接谷，灶居鳞次，又不知与彼二州者工匠移人，合为几千万人矣。”^④从这个记载中可知井研等两三县的盐井，所雇佣的工人数量是很大的。他们都是除了劳动力之外便一无所有的无产者，

① 李弥逊：《户部乞禁铜器札子》，《筠溪集》卷三。

②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

③ 四部丛刊本“役”误为“没”，兹据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六六引文改正。

④ 文同：《丹渊集》卷三四，《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

即文同所谓“浮浪无根著之徒”，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佣身赁力”——来维持生活。他们在资本家——井户的剥削下，逐渐启发了阶级觉悟，知道联合起来举行罢工，来维获自己的利益，由于他们的人数很多，而井户又完全靠他们“驱使”，他们的团结斗争，使官府和井户都感到“无术可制”，不得不“但务姑息”，接受他们的条件。欧洲即使在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刚刚肇生不久的雇佣工人，实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宋代的丝织业除了传统的家庭工业外，也有很多是大规模经营的。例如曾作台州知州的唐仲友，即在其家乡婺州开设彩帛铺，既进行贩卖，又进行加工，是一个大型的作坊店铺：“仲友私家婺州所开彩帛铺，高价买到暗花罗并瓜子春罗三四百匹，及红花数百斤，本州收买紫草千百斤，日逐拘系染户，在宅堂及公廨，变染红紫。……其余所染到真红紫物帛，并发归婺州本家彩帛铺货卖。……及染造真紫色帛等物，动至数千匹。”^①朱熹的揭发如属实，则这个彩帛铺实是一个大规模的手工工场，故买进的染料一次可达千百斤，加工的物帛动至数千匹。这是商人兼营作坊或工场，亦即商业资本控制生产的实例。至于官办的丝织品工场，其规模当然更大，分工也更细，例如成都锦院，“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一十，而后足役。岁费丝权以两者，一十二万五千，红蓝紫藕之类以斤者，二十一万一千，而后足用。织室吏舍、出纳之府，为屋百一十七间，而后足居。”^②锦院所实行的分工系有协作的分工，整个生产程序被划分为不同而互相补足的

①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八，〈按唐仲友第三状〉。

② 费著：《蜀锦谱》引元丰六年〈吕大防记〉。

诸劳动过程，每个劳动者已经不是在独立地进行生产，其所生产的只是同一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并且各个阶段之间的劳动者应有的人数还有一定的比例。尽管官营丝织业并不是商品生产，但是它在生产技术上和经营方式上，对进行商品生产的私营丝织业实有很大的影响。

印刷业是在宋代开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工业。宋时除由京师国子监大量印刷经史子集等重要典籍外，以浙江、四川、福建三省的印书业为最盛。由于当时科举盛行，故书的销售量很大。此外，宋代又行使交子、会子、关子、茶盐钞引等，这样更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宋代于雕版印刷外，北宋庆历中（公元1014年前后）毕升又发明了活字版，在印刷业的发展上和文化的传播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印刷工业内部，一般都实行分工，最简单的亦分为雕工、印工、裱工三部，各部都有“作头”领导，此外，还设有校对。

宋代的磁器工业亦非常发达，产地很多，宋朝政府特设“窑务”以管理之。宋代磁器工业官营私营的都不少，其中很多是驰名中外的名窑，成为中国古代陶磁工艺登峰造极的时代。由于磁器在当时不仅有广大的国内市场，而且大量输出国外，销路广，需要量大，故各窑场的生产规模都很大；而且烧制磁器需要很多设备，非有大量资本莫办，工作也须经过很多程序，分工必然很细，各部分工人，都是具有专门技术的工匠。这些情况虽缺乏当时记载，但由后代磁器工业的情况来看，可以推知其梗概。

造船工业在宋代也是一种超过前代而有显著发展的大型工业。宋代因国内外商业发达，漕运也极为频繁，故航运业便有了普遍发展。除政府在沿江沿海城市如福州、温州、明州、华亭等

处设有造船场外，民间造船业亦极为发达，特别是航海的商舶。宋时海舶极为巨大，普通航海用的商船，载重量达二千斛以上；出使外国的“神舟”，其长阔高大则为普通商船的三倍；此外更有“万石船”，可载钱二千万贯，载米一万二千石。这些海舶的内部构造都很复杂^①。如此巨大和复杂的船舶，其建造既需要大量资本，又需要众多的具有专门技术的工人，这都不是小型作坊所能胜任的，因而可推知宋代无论公私营的造船场，必然都是大规模。

宋代大量发展的手工业当然远不止上述几种，我们在此只是择要举例，以示其发展变化的趋势。从以上所述，不仅可以看到宋代（尤其是南宋）商品生产远比唐代为发达，而且也大大超过了十四、十五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时的发展水平，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型作坊和手工工场，在宋时已经不是个别地、偶然地出现，而是大量地、普遍地存在了。并且不但私营的各种商品生产乃至各种服务性行业，雇佣劳动已成为劳动的主要形式，而且连官工业也在以雇佣劳动取代徭役劳动。因为徭役劳动生产效率很低，“匠人多系远乡农民，追呼骚扰，离家失业”^②，服役系“强被指射就役，非其情愿，故不胜忿而作难”。^③“其入役也，苟简钝拙，务阙其技巧，使人之不己知；务夸其工料，使人之不愿为，而亟其斥，且毕为之官作”。^④这种伴为愚拙、企图逃避的怠工情形，在官工业中非常严重。工役的工作效

^① 参见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四；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关于湖船江海船舰、河舟的叙述。

^②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二，〈熙宁八年夏四月己丑〉。

^④ 岳珂：《愧郈录》卷十三，〈京师木工〉。

率很低，而所需的钱米支付则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反不如劳役折价，由应役户出免役钱，然后另以工资来雇佣工人更为合算，这就是王安石“新法”中“免役法”的主旨所在。这说明雇佣劳动制在宋代普遍发展了。

总之，根据宋代的商品经济和雇佣劳动的发展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宋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产生时期。

（三）明清时代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迟滞

中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最早的国家，比欧洲约早三个多世纪，但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缓慢，这个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发展得非常迟滞。它没有象欧洲特别是英国那样，资本主义自萌芽之后，即迅速成长起来，到了十六世纪便正式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帷幕。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个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所有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①总之，“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

军东征的远征。”^①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距离这个阶段还十分遥远。当欧洲的资本主义要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世界，“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②的时候，它以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了中国的万里长城，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还依然是一种萌芽状态。

宋以后，在元朝统治下，社会经济遭受到一次严重破坏，直到进入明代，工商业才慢慢恢复起来。就纺织业来看，中国固有的丝织业如苏、杭、湖、松、常一带的丝织业都恢复了原来的繁荣，又可以看到宋元以来即已有的那种雏形的丝织工场：

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二鼓，一唱众和，其声欢然，盖织工也。……旦过其处，见老屋将压，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进而问之，……工对曰：……吾业虽贱，日佣为钱二百缗，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养吾父母妻子，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于凡织作，咸极精致，为时所尚。故主之聚易以售，而佣之直亦易收入。^③

这个工场的规模不大，织机只有四五张，雇工只有十余人，但却具备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特征。开设工场的主人是“饶于财者”的资本家，而工人则集中在主人的工场中一起工作，故能“一唱众和”。工人都是工资劳动者，工资待遇虽勉强可以维持生存，然工作时间之长至二鼓尚不停歇，以致工人都“苍然无神色”，这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初期以剥削绝对剩余劳动为主的那种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③ 徐一夔：《始丰集》卷一，《织工对》。

残酷剥削。不过工资待遇并不一律，还可以根据各人的熟练程度来定工资数额，例如上引记载中有：“顷见有业同吾者，佣于他家，受直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艺固过于人，而受直与众工等，当求倍直者而为之佣。已而他家果倍其直佣之。主者阅其织，果异于人，……退而自喜曰：得一工，胜十工，倍其直不吝也。”^①这说明当时劳动力的买卖，已经有了比较客观的标准，而劳动力的商品化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劳动者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给“倍其直而佣之”的资本家。

到明中叶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现象是非常显著的，这是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这里可以举苏州吴江县盛泽镇的丝织业者的情况为例，因为这里是：“镇上居民稠广，……俱以蚕丝为业，络纬杼机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轴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轴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②在这个丝织业专业市镇中，织户已有大户小户之分，有些织户对商业资本已极为依赖。在上引记载中，曾着重描述了一个名叫施复的织户，怎样由“妇络夫织”的家庭手工业者，后来发展为“开起三四十张轴机”的资本主义工场主的故事：

嘉靖年间，这盛泽镇上有一人，姓施名复，……家中一张轴机，每年养几匡蚕儿，妇络夫织，甚好过活。……温饱之家织下轴匹，必积至十来匹，最少也有五六匹，方才上市。即大户人家积得多的便不上市，都是牙行引客商上门来买。施复是个小户儿，本钱少，织得三四匹便上市出脱。……一

① 徐一夔：《始丰集》卷一，《织工对》。

② 冯梦龙：《醒世恒言》，《施泽雄绸遇友》。

日，已积了四匹，……到个相熟行家来卖。……蚕种拣得好，……下丝来细圆匀紧，洁净光莹，……照常织下的轴拿上市时，人看时光彩润泽，都增价竞买，比往常每匹平添许多银子。因有这些顺溜，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轴机，家中颇为饶裕。……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轴机。①

这个故事充分反映了丝织业有扩大再生产的必要与可能，一个生产者只要生产条件较好而个人劳动耗费低于平均耗费，出售商品时就处于有利地位，而可以从较多的积累中来扩大再生产的基础。这里可以举明人张瀚自序其发家经过来作为例证，“毅庵祖家道中微，以酤酒为业。成化（公元1465—1487年）末年，值水灾，……因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诸色纹布，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②在这段简短的自叙中，反映了当时丝织业中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扩大再生产的迅速进行和资本急剧增殖的具体情况。

到明朝末叶时，这种分化情况又进一步发展，当时一方面有少数“机户”因生产条件优越，倚靠剥削雇佣劳动而发财致富，例如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有个潘壁成，其家“起机房织手，至名守嫌者，始大富，至百万。”③其他类此者还有很多。另一方面，很多织工丧失了生产资料，变成为出卖劳动力以

① 冯梦龙：《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

② 张瀚：《松窗梦语》卷六。

③ 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八。

维持生活的雇佣劳动者。例如在万历年间的苏州，“东城之民，多习机业。机户各隶官籍。佣工之人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又有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鹁坊。什百为群，粥后始散。”^①这种“机户出资，机工出力”^②的情况，已经是习以为常的普遍现象了。正由于大批劳动者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一旦受雇的作坊或工场停工倒闭，就无法生活。例如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苏州织工曾被迫起来反抗明朝政府强征织机重税，当时应天巡抚曹时聘在给明神宗的奏疏中叙述织工的情况说：“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③当时在苏杭一带，这种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织工，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曾经几次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展开自发的反抗斗争。

织造棉布，是由明代开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工业。棉花在元时始由岭南传入松江，至明而普遍到全国各地。尚在元末农民战争时期，朱元璋占领了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即曾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④后来在赋税中规定夏税秋粮按地亩征收棉花、棉花绒及棉布，这就促使“棉花种遍天下”，而“织机十室必有”^⑤。这样，它一方面给家庭手工业以新的内容，加强了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它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棉花的普遍种

① 《吴县志》卷五二上，〈风俗〉。

②③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④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⑤ 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

植和纺织技术的不断提高，明代中叶以后，棉布成为全国畅销的商品，人民已普遍用棉布制衣了。当时棉纺织业的中心地区仍然是松江，这里所生产的棉布和纱布，“北鬻秦晋，南运闽粤”，诚如明末叶梦珠《阅世篇》所云：“吾邑（上海）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绩成布，衣被天下。”而秦晋湖广浙赣闽粤之“富商巨贾，操重货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入清以后，华北又成为另一个重要产棉区，根据方观承所述，单以直隶（河北省）而论，乾隆（公元1736—1795年）时期，棉花种植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所产棉花和棉布已大量输出境外，“三辅神皋沃衍，……种棉之地约居十之二三，岁恒充羨，输漕四方”；“产既富于东南，而其织经之精，亦遂与松娄匹。……更以其余，输漕大河南北，凭山负海之区，外至朝鲜，亦仰资贾贩，以供絺布之用”。故“每当新棉入市，远商翕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列肆以敛之，懋迁者牵车以赴之，村落趁虚之人，莫不负洁纷如，售钱鬻易盐米。”^①可见明清以来，植棉与织棉业有极大的发展，种植棉花与织造棉布已成为当时重要的商品生产。

由于棉布有广阔市场，棉布的产销数量巨大，故在棉织业中心地区便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首先是商业资本侵入棉布生产，并逐渐转化为产业资本。据顾公燮记述：“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②这是布号以其商业资本控制着为布匹加工的染坊和踹坊。又如：“苏布名重四方，习是业者阊门外上下塘居，多谓

① 方观承：《御题棉花图》。

② 顾公燮：《消夏记稿钞》，《芙蓉塘》。

之字号。自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布，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惟富人乃能办此。”^①围绕一家布号即有数十家赖以举火，正说明这是在商人雇主支配下的一种“散工制度”，与英国十五、六世纪时盛行于毛纺织业和刀剪业等部门中的情况大体相同，上述记载中所谓漂布、染布、看布、行布等，乃布号进行散工时的各种程序。商人雇主制不仅见于棉布生产，且出现于棉布的再制品——暑袜的生产中，例如：松江“郊西尤墩布，轻细洁白，市肆取以造袜，诸商收鬻，称于四方，号尤墩暑袜。妇女不能织者，多受市值，为之缝纫焉。”^②进行这种计件加工的人很多：“松江……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③这里缝纫暑袜的男妇，已不是在自己的原料上加工，制成后出卖劳动成果的独立生产者，而是接受商人发给的原料，制成后交回商人，然后计件而受一定报酬的工资劳动者。

采矿冶金工业在明清两代亦有进一步的发展。以冶铁工业为例，明代放弃官营，所有产铁地区都听民开采，以产量的十五分之一输纳于官为“岁课”，政府设“铁冶所”，以专司其事。明初设十三所，岁输铁七百四十六万余斤^④。嗣后虽时有增减，但变化不大。岁课系产量的十五分之一，可想见各场规模之大。《天工开物》在说明铁的冶炼程序时，曾述及化铁炉的容量和每炉日产量：“凡铁一炉，载土（铁矿砂）二千余斤，或用硬木柴，或用煤炭，或用木炭，南北各从利便。扇炉风箱，必用四人

① 《吴县志》卷五二上，《风俗》。

②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九六。

③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

④ 《明史》卷八一，《食货五》，《坑冶》。

六人带拽。土化成铁之后，从炉腰孔流出，炉孔先用泥塞。每旦昼六时，一时出铁一陀，既出，即又泥塞，鼓风再熔”。①一座化铁炉能容矿砂二千余斤，再加木柴或煤炭，其体积实相当庞大，日间出铁六陀，即需矿砂万余斤。风箱需六人拽带，则采矿、运矿、司炉、炒熟铁、炼钢等等，其用人必更多。可见冶铁既需大量资本，又需大批工人，事实上不可能由小作坊经营，必为大型工场无疑。

清代的冶铁工业基本上沿袭明代的规模，冶铁工场都是大规模企业。例如广州炼铁场是：“炉之状如瓶，其口上出，口广丈许，底厚（宽）三丈五尺，崇半之，身厚二尺有奇，以灰沙盐豔筑之，巨藤束之，铁力紫荆木支之，又凭山崖以为固。炉后有口，口外为一土墙，墙有门二扇，高五六尺，广四尺，以四人持门，一阖一开，以作风势。……下铁矿时，与坚炭相杂，率以机车从山上飞掷以入炉，其焰烛天，黑烛之气数十里不散。铁矿既溶，液流至于方池，凝铁一版取之，以大木杠搅炉，铁水注倾，复成一版，凡十二时，一时须出一版，重可十钧，一时而出二版，是曰双钧，则炉太王，炉将伤。……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赢，八九版则缩。”②这是一个铁场的大概情况。资本在万金以上，直接生产者达八、九百人，辅佐人员尚不在内，规模之大，实属空前。

铁器铸造业虽不如冶铁炉场规模之大，但也是一种资本主义

① 宋应星：《天工开物·五金》。

②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

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并有一定程度的分工：“诸冶惟罗定、大塘基炉铁最良，悉是错铁，光润而柔，可拔之为线，铸镞亦坚好，价贵于诸炉一等。诸炉之铁冶既成，皆输佛山之埠。佛山俗善鼓铸，其为镞，……凡铸有耳者，不得铸无耳者；铸无耳者，不得铸有耳者，兼铸之必讼。……故凡佛山之镞贵坚也。……鬻于江楚间，人能辨之。以其薄而光滑，消炼既精，工法又熟也，诸所铸器，率以佛山为良。……其炒铁则以生铁团之入炉，火烧透红，乃出而置砧上，一人钳之，二三人锤之，旁十余童子扇之。……计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一肆数十砧，一砧有十余人，是为小炉。炉有大小，以铁有生有熟也。故夫冶生铁者，大炉之事也；冶熟铁者，小炉之事也。”^①可见佛山铸造业也是一种大规模经营，各肆都是专门生产一种商品，其产品提炼既精，工法又熟，故有广阔市场。各肆都是工场手工业，一肆有数十砧，砧有十余人，是一肆之中已有锻工近百人，并实行着简单分工。

以上我们概括地叙述了明清两代的纺织业和冶铁业，以及资本主义萌芽在轻重两个工业部门中缓慢发展的情况。其他各种重要手工业如陶磁、制盐、制糖、酿酒、造纸、造船等，比之过去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变化并不巨大，这里不必要再一一列举了。

货币经济永远是与商品经济相辅而行的，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货币经济亦跟着有大致相同的发展。贵金属白银虽然从唐代起即已开始流通，但在货币制度中确立其统治地位，则

^①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

是明中叶以后的事。从这时起，一向以实物缴纳的赋税、盐课、杂税、丁徭等等一概以银折纳，名为“一条鞭法”，到万历时“乃尽行之”^①，折征的银谓之“金花银”。这样一来，农民的一切负担都货币化了，他们不能再以其直接生产物来缴纳租赋，而必须将产品出卖于市场，易银折纳。

所以从明代起，特别是明中叶以后，一切农产品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渐商品化了。因为农民不但要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而且要生产可以在市场上容易换取货币的商品，甚至完全生产供出卖的商品，而以出卖商品所得的货币来购买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这时的农民，正如列宁所指出，“他们不论在个人消费方面或者在自己的生产方面都为市场所左右。”^②人们的生活资料既不必都由自己生产，而可以依赖于市场，说明自然经济已经分解，农业已经可以实行地域分工，即各地农民可以就其土地所宜，生产供广大地区需要的一种或数种商品，其不适于在本地生产的则由外地供给。

在农产品普遍商品化的过程中，各种重要的经济作物的商品生产尤为发达。例如适应丝织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植桑和养蚕，是比较发达的农业商品生产之一。当时浙江、南直隶、四川是桑蚕生丝等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湖州更以产丝著名，所产生丝供应苏杭一带丝织业的需要，所以桑蚕生产特别发达，乃至“俗以桑为业”，养蚕之家多自栽桑，否则即预租别人之桑，俗称“秒叶”，一般地主富农其田连阡陌的大地产，都是“桑麻万顷”。

^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赋役》。

^②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142页。

棉花的种植是适应棉纺织业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农作物商品生产。在明清两代，是“棉花种遍天下”，其情况已见上文，兹不赘述。

茶一向在中国农业经济中占有特殊地位，明清两代又有了大量发展。茶为明代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政府特设茶局来管理茶的产销，茶的产区亦比前代增多。明代的产茶区，除前述唐宋以来各产区仍继续发展外，陕西有汉中茶，产于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这一区的茶主要运销西北边区；四川有巴茶、松茂茶、犍门茶、永宁茶、筠连茶。这一区的茶主要运销西南边区，“其他产茶之地，南直隶常、卢、池、徽、浙江湖、严、衢、绍，江西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广武昌、荆州、长沙、宝庆，四川成都、重庆、嘉定、夔、泸。”^①茶不仅是国内市场的重要商品，而且在国外市场上中国茶也曾长期维持垄断地位。明代以茶和藏族及西南各族交换马匹，十七世纪中叶以后，茶又成为输往欧美市场的主要商品。自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开始贸易以来，茶始终占输出第一位，数量逐年增多，一七五二年，输出茶叶已达五十万磅左右，增长的趋势一直继续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甘蔗的栽培和制糖，亦是明清两代的主要商品生产之一，其行销于国内外市场的数量很大。糖的种类亦比前代为多，仅白糖以质量的精粗区分即有五种之多^②，这反映了当时制糖技术的进步。糖的消费量既大，甘蔗的栽培区亦大量推广，除闽、粤、四川等省外，清初又扩展到江浙一带。清代的产糖区以广东为首，

^① 《明史》卷八〇，《食货志》四，《茶法》。

^② 宋应星：《天工开物·甘嗜》。

故甘蔗栽培亦以广东为最多。广东产糖区种植的甘蔗是：“连冈接阜，一望丛若芦苇。……粤人开糖房者多以致富。盖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矣。”^①可见制糖与栽培甘蔗已成为当地极其重要的商品生产。

染料植物的栽培，是适应纺织工业的需要而兴起的一种商品生产，故凡纺织业发达的地区，染料植物的栽培和可供染色的天然植物的商品化亦特别发达。在染料植物中应用最广的是蓝靛：

“凡蓝五种，皆可为淀。茶蓝……蓼蓝、马蓝、吴蓝……。”^②明时蓝靛主要产于福建，其后逐渐推广于全国各地，如纺织业较为发达的松江一带，种蓝靛的亦极普遍，惟品质仍以闽产为良。闽产蓝靛，行销全国，数量甚大。红色染料主要为红花、苏木两种。苏木由国外输入，红花产于闽、粤、江南一带。此外如槐花，明时亦用作染料，把向属无用的槐花捏制成饼，售于染家。

烟草的种植是由明末开始的一种新商品生产。烟草初由吕宋传入福建，继而推广全国。明末江南一带开始种植，惟当时吸用烟草之风尚不甚流行，至清初才开始普遍：“无人不用，虽青楼稚女，金管锦囊，与镜奁牙尺并陈矣。”^③

总之，在明清两代，农产物的商品化，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比过去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必须指出，所有这些发展，还只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解体，有了一些向资本主

①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七。

② 宋应星：《天工开物·彰施》。

③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九。

义转化的开端，还远远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在农业中确立，小农业和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仍然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形态。

（四）结 论

总结以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以下几点：

（一）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具有许多与欧洲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不同的特点，例如城市的性质和作用不同、没有欧洲型的行会制度及其严格的约束力量、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发达较早、雇佣劳动很早出现等等，这些情况的较早产生和长期存在，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可能在比欧洲早得多的时间出现。

（二）唐代虽然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时代，但是随着国内外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同时又使早已存在的雇佣劳动制与商品生产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一些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型作坊。尽管这还是稀疏地在个别地区或个别生产部门中偶然看到，但都反映出在封建经济结构的胎内已经在开始孕育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成为后来资本主义萌芽大量出现的历史前提。

（三）宋代的商品经济在唐代已有的基础上，向广度方面和深度方面都大大地发展了。同时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比之唐代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使用着雇佣劳动和实行着协作分工的大型作坊或手工业工场，已经是大量地和经常地出现，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在许多经济发达的地区和许多生产部门中大量地和经常的出现，其所达到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十四、十五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

（四）资本主义萌芽本来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也不是必然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靠保证，换句话说，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不一定会发展到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地中海沿岸城市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后来低地国家沿岸城市的历史又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情况更证明了这一点。在宋代已经出现并且已经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象英国那样，使它迅速地成长壮大起来，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正式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帷幕。中国在宋代以后，社会经济经过一次巨大波动和严重破坏之后，恢复和发展一直是一种迟滞状态，从十四世纪中叶的明初到十九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时期，在长达五百年左右的时间中，资本主义仍然停滞在萌芽阶段上，而欧洲的资本主义已经在征服世界了。

（五）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迟滞，乃是商品经济发展迟滞的结果，这个现象的形成并不是偶然，而是由中国封建经济规律决定的，本书各篇论文所阐述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所具有的种种特点，对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作为它的集中表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都在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

〔原载《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三联书店1980年出版。〕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发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几个问题

傅衣凌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被提起，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代言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之流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大肆宣扬历史没有规律可循，散布东方文明长期静止，外国资本的入侵帮助中国的开化等等谬论。他不仅不注意中国历史的真正研究，并加以种种歪曲，把中国史研究搞得一团糟。直到一九二六、二七年大革命中及其失败以后，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探讨革命失败的根源，反驳帝国主义代言人以及革命叛徒对中国历史以歪曲，才开始从事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并展开了讨论。有些人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中国不产生产业革命等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不过提得并不十分明确，进一步的研究亦还不多。